

# AN AFFAIR OF STATE

## 国家事务

### THE INVESTIGATION, IMPEACHMENT, AND TRIAL OF PRESIDENT CLINTON

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与审判

Richard A. Posner

【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

彭安 等/译

蒋兆康/校

法律出版社





# AN AFFAIR OF STATE 国家事务

**THE  
INVESTIGATION,  
IMPEACHMENT,  
AND TRIAL OF  
PRESIDENT CLINTON**

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与审判

**Richard A. Posner**

**【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

彭安 刘春凌 何晓睿 高宇翹 蒋兆康/译  
蒋兆康/校

法 律 出 版 社



## 中文版作者序言

《国家事务——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与审判》一书最早出版于1999年,现在由此前翻译我《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蒋兆康先生和其他专业人员翻译成中文。本书叙述和分析了喧嚣一时的克林顿事件,这一事件起始于1988年1月克林顿总统与一名年轻政府雇员(莫尼卡·莱温斯基)之间性事的披露,并于其被众议院弹劾后、1999年2月的参议院审判和无罪判决而达到高潮。<sup>①</sup>这一事件起源于数年前由波拉·琼斯对克林顿所提起的性骚扰案件,波拉·琼斯在克林顿任阿肯色州州长时供职于该州州政府。琼斯的律师们风闻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事后,在琼斯案件的初审中要求克林顿对此作证。克林顿宣誓作证否认该性事,从而引发了突如其来的独立检察官肯尼思·斯塔尔的调查,这一调查又导致了大陪审团的调查。在大陪审团的调查中,克林顿再次宣誓作证,并再次否认了他与莱温斯基的性关系。其后不久,克林顿最终不得不在确凿的实物证据面前收回其宣誓证言,他明显的、宣誓后的谎言首先成了参议院委员会调查的基础,其后又成了众议院指控伪证和妨碍司法、以及参议院委员会调查的基础,其后又成了众议院指控伪证和妨碍司法的弹劾的基础,

---

<sup>①</sup> 在完成本序言翻译之际,克林顿终于在他离职的前夜与独立检察官达成辩诉交易,同意接受罚款而免于在离任后被独立检察官指控其伪证罪,从而“体面地”使本案得以终结(译者2001年1月19日注)。



## 2 · 国家事务——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与审判

最终成了参议院对他审判和免罪的基础。

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事丑闻和由此而生的一系列调查和其他程序,提出了许多复杂而又重要的法律、政治、道德和文化问题,本书就力图解释和分析这些问题。法律问题主要涉及妨碍司法的法律(法律调查或其他法律程序中的伪证只是其中的一种)、将大陪审团用作调查工具、独立检察官法(该法在克林顿被判决无罪后不久就时效届满,至今未被续展)的合宪性、允许一件基于总统任职前的行为而针对其提起的民事诉讼在其任职期间继续审理的适当性、弹劾总统和免除总统职务(参议院在认定被弹劾行为有罪的情况下作出的惟一制裁)的理由和程序。由于弹劾的理由并未在美国宪法中明确表述,法律问题就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卷入了道德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一个官员的私人道德行为是否可以成为被弹劾的理由(私人道德与其公共道德——与其职务相关的道德义务的履行——不同,我们假设两者是可以区分的)。有人可能会争辩,一个国家领袖的重要作用就是成为其公民优良行为的楷模。如果真是这样,只要总统不能成为楷模,那么无论如何胜任其职责,他终将背叛其职责。

在评价这一美国公共生活中的鲜有事件时(在此之前,历史上只曾出现过一次,即1868年对另一个美国总统的弹劾),其中心问题是法律和道德问题,但同时还存在有趣的政治和文化问题,当然还有本书讨论的职业人员的局限性。这里尤其重要的是职业人员,特别是律师、法官和政治家在对其专业活动范围外的情势(如总统性丑闻和随之发生的弹劾)作出反应时所面临的困难。几乎所有在这一事件中扮演角色的个人在事后看来都犯有技术性的错误。

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是对公共事件作出公开评论的学者)在对发生的公共事件进行学术评判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强烈的情绪化倾向。由于这一丑闻和随后的弹劾涉及性问题和更广泛的“生活方式”问题,由于克林顿是一个文化两极化的人物,知识分子们就在极大程度上难以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对这一事件作出冷静而理性的分析。

这一事件表明美国社会的耐久力和恢复力,虽然总统职位由于论战和抗争而持续动荡一年以上,但这个国家的私人和公共生活并未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也未出现持久的创伤。但是,这一事件向人们警示:美国的职业精英们并未对有效地处理一些未有先例的挑战做好充分的准备——最近发生的 2000 年总统选举僵局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教训。

中国具有一个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我对此不甚了解。但是,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社会,无论如何它也能从中积极地获取所应获取的经验和教训,凭借智慧有效地处理各种社会和政治事件。

理查德·A·波斯纳

2001 年 1 月 15 日



## 人 物 表

莫尼卡·莱温斯基 (Monica Lewinsky)	白宫实习生,其后成为白宫雇员,克林顿的女友,参议院克林顿审判的证人
威廉·克林顿 (William Clinton)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肯尼思·斯塔尔 (Kenneth Starr)	调查总统的独立检察官
贝蒂·苛莉 (Betty Currie)	总统私人秘书
艾维林·李伯曼 (Evelyn Lieberman)	白宫办公厅副主任
波拉·琼斯 (Paula Jones)	克林顿性骚扰案件原告
苏珊·韦伯·莱特 (Susan Webber Wright)	琼斯案件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 2 · 国家事务——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与审判

比尔·理查森 (Bill Richardson)	美利坚合众国驻联合国大使
弗依·乔丹 (Vernon Jordan)	华盛顿律师,克林顿友人,参议院克林顿 审判的证人
罗纳德·佩雷尔曼 (Ronald Perelman)	雷福龙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
希尼·布鲁门瑟尔 (Sidney Blumenthal)	总统助理,参议院克林顿审判的证人
韦伯斯特·哈贝尔 (Webster Hubbell)	司法部前副部长
琳达·翠珀 (Linda Tripp)	五角大楼雇员,莱温斯基密友
凯瑟琳·威莉 (Kathleen Willey)	白宫志愿工作人员
罗西尼·哥德伯格 (Lucianne Goldberg)	保守党出版代理人,琳达·翠珀友人
吉尼弗·福拉沃斯 (Gennifer Flowers)	克林顿前女友
文斯·福斯特 (Vince Foster)	白宫前副法律顾问,自杀
理查德·梅伦·斯凯弗 (Richard Mellon Scaife)	克林顿反对者

罗伯特·费斯克 (Robert Fiske)	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前任
詹姆斯·卡维尔 (James Carville)	政治顾问,克林顿辩护人
罗伯特·贝尼特 (Robert Bennett)	琼斯案克林顿的首席律师
戴维·肯德尔 (David Kendall)	斯塔尔调查过程中克林顿的首席律师
亨利·海德 (Henry Hyde)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参议院审判克林顿时 的首席检察官
汤姆·德雷 (Tom Delay)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
查尔斯·拉弗 (Charles Ruff)	白宫法律顾问,克林顿在弹劾和审判中的 首席律师





## 时 间 表

1991 年 5 月 8 日	波拉·琼斯在阿肯色州的一家旅馆遇见州长克林顿
1992 年 11 月 3 日	克林顿当选总统
1994 年 5 月 6 日	波拉·琼斯起诉克林顿性骚扰,要求赔偿 70 万美元
1994 年 8 月 9 日	肯尼思·斯塔尔被任命为独立检察官,调查白水门不动产交易
1995 年 7 月	莫尼卡·莱温斯基成为白宫实习生
1995 年 11 月 15 日	克林顿开始与莱温斯基的性关系
1996 年 4 月 5 日	莱温斯基调往五角大楼
1996 年 11 月 5 日	克林顿再度当选总统
1997 年 3 月 29 日	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最后一次性接触
1997 年 5 月 27 日	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允许琼斯案件继续进行

## 2 · 国家事务——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与审判

1997 年 11 月	莱温斯基同意弗依·乔丹协助她在纽约寻找职位
1997 年 12 月 5 日	莱温斯基的名字出现在琼斯案件的证人名单上
1997 年 12 月 28 日	贝蒂·苛莉从莱温斯基处取回礼物,并藏于床下
1998 年 1 月 7 日	莱温斯基在她给琼斯案件作证的宣誓书上签字
1998 年 1 月 13 日	莱温斯基接受雷福龙公司的工作邀请(后放弃)
1998 年 1 月 16 日	肯尼思·斯塔尔受命调查莱温斯基事件
1998 年 1 月 17 日	克林顿在琼斯案件中宣誓作证
1998 年 1 月 18 日	克林顿会见贝蒂·苛莉,讨论其证词
1998 年 1 月 21 日	《华盛顿邮报》披露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及其调查
1998 年 4 月 1 日	联邦地区法院决定不受理琼斯案
1998 年 7 月 28 日	莱温斯基同意与独立检察官合作
1998 年 8 月 17 日	克林顿通过闭路电视在大陪审团作证,然后对全国讲话
1998 年 9 月 9 日	《斯塔尔报告》被提交国会

**时间表 · 3**

1998 年 9 月 21 日	克林顿在大陪审团的作证被播放
1998 年 10 月 8 日	众议院投票进行弹劾调查
1998 年 11 月 3 日	中期国会选举,民主党业绩超过预期
1998 年 11 月 9— 11、19 日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
1998 年 11 月 19 日	琼斯案件以 85 万美元和解
1998 年 11 月 27 日	克林顿回答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的 81 个问题
1998 年 12 月 1、8—10 日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
1998 年 12 月 11—12 日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批准 4 项弹劾条款
1998 年 12 月 19 日	众议院批准 2 项弹劾条款,克林顿总统 被弹劾
1999 年 1 月 7 日	参议院开始对总统的审判
1999 年 2 月 6 日	录像作证证词被提供给参议院
1999 年 2 月 12 日	审判结束,克林顿总统被判无罪



## 引言

始于1998年1月21日、历时长达一年的这场涉及政治、法律、宪政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斗争,是美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篇章。其间,整个世界都风闻独立检察官肯尼思·斯塔尔在调查对克林顿总统作伪证和其他妨碍司法行为的指控(主要是唆使他人作伪证和收买证人,并力图掩盖他和一位名叫莫尼卡·莱温斯基的年轻的白宫女雇员之间的性关系)。该项调查在1998年12月19日达到高潮,当日众议院就克林顿总统在大陪审团作伪证和故意妨害司法而通过对他的弹劾<sup>①</sup>。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弹劾总统。第一次是130年前对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1974年,倘若里查德·尼克松不是在众院司法委员会向众议院提出弹劾建议案后辞职,他也可能受到弹劾和定罪。1999年1月7日,参议院开始对克林顿总统的审判<sup>②</sup>。这一经过有雷声无雨点、虎头蛇尾——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模仿法

---

① 弹劾总统在大陪审团作伪证的投票结果为228:206,一名众议员弃权;弹劾总统故意妨害司法的投票结果为221:212,两名众议员弃权。

② 虽然审判名义上持续了一个多月,实际上真正的审判只有1天—2月6日,当时由起诉方和被告方向参议院授权众议院的主持人提交他们所要求提交的三位证人(莫尼卡·莱温斯基、弗依·乔丹和希尼·布鲁门瑟尔)所存录像带的有关部分(2月6日庭审的官方记录发表在《国会记录》,第1290卷,第145页[1999年2月6日])。这里有一个语义学上的问题。在弹劾案中使用的“审判”一词是指参议院的全部活动过程,既包括审判前的活动(预先动议和审判前披露),也包括听证,后者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审判。



## 2 · 国家事务——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与审判

律正义的拙劣滑稽剧——审判于2月12日以宣告总统无罪而告终<sup>③</sup>。至此,始于1998年1月21日的这场斗争的主要法律过程的结果、在本书中分析的这一事件的记录已经结束。虽然地震的余波仍在继续(像朱尼塔·布劳瑞克的强奸起诉、莱温斯基的电视会谈和出版书籍等活动)。

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引起了我特殊的兴趣。乍一看好像是头等重要的政治危机,然而现在看来其实最好被描述为政治闹剧或喜剧(除对当事人外)。其一,是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尤其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联,这是我多年来的学术兴趣所在<sup>④</sup>。其二,是它绝对的多面复杂性——事实的、法律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它要求用一种我曾经在前几本涉及交叉学科(如性和成长)<sup>⑤</sup>的书中尝试使用过的那种处理方法——总体概括和提纲挈领。并非每个人都对克林顿总统弹劾事件给予了应当给予的足够关注,结果,就有一种其历史将迅速进入神话的危险<sup>⑥</sup>。第三个使我着迷的特点与第二点相联系:这一戏剧有着如此广泛的角度,如此复杂的感情纠葛,以致一个人很难保持平衡的心态和正确的视点来作出明智的反应。

明智的——而非司法的宪法构造者们曾经谨慎地把审判人员排除在弹劾的裁决之外(除主持参议院审判的大法官外)。我们这些法

---

③ 定罪投票的结果是:伪证罪 45:55,妨害司法 50:55。定罪需要 2/3 多数票(分别应为 67 票和 33 票)。对总统的不信任动议在程序上被否决。

④ 参见我的书:《法理学问题》(1990),《超越法律》(1995)以及《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难问题》(1990)。

⑤ 《性和理性》(1992)和《成长与老年》(1995)。

⑥ 在这一事件结束之前,公众心目中存在严重的困惑是明显的。例如,一封在参议院审判快要结束之前写给《纽约时报》编辑部的信,攻击《时代周刊》“玩弄一种审查加批准的过时游戏。伪证指控看来因缺乏证据而土崩瓦解,但是众议院的教长们想要使妨碍司法的指控成立。我看不出克林顿先生有任何法律上意义的具体的妨碍司法的行为。那么要克林顿总统承认什么呢?同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性关系亦或对此撒谎吗?他已经在无数场合承认了这一点。”《纽约时报》1999年2月3日第22页A,我们将会看到伪证指控是有充分根据的,总统在几个场合从事了法律上的妨碍司法的行为,而且他从未承认他对他和莱温斯基的关系问题撒过谎。

官则仅限于观察者的角色。联邦司法的伦理规则禁止对悬而未决的疑案发表公开评论,我猜想,也包括弹劾案在内——但我并非是在讨论任何悬案。然而,在写到克林顿弹劾案以及与此有关的事件时,一个人不可能丝毫不触及政治敏感问题,尤其是丝毫不批评克林顿总统和国会议员的行为。一个联邦法院的法官来写这个问题,即使他是以学者而非法官的身份来写,隐藏在这种假设的缺陷背后的原则,也是我所支持并且认识到的、束缚着我自己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法官们在政治上往往是不积极的。但是对总统行为的批评,以及对这幕戏剧中其他政治演员的批评,与政党斗争交织在一起,确实普遍存在。我在自己的分析中努力避免任何党派的影响,我希望力所能及地使这种缺陷中立化。

除了纯粹叙述上的复杂性,克林顿案件还提出了很多独特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分开,它们与那些争论不休的、不全为人所知的事实<sup>①</sup>相联系,因此需要加以衡量和筛选。其中有法律问题,包括刑法的、宪法的、证据法的,以及用以指导弹劾及审判的一些实体的和程序的原则;有法理问题,关于历史知识和现实理性在解决法律和政策问题中的正确作用,公众观点与法律正义之间的区别,以及(与此有关的)把弹劾过程描述为“合法”的意义和适当性;有道德的问题,既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道德;还有政治理论、政治史、政治学的问题,以及作为史学和政治学的专门分支学科的、所谓“总统研究”的问题;有引发冲突理论、战略学、以及无数令人困惑的政治和文化社会学的问题,包括产生所谓“道德右翼”和“学术左派”的社会学问题(这些都是粗略的、大致的分类,在下文我将展开论述)。

作出决定论述这场弹劾和罢免克林顿总统的斗争,我没有什么歉意,尽管它有党派色彩,并因它起于一种性关系而被传闻附上了一

---

<sup>①</sup> 我没有试图超出这些事实的公共记录。我不是记者,也非侦探或者网虫。我没有去采访,或者把结论停留在仍然萦绕着这一争论的谣言上。虽然,在努力避免袖手旁观时我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法官和陪审团的成员从公开记录中允许作出的推论。

#### 4 · 国家事务——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与审判

个俗丽的花边,而且对于在这一事件之后这么快就试图写一本学术性的著作,我也没有什么歉意。在事件之后吗?不,事实上是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之中。我于1998年10月开始写作,那时危机正盛,结果也尚未可知,写作截止到1999年2月16日,即在参议院审判结束后四天<sup>⑧</sup>。时间距离如此之近,写作时就难免因近距离而缺少透视,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图像,不能基于长远的结果而只能进行猜测,即是在没有最后结论的情况下写作的。但是,它是用新鲜的、即时的材料写作的,而不是等到历史已使它们变得模糊不清时才开始写作。这是一种同步的历史(听起来像是矛盾修辞法),虽然我并不想同塔西图斯(Tacitus)或者塞西笛兹(Thucydides)或者苏图流斯(Suetonius)相比。对这一事件的近距离写作也得以同那种事后诸葛式的偏见<sup>⑨</sup>保持相对的距离,虽然也受到一些限制。本书并非是一本日记,其判断是基于这一故事是怎样结束的<sup>⑩</sup>,而不是基于历史最终对它作何评判。

事后诸葛式的偏见是编史工作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旦某一历史事件被宣布为“结束”(到目前为止任何历史事件都可以这么描述),就会倾向于将它看做是某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实际上那是一种被描述的结果。结果对解释起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压力,那些瞎撞运

---

<sup>⑧</sup> 那是我将最后的书稿交给出版社的前一天,此后我只作过略微的更改。

<sup>⑨</sup> 这一点,可以参见巴茹奇·菲兹乔夫:《事后诸葛亮预见:在不确定的条件下结果对于判断的影响》一文,见《实验心理学杂志·人类认识和行为》第1期,1975年总第288期。

<sup>⑩</sup> 假如它已经结束的话——这是一个概念问题。克林顿总统和经受这场考验的其他当事人仍存在被指控为犯罪的危险。克林顿可能会受到审理琼斯案的初审法院的处罚(1999年4月12日法官发现克林顿在作证时撒谎,藐视法庭。见琼斯诉克林顿案,《西方判例汇编》第1999卷,第202909页[阿肯色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判决],但是还没有判定他究竟应当为此付多少罚金)。根据阿肯色州律师界的意见,如果强调本案中的政治因素,这个故事应当到2000年大选时才算结束。这就是我先前为什么说参议院2月12日判决总统无罪只是“主要的法律阶段”结束了。还有一点,尽管《独立检察官法》在1999年6月30日就已到期,仍然允许一名独立检察官完成任何未尽的调查。参见《美国法典》,第28卷,第599条。

气碰上好结果的事情可能被描述为辉煌的、先知先觉的行为,而那些明智的做法——基于当时可能得到的信息所可能作出的最佳选择,则被描述成可以避免的失误。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曾对这种事后诸葛式的偏见所产生的倾向作过著名的抨击。在他看来,历史的基本法则是非故意的结果<sup>①</sup>。我认为在克林顿——莱温斯基案件的调查过程中,以及接下来对总统职位的考验过程中,有很多证据能够证明托尔斯泰这番关于历史的理论。这一点在目前尚容易理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变得模糊不清。不过,毫无疑问,本书中的很多判断将来都可能会被修改。对于案例的研究,在案件如此复杂多面的时候,必然缺少在某一方面单独著述所能达到的深度。但是对这一特殊案例的研究也可视为对我以前提出的一种经验主义的验证,这种经验主义是法律和哲学所要求的<sup>②</sup>,这就是主张现实主义优于形式主义,对法律和公共政策问题采用现实的分析方法优于哲学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反对用宪法理论和道德理论来处理这类问题。案例研究既是研究(分析),又是案例(描述),我试图使两者平分秋色。

克林顿的桃色新闻像戏剧一样令人兴奋,但是,对于强大的、权威的美国机构来说,它又如一篇解说词一样严肃。我将要讲述的是司法、政治体制、国会、法律职业以及学术界对一个崭新的挑战处理失败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克林顿和其他涉案当事人失败的故事。不过,体制上的失败也许更有意思。我们将看到貌似强大而实则脆弱的体制,一旦遇上没有准备的事件就立即坍塌,像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美国的大学遇上事先毫无准备的学生骚乱事件时那样。克林顿总统的非常行为——色欲和谎言的双料炸药——对体制造成同等程

---

① 有趣的是,有证据表明,事后诸葛式的偏见可以通过指出人类行为中偶然的角色以及许多无法预见其性质的事件而予以减少甚至消除。参见达维德·瓦萨门、里查德·O·伦坡特和瑞德·赫斯特:《事后认识与偶然性》,载于《个性与社会哲学通讯》第 17 期,1991 年,第 30 页——即托尔斯泰所强调的特点。

② 参见前文注释④中的参考文献。



## 6 · 国家事务——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与审判

度的震动(在两次学生动乱中大学也受到冲击),他们也不知如何处理。但是,由于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美国经济一直保持繁荣和稳定,具有一种超越其体制因素的恢复力,因此能够以对社会机制看上去最小的损失顶住这场风暴(虽然此言为时尚早),那些相信股票市场是美国经济健康的准确的晴雨表的人会说是零损失。

本书不是对这一事件过程原原本本的叙述,不过,第一章是对总统行为和他与莱温斯基事件的源起的描述,因为这是下文所必需的。从所描述的事实本身,我既表明了我所认为最具可能性的观点,也揭示了这一事件在普通刑事程序中的法律意义(例如,假设克林顿是一位大学校长而非美国总统的话),假如犯罪成立会怎样呢?这是不是某种犯罪行为呢——假定不仅从克林顿作为美国总统的地位,而且从独立检察官的调查方法——从检察官起诉和陪审团定罪的角度来看?

这些方法在第一章中并未论及,而是作为第二章的重点。在这一章中,我考察了独立检察官和他的同盟(包括琼斯的律师和支持者),总统的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如何发挥和兜售他们各自对事实的看法。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独立检察官在对总统实施秘密行动的过程中是否违反了法律和道德,辩护人的行为是否有误,指控或辩护方面是否存在错误,即使就像其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糟糕,(这些错误或失误)对假如克林顿不是总统还能否被成功地控诉为犯罪有什么影响?

前面两章应当消除几个对克林顿行为的法律意义的误解,诸如如果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就不会被起诉,或者如果他被起诉定罪,他惟一可被证实的不法行为只不过是,在回答他和莱温斯基关系问题时误导他人,而作出承担刑事责任的裁决需要衡量的是,被告针对原告的不法行为所为的不法行为。一个非总统的普通公民如果发生了类似总统和莱温斯基的关系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读者从这

些章节中应当对此形成一个清晰的观点。正如公开记录所揭示的<sup>⑬</sup>,这些行为的确是犯罪,虽然不像独立检察官和众议院所相信的、被证明是排除合理怀疑的犯罪。考虑到总统的越轨行为以及琼斯诉讼,也就是总统违法行为的最初一幕——比较琐碎、复杂,认为独立检察官的调查太过分也是可能的(虽然到现在为止本书的写作<sup>⑭</sup>基本上是从道德的角度)。琼斯案件是轻微的,在无论何种情形之下法院都应等到克林顿任期届满后再予审理。

假如他不是总统,其定罪量刑就应是,因伪证和与此有关的、在联邦民事诉讼中妨碍司法、以及在大陪审团作伪证而提起的联邦刑事诉讼。对克林顿总统来说,一旦独立检察官在向众议院提起弹劾案之前不作刑事起诉,那么解决问题的方式就将是提起弹劾案——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是否起诉他尚未可知<sup>⑮</sup>。要弹劾一位联邦政府官员必须是有其“重罪和轻罪”,而对此种行为宪法中并无定义。与克林顿总统弹劾案相联系的主要问题是:犯罪行为是否是对总统进行弹劾定罪的必要或充分条件<sup>⑯</sup>?对宪法中弹劾条款的意义是否应当作为一个历史问题,采用史学的研究方法来回答?在一宗总统弹劾案中,政治和国家的考虑应占多大的比重?应当遵守哪些程序规则,尤其是其举证责任是否应为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举证责任?在弹劾

---

⑬ 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假如对总统在本书中讨论的犯罪行为以普通的方式起诉,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将基于提起的特定的起诉、传唤的特定证人和审判中认可的文件,而不是基于弹劾和参议院审判的记录,本书提及的所有法律价值,都在考虑之列。但是不应用它来预测任何由本书讨论的事件引起的未来的任何刑事或民事诉讼。

⑭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因为在本书的写作中独立检察官对总统的调查是在司法部所作的、可能存在的道德上和法律上的不端行为的调查之下进行的。

⑮ 参见第三章,在其中我也讨论过这个有趣的问题,即如果被起诉,总统是否能赦免自己(或许甚至在起诉前)。

⑯ 弹劾总统在技术上是由众议院作出的,总统应就众议院表决通过的弹劾条款接受参议院审判,只有当参议院认定总统有罪他才会被免职。这样众议院提出的弹劾条款就等于刑事案件中的指控,众议院作为控方面对大陪审团,虽然从第三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类比不太确切。“弹劾”一词常常用于描述包括定罪在内的全过程,在下文不会引起混淆的地方我还会这样使用它。



之前,参议院和众议院是否应当采用旨在使弹劾过程更加符合法定诉讼程序要求的那些具体规则?

我考虑过“政治弹劾”的历史和特性,也就是,有人利用弹劾发泄纯粹属于政治分歧的情绪;我也考虑过“选举后的政治”的趋势和民主党的指控——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是党派政治所致、弹劾案因为是由任期届满的国会议员投票表决通过的而应告无效——等等这样一些互相关联的问题。我的结论是,虽然政治弹劾确实不妥,但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不能仅仅因为弹劾表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阵线就将此作为政治弹劾一笔勾销,这两方面都存在党派偏见。

许多人辩称,只有当总统滥用权力时才能对他进行弹劾,这也未必妥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他也这么做了。私人行为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甚至比公共行为还难以采取补救措施,例如战时总统可能违反法律,但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民族利益。但由于我的结论是弹劾权既不限于实际的犯罪行为,也不限于历史上的先例所列举的公共行为,我必须回到总统的行为,力图在比刑事司法更广泛的意义上评价它(第四章),特别是检查其行为的道德多维角度。在这里关键是区分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总统的某些作为可能是非道德的,但不属公共方面,如果对其弹劾可能未尽恰当;而另一些作为又属于“公共道德”的范畴,是与某种职位联系在一起的道德义务或其应当自愿履行的行为。在强调这些义务时,我是反传统的,同意马基亚维利的观点,强调日常生活的小节对一个政治领袖可能不那么重要,政治领袖的身份往往可能给个人增加某些义不容辞的道德义务而不是减少它们。

美国总统的道德义务范围是很广泛的,既包括行政的道德义务(直接与总统执行职务相联系的道德义务),也包括示范的道德义务,也就是象征总统身份的道德义务。这两种道德义务中有一些方面是如此重要,以致违反它可能成为弹劾他或免除其职务的依据,即使他并未犯法,莱温斯基事件及其后果主要是涉及违反总统示范的道德义务,而非行政的道德义务。只是到末尾,由于那个星期巡航导弹进

攻伊拉克,对总统的弹劾达到高潮,才开始批评他作为联邦政府主要领导的能力。

克林顿总统严重违反了私人道德。并非他所承认的,只是同莱温斯基产生了一种“不正当的亲密关系,并误导了家人、朋友、下属”,以及——放在他的忏悔祈祷最后的——美国人民,他一直拒绝承认这种关系的存在,直到对他接触过的莱温斯基一条裙子上的精液进行DNA化验。这种关系使谁遭受不利并非很清楚。克林顿只是误导了极少数人——我们将会看到,说谎者自相矛盾,其谎言不被人相信,反而更加严重地违反了道德法则。

克林顿严重违背私人道德的行为也是违反联邦刑法的行为,是严重的、多方面的、不只是技术的,这些在多大程度上应被视为严重违反公共道德,有赖于人们对总统职位的看法。比较传统的观点是最先由亚里士多德清楚地表述和维护的,在美国历史上以乔治·华盛顿的品质和经历为典范,也是对克林顿总统十分不利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总统应当是一个道德楷模,是我们最崇高的理想的象征,持这种观点的人必定对我所称为示范的道德义务附以重任。比较新的观点——称之为“后领袖政治”是——美国人民已经达到一种政治上的成熟,政治领导人普遍流行的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幻想破灭不会导致大厦将倾,加在总统身上的“示范的”或“角色模型”的义务越来越少,要求越来越低,将弹劾定位于违反这些义务就越是不那么有说服力,虽然就克林顿总统行为所涉及的范围和结果来看,认为他有辱总统职位、达到应予免职的程度尚存争议。

无论从具体细节还是从总体来看,乃至从弹劾过程的范围和形式来看,在第五章中,我提出了他是否应当受到已受的弹劾,以及是否像他没有被定罪那样不应被定罪的问题。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原因是弹劾标准的模糊性以及应用这种标准时某些无法估量的因素的重要性。一方面,克林顿总统进行了一种近乎犯罪的行为,他有蔑视、破坏乃至败坏美国司法系统、美国的法治意识形态以及总统职位和角色形象的倾向,这一点使公众甚为恼火;另一方面,他的行为已

经和可能会对法治和其他社会价值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又是不可知、有可能是十分轻微的。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决定赞成或反对弹劾在普通司法程序的意义上是不够妥当的,这种考虑也是无法估量的,它包括弹劾对总统权力的影响,对联邦政府各机构的权力均势的影响,以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权力均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把总统的权力分给国会(决非肯定的)或各州,分权是大是小,加强或削弱总统的权力对政府的其他部门和私人是件好事还是坏事,等等。

第五章还继续讨论了第三章中与总统弹劾有关的程序问题,我考虑过通过一个各党联合的国会、或者由参议院提出一个指控提案来解决宪法问题和咨询问题,作为对总统定罪和免职的代替方案,我也考虑过参议院在审判一开始就通过休会而中止它是否更好一些,正如许多民主党的参议员(和白宫)所希望的那样,或者是宣称发现总统进行了弹劾条款所称的不法行为,然后宣判他无罪,正如许多共和党的参议员所希望的那样。

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就是第六章的重点,是它的两极化影响。它还涉及到文化抗争,与德瑞弗士案件(Dreyfus Case)相似(使人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历史上总有惊人相似的一幕,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的)<sup>①</sup>。阿尔弗雷德·德瑞弗士在刚刚定罪和判刑后不久即被发现是无辜的。虽然他本人是保守的和爱国的,但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已成为右派憎恨的对象的典型代表,因此他们否认他无罪。德瑞弗士事件中右派的行为反过来对左派来说是如此丑恶,以致它也成为左派对右派同样憎恨的典型代表。以斯塔尔的调查和参众两院反复研究的事实为依据,克林顿的有罪与德瑞弗士的无罪一样。但是克林顿的右派对手们对左派是如此厌恶以致许多左派议员,包括许多智力超群者,都否认他有罪(或对此问题避而不答)。而克林顿本人,虽然是一个中立分子而不是左翼分子——事实上,虽然他是否是里根

---

① 他指的是拿破仑和路易斯·拿破仑。

革命的巩固者尚存争议——成为很多右翼分子最为憎恨的对象(典型代表)<sup>⑧</sup>。为什么克林顿会有这样两极化的影响,这个问题本身亦十分重要。问题的关键,我认为是克林顿私生活的曝光使他不仅成为一个政治地位的象征(实际上很难把他等同于一个政治地位),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一种对于个人责任的态度,同右派的观点相左,而天生同当代美国左派的许多观点一致<sup>⑨</sup>。争端很快变得不可收拾和非理性化,这一分化的迅速和极端在标签理论和社会规范理论的一部近期文献中反映出来,说明规范的创立者们能够怎样诱使人们在对他们不怎么重要的问题上选择立场。

在第七章中,我试图总结这一事件的教训,独立于前述章节中列举的事实。其一,是一些公众知识阶层无力抵制被卷入克林顿事件所引起的非理性的、是非对立的公众政治漩涡。学术界的左派代表一直以参与、参加以及他们对克莱事件评论的道德非敏感性而著称。学术界的右派代表则一直以其误解公众意见、悲观主义和夸张而闻名。中间派做得好一些。而那些善于推波助澜的媒体表现最佳。这一插曲使人们对诸如历史、道德和政治哲学这些领域中究竟有多少学术专家产生疑问,即使法学在对公共政策的新问题上提供有用的、不偏不倚的意见方面是有能力的,它也使人们对所谓的公众知识分子阶层的有用性产生怀疑。同时,它也证实了一些怀疑(我就是这样

---

⑧ 文中所称的“右派”和“左派”必须结合当代美国政治的知识来理解。这些术语所指的勿宁说是一些倾向而非界定明确的团体,一个更加细致的、但不用说更为麻烦的分类,是分为极右派(包括许多“克林顿的仇人”和最为保守的共和党人)和“右派倾向分子”(像威廉·贝尼特和詹姆斯·Q·威尔逊),中立分子(像克林顿本人),“左派倾向分子”或“左派自由主义者”(像约翰·罗尔斯,罗纳德·德沃金,布鲁斯·阿克曼以及许多记者和民主党人)和“极左派”(如《国家》杂志、极端多元文化主义者,帕特里克·卡德尔,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老左派”的残余)。学术左派的代表我们将在第6章和第7章中遇到,主要是“左派倾向分子”或“左派自由主义者”。还有一种划分,是在右派内部进行的,分为道德保守主义和道德自由主义。我们在有关章节中谈到的右派是指前者,而非后者。

⑨ 这并非暗示他是一个贴切的象征——他在拥护他的人群中具有典型性。这也并非暗示每个把他或她自己归入“左派”的人(像我们前面所称的)都赞同或支持总统,在第六章我举了一些反例。



的),即规范的道德理论,及其同类形式的法律和政治理论对美国的公众生活贡献微薄<sup>④</sup>。许多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其中既包括参与者也包括观察者,同样表现得很不光彩。

这一事件的另一个教训是,由一个没有明显先例的事端引发的政治斗争与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尤其是克劳塞维兹 Clausewitz)以及象斯坦德尔(Stendhal)、图斯托伊(Tolstoy)等小说家所描述的战争惊人相似。克林顿挽救其总统宝座的斗争明显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突然的、急剧的命运逆转,陷阱、欺骗、信息误导、由于对冒失鬼运气的完全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纯粹的忙中出错、刺探活动(“漏洞”)、情绪起伏、对机会的驾驭和预先评估力量对比,借以避免遭到对方猛烈反击的困难,等等。这一事件在每一点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仍具有克劳塞维兹传统的战争研究的结构,公众对政治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的反映可能有助于我们对人类冲突有一个更概观的理解,使这个国家避免重复再犯那些卷入克莱事件混乱或其政治法律后果的人们所犯的错误。

还有一个重要的教训是最高法院的无力。竟然没有一个法官有足够的经验来处理这样一宗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案件。回顾法院作出的支持《独立检察官法》的合宪性、允许在总统离职前继续审理波拉·琼斯诉总统案件的裁决,看起来都是对总统职位的无意识的、非故意的、非现实的和无理的人身攻击。假如换一种方式来作裁决——或者假如把裁决范围限定得狭窄一些(例如,如果法院把《独立检察官法》适用于总统是否合宪的问题留给公众讨论,或者在琼斯案件中要求法官尽可能长时间地拖延有关总统性生活的任何质询)——那么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事件这样一件本来(就是说,只要它还是秘密的话)对除莱温斯基以外的任何人都毫无意义的事情,仍将是一个秘密,不为公众所知,公众也不会因为不知其事而受什么损失,也不会有弹劾质询,不会有弹劾,不会有对总统在1998年夏秋之

---

<sup>④</sup> 如同我在前述注释④中详细解释的。

季打击恐怖分子和流氓政府的军事行动的动机的种种猜疑,更不会发生美国参议院裁决处境尴尬这样的事情。最高法院的裁决创造出一种氛围,这种氛围把总统及其辩护人逼人绝境,产生一股可能激怒美国政坛、削弱总统权威、扰乱联邦政府主要事务、破坏法治的宪政风暴。

我说“可能”是因为只有时间才会告诉我们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会产生这些致命的后果。甚至连法治是否因克林顿的谎言、否认、逃避和诡辩而受到了破坏或实际上得到了加强这一点都是不确定的。至少,有一些直接的后果并不坏。政府的运作变得更加透明,美国政府,尤其是白宫和参众两院的主导取向得以暴露无遗,政治竞争的原始性得以展示。虚伪的表层被剥去了,泥塑的圣像被打得粉碎。公众普遍对法律、伦理、政治问题变得更加精通,公民意识得到了加强,虽然由于公众对公共问题注意的范围有限,这一插曲的教育效果可能很快消失,而且,由于法律问题的复杂性,已引起一定程度的混乱,例如关于伪证是如何证实的,起诉中有关刑事责任的不规则性等,这些我将设法予以消释。

一个可能会持续的正面影响是,这一事件鼓励人们对性问题进行更为坦率的公开讨论。在美国这个避孕技术先进、妇女从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传统性道德的社会基础已经遭到破坏的社会,性清教主义的残余影响已失去作用。在对这一危机的公众辩论中比较荒谬的是,右派诉称克莱事件的曝光会减弱父母对孩子性行为的控制,而左派诉称《斯塔尔报告》是具有窥淫癖的色情描写。持这些观点的人(可能只有少数人)并不了解二十世纪晚期美国社会的家庭和性文化。

最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及时暴露出美国制度上的弱点,使我们能得以在它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之前来补救它。这包括学术界的无力,其中包括在法律、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理论方面最权威的人物,他们加剧了政府危机,史学对现实事件的有限帮助,知识阶层的激动和伪善,政治阶层的平庸,国会在提起一个为公众接受的程序公正的



弹劾质询方面的低能,美国法律的过度膨胀(适用《性骚扰法》、《独立检察官法》来折磨政府官员),法院许多专家的蹩脚表现,以及如我已经强调指出的、固守在一种后顾的法哲学中而不切实际的最高法院的低能,一个其裁定不知不觉地酝酿了一场政治危机的最高法院的不称职。

并非所有这些弊端都能得到救治,也许除了让《独立检察官法》失效以外其他一切都无法医治。例如,很显然,参众两院都需要更好的规则来指导弹劾过程,但任何一方都不大可能有足够的紧迫感来承担这样一个任务。但是知道我们的弱点所在毕竟是件好事,因为无论是制度框架,还是个人的思维形式,亦或其他防卫措施方面的补偿调节都是灵活的。无论如何,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幸运的。法院所作的有损总统权威的判决的后果不久就会看到,全国人民在几年之内都将接受一个有几分虚弱的总统,联邦政府的权力有所分散,使人产生自满情绪的和平、繁荣和各项社会指标的上升,对联邦政府只有有限的解决难题的能力的健康意识,总统的临退状况使得人们对积极政府的憧憬黯淡下来。假如这是一个危机时代,那么克林顿-莱温斯基丑闻可能早已胎死腹中——不为人所知,或者知道了也置之不理(在危机时代克林顿也不可能当选和再度当选总统)。这并不是一个危机时代。美国似乎在自动领航员的领导下运行良好,作为其表征之一的证券市场对此反应冷淡,国内外经济在克林顿总统宝座的“危机时刻”仍然进一步增长。1998年是一个上演政治剧的好年头。

# 目 录

人物表 .....	( 1 )
时间表 .....	( 1 )
引 言 .....	( 1 )
第一章 总统的行为 .....	( 1 )
一、事实 .....	( 1 )
二、违法行为 .....	(18)
通奸、男同性恋和性骚扰 .....	(19)
妨碍司法 .....	(20)
不适当地影响证人 .....	(22)
伪证 .....	(28)
克林顿的违法行为：一个小结 .....	(36)
三、弹劾条款的准确性 .....	(40)
第二章 起诉与辩护 .....	(43)
一、斯塔尔的调查行为及其与琼斯案的联系 .....	(44)
二、《斯塔尔报告》及隐私问题 .....	(62)
三、起诉的自由裁量权问题 .....	(68)
四、叫我 Bubula .....	(72)

## 2 · 国家事务——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与审判

<b>第三章</b>	<b>弹劾的历史、范围和形式</b> .....	( 80 )
	一、历史与范围 .....	( 80 )
	二、起诉与赦免 .....	( 90 )
	三、政治弹劾的恶梦 .....	( 93 )
	四、由弹劾和审判引发的程序问题 .....	(104)
<b>第四章</b>	<b>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b> .....	(116)
	一、个人道德 .....	(118)
	二、公共道德 .....	(132)
	执政的道德责任 .....	(132)
	模范道德义务 .....	(136)
	三、通过成就弥补? .....	(144)
<b>第五章</b>	<b>克林顿总统本应受到弹劾吗? 如果被弹劾,</b> <b>就应被定罪吗?</b> .....	(155)
	一、答案没有捷径可走 .....	(155)
	二、对各种后果的分析 .....	(159)
	三、严格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平民主义 .....	(167)
	四、相称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惩罚 .....	(171)
<b>第六章</b>	<b>文化抗争</b> .....	(183)
<b>第七章</b>	<b>留给未来的教训</b> .....	(202)
	一、法律推理的失败 .....	(202)
	莫里森诉奥尔森案 .....	(205)
	克林顿诉琼斯案 .....	(209)
	二、理论的崩溃 .....	(215)
	三、法律职业: 不逢其时 .....	(224)
	四、大众传媒 .....	(230)

五、另一种名义的战争 .....	(232)
<b>第八章 并非结论</b> .....	(246)
<b>译后记</b> .....	(251)



## 第一章

---

# 总统的行为

### 一、事实

二十一岁、刚出大学校门的莫尼卡·莱温斯基长得很迷人。她野心勃勃,有钱,有过性经历,于1995年7月成为白宫的一名志愿实习生<sup>①</sup>。很快她就开始和总统调情,虽然在一开始还有点距离。因为作为一名实习生,她并没有机会接近总统。但在11月,由于总统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预算问题上形成僵局,导致政府关闭,实习生被安排到西楼,也就是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所在的地方工作。这时莱温斯基已年满二十二周岁,受雇为正式工作人员,但仍是从事白宫比较低等的工作。由于转正的书面文件尚未下发,所以从技术上说她还只是一名实习生。

11月份,在政府关闭期间的一个晚上,总统和莱温斯基在西楼相遇,彼此都意识到对方很有吸引力。在西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没有旁人的时候,克林顿问莱温斯基他是否可以吻她,她立即同意了。那

---

<sup>①</sup> 我的记录部分基于《斯塔尔报告》(从技术上说,是独立检察官提交给众议院的报告),但更多是基于由斯塔尔提交给众院司法委员会更多卷的证据材料(很多都是大陪审团的证据)编辑发表的摘录五卷本(约8,000页,很多都是需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压缩文件)。参见1998年9月11日的《斯塔尔报告》、1998年9月18日的《提交美国众议院报告的附录》以及1998年9月28日的《提交美国众议院报告的补充材料》。总统的律师对《斯塔尔报告》的答辩,把重点放在法律和调查行为上,对报告的事实部分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虽然他们确实辩论了——依据某些理由,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还依据某些独立检察官和众议院根据事实作出的许多推理。

## 2 · 国家事务——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与审判

天晚上晚些时候,他们就发生了第一次性关系。这些性行为(一共10次)以逐渐减少的频率持续了十六个月,在时间、地点和性行为上保持固定的模式<sup>②</sup>。她与他口交,而他则抚摸她的乳房和生殖器,不时地诱发性高潮,有时她一边与他口交的时候他一边还在打电话(有三次他在同国会讨论政府事务)。她要求同他进行阴道性交,但他拒绝了。事实上,最后两次他甚至没有射精。

其中有八次发生在1995年11月至次年4月(全都是偷偷在总统的书房、门厅、浴室、靠近椭圆形办公室的房间里秘密进行)。当时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艾维林·李伯曼将莱温斯基调到国防部作公共事务局官员的机要助手(也就是秘书)。克林顿的几位白宫助手认为,作为总统的智囊,他们有责任使总统远离性感女郎<sup>③</sup>。早在1994年5月,克林顿已经遭到他任阿肯色州州长时该州政府的一名雇员——波拉·琼斯的性骚扰起诉,该案在1996年,也就是克林顿竞选连任的那一年仍然悬而未决。工作人员已经注意到莱温斯基经常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门外逗留,他们是否怀疑总统和莱温斯基之间发生的事情,或者他们只是想要最大限度地降低选举运动中的谣言和各种阴谋诡计利用它的可能性,淡化波拉·琼斯案件的影响并掩盖总统过去的通奸行为,尚未可知,虽然从推论来看前者的可能性更

---

② 在谈到莱温斯基从白宫调到国防部以后的那段时期时,据一个侍卫特工证实:“有一种模式……莱温斯基进来的时候我在工作,总是在星期六早上或星期天早上大约九、十点钟。除了总统和贝蒂·希莉(总统的秘书)外在西楼不会有别的人。我们知道只要莱温斯基进来,总统即使在休息室那边,也会来到椭圆形的办公室里,像时钟一样准时。”见注释①提到的《补充材料》第一卷第463页。总统和莱温斯基的很多次私下会面也并没有性行为。

③ 莫尼卡·莱温斯基和琳达·翠珀称她们为“保护人”。例如,参见如前第三卷第4169页,达维德·马原里斯:《克林顿之谜:四分半钟的演讲揭示总统的全部生活》,1998年第60—61页。尽管这本书的副标题有哗众取宠之嫌,但确是一位在克林顿竞选连任之前对他抱同情态度、虽然也并非没有批评的作者所写的负责任的传记,《总统中的第一位:比尔·克林顿传记》,其中隆重推出《四分半钟的演讲》。

大<sup>④</sup>。无论如何,必须把莱温斯基调走。另一个将她调走的理由是她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她很多时间离开办公桌,在西楼(她自己的办公室在东楼)转悠。她是典型的“公共场合展示者”,对观察首长,比如总统和副总统,以及引起他们的注意比对她的工作更感兴趣。保护总统的侍卫特工十分肯定克林顿和莱温斯基发生了性关系,有人还相信,虽然不敢断定,克林顿还和其他在白宫工作或访问白宫的女人发生过类似私通。

由于莱温斯基没有了接近总统的机会,她和总统很难继续在一起。当她受雇于白宫时,她曾经按照克林顿的建议,借口给他送文件来解释她经常出现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原因。但那已经不再可能了。到五月份,莱温斯基已经爱上了总统(她对大陪审团解释说:“他就是太阳”<sup>⑤</sup>)。而总统告诉她,他将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是对她已经产生厌倦,怕她不够谨慎,还是像他告诉她的那样,对发生婚外情感到内疚,这很难说。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总统和莱温斯基开始电话性交流(一种各自手淫的形式),并交换礼物<sup>⑥</sup>。她偶尔也去他的办公室,通过总统的秘书贝蒂·苛莉带进去,贝蒂·苛莉设法在其他工作人员面前隐瞒她的来访,以及总统打给莱温斯基的电话。

在莱温斯基被调到五角大楼工作以后,1996年他们没有发生性行为。1997年发生的是最后两次(第二次是在三月份)。那年五月,也就是最高法院判定将继续审理<sup>⑦</sup>波拉·琼斯案件的前几天,总统再次告诉莱温斯基,他们之间的性关系该结束了。莱温斯基表示接受,但她并未终止同总统的所有联系。在11月克林顿再度当选为总

---

④ 例如,参见白宫雇员金莉弗·博米尔瑞的面谈和证词,前注释①中的《补充材料》,第三卷,第3183—3200页。

⑤ 见前述注释①的《附录》第一卷第968页。

⑥ 莱温斯基送给克林顿的礼物之一是尼科尔逊·贝克尔的《声音》(1992)——一本关于电话性行为的图解小说。

⑦ 总统的律师曾经要求法院悬置该案直至他离任。



#### 4 · 国家事务——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与审判

统后,她缠着他要他在白宫再为她找一份工作,因为她不喜欢五角大楼的工作,担心从白宫调离一事会对她的履历不利——这有可能被解释为一种惩罚或是降级,虽然五角大楼的工资比白宫的高,因此她想再度获聘白宫的努力并没有随着她和总统性关系的结束而减退。实际上,她非常执着,连珠炮似地给贝蒂·苛莉打电话,想要同总统取得联系。他反复保证会帮她在白宫找一份工作,但实际上并没有努力,而是尽一切可能阻止她接近自己。

最后莱温斯基终于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再在白宫获得一份工作了,她决定离开华盛顿去纽约,她的母亲已迁居到此。她请克林顿帮忙找工作。毫无疑问,他希望她离开华盛顿,找到一份她喜欢做的工作,并且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守口如瓶,很快,她就得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比尔·里查森的一份工作邀请。邀请是在1997年11月3日作出的,很可能是,虽然不肯定是,克林顿起了作用,他打电话指导她与里查森的会面。

但是,莱温斯基已经决定到私营企业工作了,因此她没有接受里查森的工作邀请<sup>⑧</sup>。她听说克林顿的一位密友,华盛顿的名律师弗依·乔丹帮人找工作很有一套办法,于是通过贝蒂·苛莉,她也是乔丹的朋友,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同他见了面。乔丹确信克林顿曾告诉苛莉,请他给莱温斯基在纽约找一份工作。在同莱温斯基见面之后,乔丹告诉克林顿,他在想法帮助她,克林顿很高兴。乔丹替莱温斯基给在纽约商界的朋友打过几个电话,但在那个时候他有很多时间在出差,因此他为此所作的努力很有限。

然而,此时波拉·琼斯案件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1997年12月5日,她的律师提交了一份要求宣誓作证的人员清单——莱温斯基的名字也在其中。审理琼斯案件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苏珊·韦伯·莱特已经授权给琼斯的律师,调查克林顿同无论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的下属之间的性关系,而且律师也已从莱温斯基的一位闺中密

---

<sup>⑧</sup> 最后,在1998年1月5日,她谢绝了这一工作邀请。

友——琳达·翠珀处知道了总统同莱温斯基之间的暧昧关系。

12月17日,克林顿在电话里告诉莱温斯基,她的名字已被琼斯的律师列入要求宣誓作证的人员名单。她很难过。克林顿建议她去提交一份宣誓陈述书,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被要求宣誓作证,他重复他们的“故事”——她可以说她去白宫是为了看望贝蒂·苛莉,她之所以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是为了给他送文件。这就暗示可以通过宣誓陈述书否认他们之间的性关系。提供一份内容真实的宣誓陈述书是不应当害怕要求宣誓作证的,因此这反而促使琼斯的律师要求莱温斯基宣誓作证,看她是否利用同总统的性关系得到好处。琼斯宣称,她因为不屑利用总统的地位而在找工作方面屡遭不利,如果莱温斯基因为总统的地位带来的好处而获利,这将是总统曾经进行过性骚扰的进一步证据,因而将支持琼斯一案。

12月19日,琼斯的律师传唤莱温斯基于一月底出庭作证,传票要求她把从总统那儿收到的所有礼物,无论价值大小,从小帽钉到诗集都带去。莱温斯基难过至极。她打电话给弗依·乔丹,告诉他有关传票的事<sup>⑨</sup>。他请她到他的办公室,叫她坦白是否和总统有过性关系。她说没有,但是她也不认为乔丹相信她的话。很明显她试图谨慎地暗示她曾经是总统的女朋友,以便乔丹能明白这层关系而为她找工作出力。乔丹说她需要一位律师,并向她推荐了一位——她反复说,最后可能终于使人确信她和总统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律师按照她的意思起草了宣誓陈述书。

莱温斯基也对克林顿总统谈起这件事。她谈到把他送给她的礼物藏起来的可能性,或者把这些礼物放在贝蒂·苛莉那儿。按照她的证言,总统对此没有责任;而按照他的证言,他告诉她无论传票要求什么,她都得提供给琼斯的律师。

上述这些谈话发生在1997年12月28日,这次会面总统送给莱

---

<sup>⑨</sup> 她并没有告诉他有关那些传票最使她焦虑的一件事——比起找帽钉等礼物要特殊得多的事情。这说明琼斯的律师掌握了某些内幕消息,并不只是瞎放冷枪。

温斯基几件圣诞礼物。根据莱温斯基的证词,那天下午,贝蒂·苛莉给她打电话说,她知道莱温斯基有些东西要给她,莱温斯基说是的,于是贝蒂开车到莱温斯基的寓所取走满满一箱总统送给莱温斯基的礼物(不过,还有一些莱温斯基偷偷留下了),贝蒂把礼物拿回家后藏在自己的床下。但尔后贝蒂却作证说是莱温斯基,而不是她打电话要求保管这些礼物的。

12月31日,莱温斯基和乔丹共进早餐。她后来证实,在这次早餐时乔丹告诉她毁掉所有她写给总统的便条的草稿。她回到家中照办了。而乔丹则在大陪审团面前否认曾经同莱温斯基共进早餐和讨论便条的事,但在参议院对总统审判期间他被要求宣誓作证时他撤回了这一声明,承认他们确实在12月31日共进早餐和讨论便条的事,但他坚持否认曾经告诉莱温斯基毁掉便条。莱温斯基同总统讨论她的宣誓陈述书应该怎样解释她被调动到五角大楼工作一事,他向她建议说,是她曾经工作过的白宫办公室(立法事务办公室)的人得到五角大楼的工作机会,并帮助她获得此项工作。实际上,是艾维林·李伯曼为了把他俩分开而有意安排的。编好律师给她准备好的宣誓陈述书草稿后,莱温斯基签上名拿给乔丹看。她为什么这么做不太清楚,但她否认签一份对总统有利的宣誓陈述书是想作为乔丹给她找一份工作的补偿。她也要求总统看她的宣誓陈述书,但他拒绝了,说他早已看过十五份了。他这么做的意图不很清楚,但他拒绝解释。

在莱温斯基给乔丹看了她签过名的宣誓陈述书后,乔丹开始采取措施帮她找工作。作为雷福龙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一,也是雷福龙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罗纳德·佩雷尔曼<sup>⑩</sup>的朋友,乔丹给佩雷尔曼打电话,向他推荐莱温斯基。早些时候,他曾对一位级别低些的主管谈起过她。1998年1月9日,在乔丹给佩雷尔曼打电话之后两

---

<sup>⑩</sup> 佩雷尔曼是雷福龙公司说话算数的人物,因为他控制着该公司的控股公司的股份。

天,雷福龙公司就给了莱温斯基一份工作。四天后,她接受了这份工作(后来,她和克林顿的丑闻一传开,她即辞职了)并告诉乔丹,乔丹把这个消息告诉总统,总统表示满意。

一周以后,莱温斯基的律师寄走了宣誓陈述书的副本,连同撤销传票的请求,给联邦地区法院和琼斯的律师各一份。第二天,也就是1月17日,琼斯的律师要求克林顿向莱特法官宣誓作证。作证内容很多同莱温斯基有关。这些律师有关克莱事件消息的来源是她从前的朋友,也是现在的敌人,琳达·翠珀,后者同莱温斯基一样曾在白宫工作,后被调到五角大楼,而且同莱温斯基一样,也在琼斯案件的证人名单中。

翠珀曾在布什执政的时候在白宫工作过,当克林顿1993年入主白宫时被继续雇用。1996年夏,由于对克林顿执政的白宫的许多(她称为)卑鄙的手段不满,“我决定记下事情的真相,把我的所见所闻告之于众”<sup>①</sup>。她联系了一家保守党的文学代理商,实际上是克林顿的一个仇人,罗西尼·哥德伯格<sup>②</sup>。罗西尼·哥德伯格要求翠珀写一本书,揭露克林顿政府的所作所为。翠珀并不是很认真地考虑了这事之后很快就放弃了。她害怕出版这样一本书会牺牲她的工作,而这本书挣不到足够的钱来补偿她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这是1996年秋季莱温斯基告诉翠珀她和克林顿之间的关系之前的情况。

翠珀先前曾在白宫“见过”的一件事可能是使她决定记下她和莱温斯基电话内容的关键因素。1997年3月,《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迈克尔·埃斯科夫,询问翠珀于1993年发生在她从前的朋友、一位名叫凯瑟琳·威莉的白宫志愿工作人员身上的事。凯瑟琳·威莉曾告诉埃斯科夫,总统“摸”过她,翠珀曾是目击者。翠珀告诉埃斯科夫,威

---

<sup>①</sup> 参见前述注释①《补充材料》中第三卷第4238页。

<sup>②</sup> 参见瑞安·丽莎:《爬虫》,《新共和》1998年11月23日,第18页,伊丽莎白·布米勒:《代理人:翠珀的朋友说她对自己的角色感到骄傲》,《纽约时报》1999年2月13日,第10页A(金伯格是一个自称为克林顿的仇人的人)。在下一章和第六章我将讨论“克林顿仇恨”现象。



莉从椭圆形办公室出来后不久曾经撞见过她，威莉当时“衣冠不整”，脸上红红的，嘴唇上的口红没有了。她又惊慌又激动，看上去又幸福又兴奋。翠珀说威莉告诉她，“总统把她从椭圆形办公室带到他的私人办公室，一间相邻的很小的隐蔽之处，吻她，抚摸她。”这样，就“不只是一个性骚扰案件”的问题<sup>⑬</sup>。翠珀对埃斯科夫所说的话被《新闻周刊》确切地报道出来<sup>⑭</sup>。翠珀还告诉他，与其浪费时间在凯瑟琳·威莉的故事上，还不如去调查总统和一位白宫实习生之间的关系，翠珀没有说出那位白宫实习生的名字。这一点埃斯科夫没有报道。

翠珀要求埃斯科夫保证在文章中不暴露她的姓名——但是她暴露了——并且附带了琼斯案件中总统的辩护律师罗伯特·本尼特的评论，说翠珀“不可信任”。因为到这时琼斯的律师已经传唤过威莉，白宫正在否认总统与她有过性关系，既没有性骚扰，也没有如翠珀告诉埃斯科夫的纯粹的双方自愿的性行为。

在与埃斯科夫会面后不久，翠珀开始详细记录她同莱温斯基的谈话内容。在罗西尼·哥德伯格的怂恿下，10月份她开始用录音磁带录下她同莱温斯基的谈话，并同罗西尼·哥德伯格重签了合同。翠珀向大陪审团证实她记录同莱温斯基谈话的动机是为了在琼斯案件中保护自己。在1997年8月《新闻周刊》的文章见诸报端以后，可以肯定琼斯的律师会传唤翠珀，他们可能会问及有关莱温斯基的事情，翠珀的律师也曾警告她可能会被问及其他总统亲热过的女人——其描述中就包括莱温斯基。如果翠珀被问及莱温斯基时撒谎，她可能会因伪证而被起诉，而如果她以实情相告，她还是可能不被信任——毕竟，本尼特已经宣称不相信她关于凯瑟琳·威莉的陈述。在这种情况下，她仍会遇到因伪证而被起诉的风险，因为莱温斯基和总统肯定会宣誓否定他们之间的性关系，而且可能被采信。实际上，莱温斯基

---

<sup>⑬</sup> 参见迈克尔·埃斯科夫：《琼斯诉克林顿案件中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她的律师传唤另外一个女人》，《新闻周刊》，1997年8月11日，第30、31页。

<sup>⑭</sup> 参见唐·凡·小拉塔和基尔·阿布热姆森：《静悄悄地，一群律师使波拉·琼斯案件热度不减》，《纽约时报》，1999年1月24日，第121页。

强烈要求翠珀在被问及她和总统的关系并宣誓作证时否认知道任何情况,确保在这一问题上各方面的誓言一致。

因此翠珀声称,她开始记录她和莱温斯基的电话内容目的是为了自卫。这可能并不全是事实。她曾怂恿埃斯科夫调查总统和某位实习生的关系。她向大陪审团承认她希望这层关系被揭穿,这是她想要揭露的、在她看来是克林顿白宫包括性关系以及其他内容在内的丑恶内幕的一部分。她已经向罗西尼·哥德伯格吐露秘密,同时她也知道罗西尼·哥德伯格是克林顿的仇人。她向大陪审团提供的部分证词表明她这么做是很自然的——她相信克林顿及其支持者可能已经卷入了克林顿的仇人所暗示的所谓谋杀活动。

在罗西尼·哥德伯格和琼斯的律师及其支持者的鼓动下,翠珀早在1998年1月就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取得了联系。她把她所知道的有关克莱事件的一切情况向该办公室工作人员和盘托出,并把录音磁带送给他们。同时琼斯的律师也已经从罗西尼·哥德伯格处获悉此事以及翠珀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翠珀同意在1月16日总统宣誓作证的前一天同他们见面,以代替自己宣誓作证。于是这些律师事先准备好了在第二天克林顿宣誓作证时准备向他提出的各种问题。克林顿似乎对他们的有些问题猝不及防,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琼斯的律师对他和莱温斯基的事情知之甚详,虽然他早就知道他们对此有所怀疑,因为他们已经向她发了传票。

当被问及他是否曾单独同莱温斯基在一起时,克林顿说他不记得了(听证会的视频信号显示,他皱起眉头,明显在努力地唤起回忆)。但又说可能有几次莱温斯基给他送文件时同她很短暂地单独在一起呆过,但否认同她有过性关系。即使出于听证的目的,“性关系”一词被广义地定义为:“发生‘性关系’是指当一个人故意进行或导致进行……同另一个人的外阴、肛门、腹股沟、胸部、大腿内侧、臀部接触,试图引起或满足其性欲望……‘接触’系指故意的触摸,直接或隔着衣服。”也就是说,“性关系”被定义为包括过去称作“比较重的爱抚行为”。在否定他同莱温斯基的性关系前,克林顿揣摩了这一定

义,表示他理解。但是,他没有被问及特殊的性行为,如口交。

在他作证的第二天,即星期天,十分震惊的克林顿总统在他的办公室召见了贝蒂·苛莉。他们谈了话,他好像一直在要求她支持他在听证会上的证词。按照苛莉在大陪审团的证言,他说过一些诸如“我们从未真的单独在一起”,“你看得到也听得见所发生的一切”,“莫尼卡走近我,但我从未碰过她,对吗?”以及“她要求同我发生性关系,但是我没有”<sup>⑮</sup>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前两句显然是撒谎,第三、第四个问题根本不能成为问题,因为苛莉无法回答<sup>⑯</sup>。几天以后,他同苛莉又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谈话。这次谈话是在人们全都知道独立检察官肯尼思·斯塔尔在调查克林顿同莱温斯基的关系之前还是之后,并不十分清楚。

在过去的三年半时间里,斯塔尔一直在调查克林顿总统和他妻子在八十年代早期即成为投资者的白水房地产案的情况。在克林顿在琼斯案件中听证的前一天,斯塔尔从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巡回审判庭的特别法庭获得许可,把他的调查扩展到琼斯案件中可能存在的妨碍司法行为<sup>⑰</sup>。斯塔尔从琳达·翠珀那儿不仅已经了解到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关系,而且知道弗依·乔丹一直在努力给莱温斯基在雷福龙公司找工作。这就敲响了警钟。乔丹曾经为韦伯斯特·哈贝尔在雷福龙公司弄到一份很赚钱的顾问工作,后者就是斯塔尔相信曾在阻止调查克林顿夫妇在白水事件中的不法罪行为的、不光彩的前任司法部副部长。看来乔丹可能试图以同样的方式收买

---

<sup>⑮</sup> 见前述注释①《补充材料》第一卷,第559页。

<sup>⑯</sup> 当她承认关于第三句话“她‘走近我’”,我认为这更像一个陈述句而非疑问句。”同注上,第682页。

<sup>⑰</sup> 特别法庭是一个由三名指定的联邦法官组成的陪审团,对独立检察官负有某些监督责任。



莱温斯基,以使其保持沉默<sup>⑩</sup>。莱温斯基自己在被琳达·翠珀录音的电话中也对有人可能会将两者类比表示担心。莱温斯基曾经给过翠珀一份三页纸的“谈话要点”备忘录——后者又将它转交给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指导翠珀如何在琼斯案件中作伪证。这份谈话要点写得如此老练,没有法律帮助的莱温斯基不大可能写得出来,独立检察官怀疑这种帮助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白宫。

一方面,莱温斯基签署了一份内容虚假的宣誓陈述书,这份宣誓陈述书一旦被提交就犯了伪证罪<sup>⑪</sup>,另一方面她还试图唆使翠珀作伪证<sup>⑫</sup>。翠珀录音的电话证实了前者,磁带和“谈话要点”备忘录证实了后者。在联邦法律上,控诉伪证和其他在联邦诉讼中妨碍司法的行为优先于私录磁带可能违反州法的事实,琼斯案件中的行为是联邦法律上的犯罪行为,因此莱温斯基被起诉的可能性非常之大。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1月16日同她见面时就已知道她的犯罪行为,并告诉她,如果她愿意同他们合作,尤其是如果她同意将她与克林顿、乔丹的谈话进行录音,他们将不起诉她。她拒绝了。

于是事情公开化了。1998年1月21日,全世界都知道了翠珀的录音磁带和独立检察官将调查范围扩大。我在前面描述的流言在几天之内就被媒体全面、充分和确切地予以披露。不过,克林顿总统在公开的电视台和私下对他的助手、朋友(如乔丹)和内阁成员面前,都坚定地、反复地、明确地否认他和莱温斯基有过任何性关系或不正当的接触,他对他的一名助手希尼·布鲁门瑟尔称她为一个名声很好

---

<sup>⑩</sup> “时间的选择、来源、支付范围(对哈贝尔来说还包括来自雷福龙公司的钱),使人相信他们是在用贿赂来封莱温斯基的嘴。”美国诉哈贝尔案,《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三编,第167卷,第552、563页(联邦上诉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庭1999年判决)(未列明法官意见撰写人)。1994年,当还在调查刑事案件的时候,哈贝尔得到450,000美元的咨询费,谁也不知道他做过什么挣到这些钱。

<sup>⑪</sup> 她于1月7日在宣誓陈述书上签名后于16日发出,法院于1998年1月17日收到,为正式提交。

<sup>⑫</sup> 此外,如果翠珀否认莱温斯基告诉过她同总统的关系,莱温斯基还承诺给翠珀她在澳大利亚的一套房子的产权。

的“暗恋者”。这一点看上去似乎有理,虽然未经证实。当布鲁门瑟尔在大陪审团的证词被发表后,他被称为有意误导检察官所提的问题,企图向公众证明独立检察官的调查是清教主义巫婆的穷根究底<sup>①</sup>,同时满足媒体对莱温斯基是个暗恋者、精神错乱、“神经有问题”、一言以蔽之,不值得信任的描述。

这段完全否认的时期一直持续到1998年8月17日,公众除了鄙弃莱温斯基外,齐声否定莱温斯基事件。总统的支持者、律师、政治伙伴联合声讨斯塔尔。在此期间,斯塔尔和他的同伴进行了一次细致的调查,其主要调查工具是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大陪审团,斯塔尔已经利用它来调查白水门事件中的一些问题,例如与之相关的文件是如何神秘地失踪而后来又重新出现的<sup>②</sup>。总统的律师尽量使调查脱离原定的轨道,或者通过进一步提出与大陪审团传唤证人有关的总统行政特权、律师及当事人特权来拖延斯塔尔对莱温斯基事件的调查。

他们还提出一项新的特权,以防止侍卫特工就他们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观察克林顿行为的情况出庭作证,总统的特权要求很快地、在某些场合是十分断然地被法院否决了<sup>③</sup>。

1998年7月28日,莱温斯基在另一些更有经验的法律顾问的建议下,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签订了一份豁免协议。接下来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在大陪审团参与或不参与的场合长时间地审问莱温斯

① 詹姆斯·本尼特:《助手:经理们追问法律顾问同克林顿夫妇的谈话》,《纽约时报》1999年2月3日第15页A。例如,布鲁门瑟尔记得曾经被问到“总统的宗教信仰包括性交方面吗?”是否曾经被“强迫回答与《纽约时报》、CNN、CBS、《时代周刊》、《美国新闻》、《纽约每日新闻》、《芝加哥论坛报》、《纽约观察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报纸和杂志的谈话有关的问题。”他没有被问及这些问题,他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证言见于前述注释①中的《补充材料》第一卷第159-206页。他在其后一次露面时因歪曲事实而受到大陪审团主席的责备,见第206页。

② 后来斯塔尔又召集了另一个大陪审团来调查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但是我将省略这个细节。

③ 本案的摘要,参见前述注释①中的《附录》第一卷,第183-200页。

基,以充实她故事的细节。这个故事被独立检察官从下面的事实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她的电子邮件、翠珀的录音磁带、白宫的电话记录,贝蒂·苛莉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证词,莱温斯基的亲戚朋友,侍卫特工提供的证明莱温斯基经常去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的证据,最有决定意义的是,从莱温斯基的一件衣服上取得的精液进行DNA化验的结果(毫无疑问精液只能是总统的)。虽然贝蒂·苛莉作证说,是莱温斯基打电话给她,要求送还礼物,而不是像莱温斯基作证时说的,是苛莉打电话给莱温斯基,但她承认莱温斯基对此事的记忆可能更准确。在此期间(也就是在1月份的媒体曝光和在大陪审团作证之后几小时,到总统1998年8月17日<sup>②</sup>对全国的演讲之后媒体曝光之间的间隙),州法院以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受到性骚扰而驳回了琼斯的诉讼<sup>③</sup>。她继续上诉。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总统同意从白宫通过闭路电视在大陪审团作证。在证词中<sup>④</sup>,他承认(不可避免地,从DNA化验的结果来看他必须这样做,虽然化验结果尚未公布,但他应当想象自己可能“通不过”)曾经和莱温斯基发生过“不正当”的关系,进行了属于性关系的“亲密接触”,不过他声称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性接触发生在1996年,并且1997年也只有一次而非两次性接触。他拒绝谈及他和莱温斯基性关系的细枝末节,但是含蓄地承认他曾对他口交。但他强调说,他在琼斯案件中宣誓作证时否认同莱温斯基有过性关系并不是伪证,因为他声称口交在为听证之目的给定的意义上,并不是“性关系”的一种形式,因为口交的人只是嘴唇接触而不是定义所列举的身体部位的接触。他承认抚摸莱温斯基构成那种意义上的性关系,因此通过否认他同她有“性关系”他就含蓄地但也清楚地否认了他曾抚摸过她。

<sup>②</sup> 见著名的《四分半钟的演讲》一文,同上资料,第二卷,第2523页。

<sup>③</sup> 琼斯诉克林顿案,《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增补本,第990卷,第657页(阿肯色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1998年判决)。

<sup>④</sup> 《附录》,见前述注释①第一卷,第453页。

他否认在听证会上他宣称的、除了有几次莱温斯基来送文件外、他没有“单独”和她在一起是撒谎,说他们并不是“单独的”,因为附近总有别的人在,但是他也承认在他们性接触时除了莱温斯基和他自己外没有旁人在场。

他否认曾经帮助她找工作,以使她在琼斯案件中作证时对他们的关系保密,否认曾经做过任何其他事情怂恿她撒谎,他也否认告诉过她如果法院发传票索取礼物她将不得不交出所有的一切,以及他一直暗示她把那些礼物处理掉,他否认建议过贝蒂·苛莉从莱温斯基那儿要回送给她的礼物,或者曾试图影响苛莉在琼斯案件和大陪审团调查过程中的证词。他证明说,他在被听证后同苛莉谈话的目的只是为了回忆他同莱温斯基之间事情的经过,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苛莉可能被传唤作证或者大陪审团会调查她。他承认他想对所有人隐瞒他和莱温斯基的性关系,但否认动机与琼斯案件或独立检察官的调查有关。他还否认对他的部下们说过谎,虽然按照他们的证言,他曾告诉他们他同莱温斯基没有发生过任何形式的、包括口部的性接触。

在大陪审团作证以后,克林顿总统和他的律师及其支持者们,公开承认总统和莱温斯基存在“不正当的关系”,作了使人误解的陈述,同时继续坚持认为他在琼斯案件的宣誓作证中没有撒谎,现在他们又加上他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证词也没有撒谎。他在 1998 年 11 月 27 日的誓言中再次否定这些,来回答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他提出的八十一个问题。他的答复不是赤裸裸的撒谎,但很多都是逃避、推诿或者干脆不回答。当他否认同莱温斯基谈过她在琼斯案件作证的问题时,当他否认同苛莉讨论过从莱温斯基那儿拿回礼物时,当他否认在琼斯案件中宣誓作证说不记得曾给莱温斯基送过礼物时,当他作证说莱温斯基只送过一两件礼物给他——而实际上她共送给他 30 多件礼物时,他是在作伪证;当他告诉大陪审团在有关他和莱温斯基关系方面他“从未叫任何人撒谎”,还坚持他说的是事实时,他绝对是在撒谎。他对莱温斯基和苛莉以及他知道可能被媒体采访或将在大



陪审团作证的其他部下们都暗示过谎言,但他确实没有(明确地)要求他们说谎。就在他在大陪审团作证后几天——也就是当人们从他承认同莱温斯基的关系,以及他在四分半钟的电视演讲中承认这一点误导了人们,从而给媒体权威和国会留下极坏的印象等等中苏醒过来,要求弹劾他的呼声正高的时候,克林顿总统悍然下令巡航导弹轰炸阿富汗和苏丹境内怀疑有恐怖分子活动的地区。虽然有人怀疑他这么做是为了分散公众对其丑闻的注意力,但被国防的需要大大地淡化了。四个月以后,当众议院正在争论是否应弹劾他的时候,总统突然命令对伊拉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一个更大范围的怀疑的热浪传开了。再一次,国防部门解释说,他们建议总统发动进攻,这与总统个人政治前途的考虑无关。这无疑是真的,因为国防部门数年来一直要求打击伊拉克,但是以往总统总是迟疑不决不予签发,基于目前所知道的情况是不可能推断出,当总统决定接受军事和国防部门的意见轰炸伊拉克时,他是否存在想要阻止隐约在望的弹劾投票的想法。总统向全国人民保证没有这回事,可是到了1998年12月18日他作保证时,人们对他的信任已土崩瓦解。

现在我已经概略介绍了解释本书主题的必要事实。略去大量的细节不说,其中的许多问题,从人类兴趣的观点来看是令人着迷的。那些在司法过程中搜集和编辑的证据记录总是包含一些无论怎样有趣但与法律无关的细节,不过,我对于克莱事件的调查以及围绕这一调查的各种情况的兴趣不止于法律问题,我所省去的大部分细节同道德、政治和文化问题也没有关系。大量过多的细节妨碍了公众对于这一事件的理解,实际上起主要作用的事实没有几件,而且很简单,就是我在本章和后面几章中叙述的那些。

我的论述关键依赖于莫尼卡·莱温斯基的可信程度,因此考察她的可靠性是必要的。正像克林顿的辩护人所指出的那样,莱温斯基曾经在给琼斯案件提交的宣誓陈述书中撒谎;曾经对琳达·翠珀撒谎,例如称她母亲在她保护总统的撒谎计划中与她是同谋;她还捏造骗人的鬼话,说什么她曾同克林顿夫人在玛莎的葡萄园里共进午餐,

说她脱光了衣服同总统性交。而且,莱温斯基从未受到过盘问。

然而,对她的这些谎言和她未受盘问的事实不应过于重视。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撒谎,很多人都在誓言下撒谎,尤其是在有关两性关系方面——这也是总统抗辩的基础之一。问题是莱温斯基在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官员、大陪审团以及最后2月1日总统的参议院审判期间,在众议院的起诉人面前回答被询问的问题时,证言是否真实。对此,在她长达十五个多月时间内所作的无论口头还是书面的陈述,从琳达·翠珀1997年10月首次录音的第一盘谈话录音带到1998年9月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官员对她的最后一次审问和1999年2月1日她在参议院宣誓作证为止,都是高度一致的(没有人能完全一致),主要的叙述和细节看上去都合情合理,得到其他证人、文件资料、白宫电话日志、总统过去的历史和性格以及衣物等非言词证据的充分证明。从所有这些记录中反映出来的,是一个聪明的<sup>②</sup>、记忆力极强的、对总统绝少有“被蔑视的女性”具有的仇恨的女子形象。虽然她长期服用镇静剂类药物,但并没有迹象表明这导致她精神紊乱地胡说八道。将这些与她上大学时有一次篡改她的成绩、蒙骗她父亲联系起来,没有多大的意义。至于说她提交了一份作伪证的宣誓陈述书,这是她在当今美国总统的鼓动下这么做的。最重要的是,在关键问题上,她只否认了两件事。而我注意到,总统连抚摸过她都否认了。这样的否认完全令人难以置信,似乎在他们的所有性活动中,当她与他口交的时候,他只是消极地坐着(或站着)。他有强烈的动机对此撒谎。再者,如果他承认他抚摸过莱温斯基,也就意味着他坦白承认在琼斯案件的宣誓作证中撒了谎。而莱温斯基,由于受到如果说她说真话就能免于被起诉的一揽子豁免的保护,则没有动机去

---

<sup>②</sup> 有一种低估莱温斯基智力的倾向,因为她只在一所虽然实际上很受尊重但相当没有名气的大学(列维兹·克拉克大学,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取得中等成绩。证据记录说明她是一个精明老练、能言善辩、对法律和政治问题均有良好的感悟能力的女子,看来确实是她自己草拟了那些“谈话要点”,虽然她可能从她的律师起草的宣誓陈述书中借用了某些材料(这是通常的习惯作法)。

撒谎。

第二点否认,苛莉说是莱温斯基先提议归还礼物的。在这点上莱温斯基的证言仍然更可靠一些。苛莉,像总统一样,也有撒谎的动机,因为承认她扮演总统的代理人的角色去收回那些礼物,意味着她在协助他妨碍司法。与莱温斯基一样,她在大陪审团作证时一接近敏感问题就看起来很紧张,躲躲闪闪,健忘(很可能是假装的),不能肯定,有时完全不可信,例如当她否认怀疑总统和莱温斯基之间有过肉体关系的时候。她承认关于那些礼物的事莱温斯基有良好的记忆力,这听起来像是在竭力避免她自己因伪证而被起诉。无疑,她的律师警告过她这一点,就像莱温斯基的律师在1997年12月当莱温斯基看来将要被要求宣誓作证时警告她一样,在宣誓下作明确的否定是件冒险的事情。电话公司的记录表明,12月28日下午,苛莉从她的房间里给莱温斯基打的电话,正像莱温斯基证实的那样;相反没有电话记录表明那天莱温斯基给苛莉打过电话,如果像苛莉作证时所说的<sup>②</sup>,返还礼物是莱温斯基的主意,她不大可能会叫苛莉(一个比她大得多的女人)来取走礼物,而不是自己把它们送到苛莉家里。或者,苛莉接受礼物并进行保管,不用问,如果这要求是莱温斯基而不是总统或其一个部下提出的,那同样不大可能。如果莱温斯基的目的仅仅在于避免被传唤到法庭,那么她把礼物扔掉比寄存在总统的秘书那儿更有意义。在苛莉的电话和来访的那天早上她同总统的谈话是真实的,莱温斯基自己建议将礼物交给苛莉保管,但可能实际的情况是并非她坚持和奉行这一建议,叫苛莉到她的寓所取礼物,而是克林顿采纳了这个建议,叫苛莉打电话给莱温斯基。

克林顿的律师抗辩说,克林顿早上送礼物给莱温斯基,又在同一天的下午从她手里把礼物要回去,这似乎难以成理。克林顿会那么冒冒失失?他会干那种蠢事吗?他在任总统期间的种种行为却证明

---

<sup>②</sup> 电话公司记录的通话时间比莱温斯基作证时所说的要晚,但如果莱温斯基记错了打电话的确切时间,倒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了相反的结论。那么做果真很愚蠢吗？他可能送给她礼物让她高兴，也相信她不会在被传唤作证时把它们拿出来，但那毕竟是一个冒险的行动（这很像克林顿的性格），自然他会想到如莱温斯基所建议的那样做更好，礼物要是在茱莉手里的话会更安全一些<sup>②</sup>。因为那时莱温斯基可以真实地答复传票有关交出礼物的要求，说她什么也没有。既然莱温斯基和茱莉是朋友，莱温斯基可以相信在她完成在琼斯案件中的角色以后能够索回她的礼物。克林顿肯定知道莱温斯基会拒绝扔掉这些礼物的命令，又有谁能给她下这样的命令呢？即使以他的地位，让他这么做或他告诉另外一个人这么做都太冒险了一点。

克林顿的律师强烈要求参议院不要传唤证人，假如参议院同意了的话，就不可能对莱温斯基交叉提问。很可能总统的律师没有想到他们会破坏她或检察官依靠的其他证人的信用。假定总统坚持否认弹劾议案中宣称的关键事实，明确地为自己的无罪辩护，如果他的律师认为提问会支持总统，他不可能同意放弃提问的机会。

参议院允许请三名证人宣誓作证，其中之一是莫尼卡·莱温斯基，她的证词同她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证词一致，因此对总统的辩护有极大的破坏力，他的律师没有提问她。他们也不想提问他们自己一方的证人，比如贝蒂·茱莉。在谁有责任对总统给莱温斯基的礼物保密的问题上，茱莉在大陪审团的证词同莱温斯基的证词互相矛盾。确实，到参议院花时间和精力来争取证人的时候，总统这边已是强弩之末，但在任何时候他的律师都不急于提出或者提问证人。

## 二、违法行为

基于所有可能得到的公共记录将这些基本事实确定下来以后，现在我试图考虑总统是否构成犯罪或其他违法行为。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为时过早，因为我尚未讨论犯罪行为是弹劾的必要条件还是

---

<sup>②</sup> 勿庸置疑，到这时他后悔没有早一点采纳她的建议，以应付琼斯案件。

充分条件。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将要看到的,既非必要也不充分。但法律决定惩罚某种特殊行为,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的,就说明那种行为具有违法性。无论如何,我对克莱事件的兴趣不仅限于弹劾与否的问题。在第四章,我们将看到总统是否犯罪的问题同他作出既不辞职又不澄清他同莱温斯基之间关系的决定的道德性也有着重要关系。

### 通奸、男同性恋和性骚扰

我们可以从性关系本身开始谈起。通奸在哥伦比亚特区<sup>③</sup>的法律中是一种品行不端的行为,在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州法作此规定,但是通奸很少被起诉。“口交”在通奸法的意义上是否被归入一种性行为还不肯定<sup>④</sup>。由于有安全避孕措施,传染性病的可能性减少<sup>⑤</sup>,并且(对大多数男人和女人来说)感情上的亲密程度较之阴道接触为低,口交对婚姻的威胁也不大<sup>⑥</sup>。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人认为违反禁止成人之间两厢情愿的性关系的法律是很严重的犯罪或品行不端行为。这种法律是无生命的文字,对没有能力集中众人的意愿去撤销它的立法机关比对那些违反它的人来说还要尴尬。

起诉总统对他的一个下属进行性骚扰是没有根据的。最初公共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克林顿和一个比他女儿大不了几岁的追星族实习生身上大做文章。这种描述同莱温斯基本人的话不相符。据

③ 见《哥伦比亚特区法典》,附录,第22-301条。

④ 见《哥伦比亚特区法典》中,“通奸”的定义仅限于性交,但对“性交”未作定义。有些州的法律明确规定性交包括口部性行为(口交),例如参见《宾夕法尼亚州法典》,第3101条,参见艾伦诉美国案,《东南地区判例汇编》,第二编,第316卷,第500页(乔治亚州上诉法院1984年判决)。

⑤ 例如参见托马斯·J·菲利普森和理查德·A·波斯纳:《私人选择与公共健康: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艾滋病传播》,第22页,1993年。

⑥ 在1994年以前,口交肯定被归入性交范畴,因为哥伦比亚特区的成文法在那一年规定“把一方的性器官置于另一方的口中”为重罪,见《哥伦比亚特区法典》,附录,第22-3502条。这意味着,倘若不是已经废除,总统就犯了性方面的重罪。

我们所知,她遇见总统的时候,不仅她自己已经有过性经验,也确实刚刚同另外一位已婚男士分手,而且老于世故,自我肯定到近乎厚颜无耻的地步,根本就不会被总统或总统的地位吓倒<sup>④</sup>。

即使一个人拒绝相信,普通常识也会告诉我们,克林顿宣称他在性接触中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也并不表明他利用职权谋求同她发生性关系,或者向她保证如果同他发生性关系会给她什么好处,或威胁她如果不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不表明他缠着和她发生性关系,或做什么事来压制她对口交的抵抗(没有抵抗),或甚至表明他诱奸她。她想要同他发生性关系的愿望至少跟他同样强烈,很可能更加强烈。也就是说她恳求他让她使他射精,他拒绝她进行阴道性交的要求,他们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传统性角色的颠倒。起诉书指称存在着“一种基于年龄和地位的利用因素<sup>⑤</sup>”是不成立的。

### 妨碍司法

在克莱事件中惟一有理由指控总统的罪名是妨碍司法,我必须阐明这个字眼在联邦法中是什么意思。公众对总统行为的争论显著地见之于“妨碍司法”和“伪证”两方面。众议院在其通过的弹劾条款中反映了二者的区别,其中一条指控伪证,另一条指控妨碍司法。直

---

<sup>④</sup> 有一次她在电话中对克林顿说:“我爱你,傻瓜!”他明显没有反应。当她把这事告诉琳达·翠珀时,翠珀评论说:“我敢肯定他意识到的一件事是你没想到他是谁。莱温斯基说话一直是又大声又清楚,因此不认为他在听到被称为‘傻瓜’时感到震惊。”见前注释①中的《补充材料》,第二卷,第2627—2628页。翠珀告诉大陪审团,莱温斯基从未“像我们在座中的任何一位对待总统那样对待克林顿……她同他说话与她跟我或任何其他人士说话绝对没有区别。”同上材料,第三卷,第4173页。莱温斯基在1998年8月11日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官员见面时对克林顿所作的总结或描述值得引述:莱温斯基“把总统描述成一个‘甜甜的小男孩’,富于爱心、善良、温柔、自私、自我中心、自认为正直,是一个为了国家的最大利益而做事的不可信的人。总统有一个‘周六晚个性’,那时他屈服于自己的性要求,又有一个‘星期天个性’,他又会后悔,去教堂做礼拜……总统曾说:‘我的生活很空虚。’”见前注①中的《附录》,第一卷,第1539页。

<sup>⑤</sup> 威廉·J·本尼特:《暴行之死:比尔·克林顿和对美国理想的强奸》第24页,1998年。

到参议院审判,人们普遍认为克林顿几乎可以肯定犯有在大陪审团作伪证的罪行(在琼斯案件的宣誓作证中亦如是,但未予指控,至少在弹劾条款中没有直接指控),而认定他妨碍司法的证据较少。投票免于他伪证的比投票免于他妨碍司法的参议员为多,他们认为伪证的罪行较轻但更难证实,这两点都是错误的。

在这一点上,众议院的起诉人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花钱买到的观点认为,(总统)伪证和妨碍司法的罪行是明显的,而且因为“妨碍司法”听起来比伪证更严重,他们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论证妨碍司法(不包括伪证)的艰难作战上,给人形成一种他们对两条弹劾条款中实际上对他们更有利的那一条——即伪证条款——缺乏信心的印象。

“妨碍司法”是对各种以腐败或其他不正当地干预司法程序的法定的特定罪行的一个笼统定义,它包括民、刑事诉讼中的伪证<sup>⑤</sup>,但不包括其他情况下的伪证,例如在国会委员会的伪证,除非该委员会正在调查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这一点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弹劾调查中却是被视为伪证的。妨碍司法还包括谋杀证人、法官、陪审员,或者伤害、威胁、贿赂、报复、胁迫,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影响这些人,毁灭证据,在保释申请中作虚假陈述,以及各种相关的违法行为。《联邦刑法典》中标题为“妨碍司法”的这一章包含了 16 个这类特定的刑名分章,加上一些并不完全是妨碍司法的不法行为<sup>⑥</sup>,例如一个

⑤ 美国诉诺里斯案,《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 300 卷,第 564、574 页(1937 年判决)。例如,《联邦刑罚准则》中规定,如果刑事被告撒谎,就应处以“妨碍司法”的惩罚。参见《美国刑罚准则》,第 3C1.1 条及应用注解 4。这样一来,说“如果一名被告宣称自己在被发现为有罪时是无辜的,控诉人几乎就从不指控他伪证”就不正确了。杰斐·罗森:《伪证陷阱》,见《纽约人》,1998 年 8 月 10 日,第 28、29 页。在联邦刑事审判中,当被告被发现无罪但仍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并因此被处以妨碍司法是很普通的事情。

⑥ 《美国法典》,第 18 卷,第 73 章。参见里萨·R·拉斐提和朱莉·特培罗:《妨碍公正执法》,《美国刑事法律评论》,1998 年,第 989 期。为防止混淆,在《美国法典》第 28 章第 1503 条“妨碍司法”一章中,在“影响或伤害执法人员或陪审员”的标题下,有一总括条款,惩罚任何“以腐败方式影响、妨碍、阻止或试图影响、妨碍、阻止既定的公正司法”正好覆盖了上述全部行为(可能仅除伪证外!)。想看有关克林顿总统违反联邦刑法的全面的讨论,请参阅前述注释①中的《附录》,第一卷,第 266-375 页。



人并不想逃避司法却申请假护照。但是它略去了伪证的内容,伪证是“伪证”一章的主题<sup>⑧</sup>,不限于诉讼中在宣誓时撒谎。另一种妨碍司法的普通方法,恐吓,也从妨碍司法这一章中略去了。

因此,无论如何,在联邦法律中,也就是同克林顿的行为有关的法律中,“妨碍司法”是散见于整个《联邦刑法典》的许多种不法行为,是这些不法行为的一部分的技术描述,是某种特定的违法行为的罪名<sup>⑨</sup>。与对克林顿总统的指控有关的最明显的是第一种用法,也是我通常使用的一种。在这种情况下,看总统是否犯有妨碍司法罪,就是看他是否从事了任何构成旨在阻碍法律程序的妨碍司法行为的构成要件的行为。

### 不适当地影响证人

所称总统妨碍司法的行为分为两类:不适当地影响其他证人,主要是在琼斯案件中;和在该案的宣誓作证、在大陪审团的作证以及在回答众院司法委员会的提问时作伪证。他犯第一种罪(不适当地影响证人)的有罪证据不如第二种罪(即伪证)充分,这里我从前者开始分析。

问题之一,在琼斯案件中克林顿是否试图以工作为交换条件而收买莱温斯基的配合。克林顿让莱温斯基保密、不说漏嘴,并谋求贝蒂·苛莉、弗依·乔丹,很可能还有比尔·里查森的帮助,具有双重动机(姑且把爱情和利他主义的可能性放在一边,因为似乎不太可信)。动机之一是避免他和莱温斯基的关系被曝光后使他突然陷入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危机;动机之二是挫败波拉·琼斯以及后来,在独立检察官介入后,挫败独立检察官。基于我们今天所能得到的事实依据,不可能肯定地判断在他和莱温斯基的谈话以及其他有关为她找工作等事情上,后一种动机起了多大的作用。

---

⑧ 《美国法典》,第18卷,第73章。

⑨ 总括条款,见注释⑧。

所有这些谈话,除了第二次同苛莉的谈话可能是例外(也不一定),在独立检察官介入以前,克林顿全部一无所知,很可能他甚至没有怀疑过,此前他所关心的惟一诉讼是琼斯案件。既然该案起诉的是一件发生在1991年,克林顿尚未任总统之前的事情,既然琼斯的证据不充分,她的损害可能为零(因此即使她胜诉赔偿金也不可能很高)。既然他和莱温斯基之间是一种双方自愿的关系,同该案的法律依据只是微弱相关<sup>⑩</sup>,想要避免该案的不利判决的愿望不大可能在克林顿对他和莱温斯基关系保密的念头中占很大比重,后者的曝光对他个人和政治生活的后果将比他同琼斯斗争的后果要严重得多——正像这一事件后来所证明的那样。而且,即使莱温斯基威胁说,如果她得不到一份好工作,就要把她和克林顿的关系告诉她的父母(事实上她已经告诉她的母亲,相信她父亲也已经猜到了),她也从未威胁,或者甚至暗示,说她会在琼斯案件中背叛克林顿。她一直对琼斯诉讼表示极端的蔑视。她否认他们之间关系的合作态度是合情合理、确信无疑的。她在参议院的听证中也强调了这一点。

现在来看乔丹为给莱温斯基在纽约找工作所作的努力,显然是克林顿唆使他干的。克林顿有一个同琼斯案件无关的、想在另外一个城市把莱温斯基安置在一个愉快的工作岗位上的想法,这样她就不会老是来缠着他在白宫找工作,老是烦他,给他添麻烦<sup>⑪</sup>。她给他写了一封信,威胁说如果她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就要把他们的事告诉她父母。这是敲诈。她是个危险的害人虫。这更是想给她在纽约安排一个好工作的充分理由。确实,当乔丹了解到她在琼斯案件的审前调查中被盯上了以后,加快了给她找工作的进度,事实上也是克林顿总统在幕后给予了周密的指挥。除此之外,有一个巧合(如果仅仅是巧合的话),乔丹开始曾把莱温斯基推荐给雷福龙公司,也就是另

<sup>⑩</sup> 但实际上它将是“实质相关”,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

<sup>⑪</sup> 她曾经在侍卫特工面前发脾气,因她从其中一个官员那儿得知,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另一个女人,莱温斯基相信那是总统的一个女朋友。



一个可能对总统作不利证据的朋友韦伯斯特·哈贝尔,奇怪的是他又推荐一位刑事律师来帮她准备一桩民事案件的宣誓陈述书——似乎乔丹怀疑伪证起诉已经在望,因此莱温斯基需要一位刑事律师的保护。乔丹在大陪审团和参议院面前的证言不那么可信<sup>②</sup>。所有这一切使总统想使她在琼斯案件中保密因而努力给她找工作这一点似乎合情合理,但基于今天所知的事实却无法加以证实。

克林顿试图影响苛莉关于他和莱温斯基关系的“回忆”的努力也是这样。在宣誓作证后的当天,克林顿决没有敏感地试图把苛莉的证言同他自己的统一起来——实际上也就是请她撒谎来保护他——他可能只是预料到媒体会爆炸,事实上接下来的几天也确实是这样,而没有料到苛莉会在琼斯案件中或是大陪审团对他的调查中成为一名证人。另一种可能,同样地,两种念头同时存在于他的思想中。他在口供中反复提到贝蒂·苛莉是莱温斯基的朋友,是她常到白宫拜访的人,是请他从玛莎的葡萄园给莱温斯基带礼物的人,是在弗依·乔丹和莱温斯基之间牵线搭桥的人,也是能证实他和莱温斯基之间关系的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对琼斯的律师说:“那些问题你们得问她(贝蒂)③。”他很公正地要求他们请她宣誓作证,虽然琼斯案件的证人名单已告终结,但总还是可以由法官基于某种充分理由再行补充。实际上,在克林顿宣誓作证后不久,琼斯的律师确实就签发了让贝蒂

---

② 回忆1997年12月31日同莱温斯基一起吃早餐的证言——开始他否认有这回事,数月之后又详细地“回忆”起来。这是乔丹的另一个不可信的证言的例子:他在大陪审团作证说,在他知道莱温斯基在琼斯案件中被传唤以后,还代她给罗纳德·佩雷尔曼打电话,这一点并没有在他的脑中敲响警钟,即使雷福龙公司在他的命令下给韦伯斯特·哈贝尔顾问合同的事如他已知的那样,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问题”,见前述注释①《补充材料》,第二卷,第1788页。确实,考虑到这段历史和乔丹作为雷福龙公司董事的地位,他在已经明知莱温斯基已被拖到琼斯案件中以后,仍然给她找工作,这一点太奇怪了。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律师,他应当知道那会使雷福龙公司难堪,也会给他自己惹麻烦。从乔丹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失误。但是我们会看到几乎所有卷入克林顿事件调查和琼斯案件的诉讼的人,从克林顿到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全都犯过错误。

③ 琼斯诉克林顿案件中威廉·杰斐逊·克林顿的口供的录音录像带,1998年1月17日。

作证的传票,虽然不曾执行,因为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莱特法官决定把所有有关克莱事件的证据排除在琼斯案件之外。

因此,当克林顿在宣誓作证后的当天同贝蒂·苛莉谈话时,他可能把她看做琼斯案件中他希望对其证言施加影响的预期证人,如果这样,他就犯有不适当影响证人之罪。如果克林顿在已经明知独立检察官在调查他在供词中进行伪证的可能性还重复上述谈话内容,那也将成为他试图影响一个预期的将在大陪审团作证的证人的证据。但是,第二次谈话的时间不能确定,他可能只是想确保在当新闻界或可能向新闻界披露消息的个人逮住她时,她还记得他们先前谈话的内容。同样地,也可能两种意图兼而有之,而且两种意图兼有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同样地,诱使一位预期的证人作虚假证言——这种不正当意图的存在,仍然未经证实。

不过,有人可能辩称,缺少这些证据无关紧要。只要总统知道,正如他必定已经知道的那样,如果法庭传唤她作证,那么把她“拉上船”会影响她的证言,即使他并不是有意追求那种结果。换句话说,我可能是在过于狭窄的意义上使用“有意”一词。故意进行一种某人明知会产生某种特定结果的行为,在刑法上常常能够构成引起该种结果的必要的主观意图。意图和欲望不是同义词,如果你在飞机上放一颗炸弹,只是想炸死你要继承其财产的那个人,那么你对飞机上其他被炸死的乘客就犯有一级谋杀罪(故意的、有预谋的),即使你并不希望他们被炸死。

在妨碍司法案件中,进行这种区分也有先例可循<sup>④</sup>,但此种区别

---

<sup>④</sup> 美国诉雷斯温德案,《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二编,第590卷,第1269页(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四巡回审判庭1979年判决)。总原则参见威斯康星有计划双亲诉都乐,《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三编,第162卷,第463、469页(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审判庭1998年判决);韦恩·R·拉费福和奥斯汀·W·斯科特:《实体刑法》,第一卷,第35节(a)——(c),第304—311页(1986年版)。“雷斯温德方法”在不同的联邦上诉法院巡回审判庭的许多案例中被引用,但也受到过批评。两种观点,参看约瑟夫·V·德马可的注释:《在前往法庭的路上发生了滑稽的事情:犯罪意图,销毁证据和联邦妨碍司法法》,载《纽约大学法律评论》,第67卷,第570页,1992年。

适用于这类案件比较深奥难懂,在将其妥当性足够公开地提交公众讨论后的结果是,劝我不要把这根绳索勒在当今天美国总统的脖子上。按照刑法的尚有争议的解释,作为一位美国总统不应犯有“重大犯罪或不法行为”。而且,克林顿总统是否想到苛莉会成为琼斯案件或独立检察官调查中的证人尚不能肯定。

我对某些观点认为总统对他的助手们撒谎,故意让他们在大陪审团面前重复谎言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确实对他们说了谎,那也可能正是他的动机,可是他有足够的其他理由撒谎。他们对大陪审团重复他的否认也根本不能保证那些否认的真实性,这一点克林顿作为一个理智的人、一名律师应当是早就意识到了的。假如克林顿被指控伪证,他曾在法庭外作过同被指称为伪证的陈述一致的陈述的事实,就成为不能接受的谣传了<sup>⑤</sup>。

克林顿建议莱温斯基给琼斯的律师提交一份宣誓陈述书,这一点倒没有多少模棱两可的地方。她不想宣誓作证,他指出如果她能提交一份书面的宣誓陈述,也许能免于宣誓作证。从表面上看,这一建议只涉及到形式而未涉及宣誓陈述书的内容,但是它暗含着宣誓陈述书可能提供虚假情况的意图,因为在宣誓陈述书(通常由律师来起草)中有条理地、使人信服地撒谎比起在被人左盘右问的宣誓作证中撒谎要容易得多。克林顿的建议几乎可以肯定是有意为莱温斯基提供虚假证词提供方便。

但有一点看来极其含糊不清,就是当克林顿告诉莱温斯基接受

---

⑤ 关于事前一致的陈述不能用以支持证人证言的总规则确实有一个例外,即用于反驳有关证人伪证或受到不适当影响或作证时有某种不正当动机的指控时的陈述,但是这一例外在此不适用。关于上面提到的规则和例外,参见汤姆诉美国案,《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 513 卷,第 150 页;《联邦证据规则》第 801(c),(d)(1)(B)条。对于总统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证言是近期捏造的,说明某种不适当的影响或先前不存在的动机,这些问题没有什么争议,倒可作为他一直保持同一立场的证据。与此对照,正如总统的辩护人所暗示的,莫尼卡·莱温斯基可能捏造了一些反对总统的谣言,以从独立检察官那儿“购买”免于起诉,在调查成为支持她证言的可接受的方式之前,很长时间她早已对她的亲戚朋友、心理医生作过许多事前一致的表述。

传票的时候她得移交所有传票所要求提供的东西时,他是在请她处理掉那些礼物呢,还是仅仅在谈及一个法律方面的常识性问题呢?如果他是那么说的,她的证言是按照她的建议处理那些礼物,他说他将考虑这个问题。这一行为本身并不构成妨碍司法,虽然可以作为他在那天晚些时候她把礼物转交给苛莉这一行为上起了作用的进一步证据。

直到莱温斯基在参议院审判中宣誓作证时,看来很肯定,总统在12月17日同莱温斯基的电话谈话中,包括在她提交给琼斯案件的宣誓陈述书中,建议她谎称“你只是给我送文件”来掩盖事实。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明显的唆使伪证<sup>⑥</sup>。但是莱温斯基在参议院作证时否认她理解了总统说的送文件的事“同宣誓陈述书有联系<sup>⑦</sup>”。她解释说,那次谈话很长,涉及到除宣誓陈述书以外的很多话题。从这一证言不能得出总统有意谈到掩饰故事的结论,但这又使要证明他建议她在宣誓陈述书中使用这个故事这一点上排除合理的怀疑更加困难。

不过,在另一个场合,他明确地建议她可以在宣誓陈述书中说立法事务办公室已经在五角大楼给她安排了工作<sup>⑧</sup>。这是唆使作伪证。他请她在宣誓后撒谎是实质性的伪证,因为解释她为什么调离原来工作的真实原因会给人提供她实际上已同总统发生性关系这一实情的线索。同样地,几乎也是事实,当总统建议贝蒂·苛莉拿回他

---

<sup>⑥</sup> 见《美国法典》,第18卷,第1622条。

<sup>⑦</sup> 见《美国国会记录》,第145卷,第3105页(1999年2月6日),众议院询问她的弹劾人员因疏忽没有问她,总统提到的这个掩饰故事如果同宣誓陈述书无关,那么它同什么有关。

<sup>⑧</sup> “我想……你知道如果,如果我不得不在宣誓后回答这些问题,如果回答的过程中我提到白宫某些不喜欢我的人,那我就完了——他们会给我找麻烦的。因此,当我告诉总统我在五角大楼的工作时,他说,‘行了,你总可以说是立法事务办公室的人给你找的,或帮你找的(工作)’。”见前注①《附录》,第一卷,第1012页(莱温斯基在大陪审团的证言)。2月1日在参议院作证时,莱温斯基说,“他(总统)根本没有同我讨论过宣誓陈述书的内容,从来没有。”《国会记录》,第145卷,第3106页(1999年2月6日),但是文中提到的“从来”似乎仅限于12月17日的电话谈话。



送给莱温斯基的礼物时,他是在不适当地影响证人(莱温斯基)<sup>⑧</sup>。这些都是妨碍民事诉讼而非刑事诉讼的、实际上是一个后来被驳回的民事诉讼的行为。莱温斯基在大陪审团作证时说,没有人曾经叫她撒谎或隐瞒证据,这并不重要,妨碍司法可以只要眨眨眼、点点头就可以构成。

### 伪证

很清楚,克林顿本人在琼斯的宣誓作证中作了伪证,即使像克林顿的辩护人所强调的那样,伪证罪仅严格限定在联邦法中,在誓言中作虚假陈述尚不构成伪证。陈述必须是故意作假,也就是说,是一个谎言,必须是在诉讼中作出的对某个问题有实质意义的谎言,必须是虚假的而不仅仅只是误导。最后一项要求的目的是,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布龙斯通案件<sup>⑨</sup>中宣告的,也是最不直观的一个。它旨在避免由于陈述人欺骗提问者而使其对陈述人的意图和理解有不能解释的不确定项,如果他(提问者)想要给伪证起诉留下证据,他就有义务提出明确的问题。琼斯的律师没有给克林顿进行一次技巧熟练的考试,特别是他们没有问及他特定的性行为,还附和他经常的离题万里的闲扯和回避那些设计以用来使他落马的问题。结果,他的许多回答,虽然极有可能是在撒谎,但并没有使他因伪证而被起诉。

对实质性的要求服务于两个目的:一是剔除无害的谎言,法律总的来说不理睬那些无害的事实,即使当事人在做的时候怀有不正确的动机。第二个理由,也是对涉及性的案件特别重要的一条,是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中的合理利益。在许多法律场合,包括在宣誓作证和大陪审团调查的过程中,法律规则的关联性极其不严密,这使得提问

---

<sup>⑧</sup> 《美国法典》,第18卷,第1512(b)(2)(A)条(扣留证据)。他也违反了妨碍司法的一系列规定,参见《美国法典》,第18卷,第1503条(参见前注37),很可能同莱温斯基和奇莉共同策划妨碍司法。

<sup>⑨</sup> 布龙斯通诉美国案,《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409卷,第352页(1973年判决)。

者能够提问那些纯粹私人的问题而与其调查目的不沾边。如果证人基于隐私权拒绝回答,这种拒绝就有可能被理解为承认他确实进行了提问中所涉及的无论多么不光彩的行为,众院司法委员会发表的大陪审团和宣誓作证的副本中满篇都是这类问题。正像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克林顿有几次回答大陪审团的询问时,似乎就遇上这种非正式的“特权”而在誓言下对一些非实质性的问题撒谎,以保护他的个人隐私。但是显然因为性是私人问题而导致与之有关的问题本身都不重要的理论,仅某个证人被问及他的性生活的事实,并不能给他以撒谎的权利。在古往今来的许多法律诉讼中,从离婚行为和监护权争执,对强奸、乱伦、男同性恋、骚扰儿童的起诉,以及色情影片的生产,到性骚扰、赡养费、诽谤,故意传播性病,确认父亲等诉讼中,性行为都是实质性的、重要的。

克林顿宣誓作证时有几处虚假陈述明显是伪证。首先是他否认,除可能的少数场合、每次都不过区区几分钟,当她给他送文件时,他曾和莱温斯基单独在一起。在这一否认和真正的事实之间的联系是,送文件只是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有时用以掩盖她去他办公室的一个借口。既然实际上并没有送文件(肯定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虽然有几次她可能开玩笑地带给他一个随手放了几份文件的文件夹),他的回答即便从字面上看也是不真实的。他说他不记得他们曾经发生过性关系,忘记了有几次她在他的办公室呆了不止几分钟,这些也同样不可信。她有许多次呆在他的办公室超过一小时,这类事情人们一般是不大容易忘记的,除非他的记忆力受到了损害,而克林顿据说具有极佳的记忆力。

当总统说,他从未与凯瑟琳·威莉发生性关系,莫尼卡·莱温斯基只给他送过一、两件礼物,他不记得曾经给过她任何礼物(而实际上他送过她大约 20 件礼物,有些还是在三周前),他惟一一次对莱温斯基谈起她在琼斯案件中被传唤的事,是他针对琼斯的律师可能要传唤每一个他曾经与之说过话的女性的情况开玩笑,他还不知道她从比尔·里查森的办公室得到一份工作,除了他的律师没有其他人告诉



过他琼斯案件传唤莱温斯基作证(事实上弗依·乔丹和莱温斯基本人都告诉过他),莱温斯基到白宫来是去看望贝蒂·苛莉,等等这些时,他也明显地、而且是实质性地撒谎。

在大陪审团作证时,克林顿重复了很多他在宣誓作证时的谎言。当他证明他在宣誓作证时说的是真话,当他否认曾经不适当地影响了其他证人时他也是在撒谎,一如我们刚才已经证明了的。当他说他对他的助手们否认同莱温斯基有性关系在文字上是真实的时,也是在撒谎,他断然地对他们当中不止一个人说过,他同她连口部的接触都没有发生过。他否认暗示过苛莉去要回给莱温斯基的礼物,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又一个谎言。当他说在他1月18日被要求宣誓作证后,他同苛莉谈话的目的是回忆他同莱温斯基的一些交往的经过时也是在撒谎,他的目的决不是这个。

当他说他从未“单独”同莱温斯基在一起,因为附近总有其他人,最显然的贝蒂就在椭圆形办公室外面的办公桌前,厨师们在厨房里,侍卫特工几乎无处不在地盯梢——的时候,他也是在撒谎。这不是一个对伪证的辩护,原告如果知道他们是私人关系就不会把隐私诉诸语言<sup>⑤</sup>;如果这是一个辩护,指控他作伪证就不能成立。建议琼斯的律师在问克林顿是否曾同莱温斯基单独在一起之前给“单独”二字先下一个定义是荒谬的。他不可能误解这个问题<sup>⑥</sup>,对他的回答甚至也很难作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使得它看起来不像一个故意的错误。一个特意为克林顿安排的陪审团可能决定,或假装决定,他甚至

<sup>⑤</sup> 虽然他不是一名天主教徒,更不是一名天主教徒受到迫害的社会中的天主教徒,克林顿是天主教模糊教义的大师——“与谎言擦肩而过而无罪”,里奥·卡兹:《错误获得的利益:法律的规避、敲诈、欺骗以及类似难题》,第29页(1996年)。(正像对盘问某人的宗教活动的地方法官宣誓那样:“某人未曾做某事,虽然他实际上做了,从内心来理解,某人在某日,或出生前是没有做过。”)布雷兹·佩斯科:《外省信件》,(A·T·克瑞尔希默编,1967年版)第140页。尽管卡兹教授的意思是相反的(“无罪”),我们将会看到模棱两可不是伪证的有力辩护。

<sup>⑥</sup> 有关这一条件的意义,参见美国诉德泽恩案,《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三编,第157卷,第1042、1049—1050页(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六巡回审判庭1998年判决)。

对普通的英语单词也确实理解得同任何其他人不一样而放过他,要证明有伪证罪,必须是明知自己在说谎,但是没有一个理智的陪审团会相信克林顿的问题是一个对英语掌握不熟练的问题。

他对他是否同莱温斯基发生过性关系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同样的。因为性行为中的被动角色没有参与性关系,暗指当莱温斯基与总统口交的时候,她在进行性行为而他却没有。就好像强奸犯在进行性行为而受害人没有一样,这也意指两人在休息室里偷偷摸摸进行口交,一个男人与另一个人口交(后者确实常常是被动的)。口交者进行了性行为而被口交者没有,即使在很多情况下他有被鸡奸的感觉。琼斯的律师曾指控克林顿要求琼斯与他口交,如果是她接受邀请而与他口交,那么她的律师不大可能对性关系设计出一种在其中克林顿没有进行性行为的定义。

进一步而言,虽然在宣誓作证中使用的性关系的定义很不灵活,它也并未排除性关系中被动的一方,即使克林顿完全是被动的,他“导致……意欲激起或满足任何人的性要求而同生殖器的接触。”这里的“任何人”是他自己,是他邀请她这么做,让莱温斯基接触他的生殖器,其目的是激起或满足他的性要求。克林顿宣称他已经仔细研究过该定义,完全能够理解它的含义,在回答有敌意的或令人难堪的问题时可以拘泥字面的解释。在事后看来,律师们不应试图寻找一个众所公认的“性关系”的定义,而应就特种性行为盘问克林顿。他们从琳达·翠珀那儿知道莱温斯基曾经与他口交,他们本来可以就克萊之间的性行为的细节问得更具体一些,可是他们的提问不够具体,对伪证指控不能起关键作用,因为“在通过上下文和证人能够清楚地理解问题的含义的情况下”,问题的含糊不清不会使被告脱离窘境<sup>⑤</sup>。无论如何,这些问题不是含糊不清的,虽然它们可能蒙住比克林顿反应慢的证人,但克林顿从未抱怨这些问题蒙住过他。

最后,克林顿在同莱温斯基的性交中身体并非是被动的。当大

---

⑤ 同前注,第 1049 页。

陪审团问他是否被动时,他拒绝回答,只是重复说他同莱温斯基没有发生性关系。考虑琼斯案件的证言中对性关系的定义,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克林顿在同莱温斯基的性交中确实完全是被动的,仿佛她是个娼妓。要是他坦言当她与他口交的时候他没有以性爱的方式抚摸她,那么哪怕是最愚笨的人也会知道他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显然他抚摸过莱温斯基定义所列名的身体部位,并且是带着性欲的目的这么做的(假如他的目的不是性欲,那么又是什么?)。这一点再次说明,他说他忘记抚摸、只记得被口交是不可信的<sup>④</sup>。他不仅对他的行为撒谎,而且对他的记忆撒谎。

克林顿的辩护律师对最高法院的布龙斯通案件判决读得有点过头,主张任何回答只要能曲折地解释成字面上是真实的就不算伪证。布龙斯通案件并没有走那么远,它所指的是一个避而不答的、误导的但并非虚假的回答。当被告被问到,“你在瑞士银行有账户吗?”回答说:“没有。”下一个问题是:“你曾经有过吗?”回答说:“公司在那儿有一个大约为期6个月的账户<sup>⑤</sup>。”事实是他曾拥有瑞士银行的账户长达5年,但是在审判的时候没有。因此他的第一个回答是真实的。假如他对第二个问题也回答“没有”,那他就是伪证。他给了一个没被问到的问题的答案(真实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公司曾经有一个瑞士银行的账户,作为替代。这种回答误导别人,但却不能说是虚假的。克林顿总统的回答则既是虚假的、又产生了误导作用。

布龙斯通判例并未对模棱两可给予认可<sup>⑥</sup>。“一个表面的、虚假的回答不在布龙斯通案件所指的文字上的真实之列,因为被告可以

---

④ 他的律师向众院司法委员会提交的材料中满怀希望地从格里斯伍德诉赫泽德案(见《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141卷,第260、280页(1891年判决))中引述道:“人们对于他们自己参与其中的事情记忆往往不一样,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是故意偏离绝对的真实。”

⑤ 布龙斯通诉美国案,见前注④,第354页。

⑥ 见前注⑤。

对问题未表述的前提进行假设,使他的回答在文字上是真实的<sup>⑤</sup>。”德泽恩案件为伪证案件“文字上的真实”的辩护提出了又一个相关的例外<sup>⑥</sup>。被告被控诉在回答有关从事非法的政治性筹资活动的问题时作伪证,他被问到,在他 1991 年加入的那个党派是否有筹资活动时,他回答说他没有看到过也没有意识到有这方面的行为。事实上他被问及的党派成立于 1990 年,而非 1991 年,因此他辩护说他的回答是真实的,因为他 1991 年加入了一个没有筹资活动的党派。法庭否决了这一辩护理由,支持对德泽恩的定罪,依据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当他回答“没有”时他知道调查者是问的是 1990 年的那个党派。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确切性的,因为日期错误,但这也不是使被告逃避、脱离险境的理由。如果这一判决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理由怀疑,总统对伪证起诉的辩护不能成立——假设他的谎言是实质性的话。

负责审理琼斯案件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认为,他的谎言是实质性的,因为她允许他们提出克林顿的律师强烈反对的问题以调查真实情况。她是对的,这些谎言对琼斯案件是实质性的,虽然只是就此案件而言。琼斯曾经是克林顿任堪萨斯州州长时该州政府的一名雇员,她在诉讼中控告克林顿曾经暴露肢体请求她与他口交,他否认这一指控,应该相信哪一方呢?莱温斯基是克林顿任总统时联邦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让一位下属与他口交使得琼斯的指控更加可信。在这两件事中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是:克林顿开始并没有要求莱温斯基与他口交,是她主动的。但克林顿当上总统后似乎比他做州长时更小心一些。他处在媒体和共和党监视的压力之下,他的隐私较少,而且,部分地由于琼斯案件本身以及在他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活动中揭露出来的他和吉尼弗·福拉沃斯之间的性丑闻,他已经有了前

---

<sup>⑤</sup> 美国诉阿布罗姆斯案,《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二编,第 947 卷,第 1241、1245 页(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五巡回审判庭 1991 年判决)。

<sup>⑥</sup> 美国诉德泽恩案,见前注<sup>⑤</sup>。



科“记录”，这使得他要令人信服地否认后来的性骚扰控告更困难一些。

莱特法官后来决定把有关总统和莱温斯基关系的证据全都排除在琼斯案件之外。法官的这一决定被普遍地理解为是对——总统的口供及其在口供中的谎言对琼斯案件来说是非实质性的一种裁定，这种理解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是不正确的。首先，实质性是在谎言说出的当时所作的评价，而不是事后诸葛式的马后炮。所应当表明的是，谎言潜在地妨碍讯问者的调查<sup>⑤</sup>，因此“一个虚假陈述可能是实质性的，即使法庭的结论最终是同样的<sup>⑥</sup>。”这一原则同法律不追究无害的谎言的原则并无冲突。表面看来(实际并非如此)同调查相关的谎言可能使调查者迷失方向，公正执法受到妨碍并不仅仅是指审判的结果不公，而且也指审判的过程受到不合理的拖延或积压<sup>⑦</sup>。假如克林顿在口供中说的是真话，或者当回答有关莱温斯基的问题时简单地表示拒绝，那么琼斯案件要么通过和解要么通过缺席判决，在1998年11月之前该案被最后调解时就应当理所当然地解决了。

其次，莱特法官的裁定受到下列事实的重要影响，即独立检察官因为害怕影响调查而倾向于搁置在琼斯一案判决前所有的新发现。搁置是被迫的，但无限期的搁置意味着对琼斯案件无限期的拖延，这一案件已经拖了四年了，在过去将近七年中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大事件。权衡克莱关系的重要性同加快琼斯案件的进展的益处，莱特法官决定把前一种关系的证据排除在外(因此也就排除了通过要求莱温斯基或者贝蒂·苛莉或者总统宣誓作证而进一步取得证据的可能性)，以便她能够较快地处理琼斯一案。这一裁定并不是认为这种关

⑤ 同前注第1051—1052页；凯斯琳·卡瓦那·巴原和瑞彼卡·I·卢比：《伪证罪》，见《美国刑事法律评论》，第35卷，第1035、1051页(1998年)，有案例引证。

⑥ 美国诉德泽恩案，见前注⑤，第1051页。

⑦ 例如，参见美国诉威尔斯案，《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三编，第154卷，第412、414页(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审判庭1998年判决)。

系不重要,而是认为它对本案来讲不重要。莱特法官承认与这种关系有关的证据“可能同本案的问题有关”(不再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其实质性),只不过这些证据对“本案的核心问题并无必要<sup>⑧</sup>”。

不可否认,总统在大陪审团的许多谎言对于大陪审团调查他是否在琼斯案件中作伪证,以及他和其他人是否在该案中有其他妨碍司法的行为是十分重要的。缺乏实质性,或者缺乏使他在证言中的错误陈述成为非故意的混淆的任何可能的争论,使得在大陪审团作伪证的控诉比在琼斯案件的口供中伪证的控诉更加有力。而且,既然大陪审团正在调查克林顿和其他人的犯罪行为,“民事案件中无人因为伪证而受惩罚”的抗辩就不再适用<sup>⑨</sup>。正巧它也是不可靠的。众议院否决在弹劾条款中指控克林顿在证词中作伪证不应当被认为是总统免责。该否决表明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裁决,或者表明怀疑总统在民事案件中作伪证属于应被弹劾的行为。

并非总统在大陪审团所说的所有谎言对调查都具有明显的意义。他否认在1996年以前同莱温斯基有过性方面的接触,这肯定是一个谎言(很可能是为了避免承认他同一位实习生有性关系),因为说他会忘记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哪一年,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特别是它发生在他第一任期中最惹人瞩目的时期之一,也就是政府关闭期间。他否认1997年3月同莱温斯基发生的最后一次性关系,这很可能也是一个谎言而不是真的记不起,是一个用以尽可能地

---

⑧ 琼斯诉克林顿,《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增补本,第993卷,第1217、1219页(塔萨斯东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1998年判决),亦见她后来的裁定,《西方判例汇编》,第1999卷,第202909页(1999年4月12日判决)。

⑨ 另外,在琼斯案件中作伪证和在大陪审团作伪证更深奥的区别还在于,普通伪证案件的“双证人”规则——也就是被告证言的虚假性不得被一个人未经确证的证词证明为无合理怀疑——对在大陪审团作伪证的案件来说是不适用的。《美国法典》,第18卷,第1623条(e);美国诉德泽恩案,见前注⑧第1052页。这一区别并不是关键,因为莱温斯基的证词已经充分证实,而且,这一规则只对虚假证言适用,不适用于故意的情形。同上,第1053页。



推远他们终止关系的时间以便使他假装对此健忘的谎言更加可信的谎话。但是大陪审团正在调查的问题——克林顿在琼斯案件中是否给他自己作伪证或者妨碍司法——并不依赖于他同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次数的多少,也不依赖于他们开始或结束性关系的时间究竟在何年何月。他证明说他同莱温斯基的关系开始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恋情,后来才发展成为性关系,而实际过程恰恰相反。这一谎言的目的无非是使他在其通奸行为中看起来不是那么好色成性,而是更“浪漫”一些,而这些也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但是不止于此。在回答众院司法委员会旨在确定争议事项而向他提出的问题时,克林顿再次重复(同样也宣誓)许多他在非公开的出庭作证场合和在大陪审团作证时所说过的谎言。这种重复很显然是故意的,对众院司法委员会的弹劾质问明显是重要的,在国会作伪证或虚假陈述属于联邦法律上的犯罪行为<sup>④</sup>。

#### 克林顿的违法行为:一个小结

1999年1月25日,在参议院审判总统期间,许多共和党的参议员要求总统回答十个问题,但他拒绝了。虚假的回答将不可信,而真实的回答要么会使他坦白犯罪的事实,要么会给他本用以掩盖的某些被起诉的罪行(虽然并不是所有)带来进一步的问题。这里我把这些问题抄录如下<sup>⑤</sup>:

1. 你在琼斯案件中的证言都是真实的吗?
2. 当你告诉贝蒂·奇莉说“莫尼卡走近我,但我从未碰过她,对不对?”(以及你在1998年1月18日告诉她其他事情)的时候,你认为自己在说真话吗?
3. 你如何解释莫尼卡·莱温斯基没有接受你的“建议”,把你送

---

<sup>④</sup> 参见《美国法典》,第18卷,第1621、1001条。

<sup>⑤</sup> 全文请参见《审判总统》,《纽约时报》1999年11月26日,第16页A。

给她的礼物交给琼斯的律师？

4. 当你的下属们说你否认同莱温斯基有过任何形式的性关系时他们说的是真话吗(人们都知道她是一个“暗恋者”)？你对他们说的是真话吗？

5. 为什么茱克·莫里丝要对美国人民是否会原谅你的犯罪行为进行民意调查？

6. 当莫尼卡·莱温斯基证实(并告诉她的朋友)说你曾经抚摸她时她是否撒谎？

7. 你是否曾经告诉莱温斯基,她可以在琼斯案件的宣誓陈述书中说,她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附近是去贝蒂·苛莉那里或者送文件？

8. 当你在1月18日,也就是你在琼斯案件中作证后的那天,同贝蒂·苛莉谈话是否违反了莱特法官的司法限制言论令<sup>⑥</sup>？

9. (当莱温斯基在提交琼斯案件的保证书之前把它拿给你看时)你告诉她你不必看,因为你已看过十五份是什么意思？

10. 你是什么时候得知莱温斯基没有把你送给她的礼物交给琼斯的律师,而是放在苛莉那儿的？

总统对这些问题的沉默是雄辩的。确实,在普通的刑事审判中,陪审团不得因被告拒绝作证而推定他有罪。但是,原因不是作此种推论没有根据,而是为了支持宪法上“一个人不应被迫证明对他不利之事”的权利。总统的沉默——他不仅拒绝回答众议院提出的问题,而且在参议院审判中当很多参议员要求他作证时他也予以拒绝——这更可能被解释为,他害怕无论他说什么都会证实而不是推翻对他的指控。

总而言之,基于目前的公开记录,这一点是清楚的而不止是合理的怀疑,就是克林顿总统在以下方面妨碍司法并违反了联邦刑法:

---

<sup>⑥</sup> 在作证完毕时,莱特法官命令所有在场的人“不许谈及他们被问到的任何问题、作证的实质”,或者“有关的任何细节”。见前注<sup>③</sup>口供录像磁带。

(1)他在琼斯案件中的口供,在大陪审团以及在回答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的问题等多个场合反复多次地给他自己作伪证<sup>⑤</sup>; (2)通过唆使莱温斯基提交一份虚假的宣誓陈述书以代替作证,隐藏她从他那儿得到的礼物,从而影响证人证言; (3)向莱温斯基建议,在其宣誓陈述书中,对她从白宫调到五角大楼工作的原因作虚假的解释,唆使她作伪证。他还不适当地影响潜在的证人苛莉,密谋策划给莱温斯基安置一份工作来贿赂她,以保证她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言,暗示莱温斯基在琼斯案件的宣誓陈述书中捏造“送文件”的虚假故事,从而唆使她作伪证,但是这些行为尚不能确证到足以进行刑事定罪的程度。

即使克林顿总统在誓言下的谎言同严格技术意义上的伪证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对此也绝不相信),那么这些谎言至少也是有意使法律程序出轨的、虚假的、误导的陈述,因而是妨碍司法的行为——同时也是涉及克林顿和莱温斯基、苛莉,很可能还包括乔丹和布鲁门瑟尔等在内的其他人的一场公开的密谋妨碍司法的行为,有想像力的检察官毫无疑问会在起诉书中加上下述罪名:幕后操纵进行诈骗罪、藐视法庭罪、向政府提供虚假陈述罪、教唆罪等诸如此类。

有趣的是,让我们思考一下一个犯了上述罪行的人可能受到的处罚。伪证罪或教唆他人伪证罪的最高刑期是5年<sup>⑥</sup>,不适当影响证人罪的最高刑期是10年<sup>⑦</sup>。实际刑期的计算则是以《联邦刑罚准

---

<sup>⑤</sup> 正如反对弹劾的《纽约时报》撰文所称:“我们相信这些证据给他(克林顿总统)在一桩民事案件的宣誓作证中和在大陪审团有计划地、反复地撒谎提供了铁的事实。”见社论:《为了我们,而不是他:不要对弹劾投赞成票》,《纽约时报》,1998年12月16日,第30页A。该杂志一直未改变这一判断。莱特法官在她4月12日的裁定中,特别指出克林顿在口供中撒了谎。

<sup>⑥</sup> 《美国法典》,第18卷,第1621、1622条。

<sup>⑦</sup> 《美国法典》,第18卷,第1512条(b)(2)(A)。

则》为依据的一个复杂的过程。保守的估计为监禁 30—37 个月<sup>⑧</sup>。(如忽略不计克林顿回答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所提的问题时的伪证和其他有关犯罪行为)。

除了对伪证罪和其他罪行进行刑事制裁外,还有潜在的民事制裁。他的谎言既是刑事违法行为也是民事违法行为,莱特法官已决定对克林顿在琼斯案件中的违法行为予以经济制裁,堪萨斯州也可能因为他从事了不符合律师身份的行为而取消他的律师资格。

《斯塔尔报告》宣称,克林顿总统“非法地”利用总统行政特权,试图向独立检察官隐瞒犯罪行为<sup>⑨</sup>。我认为这个观点站不住脚<sup>⑩</sup>。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是克林顿的律师在运用其知识和授权时有时过了头、不支持他,轻率地利用总统行政特权,招致法院对似无法律依据而要求权利或进行辩护的诉讼当事人和律师给予经济制裁。可以肯定,克林顿的律师以强硬手腕对付独立检察官的强硬手腕,但这并非不是弹劾他的一个依据。他们由此所得到的东西不甚清楚,对此我在第七章中将提供一个假设,而他们所失去的却是在同对方律师的对抗中要求道德上的优势的权利,他们的“慎打法”和逃避更加加深

⑧ 这是假设(a)在琼斯案件中伪证及与之相关的罪行(例如不适当影响证人和(b)在大陪审团面前作伪证。(a)、(b)两项的基本犯罪水平都是 12。(a)项应当加上 2 分,因为他在 1 人以上(5 人以下)的共同犯罪行为中起了主要作用,另外由于他滥用人们对他的地位的信任还应再加 2 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经过调节的 16 分的犯罪水平。(b)项中由于他实质性地妨碍公正执法应加上 3 分,另外,滥用人们对他的地位的信任应再加 2 分(因为克林顿利用总统的地位取得便于他伪证的让步,例如获准在大陪审团作证时他的律师在场),这样就得到一个经调节的 17 分的犯罪水平。较严重的犯罪水平再上调 2 个单位。以区别于不那么严重的犯罪(如我在(a)项指出的)。《刑法准则》的量刑表上初犯的犯罪水平为 19,总的幅度在 30—37 个月之间。见《美国刑罚委员会指导手册》,第 310 卷(1998 年 11 月 1 日),其他指导条款,参见 1B1.1,2J1.2,2J1.3(a),(b)(2),3B1.1(c),3B1.3,3D1.4。量刑时法官可以自由裁量,他可以视被告犯罪行为是否拖延和反复等情况而在量刑幅度以外确定刑期。

⑨ 见前注①,第 206 页。

⑩ 克林顿的律师正确地指出(他们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交的材料第 184 页),斯塔尔报告在第 207—208 页从前文引证支持对克林顿的指控,说他否认曾经同他的律师讨论过行政特权的问题。

了人们认为克林顿有很多事情要隐瞒的坏印象。

### 三、弹劾条款的准确性

我们还需考虑的问题是,本章中讨论的不法行为是否构成弹劾的适当理由(这也是第三章至第五章中的问题),以及,如果对克林顿以普通方式起诉,他还能否参照检察官及其同伴所使用的手段来为自己辩护(见第三章)。但是,现在来考察一下众议院投票表决的弹劾条款是否准确看来并不算为时过早。其准确性不仅同众议院是否负责的问题有关,而且同第五章中讨论的中途夭折的提议,即参议院在宣判克林顿对弹劾行为无罪时却发现他犯有众议院指控的某些罪行——有关。

指控克林顿在大陪审团作伪证内容有两条,其中第一条关系到:(1)他同莱温斯基关系的性质,(2)他在琼斯案件中的口供的真实性,(3)“允许”他的律师在证言中向法官作虚假的和误导的陈述,和(4)“试图通过贿赂不适当地影响证人证言,妨碍法庭对琼斯案件的调查取证。”独立检察官获得的证据有力地支持了这些指控,我尚未论及的第三点除外。

总统在琼斯案件的作证过程中,他的律师,罗伯特·本尼特曾经告诉法官,莱温斯基在她的宣誓陈述书中说“(她)同克林顿总统绝对没有任何形式的性关系<sup>③</sup>。”虽然克林顿显然从他正在仔细倾听的录音录像带中听到了本尼特说的话——他几乎不可能没听清本尼特在强调和重复他和莱温斯基证言的核心意思——但是并没有去纠正他,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本尼特是在替他说话。在向大陪审团作证时,克林顿既否认他在听本尼特讲话<sup>④</sup>,也否认本尼特讲话的内容是虚

---

<sup>③</sup> 口供录像带,见前注①;又见注①的《补充材料》第一卷,第471页。

<sup>④</sup> “我相信在我开始读这份副本(他在琼斯案件中的口供的副本)之前我根本没注意听本尼特具体都讲了些什么。那会儿整个过程好像一晃而过。”同上,第一卷,第481页。



假的和误导的<sup>⑤</sup>，他对这两件事的表态没有一件言之成理。就因为他们的陈述比其他人还要含混不清，众议院越发怀疑他们是否在作伪证。总统的律师抗辩说，只有克林顿本人知道本尼特讲话时自己在想些什么，暗示如果缺少被告人的精神状态方面的证据，任何人都不能被定罪——虽然很多刑事方面的犯罪都要求这一条。但这种抗辩破坏了法律规则。

众议院通过的另一弹劾条款(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向众议院提出的四条中的第三条)是，总统采用七种不同的方式不适当地影响证人(也就是教唆伪证和影响证人)。其一，克林顿怂恿莱温斯基在琼斯案件中提供虚假的宣誓陈述书，这一点有充分证据，虽然它可能被裹以伪饰，克林顿可能只是向她暗示说——她去白宫只是为了看望贝蒂·苛莉，她到椭圆形办公室只是为了送文件，至于白宫立法事务办公室为她在五角大楼找工作——在宣誓陈述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第三条中的第二点起诉理由是，总统怂恿莱温斯基在琼斯案件中作伪证，这一点证据并不充分。莱温斯基不需要别人怂恿，总统建议的不是在作证时说假话，而是为了免于作证而呈交一份内容虚假的宣誓陈述书。第三条中另一项未有充分证据的起诉理由是，总统为了阻止莱温斯基说出他们的真实关系而帮她在纽约找工作；企图影响贝蒂·苛莉对他和莱温斯基关系的“回忆”；以影响苛莉在大陪审团或在其他司法程序中的证言；向他的同事撒谎以诱使他们重复证言中的谎言而误导大陪审团。这些说法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在已有的记录中缺乏坚实的证据基础。当本尼特向法官谈到莱温斯基的宣誓陈述书时克林顿含蓄地沉默；克林顿特地让贝蒂·苛莉要回他送给莱温斯基的礼物，后者有证据证明，而前者没有。当本尼特向法庭保

---

<sup>⑤</sup> “这得看‘is’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同上，第一卷，第510页。“在作证的时候，是说曾经——我和莱温斯基有过某种不适当的关系。因此如果有人用现在时，我们并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那是事实；如果他用过去时，他不是说实话；现在时可以包括很多个月。”同上，第一卷，第512—513页。



证莱温斯基的宣誓陈述书时,克林顿保持沉默,仅仅因为这一点就认定克林顿妨碍司法是不妥的,因为这将暗示,只要当事人没有纠正证人的虚假证言,或者其律师在抗辩中作虚假陈述,他就得承担妨碍司法的罪名,而既然律师在开场白或结语当中很可能重复他的当事人证言中的要点,那么每一个有一方伪证的诉讼案件都将同时是一个妨碍司法的案件。

第一条和第四条众议院没有通过,但事实上却是有充分证据的,他们指控克林顿总统在口供中作伪证,以及在回答众院司法委员会提问时作伪证。

## 第二章

---

### 起诉与辩护

在对犯罪和其他违法行为进行调查、起诉、审判、惩罚以及以其他方式进行矫正的过程中,大量的规则和习俗萦绕在其间。《人权法案》中列举的刑事诉讼程序规则和联邦宪法的某些其他规定已为世人所周知,但是,还有其他很多;那些非正式的、法律未明文规定的、制约法律实施过程的习俗几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例如,执法人员似乎不应该仇恨罪犯。公众憎恨罪犯是理所当然的,但从事拘捕、判刑和处罚的人员则不应如此。法律执行中的这种非人格化和非情绪化,相对于作为复仇的司法是一个显著的进步,作为复仇的司法要比现代刑事审判理念,以及执法人员(即报复者)与罪犯之间非情感关系(除其他因素之外)的创建要早。<sup>①</sup>

另一个重要的习俗是,当被迫兵刃相见时(莎士比亚的戏剧《以牙还牙》的主题之一),执法人员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起诉权以保护公众不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美国刑法典》中有成千上万条不同的禁令。一些禁令要么毫无意义(如:在广告中禁用瑞士盾徽图形<sup>②</sup>或未经内政部许可禁止使用“Smokey the Bear”作为商标名<sup>③</sup>),要么只是泛泛而言,要么根本不适用,要么试图堵塞法律漏洞。这些禁令

---

① 见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与文学》(1998年增补和修订本),第二章,特别是第53—54页。

② 《美国法典》,第18卷,§708。

③ 《美国法典》,第18卷,§710。另一个恰当的例子是蹂躏国会图书馆场地的灌木。《美国法典》,第2卷,§167。

在其涉及的领域内消除了大量对社会仅有轻微危害或根本无害的行为。通过限制给检察机关的拨款,立法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让检察官选择起诉的对象及事由;同时,我们还希望,检察官们会用一种公正、节制、审慎的方式作出选择。

还有一些限制和约束犯罪嫌疑人辩护的规则和习俗,同以上制约法律实施的规则、习俗并驾齐驱。其中,惩罚妨碍司法的行为就是一例,另一个则是对辩护律师的道德约束。

### 一、斯塔尔的调查行为及其与琼斯案的联系

伴随法律实施过程的规则和习俗——我们姑且简称其为“程序”,有别于指导法律实施和关于实际有罪的关键实体概念。尤其是当罪行已明白无误时,一个标准的辩护策略就是,对定罪的程序提出质疑,并强调程序中出现的种种错误以减除被告的罪行。普通法(我把弹劾法放在后面来讲,因为它大大不同于普通法)当然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法。若把对犯罪嫌疑人的审判变成对法律实施程序的审查,就会使审判复杂化,拖沓延时,误导和迷惑法庭。如此一来,法庭可能作出无罪宣判,出现避重就轻、本末倒置的情况。把罪犯与执法人员一起审判,通过撤销对被告的惩罚而使执法人员受到处罚,倒不如将二者分开审判、分别处罚更为明智。这种分两步进行的审判更加简单、明了,也不会因为基于执法人员的错误(原宥罪犯)而削弱对罪犯的威慑力。美国刑事诉讼程序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指责,因为它过于注重确保在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公平”竞赛,而忽视了找出事情真相。<sup>④</sup> 联邦最高法院已正确地转变了其立场:不应作为对诉讼程序

---

<sup>④</sup> 在威廉·T·丕兹的《缺乏真实的审判:为什么我们的刑事审判制度代价高昂地失败了,要重建它我们需要做些什么?》(1999)中对这一批评的主张极其有力。

中出现的、不会导致实质错判的错误行为的一种惩罚手段而取消定罪。<sup>⑤</sup>

的确,在偶然情况下,也容许罪犯从这些程序错误中占点便宜。最著名的例子是搜查和扣留案件中的排除性规则。违反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的禁止性规定,通过不合理的搜查和扣留搜集到的证据,即使能够最后定罪并且缺其不可时,也应被排除在对被告的审判之外。但这不过是一般规则的一个例外(这一例外本身又有越来越多的种种例外),一般规则决不会允许仅仅因为警方或检察官的错误行为就让罪犯逍遥法外,除非该行为使得法庭怀疑被告是否真的有罪。但这个例外不能适用在琳达·翠珀与莱温斯基的谈话录音上。即使此录音既违反了州立法,又对斯塔尔得到进一步扩大调查的批准是至关重要的,违反州立法所获取的这一证据或取得证据的线索不应被排除在联邦诉讼程序之外。同时,即使该录音违反了联邦法律,但由于行为人是公民个人而非执法人员,因此,亦可使其不在排除性规则的范围之内,因为排除性规则仅仅适用于非法的、由政府获取的证据。<sup>⑥</sup>但这并非意味着琳达·翠珀行为在道义上无可厚非。她在该电话交谈中再三告诉莱温斯基她在录音,她是莱温斯基的好朋友,她

---

⑤ 美国诉哈斯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 461 卷,第 499 页(1983 年判决);诺瓦·斯科泰尔银行诉美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 487 卷,第 250、254—257 页(1988 年判决)。对在起诉妨碍司法语境下的这一立场的有力主张,见美国诉雷斯温德,《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二编)第 590 卷,第 1269 页。特别相关的是,鉴于众议院在弹劾中的角色与大陪审团在普通诉讼中的角色之间的相似,最高法院认为,在大陪审团前的起诉失当本身是没有太大的害处的。在诉讼过程中定罪比控诉需要更多的证据,因而,这也表明被告在没有错误的大陪审团诉讼过程中被起诉。美国诉梅卡尼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 475 卷,第 66 页(1986 年判决)。又见,美国诉威廉姆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 504 卷,第 36 页(1992 年判决)。

⑥ 美国诉加科伯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 466 卷,第 109 页(1984 年判决)。琳达·翠珀受雇于联邦政府这一事实是不相关的;她并没有以法律执行者身份被雇佣。《联邦窃听电话法》禁止使用通过违反该法的手段取得的证据,即使它是某个私人取得的(18U.S.C. § 2515),但是,翠珀对她与莱温斯基的电话谈话的录音并没有违反该法。见《美国法典》,第 18 卷,§ 2515(2)(d)。

对莱温斯基的情感如慈母一般,莱温斯基应当信任她。她骗取了信任,而后很快就背叛了她。这里,我请读者自己判断,基于她当时录音的种种情形(见第一章),她是否会有足够的理由为这种明显背叛道德责任的行为作出解释。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在使克林顿面临被弹劾的困境的过程中,是否还有其他不正当的行为(除了以上提及的非法录音以外),<sup>⑦</sup> 如果确实存在,那么,无论是单个的行为还是集合在一起,它们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假如克林顿不是总统,并按正常的方式起诉他,我们也许认为他会受到不合法或不公正的处罚。这些问题最终表明与一个事实密切相关:即,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克林顿已成为了一个导致两极分化的人物。这一事实的根源,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更为深远的涵义,我们姑且放到以后来讲。在这里,重要的是问题本身。一些总统深受人民爱戴,尽管存在一些敌对情绪,但并不强烈。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第一任期中的林登·约翰逊都是如此。相反,一些总统不受大众欢迎,即使得到一点支持也不够热烈。如吉米·卡特,还有第二度任总统时的林登·约翰逊。另一些总统则在勉强得到拥护的同时又受到激烈的诋毁,如尼克松在其第一任期时所遇到的那样。然而,另有几位,就像克林顿、富兰克林·罗斯福、里根,既受到热烈的拥护又不乏激进的敌对分子。直到1998年9月,克林顿都与尼克松在其第一任期时的处境一样,也受欢迎(比尼克松更好一点),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拥护团体,以及他们对于敌对党派的由衷憎恶。在要求弹劾总统的呼声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些以前并不太热情的克林顿支持者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他们这么做的理由与本章并无直接联系。

真正的“克林顿的仇视者”只不过是他的主要反对党中的一小部分人,但这一小部分力量却可能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利用,他们妄图

---

<sup>⑦</sup> 对弹劾程序本身,即国会程序是否存在不合常规之处,我在本章的末尾作了简单的考虑,而将在下一章作篇幅更长的讨论。



通过搅混这场指控克林顿犯罪的调查和起诉来实现其目的。这些仇视者有一种可以被称为偏执狂幻想的信念,如在克林顿第一任期中自杀的白宫副顾问文斯·福斯特,他因为对克林顿在白水门事件中与人通谋一事知道得太多而遭杀害。他知道,在阿肯色州州长通过本州的一个秘密机场操纵一个国际贩毒集团交易时,克林顿与其合谋;他知道克林顿还是一个瘾君子,最后不得不接受鼻部手术(因为可卡因已破坏了他鼻子的隔膜);他知道克林顿的拥护者定期干掉那些可能揭露其违法行为的人。大富翁兼慈善家理查德·梅伦·斯凯弗就在这一小部分人之列,他一直在为协助调查、找到文斯·福斯特被杀的真相提供赞助。(克林顿的仇视者最根本、最坚定的信念就是,福斯特是被谋杀的。)(《华尔街日报》的撰稿人使其仇视者和那些理智的反对派逐步走到了一条战线上来,因为他们认为,克林顿对那些以暴力威胁像凯瑟琳·威莉一样可能提供不利证据的人的恐吓行为,采取原有甚至鼓励的态度。<sup>⑧</sup>

独立检察官对克莱一案的调查以波拉·琼斯的案子作为出发点。对于一个像琼斯这样既不太有钱又不至于太贫困的人来说,她没有资格获得义务的法律协助,除非她能说服律师以提取胜诉酬金的方式来替她打官司,否则便不能进入实质的诉讼,即,如果她胜诉,她的律师能够得到赔偿额的一部分(通常为33%—40%),如果她败诉,他将一无所获。对于一个能在法庭上有力打击美国现任总统的杰出律师来说,从纯赚钱的角度看,波拉的诉讼请求并不太具吸引力。通常情况下,性骚扰之诉是一场艰辛的拉锯战,<sup>⑨</sup>而且,波拉除了她自

⑧ 见社论,“你没有收到那一讯息吗?”《华尔街日报》,1998年10月26日,第A22版。该社论部分出自克林顿的仇家阿姆布鲁斯·伊万斯-普瑞特查德撰写的《比尔·克林顿生活揭秘:不曾报道的故事》(1997)一书。该书广泛地暗示着克林顿对许多谋杀,包括文斯·福斯特,以及贩毒承担了责任。作者将斯塔尔标榜为“珀修斯·皮雷特”(Pontius Pilate,公元1世纪宣布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罗马检察官——译者注),因为其在一次彻底详尽的调查之后决定了福斯特的自杀。同前,第113页。

⑨ 见伯恩尼尔·S·丹斯可和迪恩·G·奎尔帕特瑞克,“性骚扰的后果”,载《性骚扰:理论,研究和处理办法》(W·O·多诺枯尔编)(1997),第152,157—159页。



己的说辞之外没有其他证据支持她的诉讼请求。阿肯色州陪审团(也许任何陪审团)极有可能相信克林顿的否认——或者,至少要等到莱温斯基事件成为众所周知的时候才会转变态度(表明该事件对琼斯案重要性的另一标志)。

此外,琼斯的诉讼请求还存在着法律上的缺陷,这些缺陷有使之在能够到达陪审团之前就夭折的危险——当莱特法官在审判之前驳回起诉时,它的确夭折了。<sup>⑩</sup> 琼斯对驳回真的提起了上诉,案件也在上诉法院作出裁决之前得到了和解。但是,莱特法官的意见提出了这样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观点:琼斯在其与克林顿的事件中并没有受到什么大不了的伤害,但其继续上诉却得到了允许。因此,即使她能够获得开庭审理并胜诉,她也“可能”得不到太多赔偿,因为实在没有什么糟糕透顶的事情发生。我用“可能”二字,仅仅是因为陪审团也许会同时判给琼斯惩罚性和补偿性双重损害赔偿,但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额不会比补偿性赔偿多多少。由于莱温斯基事件使琼斯一案成为克林顿留任总统职位的威胁,同时该案在1994年被驳回时没有预料到会如此等后果,琼斯最后获得了85万美元的赔偿(和解金额)。

基于我一直在谈论的种种现实理由,大多数“似是而非”的诉讼请求(貌似有理而又并非轻率)未予公开。这一次,如果不是克林顿的反对党想利用该案驳倒他的政治策略,波拉·琼斯案很可能成为其一。此案自始至终都是由克林顿的政治反党发起和资助的,<sup>⑪</sup> 其中一些人,而不是全部,就属于人们所称的“克林顿仇视者”的那部分。这使克林顿有理由在大陪审团前作证时以及随后对大众的演说中,

<sup>⑩</sup> 琼斯诉克林顿,《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增补编),第990卷,第657页(阿肯色东区联邦地区法院1998判决)。

<sup>⑪</sup> 见埃德·沃廉称:“克林顿的开局让棋法:总统的棋子是怎样撬开波拉的超短袜生活的”,《观察家》,1998年4月5日,第11页;基摩·马斯特斯:“国家律师,对哥利亚斯(Goliath,《圣经》中记载的菲尼斯勇士,为大卫所杀——译者注)肆意妄为”,《华盛顿邮报》,1994年6月24日,第B1版;小万·那塔阁下和阿布娃姆逊女士,“静静地,律师组又让波拉·琼斯案件活过来了”,《纽约时报》,1999年1月24日,第1版。

指责独立检察官对他和莱温斯基一事的调查起源于一个蕴含政治动机的诉讼。事实也的确如此——更深一层的理由则是,一个叫罗西尼·哥德伯格的克林顿仇视者唆使琳达·翠珀安排了与莱温斯基的电话采访录音,他在琳达·翠珀与波拉·琼斯的律师之间牵线搭桥,并以琳达·翠珀透露给他的密情为杀手锏,深入挖掘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性关系的详情,由此陡然导致了克林顿作出伪证。

当《独立检察官法》再度颁布时,第一个被任命调查克林顿(有关白水门事件)的独立检察官罗伯特·费斯克被免职而由肯尼思·斯塔尔取代他的位置。根据《独立检察官法》任命独立检察官的法官小组<sup>②</sup>一直都由一个叫戴维·森特里的极保守法官领导,他是来自于北卡罗莱纳州的保守派参议员劳克·费克鲁思(他在1998年再度竞选时失败)的好朋友,该参议员曾公开要求免去费斯克的职位。<sup>③</sup>法官小组撤换费斯克的借口根本站不住脚。他们说,因为他是由克林顿的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任命的,那么,从表面看来就不能说他是完全独立的。但事实上,根本找不到理由证明他是司法部长或克林顿的同党,更不用说他们是他们的傀儡了。他属于共和党派,很难说他会由于被克林顿的司法部长任命为独立检察官就心生感激,宽容克林顿。而且,他与克林顿家族的成员也不太亲近,也没有野心去博取一个克林顿可能赏给他的更高职位。直到他被斯塔尔取代,他对白水门事件的调查已进行了8个月,这使得调查进程拖延、工作量加倍。克林顿的仇视者之所以反对费斯克,是因为他并不认为文斯·福斯特是被谋杀的。然而,撤换费斯克是法官小组的一致意见,也没有证据表明克林顿的仇视者操纵了森特里法官或小组中的另外两名成员。

这里,我必须说明的是,我对于克林顿的不轨行为的讨论与我对

<sup>②</sup> 特别的部门,见第一章。

<sup>③</sup> 路斯·马尔库斯:“肯尼斯 W. 斯塔尔”,《华盛顿邮报》,1998年1月30日,第A1版;珍妮·梅耶,“检察官如何独立?”,《纽约人》,1996年4月22日,第58,59页。

其检控官/或其迫害者所声称的不轨行为的论述篇幅必然有点悬殊。前者已被详尽彻底地调查过了;后者不管怎么说还没有经过调查。但调查越详尽,就越可能招致欺骗而无法挖掘真相。我这里只探讨已被公布的资料。在此前提下,单凭在斯塔尔取代费斯克之后不久,有人目睹森特里与费克鲁思、杰西·赫尔姆斯共进午餐一事,并不能找到什么特殊含义。

再则,肯尼思·斯塔尔也不会是克林顿仇视者选择的对象。在里根执政时,他担任联邦上诉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巡回审判庭的法官,在布什任期内又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这些都为他赢得了一个稳健派的声誉,他也不是一名右翼党分子。有传说,在布什任期,由于右派的反对而未任命他为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事实上,他是一个极度虔诚的基督教徒——法官小组的成员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极度虔诚的基督教徒们(以及虔诚的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受到性骚扰的侵犯。但在1994年,没有人预料到,对白水门事件的调查会逐步演变为对克林顿婚外越轨行为的调查。即便所有人都相信克林顿犯了通奸罪,也料不到斯塔尔会对此如此愤怒,以至这大大渲染了他的调查,为之增添了无尽色彩。

然而,对斯塔尔的任命仍然存在疑点,但这与他的个人能力及观点无关。1992年,布什总统再度参选,但被克林顿击败;斯塔尔在布什执政期间一度位居高官,出任司法部副部长。出于保持体面的缘故,如果任命一位近来与败在克林顿手下的总统没有如此深厚交情的法官去进行调查,也许情况会好得多。然而,受命调查尼克松“水门事件”的第一任独立检察官(当时称“特别检控官”)、在肯尼迪任期连续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阿奇伯尔德·考克斯,在1960年约翰·肯尼迪与尼克松作为对手竞选总统时却表现活跃。而且,他在出任特别检控官时受到了广泛的推崇和尊敬。

迄今为止,克林顿的拥护者已制造了大量攻击对方的炮弹,但无一能对斯塔尔关于莱温斯基事件的调查产生实质性的损害。而我们必须考虑调查开始时的情势。除了琳达·翠珀、罗西尼·哥德伯格和

波拉·琼斯的律师所扮演的角色之外——他们都是克林顿的政敌——我们知道,那些律师还就与波拉·琼斯一案相关的问题和理查德·波特尔商讨过,此人是可克兰和爱丽斯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年轻合伙人,一个激进的共和党派。<sup>⑭</sup> 斯塔尔也是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1998年7月底,即在他结束对克莱事件的调查前不久,他仍然供职于该事务所。因此,当调查开始时,他可算作波特尔的合伙人,<sup>⑮</sup> 不过,波特尔在芝加哥办公室而斯塔尔在华盛顿办公室。这是一个很大的事务所,斯塔尔否认在琼斯一案上他与波特尔有过任何交流。

我们知道,波拉·琼斯的一个律师曾就总统豁免权的问题向斯塔尔请教过几次,知道斯塔尔的部门为进一步查清事实、而被获准扩大对白水门事件的调查之前就已经着手调查克林顿-莱温斯基的事情了,知道斯塔尔险些辞掉独立检察官的职务而成为由理查德·梅伦·斯凯弗赞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他是该大学法学院院长)公共政治系的系主任,知道斯塔尔在请求批准的时候并未透露他本人或波特尔与波拉·琼斯案的牵连。法律并不禁止一个在职的独立检察官继续出任律师。但是法律禁止该检察官以及任何受雇于、或通过其他途径与其律师事务所有牵连的人,“在任何事件中替任何根据《独立检察官法》起诉或调查所涉及的人作代理人”。<sup>⑯</sup> 琼斯就是独立检察官的调查所“涉及”到的人。从现实意义上看,她想从中捞点什么;她

---

<sup>⑭</sup> 为了完全披露可能导致读者怀疑我在此事上的偏见的那些事实,我应该提到,理查德·波特尔是我以前的一名学生和法律秘书。在我开始撰写本书之前,我不曾和他讨论过克莱事件及其任何后果;对我们在更早时期的任何谈话中那些不为公众所知道的事情,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一如我在导论中所表明的,我并不知道克莱事件及其后果的内幕知识。对于记者对波特尔角色的报道,以及琼斯的律师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之间的联系,见万·那塔和阿布娃姆逊,前注⑪,以及迈克尔·埃斯科夫,“右翼网”,《新闻周刊》,1999年2月22日,第32页。

<sup>⑮</sup> 也许到它结束的时候;斯塔尔从可克兰和爱丽斯“辞职”采取的是无限期的无偿假期形式,这与《独立检察官法》利益冲突条款中规定的辞职不尽相同。

<sup>⑯</sup> 《美国法典》,第18卷,§594(j)(1)(A)。



最终从该案中得到了大笔赔偿金,这无疑是调查的成果,也是由调查导致的弹劾审讯的成果。但我们不能确定,波特尔与琼斯的律师们之间互相商讨——这与斯塔尔不同——是否就意味着他是她的代理人。没有迹象表明,可克兰和爱丽斯律师事务所会因波特尔为波拉·琼斯提供的任何法律服务而获得报酬,即使真的有,斯塔尔也不可能因琼斯案涉及到波特尔而得到好处。

即使检察官能够从私人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或其律师那里分一杯羹,也不是不合情理的。大量极为合法的、毫不特殊的、必不可少的刑事诉讼都起因于想从刑事共犯、付酬的通风报信者、竞争对手、心怀怨恨的前任配偶或雇员以及其他怀有个人目的的人那里索取报酬。如果这些收入来源被认为是肮脏不堪的,那么,整个刑事司法体系就会崩溃。斯塔尔不愿接受波拉·琼斯那帮人援助的原因在于,由于琼斯的律师和支持者都是狂热的党徒,他们的帮助也许会过分渲染指控,使克林顿成为党派之间政治迫害的牺牲品。

假如检察官的违法行为为公众所知,这会干扰对克莱事件的调查吗?作为法律事件,它们不会妨碍对斯塔尔的调查任命。这一事件,通过弗依·乔丹与韦伯斯特·哈贝尔之间的联系,进而又与白水门事件之间的联系,通过琳达·翠珀与白宫旅行办公室事件的联系(也在斯塔尔调查之列),<sup>①</sup>就足以使斯塔尔去着手调查而无须获得额外批准,这一点是可以得到论证的——尽管我认为理由还不够充分。斯塔尔的部门显然不知道,乔丹在莱温斯基被确认为琼斯案件的可能证人之前就已开始帮助她收集证据了。斯塔尔与琼斯案之间的联系即使完全暴露,也不大可能导致司法部长或特别部门换一个人选去调查。看起来好象在克莱事件与白水事件的调查之间,由于弗依·乔丹和琳达·翠珀而存在着某种关联。司法部长让总统受到被两个独立检察官同时调查的侮辱本来就不该是心甘情愿的。我再次重

---

<sup>①</sup> 在好几个雇员在可疑的情况下被解雇的时候,琳达·翠珀在旅行办公室工作,并且还接受了卷入该事件的独立检察官的工作人员的询问。



申,斯塔尔从来就不是一个右翼党狂徒。而且,时间是至关重要的。直到1月12日,即安排克林顿总统为琼斯案作证的前几天,斯塔尔的工作人员才从琳达·翠珀那里得知,莱温斯基计划马上向法庭提交一份伪证词,而且很有可能是克林顿鼓励她这么做的。这是一个机会——要是检察官行动快一点的话,他们就能捉住策划此阴谋的嫌疑犯。

即使本当派别人出任独立检察官——正如特别部门所为,他们把障碍栏提得如此之高,以致斯塔尔可能根本无法跨越,而且,假如一旦他与琼斯案有牵连的任何消息被泄露,他就不会担任独立检察官了。基于这些根本站不住脚的理由,就取消费斯克的检察官资格,确实是值得商榷的——此调查本当是另一种情形的说法也不过仅仅是推测而已。克林顿的拥护者(以及其他,特别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瑟瑞·道)认为,由于斯塔尔是一个受到性困扰的清教徒似的政治迫害者,或是其他什么种类的道学家,他才如此卖力地进行调查——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同时,正如我已说过的,把他看做是连呼吸都冒着火星的右翼党的好斗分子也不正确。毫无疑问,出于他的宗教信仰,他不赞成婚外性行为。但是,把任何反对婚外性行为的人都看做是道学先生也有点过分,更不用说,他也许还为性所困扰——在牵涉到性的调查中,不能从职业角度超然对待的、受压抑的性变态者。我们对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斯塔尔的私生活一无所知;1998年11月19日,在他提交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马拉松式的证词中,以及之后不久他与丹尼·索耶的电视采访中,也看不出他有受到性困扰的迹象。

在斯塔尔的报告里,即使是那些无中生有的性行为细节——我稍后会在后文解释,其中有些的确是毫无根据的——也并不要求把性困扰(或是“纯粹”的道学主义及党派狂徒行为)作为前提予以说明。斯塔尔及其手下从琳达·翠珀那里得知克林顿很可能妨碍了司法,于是他们计划运用诉讼上特有的强硬手段使其束手就擒。而韦伯斯特·哈贝尔拒绝与他们合作(正如他们预料),他们的计划流产

了；现在，他们似乎找到了解释——克林顿和弗依·乔丹沿着一条从华盛顿政府到纽约瑞富伦的地下铁路，把那些有可能对克林顿不利的证人迅速转移，使检察官无法找到他们。斯塔尔及其部下也许结论下得太早了。如第一章所言，利用弗依·乔丹帮助莱温斯基找一份工作的提议来自莱温斯基本人而不是白宫，至少是在最初，与传唤她为波拉·琼斯案到庭作证并无关联。“谈话要点”备忘录也是一个误导。对旅行办公室的调查也在没有起诉任何人的情况下就草草收场了。但是，我们从已知的情况中很自然地就能推测到，当琳达·翠珀第一次与斯塔尔打交道时，克林顿和乔丹正忙于在独立检察官已着手调查的事件中妨碍司法。这正所谓：无风不起浪。

如此一来，斯塔尔就责无旁贷地要把琳达·翠珀的录音内容提交司法部长审查，同时他也有责任提请特别委派人员着手调查录音中所暗示的、总统可能犯下的罪行，但此人不一定非是斯塔尔不可。考虑到总统的任期及其隐私问题，另一在琼斯案中调查克林顿和莱温斯基关系的独立检察官本应干得更谨慎一些。但从琳达·翠珀的录音来看，事情迟早会浮出水面，一个尽责的独立检察官不大可能不进行调查就草率完事，也不可能对总统的无罪否认信以为真，就此放过对那条沾有精液的裙子的调查。大多数受到指控的、独立检察部门的违法行为对调查进程并无影响，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在与莱温斯基初次交锋时运用的心理攻击战，此战术对她不管用。无论如何，认为是斯塔尔对性的态度使他在调查时干劲十足的想法是不负责任的，尤其是斯塔尔以前并未干过这行，因此他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为其工作的、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来告诉他应如何进行。这些检察官可没有被指责为是受压抑的性变态者。检察官都是好斗分子；否则，美国的犯罪率会比现在更高。

可以想象，斯塔尔被那些克林顿拥护者制造的诋毁战弄得很沮丧，他们把他描绘成一个遭受性压抑的清教徒似的疯子，一个爱走极端的右翼党分子，一个克林顿的仇视者。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诽谤。我们还不能确定，总统是否也在这场诋毁战中扮演了角色；但他可以

下令让它停止,正如他后来所做的那样,当詹姆斯·卡维勒对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发起恶毒攻击时,是他让他住了嘴。<sup>⑧</sup>

请设想一下当时斯塔尔所承受的压力——斯塔尔从前在联邦上诉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巡回审判庭的同事阿伯纳·麦克瓦也参加了这场战役。他辞掉法院首席法官的职位,摇身一变成为白宫顾问,但他在丑闻爆发时就已离开了白宫。一俟媒体开始报导斯塔尔对莱温斯基事件的调查,麦克瓦就告诉记者:“他完全疯了。与我合作过的这个人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他早已变成了一个低贱的煽动者。”“我想,司法部长必须认真考虑是否要撤换斯塔尔,由其他人来调查。”“他的行为简直令人无法容忍。”他不应该仅仅根据“两个女人的闲言碎语”就得出调查结果。“我不知道事实到底如何,但我想斯塔尔法官有点病态。”<sup>⑨</sup> 他承认,他并不了解事实真相——而且在1998年1月和2月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无人能确知事实真相——麦克瓦说斯塔尔“有病”和“疯了”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有什么能激怒斯塔尔的话,那就是麦克瓦的这些连珠炮般的攻击,从曾经共过事的、声名显赫的联邦上诉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巡回审判庭的前任首席法官的嘴里说出来,具有格外的杀伤力。克林顿本可以轻松地保持沉默,甚或更容易一些——把责任推卸给他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辩护者,<sup>⑩</sup> 但他没这么做。他对这种卑劣的攻击手段或是鼓励或是宽宥,卡维勒为其

---

<sup>⑧</sup> 卡维勒承认,白宫有能力让他住嘴。詹姆斯·卡维勒:《……和他骑的马:人民诉肯尼思·斯塔尔》(1998),第15页。

<sup>⑨</sup> 这些引证的资料来源分别是,拖尼·毛罗,“磁带显示出斯塔尔时间短促而问题复杂”,《今日美国》,1998年1月30日,第3A版;大卫·郝培,“提供不该提供的情况”,《信使杂志》,1998年2月1日;大卫·维尔曼和塞斯尼尔·巴厘,“宣誓之后,斯塔尔的批评者确信他不会轻松”,《洛杉矶时报》,1998年2月27日,第A28版;大卫·G·萨维葛,“以公众的看法,斯塔尔正在走下坡路”,《洛杉矶时报》,1998年1月30日,第A16版;罗戈·西蒙和威廉·内可克,“掩饰让克林顿卷进了诉讼”,《芝加哥论坛报》,1998年1月22日,第1、12版。

<sup>⑩</sup> 并不是他们中的全部,例如,阿兰·德尔修维茨。见第四章。

打头先锋<sup>①</sup>，象麦克瓦此等有名誉有地位的民主党人作此后盾，这极可能导致一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

在整个磨难过程中(这既是斯塔尔的磨难，也是克林顿的磨难)，斯塔尔神闲气定，至少在表面上，他泰然自若；但人们猜测，这一次他是真的被激怒了，或者，假如他被激怒，这将会影响其调查行动。但是，假如关于他遭受性困扰的传言不是那么绘声绘色，这个猜测会可信得多。有个说法倒比较可信，即：其下属感到身为检察官的声誉正受到威胁，于是加倍努力要“钉牢”克林顿不放。他们越是加紧调查，克林顿及其厚颜无耻的同党就越是加紧反击。双方战斗愈演愈烈，一直打到了参议院法庭上。就我看来，要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人为这场冲突的不断攀升负责是不公平的。

独立检察官的调查从1998年1月持续到9月，斯塔尔向国会提交了他的调查报告。这一时期，除受其他指责外，他还因为在大陪审团前究查“平民小百姓”，如白宫管家、贝蒂·苛莉、侍卫特工、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母亲和姑姑，而受到指责。这迫使他们不得不花费总共好几百万美元的法律费用用来打这场官司。<sup>②</sup> 其中几个也许犯下了

---

<sup>①</sup> 卡维勒称斯塔尔是“一个辱骂性的、侵犯他人隐私的、性迷乱的、右倾的、身体感觉迟钝的、令人厌恶的、谄媚的无耻小人。”卡维勒，前注③，第10页。还是一个“传媒娼妓”，同前，第106页。卡维勒心怀嘉许地引用了卡米勒·帕格里尔对斯塔尔的描述：“一个喜欢傻笑、游手好闲、羞涩胆怯的法西斯匪徒……他长着奶油玉米似的脸，大脑与之相伴而生”。同前，第141页。而且，他还通过暗示对谋杀文斯·福斯特表示怀疑的理查德·梅伦·斯凯弗本身就杀害了一个人而将之伪装成自杀，将矛头进一步对准了克林顿的仇家。同前，第118-119页。在1998年1月26日的电视访谈节目中，克林顿夫人把对其丈夫与莱温斯基有瓜葛的指控描述为“一个巨大的右翼阴谋”，并称卡维勒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向美国众议院提供的报告的附录》(1998年9月18日)，《众议院文件》第311号，第105届国会，第2会期，第2卷，第1973页。

<sup>②</sup> 然而，这些证人中的一些是由政府律师免费代理的；而事实上将由当事人或者任何人给付其他律师多少法律费用，不得而知。



重罪,<sup>②</sup> 因而我们不必为他们无端招致的巨额花费担忧。另一些人则没干任何违法行为——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既非独立检察官的调查目标又非其调查对象<sup>③</sup> 的人,却被大陪审团传唤,要大伤脑筋地去聘请律师。也许他们害怕某天不得不在大陪审团前秘密作证。但是更多的人也许希望律师能够帮助他们以某种方式作证而不致于危及总统和他们自己的声誉,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危及他们的前程。大部分证人请的律师是由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推荐的,其中几位律师相互间有联合辩护协议,可以与其他证人的律师互相交换笔录。证人在大陪审团前作证时不允许律师陪同,但他们可以将其作证的证词告诉律师(或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人),可以授权律师与其他证人的律师交换有关资料。

有人猜测,那些既非大陪审团的调查目标又非调查对象的证人之所以聘请律师也许是为了保护总统,而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这一说法已被白宫电话服务主任亚历克斯·纳吉在大陪审团的作证所证明。他作证说,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对他在斯塔尔的大陪审团前作证时拒绝聘请律师极为恼火。但他知道自己不会被起诉,找不到什么理由要去劳神费力地请律师。

一旦斯塔尔的调查报告被公开,所有这些审问的目的就会不言自明。贝蒂·苛莉和弗依·乔丹的证词,当然还有莱温斯基自己的证词,对确认总统是否妨碍司法是至关重要的。其他证人的证词,不仅包括侍卫特工和白宫人员的,还有莱温斯基的朋友们、姑姑、母亲的,都必须进一步确认她的证词,这样就能证明总统在波拉·琼斯案中以

---

② 或者似乎是这样的:莫尼卡·莱温斯基在她的磁带录音中曾告诉过琳达·翠珀,她母亲建议她在宣誓作证时撒谎,但是莱温斯基对此也有可能是在胡编乱造。她证实她已经怀疑琳达·翠珀,并且开始对她撒谎了。但是,这些证词是在她的母亲在大陪审团前举证之后作出的。在她的母亲举证时,莱温斯基尚未开始与独立检察官合作,因而,斯塔尔的人员没有理由相信她的母亲不再因此而受嫌疑。

③ “对象”是这样一种人:尽管不是大陪审团的调查目标,但也可能参与一些目标的非法行为,因此也可能处于受伤害的危险境地。在斯塔尔的大陪审团前,大多数证人既非目标,也非对象。



及后来在他自己的案件中,对大陪审团所作的证词是伪证、他确妨碍了司法。假如总统在1998年1月就说出真相,也许就不会再有人被带到大陪审团面前了。

有人指责斯塔尔的部门说道,他们违背了《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6条的有关规定——“除非为法律实施的目的之必须,否则禁止透露大陪审团的有关证据情况”,将大陪审团的证词泄露了出去。早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布证词副本之前,有几份证词就落入了媒体手中。但是由于证人可随意向一些人透露其证词,而且,斯塔尔大陪审团的证人可通过律师相互交换情况。因此很难确定,哪一条“消息”是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泄露出去的。甚至一些对克林顿不利的证词也有可能是被“友善的”证人泄露出去的,其目的是为了减低众人期待的、斯塔尔报告的轰动效应。

无论如何,假如真是独立检察官办公室走露了风声——直到写作本书时这一问题仍在调查中,它也不过是独立检察官办公室与白宫谣言制造机构<sup>⑤</sup>之间在公共关系上开展争夺战的一部分(前者失败了),因此,事后看来,它是无关紧要的。但即便受到挑衅,进行这样一场战争也是不符合正确的法律实施目的的。为保护大陪审团作为公诉人调查工具的效力,必须保持其证词的私密性,它鼓励证人作证而无须害怕威胁恐吓,<sup>⑥</sup>那些泄露秘密的检察官们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基于此理由,以及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由于泄露消息而一事无成(即使真是它泄露的,也尚未得到证实),我们难以看到克林顿有理由抱怨,尤其是当他自己的律师也参与这场矛头指向独立检

---

⑤ 我想,对于在克林顿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地维持其职位的斗争中,白宫工作人员(如悉尼·布鲁门菲尔,我在第一章提到他在大陪审团前作证时的误传是想“捣毁”独立检察官的调查),克林顿夫人(带着她对右派大阴谋的谴责以及她给詹姆斯·卡维勒性格的奖励)以及总统的其他维护者诋毁总统对手的名誉的努力,此一用词并不过分。

⑥ 然而,第二个目的在于保护那些最终没有被起诉的人免受尴尬。在后文我们会看到,这一目的被更改了,不是因为泄密,而是因为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略微作了修正的大陪审团抄本的出版。

察官办公室的口舌之战时。

就最坏的打算而言,大陪审团证词的泄露发生得尤为仓促。法律没有规定禁止独立检察官将大陪审团证词提交给众议院。由于已经找到“实质的、可信的资料……这也许就构成了弹劾的理由”,《独立检察官法》要求独立检察官报告众议院,<sup>②</sup>而其中大部分证据都采用副本形式。法律或习俗也没有禁止众议院将副本中的摘录(或是全部)公布于众。假如没有公布,那么无论众议院最终作何举措,斯塔尔的引证都将缺乏公众可信度,尽管我们看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也许已用更为笨拙的手法把副本重新编排过了。

将大陪审团证词进行电视实录的确不同寻常;在全世界播放、发行录像带更是前所未闻,但是这一次总统依然不能抱怨什么。他同意将证词制成录像以取代亲自到庭作证,他也知道媒体正在制作录像而且迟早会公开发行,也许比他想象的更快。而且自始至终,他的基本目标是要避免被弹劾及被定罪,就此而言,尽管这使他蒙羞,他也从证词的播放中得到了好处。克林顿以其个人魅力和才思敏捷而著称,这些品质从电视中看比从证词副本看更为清楚。他的证词副本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吞吞吐吐、迟疑不定,极其缺乏自信。但当你从电视中目睹他作证时,你的主要感觉就是:处于如此棘手环境下的此人正尽其所能、斗胆一试,机敏地躲开种种困扰。证词播放的那天我正好在巴黎,我从自称有十亿观众的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上看到了实况转播。我怀疑在当天或后来是否真有十亿观众收看证词播放,但至少有几千万人在收看,看见他在那些匿名的询问者问他关于婚外性行为细节时闪烁其辞。许多观众的感想是,堂堂一国总统在有几百万观众的“露天看台”受到史无前例的羞辱仪式就已惩罚得足够了,再遭弹劾或判刑只会导致故事毫无来由地草草收场,虎头蛇尾、令人扫兴。

斯塔尔因为一开始就将克林顿带到大陪审团前而受到了指责。

---

<sup>②</sup> 《美国法典》,第28卷,§595(c)。

大陪审团调查的目标通常不称为证人,因为他们无疑采纳了“第五条修正案”,拒绝到庭作证。克林顿也可能采纳了“第五条修正案”,但以政治上的牺牲为代价。看起来他似乎也宁愿其他犯罪嫌疑人有时做的一样,试图从困境中找到一条出路。

大陪审团在实际上被当作国会的调查部门,这有点奇怪,也许还不太正常。但是斯塔尔大陪审团(实际上是几个陪审团)正在调查除总统以外的其他人,且总统的证词与调查密切相关;曾有这种可能(目前仍有):总统会以普通方式因其罪行而被指控。

斯塔尔也因其最初对待莱温斯基的方式而受到了指责,其手下人名副其实地威胁说,如果她不与他们合作,他们就把她及其母亲送进监狱。如果她作了自证其罪的供述且随后被起诉,那就有可能(但不大会成功)将其供述作为高压下得到的证据摒弃不用。可惜她未作有罪供述,于是这些强硬手段至多只能算得上法律上所称的“无大碍的错误”。或者,它们根本就算不上是错误。莱温斯基及其母亲处于被判刑的危险处境,检察官们极其夸张地告诉她们要坐 27 年牢,<sup>②</sup> 其实,我们从第一章为克林顿假定的“刑期”估计中可以得知,27 个月才比较接近标准。即使她能在法庭记录存档之前就撤回其虚假书面陈述,从而免于因作伪证被起诉,<sup>③</sup> 她也已经不可挽回地犯下了试图唆使别人作伪证罪(琳达·翠珀)、证人收买罪(也是琳达·翠珀)以及合谋犯罪(与其母亲——假如在琳达·翠珀的谈话录音中所说的、有关她母亲的情况都属实,还有与总统合谋)作伪证及以其他方式妨碍司法,检察官们给了她许多——对她母亲及其本人的豁免权——用以交换她们的合作。直到 6 个月之后,她才首肯了这笔交易。

② 这是该遭遇最具强迫性的方面。

③ 和莱温斯基的对质发生在 1998 年的 1 月 16 日;虚假的宣誓证词由她的律师以一夜快递发送了出去,法院是在第二天收到的。直到法院存档,她的假证都是无辜的,至少根据《美国法典》,第 18 卷,§ 1623。顿恩诉美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 442 卷,第 100、109-113 页(1979 年判决)。

莱温斯基本来可以在其书面陈述被存档前就撤回其虚假书面陈述,独立检察官却没有告知这一可能性,因此被指控为:为她设下“伪证陷阱”。但是,莱温斯基已处在了极深的判罪危险中。而且,法律术语“伪证陷阱”指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势——政府把证人带到大陪审团(或在其他须宣誓作证的场合)不是为了问出有用的信息而是为了诱骗证人作伪证。<sup>①</sup> 事实是,独立检察官将莱温斯基名字列到了本案之证人名单上,并不是因为他们怀有莱温斯基会在波拉·琼斯案中作伪证的希望。

当斯塔尔的人员最初开始对付莱温斯基时,她请了一位律师——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司法部既适用于独立检察官也适用于司法部聘请的律师的有关刑法事实的政策是,<sup>②</sup> 禁止检察官直接审讯一个他们知道有代理律师的犯罪嫌疑人。然而,莱温斯基聘请律师是为了帮她在一场民事纠纷中准备一份书面陈述,而并非是为了打刑事官司;她不知道这场官司正悄悄逼近。由于律师并不是在这场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设法讯问她的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代理人,或者在任何真正的刑事诉讼中代理她,那么,她是否就是司法部“反对审讯一个有代理人的嫌疑犯”政策中所指的“有代理人的当事人”就值得怀疑了。<sup>③</sup> 此外,弗依·乔丹找过莱温斯基的律师——且找的是一位刑事律师——这就使得这位律师有可能成为妨碍司法的共犯之一;他们也许还向这位律师保证过不会牵连到他。无论如何,对绕开嫌疑犯律师的检察官们的正常处罚应该是,在对嫌疑犯审理的过程中,排除嫌疑犯也许已经作过的供述作为证据,而莱温斯基既未作供

<sup>①</sup> 例见,美国诉陈,《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二编)第 933 卷,第 793,796—797 页(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九巡回审判庭 1991 年判决)。

<sup>②</sup> 《美国法典》,第 28 卷,§ 594(f)(1)。

<sup>③</sup> 见《美国法典》,第 28 卷,§ 77.3。司法部关于宣誓假证和其他妨碍司法的形式已经发布了大量的政策观点。见美国司法部:《美国律师手册:刑事资料手册》(1999),第 1720—1767 条, ([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eding\\_room/usam/](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eding_room/usam/)); 美国司法部:《美国律师手册》(1998),第 1 卷,第 9—69 条。按此文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独立律师在其对总统的调查中违反了它的任何规定。



述也未因其罪行而被诉。任何情形下,被告(即克林顿)都不能就其他人的权利——在此案中指莱温斯基的权利——受到侵害而申辩。

独立检察官办公室为莱温斯基布下了一个“伪证陷阱”的观点与另一更为广泛的观点相互交织,即: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实施了一项针对克林顿的“秘密”行动,检察官或警方设下一个诡计,诱使某人犯下会遭拘捕和起诉的罪行。如果秘密行动的目标物受到愚弄,在他们早已做好手脚的情形下犯了罪,他们必定会当场逮住他,由此他便落入法官手中。独立检察官也许已经警告过总统,1月17日他在琼斯案中作伪证会得到什么结果。而且,独立检察官办公室也许已经不再要求莱温斯基将其与总统的谈话录音了。它也许一直在“促使”总统犯罪和教唆他人作伪证;它也许也一直在与波拉·琼斯的律师们直接或间接地合作。

“秘密”行动并非不合法。这是一种常见的、抓住“无侵害对象”罪犯的必要手段;从广义上解释,“无受害人的犯罪”包括那些受害人(例如波拉·琼斯——就是克林顿和莱温斯基妨碍司法的蓄意的受害人)并不知道自已受害的犯罪。这些手段只有在渐渐成为圈套时才是非法的,这意味着故意引诱某人犯罪——如果当局不提供这些反常的诱骗(例如付给某人一百万叫他去偷自行车),罪犯也许永远也不会犯这些罪。这里讲的和以上不同。然而,与总统的政敌站在一起针对美国总统实施一次“秘密”行动,作为一种合理的执法政策无疑是值得怀疑的。它同时还是令人信服的反反对《独立检察官法》的论据,若缺少它,这种反对计划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并非一项针对起诉的合法抗辩。

## 二、《斯塔尔报告》及隐私问题

关于独立检察官对克林顿的调查,最厉害的批评是针对《斯塔尔报告》本身提出的。它们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报告本应包括这样一种分析,说明是总统的何种行为发展到了可遭受弹劾的罪行的程度。



此要求含有一个特定逻辑。独立检察官在最初没有确定会遭弹劾之罪行究竟何时,它如何能够决定,是否真的存在能证明此种罪行的实质的、可信的证据?但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看到,没有人知道会遭弹劾的罪行是些什么。假如独立检察官曾试图为之下定义,那会比众议院议员认为的正确含义狭窄得多,于是就会把众议院认为是对审议很关键的证据遗漏掉,从而招致指责:篡夺了众议院为“可遭弹劾之罪行”下定义的特权。假如定义下得过宽,它依旧会被指责为夺权,而且当然地缺乏客观性。此种情形下,给“可遭弹劾的罪行”下一个含义模糊的、留有商榷余地的定义——包括,即使在以私人纠纷为主的案件中妨碍司法的行为——或许是最佳选择。

对报告的第二项指责是,它对总统的态度是不公正的。的确如此,但不能因为这点而对其吹毛求疵。它之所以不公正,是因为有关克林顿罪行的证据极具说服力。除非它根本就不是判断性的报告,才会做到公正不偏。斯塔尔也许只是将未经加工的、大陪审团的证词副本、他的手下与莱温斯基多次会谈的记录(及其供词)、DNA 报告、电子邮件、琳达·翠珀的谈话录音等等,都一并交到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但据《独立检察官法》的语言规定,斯塔尔的职责是向众议院报告他是否已找到了有关克林顿可遭弹劾的罪行的实质的、可信的证据。判定他已找到实质、可信的证据,这要求从原始资料中得出一个大致推断——即,要求对报告进行分析,而在特定的证据情况下,报告必定会是有所偏私的。这些并不能表明他就是弹劾总统的“倡导者”。证据未经分析,就不能确定是可用来证明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此外,克林顿的拥护者说,他们希望弹劾审讯尽早结束;如果把对独立检察官收集证据的筛选任务交到毫无经验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手上,审讯就会拖延好几个月。

记住,弹劾实际上就意味着起诉,因此,众议院议员也就相当于大陪审团。(参议院相当于小陪审团,即对已被大陪审团起诉的人判决其有罪或无罪)。检察官们不只把原始资料交由大陪审团处理。他们对资料作出分析,提醒大陪审团,他们是否认为有足够证据起

诉。当然,与大陪审团相比,众议院有更多财力可用来进行分析。但这些力量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众议院无权参与刑事调查。无论如何,国民已迫不及待想要一个克林顿“案件”的结果了——当众议院在已被独立检察官踩平的道路上懒散地步行时,国民却不想再等待几个月了。读者可以同我一样,对斯塔尔报告分析的某些特定部分持不同意见,甚至指出某些带有偏向性的删节,<sup>③</sup>但不必猜想斯塔尔在得出“确实存在可遭弹劾之罪行的实质的,可信的证据”的结论时行为不端。我们将在第四章看到,这份报告也许实际上就忽略了这样一种罪行。

对斯塔尔报告最具压力的指责是,报告中不必包含如此之多的性描述。有一些描述必然要涉及到,这是因为克林顿在波拉·琼斯案的作证中及其在大陪审团的证词中都否认了他曾带有色情目的地抚摸过莱温斯基。在克林顿向大陪审团作证之后,他为对付独立检察官的调查而请的首席律师戴维·肯德尔作了一次公开陈述,他说,证词表明总统没有作伪证。事实正好相反。斯塔尔责无旁贷地要揭穿这些谎言,不是因为它“关系到”在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接触中他是主动抑或被动,而是因为他对大陪审团撒了谎,而这些谎言对大陪审团调查进而定罪有着决定性影响。

斯塔尔只需按其日期、时间和地点将这十次性接触——记录下来就可能揭穿克林顿的谎言了,至于说到具体内容详情,每一次他们都采取口交形式,莱温斯基吮吸他,而总统抚摸她的身体以唤起和满足其性欲,这些身体部位按照性关系的定义都在波拉·琼斯的证词中

---

③ 总统的律师很正确地批评了斯塔尔的报告没有引用莱温斯基的证词,莱温斯基的证词说没有人告诉她撒谎,也没有人向她提供工作以作为她沉默的交易。该报告本来可以指明,这可能正意味着没有人明确告诉她撒谎或者正式向她提供工作以作为她沉默的交易,但是她的否认太重要了,这理当受到引证,而不应该如报告所做的那样,只是进行解释和意译。我在第一章提到,该报告对克林顿总统断章取义,使得他看上去似乎对他是否与他的律师谈论过行政特权撒了谎。但是,该报告基本上是偏颇的,因为那些事实是偏颇的。

——列举了。这也许就足以证明,总统对与莱温斯基有性关系的否认是谎言。<sup>④</sup>没有必要再额外添加其他赤裸的性描写。<sup>⑤</sup>此推断提出,斯塔尔有意将一些与总统是否犯了可遭弹劾的罪行无关的细节列在报告中,是意图击垮克林顿(或许是其手下想这么干,但斯塔尔也首肯了)。假如此推断正确——也许不正确;但这只不过是猜测而已;考虑到克林顿尤其能言善辩,检察官们也许认为,每一细节对于增加莱温斯基证词之可信度及弄清真相都是必不可少的——克林顿的支持者们,必须至少是在其默许之下,针对斯塔尔发起一场诋毁之战,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但是我们认为检察官们并不是那么糟;如我在本章开头所言,他们并不憎恨他们的猎物——克林顿。此外,我们将在第四章看到,有关一位总统行为的隐秘细节能够毁掉总统机构进而也许毁掉整个国家。

人们也许认为,一旦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有性关系的核心事实被公开——她吮吸他而他抚摸她的事实——就彻底侵犯了其隐私权,那些总统与莱温斯基性行为的额外细节的公开就无关紧要了。但此观点会忽略有关隐私的一个重要方面。隐私权像屏风一样发挥作用,用以阻挡信息超载,或像一副解毒剂,用以对付认识过程中的突发事件,我们称之为具有特色或(更通俗一些)有利用价值的启发。<sup>⑥</sup>理智的思维要求从浩瀚无边、气势磅礴、面对我们的感官、试图引起

---

④ 事实上,还不仅仅是足以。我们在第一章看到,克林顿参与了“性关系”(就如为了宣誓作证的目的所详细说明的那样),即使他完全是莱温斯基性行为的消极目标,就如一名遭受强奸的受害人。

⑤ 他的确在大陪审团的证词中误导性地证明了电话骚扰,在他的大陪审团证词中,他只是说他和莱温斯基的某些电话谈话涉及了“性打趣”。任何听众都知道,那不是“性爱电话”的确切所指。但是性爱电话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性关系的一种形式,除了在这一术语最缺乏真实性的意义上,即如在波拉·琼斯案中为了革总统的职所界定的那样。

⑥ 例见,阿莫斯·特母斯基和但尼尔·卡内曼:“有效性:判断频率与可能性的一项启发式研究”,《认知心理学》(1973)第5卷,第207页;克利斯汀·乔尔斯、凯斯·R·桑斯坦和理查德·撒勒:“法律经济学的行为分析方法”,《斯坦福法律评论》(1998)第50卷,第1471、1477、1518-1522页。迈克尔·库岚和凯斯·R·桑斯坦:“有效性链条和风险规则”,《斯坦福法律评论》(1999)第51卷,第769页。

我们注意的大量信息中进行筛选。我们不想了解别人的每一个想法和行为,因为这些信息会妨碍我们的解释和理解。有关克林顿性癖好的详情,对于任何想要理解和评价克林顿的总统任职情况或总统在美国政府和社会中之角色和作用的人来说,只会分散其注意力。这些细节是饶有兴味的分心物(此即显著启发之功能)。在琳达·翠珀的录音带上,记录了一次更为淫秽不堪的谈资交换——莱温斯基和琳达·翠珀谈论了克林顿生殖器的尺寸——这些在斯塔尔的报告中被恰如其分地删掉了,但却包含在被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布的大量证据之中。所有人都知道了,总统像少数几个不走运的男人一样,有这么一个生殖器。但是,公开地讨论和描述性器官,正如将之拍照,使本应是隐蔽的信息置于最突出的地位,结果导致人们注意力的分散。同样,从斯塔尔报告中的其他部分提示的有关克林顿的情况,我们或许能够猜到,像把雪茄作为生殖器,或性爱电话,很可能是他全套性把戏的一部分。但是一旦这个猜测变成众所周知的事实,它就具备了一个特征,使人们更加难以直接考虑,何为令人气馁的、错综复杂的道德和法律形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克林顿的家人更加难以从他和莱温斯基的关系上转移视线。

报告中的其他性行为细节——如克林顿好几次在被莱温斯基吮吸时与国会成员进行电话交谈——只有在克林顿试图否认莱温斯基吮吸过他时,才对独立检察官的调查有重大影响。但他没有通过对莱温斯基裙子进行的DNA测试,这样他就无法抵赖了。或者斯塔尔认为,人们觉得克林顿在一系列事件中出丑是对国会的藐视,但这是与弹劾审判有关的——对此报告中没有表述——那些细节也对调查意义重大。因此,这是又一次使总统无还手之力的重击,正如报告上所说,克林顿暗示莱温斯基,这一任期结束时他会与其妻分手,<sup>④</sup>

---

<sup>④</sup> 这统是多此一举,因为斯塔尔的报告忽略了莱温斯基最好的朋友凯思宁·奥戴·戴维的观点,即克林顿告诉过莱温斯基:“他爱,尊重第一夫人,也希望和第一夫人共度余生”。《向美国众议院提交的报告的附录》(1998年9月18日),《众议院文件》,第316号,第105届国会,第2会期,第1卷,第832页。



以及,他招供了在过去曾有过不计其数的通奸行为。

我不希望对隐私权盲目崇拜。隐私就意味着掩饰,而通常需要掩饰的都是丢脸的事。<sup>③</sup> 阳光可以灭菌。如果人们在配偶面前无法隐藏其通奸行为,那么,通奸就会少得多。但我在此关注的是,超出了不名誉行为的披露,以及那些告发或威胁甚于干扰、困惑和尴尬难堪的性细节披露。<sup>④</sup> 《斯塔尔报告》本来无须侵犯总统的隐私——这当然对其妻子、女儿、还有他本人造成了伤害——这就有点令人遗憾了。但这种起诉程序上的不当行为在刑法或民法中没有起诉权。当事人不能在刑事诉讼中基于如下理由对起诉提出抗辩:检察官公开的有关当事人私生活的细节比他为了履行职责而必须公开的细节要多。

当斯塔尔出现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前时,他受到了盘诘。在盘诘中,有人提出,其报告以及整个调查中的令人作呕的性特写显示报告缺乏可信度。此提议与另一观点不能相符,即斯塔尔对案情调查过度了,从而忽视了由其手下收集到的、被委员会公布的、而与报告证据摘要不同的实质证据。存在很多有关总统实施了犯罪的证据这一事实,这通常是过度热衷于起诉的情形,表明独立检察官的过度调查反映了他及其同僚对他们职业之正义性的充分自信。

在普通刑事审判中,从来就没有一个受到指控的调查或程序中出现的不当行为——我已花费太长篇幅讨论它——被允许作为宣判被告无罪的证据或论点。刑事审判之目的——就某种程度而言是主要目的,如果我们将之忽略就得自担风险——是找到事实真相,而不是决定检察官们是否不遵守比赛规则。总统的拥护者在指控起诉程序上的不当行为时,开展了一场政治战争而不是为使总统免于指控的法律之战。自然,他们是主要通过媒体发动这场战争的。与独立

---

③ 理查德·A·波斯纳:《超越法律》(1995),第531-536,539页。

④ 无疑存在着某种逐渐递增的威慑;想想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成年人被迫向媒体提供他们自己从事成年行为的相片的情形。



检察官相比,他们带有更强的党派热情、更大声的叫嚣、更多的诡辩、以及更少对事实的尊重。

### 三、起诉的自由裁量权问题

我们必须考虑,起诉自由裁量权的一个合适概念是否会导致一个具有良好动机的检察官不对参与克林顿不轨行为的人起诉。克林顿的辩护人指出,对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起诉是很少见的,本文提及的民事诉讼(波拉·琼斯案)被驳回了,莱温斯基事件也不过是因波拉·琼斯案的有关问题附带提起的。如果在该案中对克林顿的伪证行为进行判决无须调查,那克林顿就根本没有机会对大陪审团撒谎了。他们还说,每个人都掩饰自己的性事,对克林顿的调查不仅根源于带有政治目的的诉讼(即琼斯案),而且还出自于调查由独立检察官操纵这一特殊性——独立检察官不像普通检察官,他们不受现有材料的限制——而对普通检察官,想通过这些有限的证据证明一个和民事诉讼之伪证行为相同的刑事指控,实在是勉为其难。此外,普通检察官要么是由选举产生,要么是由选举的官员任命的(与联邦检察官相同)。从政治敏感性的角度考虑,普通检察官通常都不会对此类涉及隐私的犯罪嫌疑人起诉,正如由此“桃色”事件引发的、妨碍司法的行为一样。对检察官实行政治和财政预算两种压力并施,使我们还能容忍含义模糊、范围广博的刑事法律存在;同时,正是由于其外延广泛、内涵模糊,才堵住许多法律漏洞,使一些本可以逃避司法的严重犯罪无处可藏。这些法律所采取的形式,以及对检察官的激励制度形成了《独立检察官法》得以动摇和毁灭的机制。

他们还认为,假如克林顿不是总统,或是干了《独立检察官法》规定的其他不轨行为,也许琳达·翠珀就会把录音带交给一位普通检察官,克林顿也不会被起诉。对民事案件之伪证起诉,与作伪证的次数

无太大关联,但也不像克林顿的辩护人说的那样一点关系也没有。<sup>④</sup>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丝缕的牵连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含义太窄,伪证行为通常很难认定——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在克林顿案件中,可以说只要有充足的财力进行彻底深入的调查,就能轻而易举地抓住其伪证行为。

对牵涉到性或家庭关系的民事案件中的伪证行为的起诉尤为少见。法官们在数据库中搜索自1992年1月以来的此类案件的判决,结果只找到了两个:两例中被告均未被指控为同时犯有其他罪行。<sup>⑤</sup>而克林顿却有,且与作伪证密切相关;我又找到四个被告还被指控其他罪行的、有关性或家庭关系的案例,其中两例还属军事诉讼。<sup>⑥</sup>

涉及到性的伪证诉讼罕见,这反映出,检察官们也许担心陪审团会赞同克林顿辩护人的观点:因为“每个人都掩藏自己的性事”而认为,即使经过宣誓又对之撒谎,也可以比其他伪证行为少受一点处罚。检察官们通常都宁可起诉有名望的罪犯也不愿起诉平民百姓,该事实为我们开辟了另一条崭新的道路;起诉有名望的人更能产生公众效应,既能威慑民众又能让检察官得到晋升。假如克林顿只是一位权贵,而不是总统,他也许比一般的性伪证犯更有可能被起诉。

④ 见《向美国众议院提供的报告的附录》,前注②,第1卷,第271—274页。威廉·格拉伯逊:“事实上,甚至那些小谎也间或遭到起诉”,《纽约时报》,1998年11月17日,第A1版;亨利·维恩斯坦:“斯塔尔的伪证走了一条鲜有人走的道路”,《洛杉矶时报》,1998年2月15日,第A1版。记住在第一章讨论的德扎恩案。

⑤ 政府诉法国人,《美国西北地区判例汇编》,第2编,第509卷,第698页(1993判决);伯利特诉北卡罗来纳司法行政长官教育和培训标准委员会,《美国东南地区判例汇编》,第2编,第501卷,第75页(北卡罗来纳1998判决)。

⑥ 拉帕尔诉州政府,《美国太平洋地区判例汇编》,第2编,第957卷,第330页(阿拉斯加州上诉法院1998判决);州政府诉戴,《西方法律判例汇编》,第1998年卷,第666751页(俄亥俄州上诉法院1998年8月28日审判);施奈德诉泰里,《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增补编,第998卷,第1210页(1998判决);美国诉捷卡拉,《军事法院判例汇编》,第28卷,第566页(陆军预备役法院1993判决)。在其他两个与性有牵连的案件中,被告因为在诉讼过程或相关程序中作伪证而受到了重判。美国诉纳西鲁汀,《西方法律判例汇编》,1998年卷,第539468页(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四巡回审判庭1998年8月25日判决);美国诉拉宾,《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增补编,第986卷,第887页(1997判决)。

在此假定前提下,检察官或许认为,这就足以使波拉·琼斯案的法官警觉到克林顿的不轨行为了。莱特法官如果发现他在证词中撒了谎,也许会作出缺席判决或执行其他民事制裁。<sup>⑨</sup> 事情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大陪审团也不会制造机会诱使其再度撒谎而进行调查了。但正如我试图说明的,我们根本就不能肯定事情会在未受刑事起诉前就结束。很多事情本该仅取决于检察官是如何繁忙、或者他对性骚扰案件的态度。

而且,在最后,众议院议员决定不以克林顿在琼斯案中的伪证词为由弹劾他。他们决定将其在大陪审团前的伪证行为作为他受指控的核心。对伪证行为进行调查比进行实际的起诉更为常见。为避免被诉而在调查过程中作伪证是更加严重的罪行,因此,这比在证词中作伪证更有可能被诉。

请设想,在调查克林顿时一切都与原来相同,只不过他不再是美国总统,而是某公司董事长、大学校长、基金会主席、或某中等城市市长,情况又会如何。在关于是否弹劾克林顿的争论过程中,人们不停借用这些比喻来说明,既然以上列举的、与克林顿地位相当、行为相似的人会被立刻解雇,克林顿也理当如此。此说法缺乏说服力,不仅因为他们的利害程度不同,而且在其他情形下是要求既是该行政主管的任命人又是其上司的那人将该行政主管革职。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假设这种情形,一个经费充裕的检察官利用大陪审团,收集到所有斯塔尔掌握的证据,那么请问,诉讼是否还会与原来的相同。一个性骚扰案件中的被告,孤注一掷想要掩盖其婚外隐私,而在证词中再三撒谎,又教唆他人作伪证,以及收买旁证。随后,在大陪审团着手调查这些妨碍司法的行为以决定是否构成起诉时,他又一次说了谎。这一系列罪行足以构成起诉,尤其是当罪犯声名显赫、且正因其其他可能罪行(白水门事件及其后果,包括令人生疑的、给韦伯斯特·哈贝尔的秘密酬金)而被同一位检察官调查时。罪行由“性”而生,接

---

<sup>⑨</sup> 例见,《联邦民事诉讼规则》,37(a)(3)。

着,本能驱使他隐瞒婚外性关系——该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到了行使对罪犯有利的起诉自由裁量权的程度,正如克林顿为了让莱温斯基闭嘴而谋杀她的假设一样,难以令人信服。我们假设,不在总统之位的克林顿只是一个藐视法律的常人,他对其犯下的罪行过于厚颜无耻,而无法被轻易饶恕。法律无法对之起诉,这给我们一个信号:法律制度只能对妨碍司法的行为投以微笑。

在第一章我得出结论说,总统犯了妨碍刑事司法罪。这里我又补充,尽管拘押他的程序不同寻常且有那么一点不正确,假如——这十分可能——他被普通法庭起诉,他就不能将此程序中的违法行为作为驳回起诉或被判无罪的理由。当然这是另外一个不同问题,但在本文后面值得一提的是,是否他本来就应当基于该罪而被弹劾。

人们普遍关注斯塔尔的调查,它和大多数独立检察官的调查一样,投入了过量财力。联邦刑事调查和起诉机制包括大陪审团、电话窃听装置、DNA 测试、如哈吧狗般勇猛顽强的检察官、审判前的侦查、广泛地界定同谋、重刑(通常被用作恐吓手段使罪犯揭发其同党)、以及联邦调查局的装备,都非常强大;存在着这种可能,只要有充足的时间和金钱,它就能抓住任何人。此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事实上有成千上万的联邦刑事法律,其中多数都外延广泛、含义模糊、语言晦涩,因而无法实施。此外,美国人民往往不太听从,难以驯服。假如每一位美国人背后都跟着一位独立检察官等着抓他的小辫子,那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充满警察的社会。但无论独立检察官法明智与否(我将在第七章论及它的不明智),有一种观点认为,上层官员应当比平民百姓更加遵从法律之要求。同时,有人还刚刚找到如此理由,认为即使一位普通检察官也可以起诉与克林顿地位相当、罪行相似的人。

#### 四、叫我 Bubula

我已经表达了我对《斯塔尔报告》中一些内容的担心。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我对 8000 页证据中的某些内容的忧虑——这些证据主要是由独立检察官通过与证人会谈和从大陪审团证词中获取的,随后又补充交给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委员会将其作为《斯塔尔报告》的附属和补充部分公之于众。我的忧虑与总统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提出质疑的证据精确度无关。这些质疑一路攀升,于 1998 年 12 月 8 日他们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交 184 页法律意见书时达到了顶点。但是,它们缺乏说服力,对说明事实毫无价值。请记住,白宫宁愿因斯塔尔收集的证据而被参议院审判,也不愿让可能受到盘问的证人到庭作证——克林顿的主要证人莱温斯基最后终于作证,总统的律师却拒绝盘问她。

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收集到的大量“证据”,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大杂烩,它包括谣传、道听途说、影射、诽谤、琐碎小事、<sup>④</sup> 枝

---

<sup>④</sup> 例如,莱温斯基和她的母亲所住的水门公寓鼠满为患,以致于她们不得不在消灭害虫的工人工作时搬出房间。又如,克林顿总统在做字谜游戏的时候,没有能够想起胖猪的妻子叫什么名字(那是矮牵牛);还有,他收集青蛙,并且“过去常常把这种真正令人发笑的塑像放在书架上。这真正是古怪的事情。它像一头四脚兽。那简直就像——它们像一棵大蘑菇下的丘比特娃娃,并且天还下着雨”。《向美国众议院提供的报告的附件》,前注③,第 2 卷,第 2637 页。再如,琳达·翠珀,当她还在白宫工作时,有一次她到当地的麦当劳去为她办公室的一些工作人员买一些食品。克林顿总统对她说,他也想要一些,要烤烧鸡三名治。当时麦当劳店没有烤烧鸡三名治,琳达·翠珀就恳请厨师破一次例,帮她烤成鸡里脊。他不同意,说,“小姐,我们在这里不做那种事情”。“所以,我再次恳请他,这时我的身后排了好长的队,那家伙只是看着我,继续说,‘小姐,我不介意这是否是给美国总统的,我们不做烤鸡三名治’。我说,‘我明白’。后来,我要了一个油炸的”。同前,第 3 卷,第 4168—4169 页。



节问题、愚蠢的重复,以及对人们外貌的刻薄评论、<sup>⑤</sup> 令人尴尬的私生活细节。由于融汇大量证据的大陪审团证词记录只是按常规保密,即使一个老道的律师或法官也会对这些未经加工的第一手材料感到愕然(我就是这样)。

经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工作人员编辑(律师称之为删减)的那部分证据显得拙劣粗糙。其中一些删除掉的材料已在《斯塔尔报告》中公布;秘密已经泄露。同样,当委员会工作人员设法删掉有关除莫尼卡·莱温斯基和吉尼弗·福拉沃斯以外的克林顿女友的谣言时,由于其工作不够细致,导致关键人名被泄露,其中还包括这样的花边新闻:那些没有倒戈一击的克林顿前任女友被称作是“毕业生”。<sup>⑥</sup> (莫尼卡·莱温斯基认为,克林顿以及白宫成员没有给予她毕业生应有的尊重)。删节中惟一能保持前后一致的地方是电话号码——这很清楚,还有一些污言秽语——考虑到调查之主要案情,以及不会有儿童去读这些小字体印刷的卷宗,它显得尤为荒谬可笑。

将这份几千页的大杂烩读得越多(这里有证据表明:尽管民主党反对,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中的大多数共和党人依然作出愚蠢裁决,将过多内容公布于众),就越不可能——即使是一位法律专家——十分认真地对待那些调查。我举两例说明。

大富翁瓦尔特·凯耶是民主党的资助人,他为莫尼卡·莱温斯基在白宫谋了一份实习生的职位(他是莱温斯基母亲的朋友),下面是他与大陪审团以及一个名叫所鲁门·韦圣伯格的检察官之间的对话:

---

⑤ 例如:

莱温斯基女士:……我不知道你最后一次看到[人名]是在什么时候——

覃珀女士:瞧你说的,莫尼卡。你不能用母猪耳朵做出金丝袋吧,我什么时候看到你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同上,第2卷,第2634页。有女人的名字出现在我所援引的段落里,那段落本来应该全部删除的,那曾经是对被点名的人的一种冒犯,也与调查无关。

⑥ 至少在一种场合,谣传的女友的名字是可以清晰辨别的,这只是因为编写者没有对它划一条足够粗的线。见,同上,第3卷,第4024页。

**陪审团主席:**我可以问你吗——

**证人:**可以。

**陪审团主席:**你曾用过 Bubula 这个称呼?

**证人:**是的。

**陪审团主席:**谢谢。

**证人:**我经常用。

**陪审团主席:**很好。

**韦圣伯格:**你怎么念它?

**证人:**你们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吗? Bubula 是犹太语——也许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个犹太人——这是一个专用语——我用它表达我的爱慕之心。我经常用它。有一阵子我总是叫她(莫尼卡·莱温斯基)Bubula。

**陪审团主席:**……是因为,也许当你正在电话里与人闲聊时,你说,“叫我 Bubula”。你曾——

**证人:**再说一次?

**陪审团主席:**“叫我 Bubula。”你曾——

**证人:**对我说吗? 从来没人这么叫我。

**陪审团主席:**不,不。但当你通完话时,也许。

**证人:**那我就会说,“再见,Bubula。”我就这么做,一点不错。

**韦圣伯格:**“改天给我电话,Bubula。”

**证人:**Bubula,完全正确。在白官的时候我教过很多人依地语,随便教几个单词,还有军队的人。这很难让人相信,但是——这就是我用的词。至于我怎么拼它的? 我并不知道。

**韦圣伯格:**你拼的时候有没有“H”? ——我开玩笑而已(笑声)。<sup>⑦</sup>

---

<sup>⑦</sup> 同上,第2卷,第2044页。

大陪审团的询问,不时被爆发的笑声打断;然而,像“Bubula”<sup>④</sup>这种离题的玩笑话,以及莱温斯基电脑中收集的、与证明事实毫不相关却收录在大宗证据中的犹太笑话,就不必公布出来赚纳税人的钱了。<sup>⑤</sup>

第二个例子更为严重。一位侍卫特工在证词中说,总统的一个叫芭亚尼·奈尔维斯的私人管家告诉他(此人也是同谋),“他已厌倦了替总统收拾残局,这是不正常的,或是大意如此,”<sup>⑥</sup>这位侍卫特工得到如此印象,以上那段话指的是设在总统椭圆办公室外的浴室毛巾上的口红印。这使正忙于询问的检察官花费一分钟询问那位管家,他手中拿的是什么。只是毛巾吗?还是不止一条毛巾?有多大?什么颜色?还是一听苏打水?也许是塑料垃圾袋?或是别的什么袋子?有多长?18英寸吗?

问:(袋子)是透明的还是不透明的?

答:半透明。

问:你能看见袋子里的东西吗?

答:事实上你知道,我不能肯定袋子里有东西。不,我不能。我看不清袋子里有什么——他攥得很小,捏在手上。

问:他把它完全弄皱了吗?

答:是。可能就是用来更换的垃圾袋。但他手里还拿着毛巾。

问:为什么他出来的时候拿着一只用于更换的袋子?

答:也许是为了对我叫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是——

问:你知道,当你带着垃圾袋的时候,也许会把它折起来或者别

<sup>④</sup> 正确的拼写是“bubeleh”(检察官在h上是正确的)。它是由“祖母”后缀构成的依地语。大陪审团对词语的好奇可能源于莫尼卡用词语“Baba”(可能是“bubeleh”的变形——“Baba”是祖母的俄国用语)表示克林顿女士。

<sup>⑤</sup> 笑话是:问:为什么犹太人喜欢从背面看色情电影?答: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看到妓女倒给钱。

<sup>⑥</sup> 《向美国众议院提供的报告的附件》,前注④,第1卷,第323页。

的什么。

答：对。

问：那这件东西是打开了的吗？

答：是的。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就是这样拿在手里，伸得长长的。他手里还捏着毛巾。

问：你能看清塑料袋里有什么东西吗？

答：不，看不清。不——我想不起来了。<sup>⑤</sup>

你能想象，只有谋杀或间谍案才需要如此细致深入的询问。我们能轻而易举地将其归咎于克林顿总统，是他迫使独立检察官不得不调查有关他与莱温斯基关系的详情，以证实克林顿对此关系加以否认的真实性，以作出他在波拉·琼斯案中是否犯下伪证罪的裁决。但是，为证实克林顿婚外性行为的细节而闹得白宫人仰马翻，的确是有那么一点疯狂，如此一来，波拉·琼斯就可以在这场大爆冷门的官司中给克林顿一记重击，因克林顿出任总统前作出的冒犯性但无实质伤害的性挑逗而获赔偿。

你们知道，假如弄错批判对象——如果总统变成共和党人，而其他方面相同——共和党人就会以与民主党人相同的理由来诋毁调查，并且带着极大的忠诚。

我们开始明白，为何整个克林顿－莱温斯基－斯塔尔－弹劾事件会让人如此困惑。即使把那些毫无事实根据的猜测（例如斯塔尔受到性困扰，克林顿害怕莱温斯基在波拉·琼斯案中说出真相而为其设法谋职）放到一边，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辞难分真伪。一种叙述是，鲁莽行事、目无法纪、道德败坏的总统为掩盖其庸俗羞耻的陈年往事，不惜犯下一系列罪行，而这些罪行又因一场群体撒谎和诋毁运动而复杂化。一个检察官可以轻而易举地起草一份有关克林顿 30 项罪状的起诉状。另一种叙述是，一部愚蠢的法律（《独立检察官

---

<sup>⑤</sup> 同上，第 1 卷，第 324 页。

法》),一场由政治党派斗争引发和促成的、无关紧要的官司,最高法院幼稚而轻率的司法判决,以及人类情不自禁要去隐瞒不当性行为的冲动,凑合在一起,使得一次微不足道的越轨行为(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称之为“勾搭”或“调情”)<sup>⑤</sup>急剧扩展为荒诞而毫无根据的剧目。问题在于,两种说辞都有理。

选择其中之一加以强调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是,将民众正义和法律正义混淆在一起,这就是总统的拥护者、包括那些清醒的学者和律师所干的。所谓民众正义,我指的是未经法律培训的一般人对正义的理解。所谓法律正义,我指由法官以及其他授权人员所给予的正义定义。此两种类型之正义逐步融合成一个体系,正如古雅典一样,完全由不懂法律的人操纵;它们融合成对克林顿进行的参议院审判。民众正义有逐步蜕化成民众竞赛的趋势,而且,用确切的字眼说,总统的拥护者提出了有关其行为的问题。他们称之为“克林顿与斯塔尔的对抗赛”,并号召美国人民施加压力判克林顿无罪,因为斯塔尔不太讨人喜欢。毫无疑问,如果克林顿不得人心,也即国家处于极度萧条时期,或他像尼克松一样严厉冷酷,而斯塔尔又具有克林顿在电视上的那种翩翩风度,那么克林顿被弹劾及判刑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在公众评价的法庭上会成为败方。

假定法庭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合成,公众舆论就对弹劾有影响。但为了将问题分析透彻,也为坚持“在文明社会,如何解决法律上的争端无须考虑争辩方的个人魅力”之原则,<sup>⑥</sup>我们必须牢记,无论怎么看待斯塔尔及其战术,无论克林顿的成就有多大,人们有多么尊敬他,克林顿都已犯下重罪,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琳达·翠珀、波拉·琼斯

---

<sup>⑤</sup> “我们误认为……发生性关系就是性交”。同上,第2卷,第2664页(莫尼卡·莱温斯基致琳达·翠珀)。克林顿的维护者们牢牢抓住这一观点,作为克林顿在波拉·琼斯案中否认和莱温斯基有性关系并没有撒谎的证据。但是,“性关系”是一个确定的术语,它毫不含糊地包括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所为的行为。

<sup>⑥</sup> 这是“矫正正义”原则的核心,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被承认是法治的基石。见理查德 A. 波斯纳:《法理学问题》(1990),第313-320页。



的支持者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为此罪行开脱。假设 X 被控强奸了 Y, 但 X 讨人喜欢且事业有成, 而 Y 不得人心, 检察官却莫名其妙地对 X 有反感, 这有何重大关系吗? 答案是没有, 根本没有, 因为法律正义绝不能蜕变为民众正义。基于上述理由, 同时为保持法律程序的可操作性, 由于法律试图缩小争议的焦点而排除那些为法律争端添油加醋、步步紧逼、施加感情因素的东西, 以致于那些被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布的、未经加工的大量证词四处漫延, 搅得法律专家坐立不安。

自相矛盾的是, 在弹劾程序中, 总统的辩护人动辄就搬出那些吹毛求疵的小争端及转移人们视线的辩论(我们将在后面几节中看到几例), 这为民众正义而非法律正义作了铺垫。许多民主党议员不愿支持此等在国家最高机构里发生的罪行这一说辞。律师的争辩使他们有可能认为, 总统的行为既已受到指责, 它就不是(至少不能证明是)有罪的。此争论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遮羞布。

并不都是克林顿一方的人试图以民众正义取代法律正义。大陪审团的大量证词被公布就是一例, 尽管很难相信这些证据会被永远隐藏。众议院在开始弹劾审判之前没有采用综合程序规则, 就是对法律正义的不尊重。从法律正义的角度看, 众议院是一个党派团体, 这实在糟糕透顶。但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可以做到的是, 众议院或司法委员会应在审判过程中草拟一些程序规则, 以便指导审判。即便我们期望, 立法机关能在像弹劾总统这类出现频率极低的事件(至少历史是可靠的向导)发生之前就早早制定一些条款, 这是我们期望过高了, 众议院在从克莱丑闻爆发到斯塔尔提交调查报告还有 8 个月的时间可供斟酌。如果那时能公布程序规则, 那么, 当弹劾审判程序开始时, 这些规则就不会被当作政治皮球被踢来踢去了。克林顿的拥护者反对在弹劾审判期间对程序规则进行党派操纵, 反对在政治上利用这种导致不公平的操纵, 这是正确的。这种利用包括试图在国会议厅之外激起平民浪潮以平息民众正义。

参议院审判也因缺乏详尽规则(见下一章)而受阻, 例如缺乏规

定证据要旨的规则,有关审判前秘密泄露的规则,有关证据的规则,有关参议院在弹劾审判中适当行为的规则(像任何法官或陪审员一样,在审判结束前,应当禁止他们对审判作公开评论,或与诉讼当事人——白宫和众议院弹劾官员进行秘密交往),有关陪审团的裁定形式规则(还应包括事实调查结果,判决无罪或有罪的最低限度?)。因为缺乏必要规则,参议院不时为援引下一程序规则而使审判中断。这些停顿成为党派之间争论的理由,他们强调弹劾程序连最基本的法律正义要求都达不到。

## 第三章

# 弹劾的历史、范围和形式

### 一、历史与范围

宪法规定,总统和其他联邦官员如遭众议院大多数议员代表的表决弹劾,并被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判决其犯叛国罪、受贿罪,或其他“重罪和轻罪”,<sup>①</sup> 应被免职,而且以后也不得担任联邦官员。尽管参议院没有强加额外制裁,受到弹劾及定罪的官员仍有可能在普通刑事司法过程中受到惩罚。<sup>②</sup>

这段引文的含义,对于克林顿总统是否犯了可遭弹劾之罪至关重要。由于宪法没有确切定义“重罪和轻罪”,这亦非现代术语(照现代说法,轻罪只是轻微犯罪,通常其最重刑罚为监禁一年),我们很自然地(但不一定会有成果)要到历史中去寻求指导。除了这段引文的含义外,另一个宪法正文亦未说明的、也可能很关键的问题是,弹劾应遵从何种程序,尤其是——何种标准的证据才能决定对遭弹劾的官员进行参议院审判,是否犯罪在刑事审判中必须排除任何合理怀疑地被证实(或者,确信度略微低一点也行)。<sup>③</sup> 同样,我们也很自然

---

①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二条,第四项;又见第一条,第二项,第五款;第三项,第六款。

②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条,第三项,第七款。

③ 参议院采用了“参议院弹劾审判开庭时的程序规则和惯例”,《美国参议院弹劾程序与指南》(1986年8月15日),《参议院文件》,第33号,第99届国会,第2会期。但是,如我在接下来一章的结尾所指出的,它们非常简短、原则,并且没有规定证据标准。见麦克尔·J·格哈特:《联邦弹劾程序:宪法和历史分析》(1996),第4章。

地要带着这些问题,在历史中搜寻答案。

弹劾制度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的英格兰。那时,国会用它来处理那些犯有贿赂、恐吓、威胁罪,或除此之外不能被普通法庭处罚的高官(有时是有权势的个人);但是,君主被认为享有豁免权。下议院的作用相当于大陪审团,以裁决是否弹劾此人。如果弹劾裁决已作出,上议院就对他进行审判,如果定了罪,就可以施以刑事制裁,包括死刑和革职。在立法机关前进行审判是反常的,不仅因为英国没有(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依旧没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分离的观念,而且上议院包括——至今在名义上还是——皇室大法官。<sup>④</sup> 由下议院弹劾、上议院审判的程序相对于普通民事或刑事程序来说,并不能完全取而代之。“大陪审团”(下议院)和“法官-陪审员”(上议院)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政治家而不是正规法官。于是,在实践中,弹劾制不仅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模式而且作为扩大与君主、官员相关的国会权力的方式在行使职责,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大不列颠美洲殖民地的殖民议会大量运用弹劾制,特别是在十七世纪,即使英国政府还没有认识到殖民议会有弹劾权的时候。<sup>⑤</sup> 他们随随便便即进行弹劾和接踵而来的上议院审判(通常是市镇委员会),单是审判带来的威胁就足以使遭弹劾的官员辞职了。在英国,法律形式——尤其是提请被告注意指控的权利和在听讯时质证原告、提供证人的权利——是紧密相连的。但在英国,该程序常常因为政治事务而起作用。在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几个殖民弹劾案,该程序的根本用意是对皇权的公然挑衅。

如此,弹劾制就成为宪法缔造者熟悉的程序。要求把弹劾制包含在联邦政府的新章程中,并将之适用于总统、副总统、法官及其他

---

④ 现在,上议院上诉委员会是英格兰的最高法院。但是,组成它的法官并不由那些有权出席上议院会议的同僚任命;他们是专职法官,从司法机关的下级晋升到上诉委员会。

⑤ 关于殖民和革命时期(即前宪法时期)的弹劾,见彼特·卡勒斯·霍弗和N·E·H·哈尔:《美国的弹劾:1635-1805》(1984),第1-2部分。

联邦政府官员的主张直接明了。总统应有一个固定任期；也应当有在任期届满前免除其职务的程序。<sup>⑥</sup>但是，如果该程序，譬如说，包含国会两院的不信任投票，总统的职位就非常脆弱；立法机关成了至高无上的部门，作为宪法精心构筑的这座大厦基石的权力平衡就会毁坏。

解决途径在于，既为通过弹劾而免除总统设置程序路障，也为其设置实体路障。主要的程序障碍是，要求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投票通过才能定罪。令人误解的是，因为参议院越难定罪，众议院也许就越容易弹劾总统；一些温和的共和党人，他们的投票对弹劾克林顿总统是非常关键的，他们之所以这样投票，是希望并预料他不会被参议院定罪。除了遭受弹劾的官员被革职和取消他将来执掌联邦拥有信任或荣誉的部门的资格外，法律禁止众议院再施加任何制裁，该禁令通过降低弹劾中的利益关系，稍微缓解了要求三分之二通过所带来的影响。同时，还有针对宪法第一条、第九款有关剥夺财产和公民权的法案的禁令，<sup>⑦</sup>禁止参议院对被它定罪的总统施加刑事制裁的禁令也削弱了国会对总统的威慑力。

在实体法上对总统弹劾和定罪所设置的障碍是，将免职的理由

---

⑥ 副总统也有固定的任期，联邦法官“在行为良好期间”可以连续任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三条第一款，即只要他们表现良好就可以终身任职。联邦政府中的其他文职官员虽然没有固定任期，但却可以行使那种根据普通的法律程序而难以控制的权力，总统也可以拒绝免除他们；除两次总统弹劾外，联邦法官是依据宪法被遭弹劾的惟一官员。

⑦ 剥夺权利法案，历史上非经司法审判剥夺个人或团体权利或对其实施刑罚的国会法案，后为《美国宪法》第一条所禁止——译者注）是由立法机构作出的刑事裁决，既适用于英格兰，也适用于美洲美国殖民地。该剥夺权利法案是立法机构以弹劾惩罚官员的一种替代机制。至于立法机构的责难是不是一种剥夺权利法案，见第五章。



限制于重罪和轻罪。<sup>⑧</sup> 这些术语没有定义,也没有固定用法。“重”罪也许表示严重的犯罪——也许只不过表示由高级官员犯的罪。<sup>⑨</sup> “轻罪”也许意味着“过错;病态行为;(或)比残暴的罪行略轻的行为。”<sup>⑩</sup> 如果是最后一个意思,这也是对轻微犯罪的现代理解,那宪法中的惯用语就会很荒谬:要么是“重罪和轻罪”,要么是“重罪和重的轻罪”。

宪法大会拒绝接受允许因“执政不当”、“渎职”或“玩忽职守”而弹劾的提案,以免这些术语会产生副作用——使总统、法官及其他联邦官员在国会的压力下工作。<sup>⑪</sup> 但大会无意将弹劾限制于在正规法庭应受惩处的罪行。<sup>⑫</sup> 这种限制是与殖民地和州的实践相矛盾的。<sup>⑬</sup> 除不服从总统意志的、可弹劾的官员外,尤其是总统自己、副总统,和

---

<sup>⑧</sup> 有人认为,这些理由并非如此受到限制,以致于重罪和轻罪的惟一意义是免除被定罪的总统或其他官员职务的强制性理由;免职对在次级指控中受到弹劾和定罪的总统或其他官员来说是一种自由裁量的制裁。约瑟芬·艾森伯格:《弹劾与司法程序的总统豁免》(芝加哥大学法学院,1999年1月,未出版)。尽管这一观点从宪法弹劾条款的上下文和背景尚可争论,但它却是与这些条款的现代含义背道而驰的,也会通过消除国会免除总统的任何实质障碍而大大弱化总统,这是它不喜欢的。

艾森伯格教授在1999年1月26日享受了他的瓦霍尔主义者的十五分钟声誉,当时正处于总统审判期间,据说一些共和党参议员正根据艾森伯格论文(已经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网站上公布)的权威性在考虑定总统的罪而不免除他的职务的可能性。纳尔·A·刘易斯:“定罪而不罢黜之建议”,《纽约时报》,1999年1月26日,第A17版。接下来的日子,参议员打消了这一念头。大卫·E·罗森包姆,“罗特精选了六名侦探找寻出路”,《纽约时报》,1999年1月27日,第A17版。

<sup>⑨</sup> 霍非和哈尔,前注⑤,第102页。在它的第六章,以及格哈特,前注③,第三章,可以找到在弹劾宪法惯例上很好的讨论。格哈特还讨论了在正式生效的协定上的争议,同前,第二章。

<sup>⑩</sup> “轻罪”,载萨缪尔·约翰逊:《英语词典》(1975)。

<sup>⑪</sup> 霍非和哈尔,前注⑤,第97,101页。例见,《1787年联邦大会记录》第2卷,第550页(马克斯·法尔王德编,1937年修订本)。

<sup>⑫</sup> 霍非和哈尔,前注⑤,第101-102,118-119页。

<sup>⑬</sup> 饶尔·伯格在《弹劾:宪政问题》(1973)中错过了这一点,在此著作中,他根据英国的先例认为,弹劾只对犯罪行为才合适。如果美国宪法的构建者宁要英国的先例而不要他们相当精通的殖民地和州的先例,那才怪呢;霍非和哈尔极有说服力地断定他们没有如此,前注⑤,第6章,第117-118页。

联邦法官,宪法没有规定其他程序,这样就在宪法结构中留下一个缺憾。假如总统为娶四个妻子迁到沙特阿拉伯,而他打算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来掌管政务,那么,即使他不会因长期旷工而判刑,也会被免职;<sup>⑭</sup>而且,惟一的免职方式就是:弹劾。没有犯罪却完全不称职的法官也会同样对待:换句话说,联邦地方法院的约翰·皮克林法官,嗜酒如命并且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没有犯罪,他成为根据新宪法弹劾和定罪的第一位官员。

可以替代弹劾、作为任职官员免职方式的惟一选择——但会带来同样的结果——是国会首先对官员的行为定罪,而后以此为由弹劾他。<sup>⑮</sup>但这将变成过度的形式主义。从职务上考虑,他会因不构成犯罪的失职行为被弹劾和定罪。只有当可遭弹劾的行为是持续的、而不是已经完成的,并且,没有取消他有效履行职责的资格、他不得不继续下去时,此种形式主义的花招才会起作用。假如国会试图对总统已经停止的行为定罪,就会违背宪法关于有追溯效力规定的禁令。<sup>⑯</sup>

在赞成彼特·卡勒斯·霍弗和 N·E·H·哈尔<sup>⑰</sup>,而反对饶尔·伯格和詹姆斯·圣·克莱尔<sup>⑱</sup>(他们还从语言学角度和历史的例证将“重罪和轻罪”限制在犯罪领域之内)的基础上,我从构造和讲求实效方面而不是从形式主义或原创者的角度来理解宪法的含义。假定原意应该是能够将假定的自我流放的总统或根本不称职的法官免职(从

<sup>⑭</sup> 例子取自小卡里斯·L·布莱克:《弹劾:手册》(1974),第33页,略微作了修改(他没有预见到看到电子邮件)。

<sup>⑮</sup> 那是国会对安德鲁·约翰逊所做的事情,安德鲁·约翰逊是克林顿之前受到弹劾的惟一总统。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总统任命或者免除某些官员,并且宣布违反该法是“重罪”。约翰逊通过免除国防部长艾德文·斯丹顿的职务而否决了该法,从而立即受到了弹劾,尽管参议院宣判他无罪,见迈克尔·勒斯·伯内迪克特:《对安德鲁·约翰逊的弹劾与审判》(1973)。

<sup>⑯</sup>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第三项。

<sup>⑰</sup> 又见格哈特,前注③,第九章。

<sup>⑱</sup> 詹姆斯·圣·克莱尔等:《弹劾总统的宪法标准分析》(1974)。圣·克莱尔是导致尼克松下台的弹劾调查中的尼克松的律师。

实用主义考虑),<sup>⑩</sup> 而宪法中又缺乏在任职期间将此类官员免职的规定(从结构上考虑),那么,无论历史是怎样记载的(尽管霍弗和哈尔的历史研究方法比伯格的理论更有说服力),利用弹劾制来罢免滥用职权或有失职行为的联邦官员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确的。这里不论人们想要弹劾的是哪一位总统。1974年,共和党人和尼克松的律师圣·克莱尔一再要求对“重罪和轻罪”从形式上作狭窄解释,而民主党派,包括克林顿自己,反尼克松分子,如查尔斯·布莱克,都要求从文义上进行解释。1998年,双方角色互换了,共和党取代了民主党在1974年的地位,而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的位置。这种角色的互换是常见的,因为议员和其他政治家们并没有承诺永远不变。

在美国历史上,由众议院进行的弹劾很少见。<sup>⑪</sup> 惟一被参议院定罪的法官,其中大多数犯了诸如受贿一类的严重罪行,但皮克林是一个重大例外。林肯的副总统和接班人安德鲁·约翰逊——于1868年遭到弹劾,由参议院审判,以一票表决被判无罪。从与个人能力和德行无关的角度考虑,该程序被普遍认为是完全具有政治目的的。它始终围绕着总统和操纵国会的激进共和党之间、在关于战后南部重建的步伐和规模问题上的分歧而进行。他拒绝执行或遵从某些法律,而那些法律的合宪性是令人怀疑的。

在众议院投票建议其司法委员会弹劾尼克松总统之前,他若不

<sup>⑩</sup> 免除总体上不称职的法官事实上并不是太紧急,因为他的工作常常不是太费力地就可由余下的法官分担。

<sup>⑪</sup> 那些以美国宪法为模式的国家的宪法毫无例外地都包含了弹劾条款;而那些议会制的国家则没有此规定,因为首相能够被不信任投票所免职,尽管这些国家需要,并且有罢免法官的程序。研究弹劾的美国学生是迂腐守旧的;他们不研究国外的经验。他们也为联邦弹劾制所吸引;州的弹劾自建立时期起就很少被讨论。而除了俄勒冈州之外的所有州在它们的宪法中都有弹劾条款,还常常耐带有联邦宪法中没有的额外理由;州的弹劾很少,比联邦的更少。例如,见威恩·格林,“历史表明州对弹劾的热情”,《塔尔萨世界》,1993,10月24日,第N1页。一般见罗伯特·F·威廉姆斯:《州宪法:判例与材料》(1993年第2版)。

辞职,就极有可能被弹劾和定罪。<sup>①</sup> 他被指控为,在共和党指使下派有关人员潜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所在地水门大厦,随后使用一些可构成刑事妨碍司法罪的手段掩盖其罪行,同时还运用国内税务署、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骚扰和恐吓其反对者和批评者。此掩盖行为触犯了刑律,但他利用行政部门打击政治敌人却没有犯罪,而只是错误地行使了权力。尼克松辞职事件是我们能找到的、与总统的实际定罪最为接近的一例,因此这个导致尼克松至辞职境地的程序给法官们施加了如万有引力一般的影响,没有先例指导,他们就无所适从。像许多人在关于克林顿是否应当被弹劾的争论中提出的一样,有人认为因为克林顿的不轨行为没有牵涉到任何权力滥用,他就不应被弹劾,此观点是不合逻辑的。所有一切显示,只不过其行为方式与尼克松的不同而已。

尼克松本人是否应被弹劾也不能确定,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他应当被弹劾是基于与对弹劾克林顿持赞同意见的共和党人和持反对意见的民主党人共同的理由。<sup>②</sup> 夜潜水门事件本身就是严重的政治犯罪,与选举舞弊相仿;但尼克松并未参与夜潜水门,而只是参与了掩盖罪行。当然,后者是对权力的滥用,但只有轻微危害;而且,导致弹劾的其他行为之目标,如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可被合理地推测为不忠诚以及危害国家安全。至于说到那些行为(然而,我着重强调的是尼克松参与掩盖水门事件),尼克松轻罪的严重性可以被认为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而减轻了。同样,许多人认为,克林顿的错误行为也由于他们相信他有杰出的领导才能而减轻了。而且,尼克松也不是第一个滥用权力的总统。那些认为冷战如二战一样对美国造成巨大损失的人也许会把尼克松对付反对其外交政策的人的手腕,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诡计相提并论——美国援助了大不列颠,从而违背了

---

<sup>①</sup> 事实上,辞职是否就弹劾程序提出了异议是不清楚的,因为如果它是如此,参议院就不能禁止官员在将来担任联邦官员。

<sup>②</sup> 例见,大卫·弗罗姆:“是的,它是像水门,”《每周标准》,1998年9月28日,第21页。



美国参与二战前签订的《中立条约》。同样的理由也可以为里根政府开脱,他们违背法律,设法资助尼加拉瓜反对党(尽管他不承认,里根也知道内情),还通过秘密出售武器给伊朗,实现了其他外交策略的目标(如从赫兹伯拉的手中,把在贝鲁特的中央情报局的站长解救出来,但赫兹伯拉的人最终还是将其杀害了)。

尼克松和以上这些总统之间只不过是类似而已,也许不是一个太恰当的比较。夜潜水门和掩盖行为不能以政治理由开脱,其他一些违法的权力滥用行为、尼克松似的冒险行为,可能被认为是附带的,因为入侵柬埔寨也许是削弱而非巩固了国家防务,由此使其不当执政行为复杂化而非减轻化了。我并不想替尼克松辩解。我只想像克林顿的律师所做的那样指出,当尼克松确实做错了的时候,考虑到当时的局面,它并非必定是一个如此重大的错误,以致要使用弹劾这样一种极端的制裁方式来惩罚他。如克林顿一样,尼克松两度选举获胜——其第二次比克林顿的第二次更有决定意义——是国会在两度失败的党派操纵下,想将其挤出白宫。和克林顿一样,尼克松显示了他可用作赎罪的、有目共睹的政治成就:在其任期,与东方关系缓和,对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巩固和扩展了林登·约翰逊提出的“大社会”纲领。如果尼克松拥有和克林顿一样的个人魅力及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也许能安然度过这场风暴——而且也不会由违背宪法的轻罪而导致这场风暴。

在实施总统弹劾时,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是,宪法中存在这样一个奇怪现象:它对所有联邦官员都采用统一标准,即“重罪和轻罪”。但是看上去很明显,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我会在后面论述),总统的门槛要比,譬如说,法官高一些。严重违反所得税法的法官当然要被弹劾;但总统犯了同样的罪行却不一定。如果把克林顿换成法官,其罪行牵涉到波拉·琼斯案,随即又被独立检察官调查,这些罪行比逃税要严重得多,他就应当被弹劾和定罪,这样



看来就更清楚一些。<sup>②</sup>但是涉及到克林顿本人就一点也不清楚了。因为我们拥有许多法官却只有一位总统,于是就能轻易地牺牲一位法官;或者因为他们的任期更长,能比总统干更多的坏事,而总统只能寄望于四年后的再度选举,若失败了还得再等四年。因为总统是单个而非群体,并且他拥有比法官大得多的权力和责任,那么他的弃职行为就会比法官类似的“轻罪”严重得多,即使这个“轻罪”没有持续四年。反对弹劾总统的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这会使后来的总统过于屈从国会的意志;另一方面,弹劾总统的法官会削弱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与总统权力一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我们将在下文看到,有一种值得推崇的观点——美国总统是一个拥有过度权力的政府官员;但是很少有明辨是非的人认识到,联邦法官过于独立了,或者如果他们是独立的,那么弹劾就是一个解决该问题的合适方法。富兰克林·罗斯福因为其“在法院安插人员”的计划而备受指责;我不清楚是否有一些地位显赫的人想把这些保守的、作为该计划目标的法官弹劾掉。股票市场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和审判反应平静,这表明略微提高或降低总统弹劾的门槛,没有像人们感觉到的那样,有明显破坏稳定的后果。

至少就犯罪而言,存在两个理由使得弹劾法官的门槛设得比弹劾总统更低些。第一个,因为法官是任命的而非选举出来的,出于政治动机,弹劾法官就不太容易。然而我们会看到,对联邦法官的政治弹劾依旧存在。第二个更为重要的理由是,司法部门的角色与总统或其他多数行政官员的角色不同(司法部长例外)。法官作为法律的象征,即使犯下相对轻微的罪行也会大大削弱司法体系。人们认为总统是政治家。人们希望政治家遵守法律,但是不必成为法的化身。

各个部门对于“重罪和轻罪”的理解都不同,这使得难以将其含义固定下来。涉及到总统,解释该术语的基本困难在于,犯重罪既非

---

② 一位法官,瓦尔特·尼克松在1989年因为在大陪审团前作伪证而被弹劾和定罪。

导致弹劾的必要条件——如沙特阿拉伯例证<sup>②</sup>，也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如果罪犯是法官，弹劾就足够了。总统的重罪必须在招致弹劾之前就达到一定程度的严重性或不利后果，甚或两者兼备；而宪法并未详细说明要达到何种程度。因此，严重犯罪行为本身不是弹劾总统的充分条件。沙特阿拉伯的例子还表明，滥用权力也不是必要条件。下一例是关于失职而非滥用职权的，李尔王或理查德二世对麦克佩斯或尤利乌斯·恺撒案——但有明显理由使得权力滥用成为宪法制定者的优先考虑，<sup>③</sup>正如他们从其他重罪和轻罪中单独列出叛国罪和贿赂罪加以特别说明一样。制定者尤为关注总统受外国政府贿赂的可能性<sup>④</sup>——这是对克林顿总统的指控之一，肯尼思·斯塔尔未被获准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

在目前讨论过的所有这些例子中，无论可遭弹劾之行为的动机如何、应受惩罚的程度如何，它都与该职务行为直接相关。所有这些例子都与总统歪曲、滥用或放弃其行政职权有关。没有一个牵涉到非官方行为。宪法条文中也没有任何有关弹劾的背景资料可以表明，当那些制定者和批准者把“重罪和轻罪”作为弹劾之衡量标准时，私人的行为也在其考虑范围之列。作为法官任期评定标准的“良好行为”的概念，至少还与这种考虑一致；但是总统的任期（更短）却没有以某种方式明确地、以其自身行为为条件。

这是否就意味着，如果克林顿总统没有利用任何其职务资源，亦即，在滥用总统职权一说上是清白无辜的，而只是徒手杀掉莫尼卡·莱温斯基以防止她与独立检察官合作，他就不会犯可遭弹劾之罪行？此种说法很难让人接受；假如历史上没有这种由来，认为这种罪行是导致弹劾的理由——这对于历史学派和“原创派”理解“重罪和轻罪”来说是一个致命缺陷——那么，运用历史去指导解释宪法就更糟了。

<sup>②</sup> 然而，这对法官和其他官员是真的，就如我们从皮克林案件中所知道的那样。

<sup>③</sup> 霍弗和哈尔，前注 5，第 101—102 页。

<sup>④</sup> 例见，《1787 年联邦大会记录》，前注 11，第 2 卷，第 68—69 页（古文纽·莫里斯的发言）。

宪法历史在提示目的和为含义提供线索和建议方面非常的有价值。但它不能应付实践的需要。如果克林顿犯了谋杀,他就不能继续任总统,如果他不辞职,就会被弹劾和定罪。无论他在执政上多么称职,美国人民都不会被一位尼禄(残暴的罗马帝王)或卡利克拉所统治。而且,再重复一次,弹劾是由宪法授权的、在任职期间将其免职的惟一手段。即使他被普通刑事法庭定罪、关进监狱,他都依旧是总统,除非他辞职或被弹劾、定罪。

## 二、起诉与赦免

如果总统能因为其任期中的犯罪在普通法院起诉,如果假定犯了谋杀罪的总统因此被判刑和监禁,那弹劾他的理由就可能不是基于犯罪或滥用职权,而只是不能履行总统职责,像自我放逐到沙特阿拉伯的情形一样。与职责不相关的罪行是否应作为弹劾的正当理由,这一问题只会在令人尴尬的、从逮捕到定罪的间隙期间产生。但没有人知道,总统在职时是否能以常规方式被起诉。宪法明确规定,在弹劾、定罪和免职之后能对总统起诉,<sup>②</sup> 但没有说明在此之前以及根本没有出现以上三种情形时,应如何做。制定者们假定,所有联邦官员都将在正规法庭被起诉。<sup>③</sup> 那些可能被弹劾的无数官员由于普通刑事犯罪而被普通法院定罪,随后免职,却没有被弹劾,因为他们是在总统的压力下做事,总统能随心所欲地解雇他们。但是,由于任职期间就让他受刑事审判会挫伤他的积极性,在实践中就有充分

<sup>②</sup>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条,第三项,第七款。

<sup>③</sup> 霍弗和哈尔,前注⑤,第101,118页。

的理由提出：他应当被豁免。<sup>②</sup>

此观点被宪法所创造的政权组织形式进一步增强了。因为(请艾瑞克·弗里德曼原谅不同看法<sup>③</sup>)一个被监禁的总统必然要被免职,起诉他就会在实际上增强检察官、还有法官和陪审员对他弹劾和免职的权力,这样就会使宪法赋予国会两院独有的弹劾和免职权受到损害。事实上,仅是定罪的可能性就会让总统辞职,以此作为其认罪辩诉交易的一部分——这种情况恰好发生在副总统斯皮鲁·阿格纽身上。既然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总统被定罪和判监禁,他就不得不辞职或被弹劾、罢免,那么假如肯尼思·斯塔尔说服他的一个陪审团起诉总统,他就实际上已经抢先开始了弹劾程序。地方检察官也会这么做的。

结构说的缺陷在于,看上去它好像暗示也不能以正常方式起诉法官——这几乎没人会相信。在多数遭弹劾和定罪的法官都是在以正常方式判罪后被弹劾的。但是,对单独一个法官的起诉和监禁对司法部门产生的影响,与对总统起诉和监禁对行政部门、政府和整个国家的影响比较起来,要小得多。

如果总统在位时不能被起诉,这就意味着他只能由于纯粹私人性质的犯罪被弹劾和免职,正如我们假设的他犯了谋杀罪一样,这样,允许总统继续任职就会显得不可思议了。事实上,总统可以在任期结束后以普通方式被起诉。与此同时,对刑事诉讼的限制规定解除了,这不会产生什么危害;因为,当一个可能的被告在一定期间内

---

<sup>②</sup> 例见,肯·郭姆雷:“弹劾与独立检察官:功能失常的联邦”,《斯坦福法律评论》(1999),第51卷,第309、315-324页;亚历山大·M·比克尔:“宪政三角”,《新共和国》,1973年10月6日;又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69篇”,载《联邦党人文集》(加克伯·E·库克编),第462、463页。相反的观点完全为艾瑞克·M·弗里德曼所持有:“作为国王的法律和作为法律的国王:弹劾之前总统对刑事起诉享有豁免权吗?”《哈斯汀宪法季刊》(1992),第20卷,第7页。

<sup>③</sup> 他主张“让总统免遭监禁在事实上是可能的”,同上,第53页。

可以免于起诉时,直到该豁免权届满,时效才会生效。<sup>②</sup>但是如果总统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特别是在他刚刚就职时犯下的,公众不会同意让他继续任职,也不会同意随后按刑法规定的普通程序制裁他——尤其是因为,宪法赋予了总统赦免任何联邦政府违法者的权力,<sup>③</sup>甚至是在起诉前,<sup>④</sup>例如,福特总统赦免尼克松,布什总统赦免卡斯佩·温伯格。赦免条款本身也没有说明总统不能赦免他自己。条款写道:“除了弹劾以外,他有权批准缓期执行死刑。”他不能在弹劾案中赦免自己,因为,那将使他取消宪法赋予国会的特定权力——对总统的弹劾、定罪权。但这是惟一载明的例外规定,并且不包括如下情况:被弹劾但判决无罪的总统对其所有犯下的联邦罪行全部免于起诉。

当然,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判例法,但是人们通常能从宪法措辞的广度推断,总统确实能赦免自己,<sup>⑤</sup>尽管此结论受到质疑。<sup>⑥</sup>目前,联邦最高法院也不太可能大胆到公然违抗宪法规定,在赦免条款上另加一条可以赦免总统本人的例外规定。这是不可能的,但并非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宪法规定广泛,但对该条的解释是:不允许总统赦免未犯的罪。<sup>⑦</sup>这是一项法官制定的例外规定;其他都是可以想象的。有人认为,宪法明确规定受到弹劾的总统在离任后可被起诉,就

<sup>②</sup> 例见,《美国法典》,第11卷,§362(破产的自动中止);《美国法典》,第11卷,增补本,§§501-525(基于主动职责而由或对军事人员提起的诉讼);黑劳诉马科斯财团案,《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3编,第103卷,第767、772-773页(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九巡回审判庭1996判决);克勒郭恩诉比修普,3Haw. 483(1873)。这些都是民事,而不是刑事暂时豁免的例子。我没有发现后一种类型的例子,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在适当的案例中不可能。

<sup>③</sup>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二条,第二项,第一款。该权力限于联邦违法。

<sup>④</sup> Ex parte Garland, 71U. S. (4 Wall.) 333, 380 (1866); 劳伦斯·H·特瑞伯:《美国宪法》,§4-11,第256页,注⑩(1988年第2版)。

<sup>⑤</sup> 郭姆雷,前注②,第323页。

<sup>⑥</sup> 布瑞恩·C·卡尔特:“赦免我?针对总统自我赦免的宪法判例”,《耶鲁法律杂志》(1996),第106,第779页。

<sup>⑦</sup> 特瑞伯,前注③,§4-11,第256页,注10。



表明他不能赦免自己,因为那将会使该赦免规定无效。如果总统在联邦某一区域内——比如哥伦比亚特区——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莱温斯基事件本身,在此实际最有可能是总统犯罪的现场,这样,总统的犯罪就成为联邦犯罪,因而正好可以包括在赦免条款的字面范围之内,联邦最高法院否决总统自我赦免的权力就会受到巨大压力。

一个赞成总统有自我赦免权的实用观点是,总统能够通过赦免他的同党间接地赦免他自己。在许多情况下,不借助起诉来威胁其同党举报他,就给一个刑事被告判罪,这是不可能的。(请回顾一下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对莫尼卡·莱温斯基运用的手段。)此观点与宪法正文或历史中缺乏任何有关排除自我赦免权的提示相互结合,因之,我得出如下结论:总统或许有自我赦免的权力。若果真如此,不仅刑事起诉总统的全部缘由颇具学术性;而且,无论作为罪犯的总统罪行是否牵涉到运用职权或实际上有任何公众影响力,弹劾对他都是一种根本的救济。

但是,总统若犯下重罪,一点公众影响力都不会产生吗?假设总统为纯私人目的、运用纯私人手段犯了谋杀罪,不能成为反对自我赦免权的有力例证。但它的确表明,在某种程度上,私人性会变成政治性。犯谋杀罪的总统拒绝辞职,但从失去权威这个意义上说,他会“放弃”其行政职责;他很可能移居沙特阿拉伯。许多人认为,克林顿总统的罪行尽管不如谋杀严重,但也足以使他丧失权威。但是,民意测验显示,他还没有丧失权威——大多数美国人继续承受他任职的折磨,如果他们相信他是谋杀犯,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了。

### 三、政治弹劾的恶梦

从作为一种救济的免职这一结果开始,有助于我们思考应遭弹劾的总统违法行为应该是如何构成的。我们要问:什么类型的行为,刑事的或非刑事的,会成为不得不将其免职的正当理由?从这个角

度看,并且考虑到宪法不同部分对弹劾的法律措辞、制定者强调把轻罪作为弹劾的依据,立宪大会拒绝了让国会选举总统的提议、<sup>③</sup> 殖民地和各州运用弹劾的经验,基于宪法的弹劾实践,还有宪法的结构,那么弹劾就不应被仅仅当作是国会和总统或其他官员之间分歧的表达方式,这一点是比较合理和清晰的。此观点对许多研究弹劾的学者来说,好像早在宪法产生之初就确定下来了,那时共和党人(即杰弗逊所属党派)要设法除掉由杰弗逊的前任总统们任命的联邦党派的法官,于是求助于“政治”弹劾。<sup>④</sup> 这次尝试的高潮就是对最高法院法官萨缪尔·蔡斯进行的弹劾。这场运动以他在1805年被宣判无罪而告终。<sup>⑤</sup> 然而,政治弹劾的恶梦再度出现了,1868年弹劾安德鲁·约翰逊又试图对极度自由的、四度结婚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进行弹劾,未获成功,以1970年的一次弹劾审讯而告终。<sup>⑥</sup> 这只不过是一场恶梦而已。1997年,当共和党派的国会议员汤姆·德雷,现任众议院共和党首领,企图弹劾克林顿的发起人,要求弹劾由克林顿总统任命的“自由主义的”法官时,<sup>⑦</sup> 他受到众人指责,因为他严重偏离了宪法之弹劾规定的合理解释范围。

人们对政治弹劾法官的看法是,这会使他们胆小怕事,削弱作为自由政体基石的司法独立。人们对政治弹劾总统的看法是,这也会使总统胆小怕事,驻足不前。既然总统只需众议院大多数代表通过就可被弹劾,既然参议院的审判会给总统留下创伤(即使最终宣判无

<sup>③</sup> 一个被广泛考虑,并且在开始时被强烈支持的提议。例见:《1787年联邦大会记录》,前注①,第2卷,第119-121,第401-404页。

<sup>④</sup> 共和党人不应该因为这一努力而受到过于严厉的审判。他们当时正努力回击联邦党人的司法体制——因为它实施由联邦党人所控制的国会通过的侨民和煽动叛乱法,以遏止共和党人对联邦官员和法律的批评。尔虞我诈在政治中是一种公平游戏。

<sup>⑤</sup> 霍弗和哈尔,前注⑤,第12章。

<sup>⑥</sup> 格哈特,前注③,第27、29页。

<sup>⑦</sup> 例见,拉尔弗·Z·哈罗:“共和党人力求指控法学家‘积极份子’”,《华盛顿时报》,1997年3月12日,第A1版;社论:“终结国会对法院的战争”,《新闻日报》,1997年10月5日,第B3版。

罪),既然由一个与总统不同的党派来操纵众议院是常见的,那么运用政治弹劾制就会使我们进一步走向议会政体之路——至少,议会在名义上是最高机关。而且,无论其价值何在,它都不同于美国宪法理论。事实上,弹劾程序越走向政治化,与之相连的耻辱感就会越少,因而,国会对总统威慑力的净增长就会越少。然而,如果弹劾的门槛设得很高,我们的政局就会更加动荡,总统也会更无权。

反对政治弹劾法官的呼声比反对政治弹劾总统更强烈。我们希望法官比总统更独立于其他政府部门。人们认为,总统要与国会保持一致;否则他将一事无成。安德鲁·约翰逊作为总统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因为他蔑视国会,而且对由其反对党操纵的国会采取对抗态度。与之相反,大多数总统,包括克林顿,在面对由反对党操纵的国会时,都能明智地运用妥协手段来有效地行使管理权。你或许会认为,由于约翰逊没有按照宪法规定的方式——即,使司法和行政相互依赖而非相互独立的方式——行使职权,他就“放弃”了职权。在此例中,我们会看到,政治弹劾不易察觉地与因非刑事滥用职权或失职行为导致的弹劾融合在了一起。

但是不能因此就将克林顿与约翰逊相提并论。如此,我们要问,对克林顿的政治弹劾是否比对约翰逊的更纯粹、更不可原谅。民主党派指控说的确如此,然而他们不是根据弹劾规定提出指控——有关规定并未提出任何总统不与国会共和党派合作的政治分歧或指责(民主党派长期以来指责克林顿与国会中的大多数共和党人太亲密无间)——而是依据所谓的、对导致弹劾程序的党派偏见提出指控。除了热衷于弹劾的国会成员德雷的作用之外,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只有五位民主党人支持共和党投票表决弹劾克林顿,但更多的人(31位)支持共和党人表决发动弹劾审讯。这个理由不具有说服力。弹劾安德鲁·约翰逊显而易见是政治性的;他被指控为妄图破坏《战后重建法》。克林顿的辩护人着重强调了导致克林顿弹劾之行为的非政治性。

当然,许多共和党人的真实动机也许带有隐藏的政治目的。但

此观点与克林顿的辩护人试图解释的观点相比,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在此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要求我们更加仔细思考,如何理解“政治弹劾”。如果它仅仅意味着,在决定是否弹劾时党派关系起重大作用,因此比如,一个共和党总统与克林顿犯了同样罪,他就不会被由共和党操纵的众议院弹劾,于是对克林顿的弹劾就成为一次政治弹劾。但是此定义也太不严谨。没有一个总统弹劾是不充斥政治色彩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假设布什与克林顿干了同样的事,共和党人就会认为他应受弹劾,但从政治角度考虑,则会撤回其弹劾决定。那将是阻挠干预弹劾而不是支持鼓励弹劾的一个政治实例。但是假如共和党人并不认为克林顿的行为能导致弹劾,却无论如何也要投票弹劾他,那就会是政治弹劾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他们的惟一动机是政治。如果这是判定“政治”弹劾的正确检验方法(政治是弹劾的惟一动机),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弹劾克林顿是否也应当被视为政治性的;我们对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想法了解得还不够。

对弹劾克林顿总统是否可以合适地称之为“政治弹劾”提出质疑的第二个理由是,民主党在投票反对弹劾时,很可能与共和党投票支持弹劾时一样,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1974年,民主党也许比共和党更具政治性,那时共和党中有很多人都支持民主党,要求尼克松辞职。在他们内心深处,国会中的民主党也许认为克林顿犯了重罪或轻罪,但是他们害怕弹劾和定罪会对民主党产生不利后果,或者会提高宗教权。“党派偏见”的指控也许本身就是一个党派伎俩。据说,在1999年1月8日,参议院一致通过进行弹劾审判的基本原则时,白宫大为失望;“白宫一直设法使(参议院中的)民主党放弃两党之争。”<sup>②</sup>

表明民众看法的民意测验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弹劾克林顿总统,这个事实并不能有力说明共和党不如民主党那样依原则办事,

---

<sup>②</sup> 艾理森·麦克尔:“参议院,全体一致同意,为审判设置规则”,《纽约时报》,1999年1月9日,第A1,A10版。



民主党指责共和党对民意测验中显示的大众意见嗤之以鼻,同时又前后矛盾地说,共和党的反响太强烈了,不能满足其保守选民的要求。一个人不能对同一事件采取两种态度。投票人的偏好如何与弹劾并不相关。如果两者不相关,民意测验的结果就会屈从于选民的压力。如果相关,人们也不认为前者会比后者更加真实可靠地记录了投票人的偏好。对选民作出响应是一种不完美的民主形式(并不存在完美的民主形式),但它比根据选民投票的、对大众看法进行民意测验的民主方式要更为可取。在最初的宪法草案中,众议院是联邦政府的平民党机构。

一个更为深刻的观点是(因为反对弹劾的人非常正确地指出,立法机构可由选举出的少数人控制<sup>④</sup>),强化宪法的政治体制,仍与1787年一样,是一个代议体制而非直接民主体制。联邦公民复决投票权或公民立法提案权并不存在。人民的政治观点在所有情况下都通过他们选举的代表这个折射中被过滤掉了。民意测验则没有这个过滤过程,但却是比争议表决(如公民复决投票权或立法提案权)更糟糕的、人民志愿程度更低的表达方式,因为它比表决轻松,不必费劲回答民意调查人的电话提问。当一个立法机构承担诸如决定是否弹劾这样准立法的职责时,这个代表机构的过滤功能尤为重要。如果总统的支持率降到50%以下,他就会被弹劾——这是一个奇特的观点。

两个党派在关于弹劾的公开争论中不时运用煽动手腕。我们更易在民主党的证据中找到漏洞,因为总统犯罪使民主党处于被动防守之势,而且光靠诡辩和迷惑怎能为根本站不住脚的行为辩护呢?国会内外的民主党(请记住卡维理和麦克威尔)认为,克林顿是因纯

---

④ 想象一个由同样的人口地区选举产生的、由100名成员组成的立法机构。51名立法者属于政党A,其他的49名属于政党B。政党A有严格的纪律;结果,A的大多数(26名)控制立法机构。那26名中的每一名都由其所在地区的微弱多数选举产生。因之,略微超过13%的选民就将控制立法机构。这一例子是极端的,但是有助于解释众议院能够提高投票来弹劾,尽管从民意调查看可能会与选民的大多数相反。



私人轻罪被弹劾的；重罪和轻罪只局限于滥用政府权力；克林顿没有作伪证、或撒谎（几位民主党人士暗示，他从来没有抚摸调戏莱温斯基，这是可信的）；问题不在于作伪证，而仅仅在于总统抚摸的是她身体的哪一部分；没有实物证据就不能证明他作了伪证——缺乏实物证据，这个案子就成为“他/她说如何如何”，这样的案子不可能会赢；<sup>④</sup> 克林顿已经道过歉了，“他还能做什么呢？”他犯下的惟一错误在于他伤害了他的家人；没有给予他充分机会为自己辩护（例如，法官盘问证人，而证词对他极为不利）；斯塔尔比克林顿更藐视法律，而且可能有精神病；弹劾克林顿违背了宪法的“简单含义”或“字面意义”；共和党热衷于党派之争而民主党不是；克林顿名副其实地推行自由政体（从传统民主政体的意义上说）。所有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正如他们说共和党阻挠众议院表决以谴责代替弹劾一样。遍及众议院的这场弹劾争论的主持官作出裁决，以谴责代替弹劾的这种补救措施超越了界限，他们就向众议院提出上诉，结果众议院表决支持该裁决。投票支持的是那些民主党声称是正在叫嚷要以谴责取代弹劾的温和共和党派。党派规章制度是一个因素；温和派担心，如果他们公然反抗领导层，会失去担任委员的机会。然而，看起来好像众议院中共和党人对公开谴责的支持在弹劾辩论和表决前一周就消退了，因为总统依旧不肯承认，他在大陪审团面前和琼斯案的证词中撒了谎。

民主党还声称，共和党正试图破坏 1996 年的大选结果。但那将意味着，以罗伯特·多尔而不是阿尔伯特·戈尔取代克林顿。不管怎样，除非总统碰巧成为依据《第二十五条修正案》产生的总统（像吉拉尔特·福特，他没被选为总统），对他弹劾和定罪就意味着在他任期结束前将这位选举出的政府官员免职。因此，抱怨这是“破坏选举”就是指责宪法，而近来还无人胆敢这么做。如果迫使克林顿辞职仍然意味着破坏 1996 年大选，那么在 1974 年迫使尼克松辞职——这是

---

④ 这似乎是我在第一章提到的“两名证人”规则的一个引致误解的说法

所有民主党赞成的事——就将意味着破坏 1972 年大选,并且以非选举的人选(福特)而不是以人民选择的总统替角(戈尔)取代一位被选举出官员。

民主党指责,斯塔尔的调查过于集中在莱温斯基事件上了,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又不适当地扩大了弹劾质询的范围,超出了斯塔尔报告中的列举事项。他们既批评质询过短又指责它拖延过长了。事实上,质询未在斯塔尔报告上增加任何内容,而且民主党无法找到报告中的重大错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说(实际上是确定地说),如果采用比普通民事标准更高的证据标准,斯塔尔得出的一些推论就不能得到证实。<sup>⑤</sup> 民主党要求结束这场“纯粹毁灭个人的政治斗争”,但却没有放弃他们自己诋毁别人的企图,他们说斯塔尔是受性压抑的精神病患者,琼斯是善长捕猎的人渣,莱温斯基是猎物追踪者。但是,当女权主义者的梦魇、淫秽刊物《妓女杂志》的发行人拉瑞·弗陵特“攻击”尚未上任的众议院议长罗伯特·列文斯顿试图阻挠弹劾程序的时候,当他设法击倒作为众议院进行弹劾审讯的起诉人的国会议员鲍伯·巴时,他们中却没有批评他。在众议院,民主党指责共和党没有传唤证人以证实他们声称的轻罪,如莱温斯基、苛莉和乔丹;在参议院,民主党批评共和党传唤那些相同的证人。民主党说,众议院的弹劾审讯太简易了,而参议院审判又不够简易。

对克林顿的弹劾,反映出一些与逐渐增长的国会两党分化不同、但又有一定关联的东西:本杰明·金斯伯格和马丁·谢弗特称之为“选举后的政治”问题的出现。<sup>⑥</sup> 1990 年,共和党操纵国会不过几十年(除了 1981—1987 年的参议院以外),民主党在此前的 21 年中也只有 4 年执掌总统权,当时金斯伯格和谢弗特著书写道,共和党得到了总统职位的保险栓,而民主党得到了国会的保险栓。他们认为,这降

---

<sup>⑤</sup> 那不是斯塔尔的过错;没有人要求他建议众议院在决定是否弹劾总统上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证据标准。

<sup>⑥</sup> 本杰明·金斯伯格和马丁·谢弗特:《其他途径的政治:美国选举重要性的衰落》(1990)。

低了党派之间竞选的意义。并且,随着媒体与联邦司法部串通一气,它作为一种替代方式,这些党派逐步演变为“一种主要的政治竞争新技巧——揭发、调查和起诉。”两位作者在宣布竞选的失败时是草率的;自1993年以来,民主党控制了总统权,自1995年,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但是,他们关于揭发、调查和起诉(他们称之为RIP)在逐步增长的说法是正确的,这已经在像《独立检察官法》这样的机构“改革”的辅助下,成为了政治竞争的另一种方式。他们用实例论证,两个党派都同样运用了此技巧(第26—31页),他们还采用尼克松的弹劾质询作为例证(第26—27页)。我们在克林顿的弹劾中也能发现,双方都运用了此技巧。请考虑一下,“攻击”声名显赫的共和党人为通奸者,对斯塔尔进行恶毒攻击,克林顿仇视者使用诡计和一些共和党要为尼克松“报复”民主党的愿望,因伊朗门事件对里根政府起诉的检察官们,阻挠罗伯特·伯克担任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被提名为大法官时度过的难堪时光。RIP创造了一个有利于政治弹劾的气候。尤为显著的是,共和党在对待伊朗门事件中的有关妨碍司法行为和托马斯证实战中的性骚扰时,他们采取了极为低调的态度,而民主党在伊朗门争论中大声叫嚷那些冠冕堂皇的法律辞令,却在涉及克林顿的争论中沉默不语。

假如,正如我所解释的,对总统进行政治弹劾是不恰当的,那也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弹劾中一个不合法的因素。我们必须考虑宪法之最初结构和现有结构。在最早的宪法中,惟一由人民直接选举的官员是众议院议员。总统和副总统是由各州选举人推选组成的总统选举团选举的;宪法没有(目前依然没有)明确规定各州推选选举人的方式。参议员是由各州立法机构选举的。内阁成员以及其他所有行政部门官员,还有法官,须经参议院批准、由总统任命。众议院议员是由联邦政府中直接选举的惟一机构,类似于古罗马的保民官——是人民的监察员。弹劾权是对众议院调查权的补充。于是,

它就成为了一种民主权利,尤其是在针对终身制法官时。<sup>⑧</sup> 在民众大会决定弹劾一位官员时,必定要考虑政治因素——由于众议院不仅负责完善弹劾议案,而且要对参议院弹劾的官员起诉,政治因素因而更加不可忽视。<sup>⑨</sup> 一如我们将在最后一章看到的,人们认为检察官有对谁和为何事而起诉的自由裁量权,在适当的时候,这一权利的行使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与之相反,参议院类似于罗马参议院或英国贵族院,被认为是由名人显贵组成的委员会,是一个审议机构而非仅仅是代议机构。这一点可由宪法授予它的批准条约、批准总统委任司法行政人员的特权上得到证实。<sup>⑩</sup> 因而很自然地要为之安置司法权,尤其是因为,最高法院的法官——在逻辑上可能被认为是更合适的弹劾法官——是由总统任命的。宪法规定的审议权还表明,因为法官比参议员的数量少,他们更易受贿或受到恫吓。<sup>⑪</sup> 象贵族院一样,人们不可能指望参议院不考虑政治因素就决定一宗弹劾案。但是政治色彩会相对较轻,特别是因为,总统自己不是被直接选举的,他将发现很难对投票表决因他试图违背人民意愿而定罪的参议员提起控告。

自十八世纪以来,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宪法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参议员由 26 人增长到 100 人,这使得参议院成为效率较低的法庭,<sup>⑫</sup> 另一方面,由于联邦政府机构膨胀而增加的参议院的工作量使得审判总统成为一项更为繁重的、令人头疼的参议院职责(和

---

<sup>⑧</sup> 霍弗和哈尔,前注⑤,第 259-260 页。

<sup>⑨</sup> 这在宪法中并没有得到表述,但是却隐含在这一事实中,即弹劾条款让众议院扮演起诉人的角色,而让参议院扮演法官的角色,并且对参议院审判中的检察官没有单独的规定。宪法通过之前的英国和美国的弹劾实践是,弹劾机构(下议院)向审判机构(上议院)提起诉讼。

<sup>⑩</sup> 霍弗和哈尔,前注⑤,第 106 页。

<sup>⑪</sup> 见《1787 年联邦会议记录》,前注⑩,第 2 卷,第 551 页。

<sup>⑫</sup> 注意弹劾审判会衰退为“狂欢”审判,早在 18 世纪 90 年代和 19 世纪初的头 10 年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参议院只有 32 名成员。霍弗和哈尔,前注⑤,第 261 页。



弹劾法官时一样,参议员不愿将大部分程序授权给委员或职员)<sup>②</sup>。此外,参议员目前实际上和总统一样,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因而他们更具政治性,总统最好能以其深得人心的统治来抵触弹劾和定罪。此外,取消参选的财产资格使得民主政治更加平民化,科学选举的出现以及有关政治问题的大量综合信息的瞬时传播,也使我们朝着有别于代议民主的直接民主方向推进了一步。人民期待在正式授权给议会在有关国家事务特定问题上(如弹劾)有一个有效解决措施,而不是仅仅依靠选择官员、让他们基于自己的判断去解决此类问题。现代美国民主的平民化倾向引起了如下关注:我们的政治已经变得审慎不足。

然而事实上,政治必定会在总统弹劾中比宪法刚刚制定和批准时发挥更大作用。另一个理由是,无论制定者在运用“重罪和轻罪”这个术语时的意图如何,二百年来,我们有幸只发生了有限的几宗弹劾案件,并且,它们也没有在有关何时才是适当运用弹劾制弹劾总统的问题上为我们提供明晰指导。法律规定越含糊,它就越可能根据人的价值观来适用,其中包括任命去适用它的人(在此例中指选举出的官员)的政治偏好,而不是遵从客观法条。

然而从法律语言上看,这一点还值得争论——宪法的弹劾条款规定:无论这将如何破坏他们的工作业绩,或危及他们再次竞选的机会,或降低司法效率,宪法要求参议员从严格的司法角度而非政治角度来对待他们进行弹劾审判的职责。<sup>③</sup>但是,一旦批准可遭弹劾之罪不限于犯罪——也不是所有犯罪都是可遭弹劾之罪——这个立场就难以维持了。在决定一个罪行是否严重到需要总统免职的程度、或一些稀奇古怪的非犯罪行为(如移居沙特阿拉伯)是否仍要免职时,参议员不可能不考虑政治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与总统执政效果有

② 见格哈特,前注③,第116-117页。

③ 极负象征意义的是1999年1月8日的会议,参议员在老的参议院会议厅讨论审判克林顿总统的程序。在1935年现在的最高法院大楼建起来之前,老的参议院会议厅一直是最高法院的审判庭。



关。假如有人揭露总统是一个儿童淫秽物的制作人,那么,决定该行为或更确切地说它的公开披露是否会因此降低他作为总统执政的有效性以致被迫辞职,就会立刻成为一个政治性判断,成为一个进行弹劾审判恰当的、真正决定性的因素。

与参议院审判总统最为接近的例子是,纽伦堡法庭对纳粹头目的审判。尽管该法庭主要由职业法官组成,它也不是一个正规法庭;审判被告的法律标准是特定的。然而,他们仍要遵循大部分法定的程序仪式,因此,定罪和无罪的可靠度较高,并且需要由大众决定。但美国参议院不是法庭,重罪和轻罪的含义也未预先确定,<sup>④</sup>只要正规审判的程序仪式被一丝不苟地遵守,所有人都会知道,一个遭弹劾的总统是否真正犯了两院认为的可遭弹劾的罪行。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尤其是在参议院对克林顿的审判中,实际采用的程序并不能很好地确保对有罪或无罪作出准确判决。

纽伦堡审判和弹劾审判的主要区别在于,纽伦堡审判的罪行极具凶残性。纳粹头目的行为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致惟一的可行解决方式就是,施加无须以法律为托辞的政府制裁或是并不完全遵从法律基本规范的法律制裁。从不同的实践理由考虑,包括必须创设可信档案和德国人由来已久的尊重法律教条的传统,后者更为可取。<sup>⑤</sup>宪法明确规定,弹劾由众议院进行,对弹劾官员的审判由参议院主持;于是这一程序有了必不可少的由来;问题在于,缺乏对可遭弹劾的行为的界定以及法庭的政治特性。困扰参议院审判克林顿总统的不适当程序不是天生固有的;参议院本可以启动一次更好的审判。但是,从弹劾诉讼中固有的、正当程序出发,伴随着弹劾和审判总统可能引起的政府瓦解和各部分权力平衡的破坏,它能够解决反对弹劾的各种质疑。

<sup>④</sup> 设想一下新任总统向白宫顾问索要一份“重罪”的清单,以避免冒受弹劾的危险。

<sup>⑤</sup> 见朱迪斯·N·西克拉在《法律主义:法律、道德和政治审判》(1986年编),尤其是第155-170页中的杰出讨论。

#### 四、由弹劾和审判引发的程序问题

与总统弹劾程序形式有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参众两院的证据标准：根据弹劾和定罪而分别要求不同的证据数量及其信服度。尽管该问题很关键，宪法和参众两院都没有相关规定，而且在克林顿的弹劾程序中，他们也没有设法去解决。他们把它留给议员个人自己去判断。

如果有规定，那它应该是怎样的呢？起诉或其他刑事指控的标准是相信被告有罪的可能理由，而且大陪审团通常留下的惟一证据就是由检察官收集的有罪证据。在弹劾中，众议院的角色相当于大陪审团。但是，因为众议院审判总统的代价如此高昂、破坏力如此之强，看起来很清楚，在众议院投票弹劾并要求参议院由此负责审判之前，众议院应当相信总统有罪而不仅仅是他可能有罪。<sup>⑨</sup>

我用“要求”而不是“强迫”是因为，在宪法中，在弹劾历史上，在相当于刑事司法制度的程序中，都没有要求参议院就总统（或其他被弹劾官员）的指控是否能实际导致审判的问题暂不作出独立的判决。正如普通刑事法庭可以不必使被告经历审判就以理由不充分驳回起诉一样，那么，如果参议院认定即使罪状中声称的所有情况都属实也不能成为将遭弹劾的官员免职的正当理由，参议院就能有理由驳回由众议院向它提出的弹劾罪状。但是，参议院不愿这么做，因为这等于在众议院的脸上扇了一记耳光（可以假定两院都由同一党派操纵）。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众议院为了弹劾应当相信总统有罪：否则，它会通过将责任推委给参议院而使弹劾程序耗费政治代价。从温和派共和党的角度考虑，他们试图这么做是正确的，他们投票支持弹劾，随后又公开宣称，他们认为参议院不应当给总统定罪。

---

<sup>⑨</sup> 这似乎是国会中投票弹劾克林顿总统的大多数议员的看法，但不是全部——投票弹劾但力主参议院不对总统定罪的那些人尤其不在此列。

人们普遍认为,弹劾要求的举证责任在实际上应当比普通诉讼要求的举证责任更重,这使众议院不愿像大陪审团那样对《斯塔尔报告》随声附和,而大陪审团,如果斯塔尔向它提交报告并要求它起诉克林顿,它一定会不假思索地表示赞成的。但是众议院不能制定程序以实施一次负责任的质询。众议院不是一个诉讼机构,参议院也不是法庭。它缺少人手、组织机构、程序、以及与有效迅捷履行诉讼职责相一致的传统。这在克林顿弹劾案中并非是一个可批评的缺陷,因为独立检察官整理的证据内容广泛,大部分无可争辩。众议院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询问集中在一个无关事实但有关法律和政治判断的问题上——《斯塔尔报告》中揭露的行为是否可成为弹劾的正当理由。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中的民主党少数派最初提议说,委员会应在查明事实前就首先着手处理给“重罪和轻罪”下定义,委员会只关注《斯塔尔报告》中所称的轻罪,而不再关注有关凯瑟琳·奇莉、其他女人和与白水门事件相关的记载。共和党多数派考虑到其后果和影响,本当明智地接受民主党的提议。民主党针对共和党提出的、他们存有过分党派偏见的指控本可以基本平息,那么草率公布斯塔尔提交给委员会的证据<sup>⑤</sup>,包括大陪审团的证词录像带所带来的自食其果的后果就可以避免了。而且,共和党试图在《斯塔尔报告》涉及事件之外拓宽弹劾询问范围的计划也夭折了。

我们还不太清楚是否司法委员会本应当同意民主党的提议,以12月为截止期,但结果表明司法委员会将日期提前了。人们担心刻板的日期规定会加倍促使白宫和司法委员会民主党派采取拖延手段。随着弹劾一步步逼近,当司法委员会民主党派要求传唤“事实”证人时(被指控罪行的证人,而不是有关法律和政治问题的证人),这一担心貌似有理。

避免进行任何形式的事实询问——完全取决于有事实来源的

---

<sup>⑤</sup> 一如我们在最后一章所看到的,给必要的编辑加工留下的时间太少了。

《斯塔尔报告》——不应要求众议院接受来自于报告记载证据的推断。因为众议院不仅需要决定克林顿是否犯下如斯塔尔调查发现的特殊罪行,决定这些行为是否构成可遭弹劾之罪行,而且还需要决定这些行为的证据是否有充分说服力,有可能使参议院相信。这取决于参议院审判所采用的证据标准。如果参议院的结论是,总统既可能有罪也可能无罪,那么总统就应判无罪,按此说法,显而易见举证责任应在众议院。难题是,举证责任是否应是刑事责任,而要求证据不容置疑;通常民事举证责任,仅仅要求数量占有优势、有重大分量(仅仅举证被告有罪的可能性比无罪大);或者民事调解的举证责任,主要运用在诈骗案中,要求证据明显、令人信服地来证明其有罪。

该选择影响到两类法律错误之间的平衡;判实际有罪的人无罪,和判实际无罪的人有罪。检察官(如是民事案件,则是起诉人)的举证责任越轻,就越有可能发生第二类错误(判无罪的人有罪),越不可能发生第一类错误(判有罪的人无罪)。举证责任越重,情况正好相反。两类错误的分量应当决定,或至少可极大地影响施加给检察官的举证责任。不幸的是,在总统弹劾这一背景下,很难决定孰轻孰重。迫使总统在任期结束前辞职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行为,在两个多世纪的美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尼克松)。但是如果总统实际犯了重罪和轻罪而不能将其免职,就会严重放弃宪法规定的职责,而且可能将总统职位留给一个明显不能履行职责的人,从而危及国家利益。如我所见,众议院必须使自己确信总统有罪而不是他可能有罪,还要求参议院三分之二的人投票才能定罪,这两点为防止给无罪的总统定罪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保护。也许,要求证据无可置疑,或者如查理斯·布莱克的提议,要求有罪证据必须“具有极大数量优势”,<sup>⑤</sup> 会给有罪的总统提供过分的保护。

适当的证据准则可以由总统指控的确切罪行决定。如属滥用职

---

<sup>⑤</sup> 布莱克,前注④,第17页。这听起来很像明确的、有说服力证明的证据,因其更加为人所知,这是一种更适宜的确切表述。



权,则基于如下原理:错误保留一个滥用权力的总统给国家带来的风险,与错误将其免职带来的风险是相当的——要求相对较轻的举证责任很可能会比较适当。但是,如果指控的罪行是与行使总统权力无关的(或仅仅有微妙模糊的关系)刑事犯罪,如克林顿的案子一样,根据比普通刑事案件所要求的证据还少的证据定罪就违反常规了,或至少是特别的。事实上,参议院的定罪不会导致监禁或被判罚金。但是,革总统之职,尤其是还伴随着也许从此丧失再度执政的资格,就是严厉的惩罚。在考虑到整个社会因弹劾而承受的代价而不是总统承受的代价时,这一点显得尤为清晰。

选择何种证据标准只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案件中发生作用,但在某些尽管不是全部方面,克林顿的案子就是如此。一些对克林顿的指控,例如他为阻止莱温斯基在波拉·琼斯案中作证说出真相而为其在纽约谋职,不可能不基于参众两院的证据而提出合情合理的质疑就得到证实,而这些证据是独立检察官收集到的(在参议院,由众议院检察官许可宣誓作证的三位证人的证词还作了适度的补充说明)。然而,我在第一章谈到的大部分指控,可以得到证实,而无须根据证据记录提出质疑。因此,如果不必有合理怀疑就得证明总统犯罪,并且此等证据要求他将被弹劾和定罪,那么众议院弹劾克林顿总统就是正确的,而参议院本来就应当给他定罪。

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总统犯罪,那么必须弹劾总统和给他定罪简单方法是不完善的。因此,有必要对总统行为和除第一章涉及以外的各种情势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调查。独立检察官以及其他检察官的行为,或克林顿起诉人的行为(包括克林顿仇视者的行为),是第二章讨论的主题,它们也许是有重大关系的。同样,由总统行为所引发的、更为深远的道德和伦理问题,则是下一章讨论的主题。这些问题不仅与总统的罪行严重性有关,而且与其工作成效引起的后果有关,因此还与克林顿是否可与为娶四个妻子迁移到沙特阿拉伯的总统相提并论有关。同时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重罪和轻罪是否可基于他在总统职位履行职权的成就而得到原宥,这将是下一章讨论的



另一个问题。

克林顿的辩护人想要通过转换弹劾罪状的起诉为公开谴责的提议阻止参议院审判。当其努力失败时,他们又设法把审判限制在独立检察官调查所得到的证据范围之内。原则上,这种审判方式没什么问题,然而克林顿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为达到目的而找的各种借口是荒谬可笑的——听到莫尼卡·莱温斯基描绘她与克林顿的幽会,会玷污参议院、使公众反感,再则审判时传唤证人耗时几个月之久。其辩护人真正担心的是,即使证人证词与先前在大陪审团作出的一样,也会使克林顿的不良行为给法官们留下更为鲜活的印象<sup>⑤</sup>——当然,结果就不一样了。这种担忧证明是毫无根据的;三位证人最后在参议院审判时作证并未伤及克林顿。

如果存在不恰当的理由去进行一次书面审判(无证人的审判),那也同样不存在恰当的理由反对它。例如,没有亲眼见到证人作证,由此对他或她的言行(主要是作证时的身体语言、语调及流畅与否)作出评判之前,是不能对他的可信度妄自评定的。证人的言行举止所暴露出来的不是他(她)是否在撒谎,而是他是否是一个好演员。<sup>⑥</sup>这是一个理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布克林顿在大陪审团的作证是一个失策。反对书面审判的最佳理由是,那些证据记录操作起来不灵便——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有成千上万页,<sup>⑦</sup>而大陪审团收集到的大部分证词彼此关联甚浅,重复啰嗦。在独立检察官设法

<sup>⑤</sup> 这是显著或有效的启发法的一个实例。见第二章。

<sup>⑥</sup> 有证据表明,如果事实审判员只看证人证言的抄本,而不听口头证词,撒谎更有可能被查出来。迈克尔·J.萨克斯:“提高和限制审判的精确度”,《法律与当前的问题》第51卷,1988年秋季号,第243、263-264页。

<sup>⑦</sup> 报告的数量有60000,但这是有误导性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出版了5卷证词和其他证据(包括一些并非真正的证据材料,如独立检察官对妨碍司法的法律分析),大约有8000页。由于出版的卷册对大陪审团的许多证据使用的是压缩本,出版的每一页上包含原始抄本的4至6页,8000估计就是全部的页数;但是,要是全部正常页数超出出版卷册页数的30000页,那就令我惊讶了。我猜,其他的30000页是电话会客记录,访问日志,以及其他一些参议员没有必要觉得应当阅读的其他文件。

证明总统对与莱温斯基有性关系的否认中撒谎时、彼此相互联系的许多证据,在总统承认有性关系时又变得不相关了。在参议院审判中,双方律师都能对参议员指出证据记载中的重要部分,这样就能节省时间和精力,不必费力阅读整个记录,但是,让证人自己叙述会更有效一些,因为这样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有限几个相关事实的关键分歧上。大多数与指控克林顿有关的事实都未经证实;也不要求有证据证明这些事实。至于那些已被证实的事实,除了莱温斯基、贝蒂·苛莉、弗依·乔丹、琳达·翠珀、弗兰克·卡特(由乔丹推荐的、莱温斯基的第一位律师)、比尔·理查森、罗纳德·佩雷尔曼、当然还有克林顿自己以外,还有谁能给出重要证词呢?只有莱温斯基、苛莉、乔丹和克林顿才能作出一些重要证词,<sup>②</sup>但克林顿拒绝作证。即使三位以上的证人被传唤,审判的作证期也不必拖延好几天。

在总统的律师试图阻止传唤证人时,他们假装大度地作出让步,提议对斯塔尔全部证词记录的可采信性作出约定。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妥协。它的全部用意在于,他们不会根据证据规则(主要是传闻证据禁用规则)对证据记录中的特定部分提出可采信性质疑。由于参议院没有采用证据规则指导弹劾审判,<sup>③</sup>正如它也没有采用证据原则一样,就很难看出这种质疑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而且,他们只会通过给人们加深印象说总统的案子完全拘泥于法律术语上而惹

---

② 总统在知道其助手会被大陪审团传唤前向他们撒谎这种行为不可能被定为无合理怀疑的妨碍司法犯罪,如果我说的对,那么谢尼·布罗门瑟尔,作为除了莱温斯基和乔丹之外在参议院审判中作证的唯一证人,就不曾给出相关证据。也许参议院起诉人挑选布罗门瑟尔作证人是为了让总统尽可能地看起来像坏人;因为在对布罗门瑟尔讲话时,克林顿对他与莱温斯基的性关系的否认作了添油加醋,他声称她为了消除猎捕者的名声而想方设法地与他发生关系。质问布罗门瑟尔的参议院弹劾主持人可以迫使他承认,总统对他事实上撒了谎。受参议院三名证人的限制,众议院不得不在苛莉和布罗门瑟尔之间作出选择,并选择了后者。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如果人们可以从苛莉在大陪审团前作的证言作出判断,她对授意(事实上是在总统的指导下)返还总统给莱温斯基的礼物的否认,就是不可信的,这正加固了擅自改动证据的证明。

③ 参议院应当采用《联邦证据规则》。它们既是合理的,又是灵活的,并且也提供了一个熟为人知的使弹劾审判免于脱离轨道的框架。

恼参议员和大众。总统的律师不愿意对《斯塔尔报告》中宣称的事实作出约定——那将会是真正的妥协。事实上，既然报告中的一些事实结果不能被认为得到了确凿的证实，它就不仅仅是能否被合理询问的问题了。

两个党派在有关证人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他们实际上决定对资料记录进行为期两周的审查，然后再决定是否传唤证人。这一度看来是一个明智的妥协，也赢得了参议院的一致支持，这样就在公众面前提高了该程序的可信度（根据该协议宣布之后立即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的）。结果，对“资料记录的审查”演变成了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反复游说的几个问题。它就像一场急剧扩张的上诉辩论，《斯塔尔报告》代替了通常作为上诉起点的、审判法庭的判决。这场诉讼又一次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将发言的机会给了众议院所有13位主持人。这为总统律师们的种种努力提供了便利，因为他们将该案分散成许多细小的指控，而孤立地看来，没有一个指控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制裁，这样就使得免除总统的职位显得太琐碎了。参议院给予每一方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24小时！——至少3倍于必要的时间），而且不允许众议院支持人保留时间进行驳斥，这是正常审判程序的开端，它会使参议院和电视观众更难于对这场争论的问题形成一个清晰看法。最后，在2月6日，进入审判的那个月中，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证据听讯，双方运用三位证人的证词录音节录，彼此争论不休。<sup>④</sup>

从整体看，这场审判是对司法正义的一次嘲弄。<sup>⑤</sup> 尽管大多数参议员假装并未作出决定，遍及整个审判过程的公众评论却以另一种方式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并且，当审判越来越明朗化时，越来越多的参议员开始公开宣称，他们本来是打算如何投票表决的。参议员

---

<sup>④</sup> 《国会记录》，第145卷，第S1290页（1999年2月6日）。

<sup>⑤</sup> 但是并不是因为使用了从录音带中摘录的宣誓证词以代替活生生的证词。那是全部审判的后期风波。

既非法官亦非事不关己的局外人；除了少数例外，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把时间耗费在涉及复杂法律与事实问题的审判上，或者首先从法律和宪法角度而不是从政治角度——一句话，超越党派偏见——解决问题。民主党派参议员曾单方面与白宫（被诉方）接触，共和党参议员也曾单方面与众议院议员（起诉方）联系。如果审判遵从规定程序的基本原则，所有参议员都会从开始起就被取消参与资格，或者在他们作出公开声明和私下联络之后因其偏袒和忽略证实了他们的不胜任而会将他们除名，或者为履行称职的审判职责而两种手段并施。宪法制定者们授予参议院对弹劾案的审判职责，本来打算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组织团体——更小、更自由、更少的政治色彩。因为参议员太注重细节，他们必须从头至尾静坐几个小时聆听各种不致影响他们投票的观点，而分配大量时间给律师们争论案情纯属一种折磨。

最为严重的程序失策是，没有对辩论时间实施限制规则。结果，审判的正常秩序——听讯，然后作出裁定——就颠倒了，正如《艾莉丝漫游记》中的审判一样。参议员在听讯证据和争论之前就已作出了决定，他们作裁定时显得漫不经心而且有偏见。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布鲁斯·阿克曼于1998年12月8日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通过与法律制定程序的类比，指出当颁布弹劾议案的国会届满时，弹劾案就失效了，这样就为弹劾程序引入了一个新的程序问题。<sup>⑥</sup> 这个类比是不具说服力的。法律生效要求国会两院同时同意；此所谓两院制。弹劾程序不是立法性的，而是审判性的，无须两院同意。宪法给两院分配不同的任务：众议院决定总统（或其他官员）是否应当被审判；参议院执行审判。参议院不必同意众议院对总统的审判决定，众议院也不必同意参议院对总统的定罪决定，与此相反，两院都必须同意见案的内容，因为它将制定成法律。阿克曼的设想将在十一月的第一个周二和次年一月的第一周之间

---

<sup>⑥</sup> 他已经把他的证词扩展成一本小书出版了。布鲁斯·阿克曼：《反对弹劾即将卸任的总统（跛脚鸭）的理由》（1999）。



(新一轮的众议院大会)创造一个例外,如果参议院不可能在例会结束之前就完成总统审判,那么无论他犯了多大的罪也不能被弹劾。这就如同在同一庭审期限内要求大陪审团起诉、小陪审团定罪一样,或者因为期限届满而放弃大陪审团起诉被告的审判一样。

阿克曼的观点甚至比我刚才举的例子所建议的更不合理。尽管他的书名叫作《反对弹劾跛脚鸭的理由》,他并不认为任期将满的众议院缺乏弹劾权。尽管宪法第二十条修正案的第一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敌视任期将满的国会大会而提出的,它通过规定两院议员的任期在国会选举后的1月3日到期而缩短了任期将至的跛脚鸭国会(和总统)的任期,但它并未废除该会期。然而,阿克曼运用这种敌视争辩说,立法要求的两院同时同意(两院必须在同一会期中通过一个议案)也应用于弹劾上。<sup>⑤</sup>但是,两院同时同意的要求并不仅仅局限于任期将满的国会,即新国会选举已经开始、尚在会期中的国会。在阿克曼看来,如果众议院在6月选举前弹劾总统,但若国会会期于12月结束时参议院的审判仍在进行,即使进行弹劾的众议院不是即将到期,弹劾也会无效。

更糟糕的是,尽管阿克曼的提议是由于反对弹劾即将卸任的总统(跛脚鸭)而提出来的,也并未排除弹劾的可能性。如果弹劾是在11月选举和参议院匆匆在12月完成审判并证实他有罪之后进行的,他将会由即将到期的国会弹劾和定罪,而此定罪是有效的。

阿克曼认为,作为参议院审判主审官的首席大法官威廉·林奎斯特<sup>⑥</sup>必须制定规则以决定即将期满的众议院是否能够弹劾克林顿。然而阿克曼承认,此规则可能会被参议院多数人投票否决(正如参议院弹劾规则规定的。)此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席大法官的职责在于作为主席主持会议,也即维持秩序。他要对与证据和与审判相关的其

---

<sup>⑤</sup> 同上,第11、13页。

<sup>⑥</sup>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对总统的弹劾审判。《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条,第三项,第六款。



他事项提出的反对意见作出规定,(根据罗伯特规则)由当事人向参议院提出上诉;他不会就程序正当有效的问题(如弹劾是否合法)作出规定。宪法授予首席大法官主持总统审判的权力,并不因为他是一位法官,而是因为副总统——即使他不作为法官也能主持所有其他弹劾审判,而他在主持总统弹劾审判时会产生利益冲突。<sup>⑥</sup>

假如对首席大法官弹劾审判权力的限制规定不像法律一样清晰(我认为法律是清晰明了的<sup>⑦</sup>),它也会像政治理论一样清楚。将一个势单力薄的、即使高居美国首席大法官之位的法官置于此种情势,使他不得不就总统是否由参议院审判和可能判罪并免职、或不经审判就赦免作出决定,这将削弱司法部门的权力。这就是为何弹劾审判不由联邦最高法院进行,定罪也不由其进行审查的原由之一。<sup>⑧</sup>从林奎斯特审判克林顿总统的言行中很明显可以看出,他狭义地解释了他的权力。他几乎没作什么规定,仅有的几个规定既非实质性的、也不可能影响到审判结果。

即将届满的总统的弹劾问题主要是由众议院在新国会大会之后,于1999年1月6日投票表决讨论时提出的。投票关于对由即将到期的众议院任命的、在参议院审判中提出弹劾理由的弹劾主持人进行再度任命。民主党认为新众议院不应再次任命弹劾主持人。如

<sup>⑥</sup> 迈克尔·J·格哈特:《宪法对弹劾的限制及其选择》,《德克萨斯法律评论》(1989),第68卷,第1,88,98页。

<sup>⑦</sup> 首席大法官能够对弹劾克林顿的有效性作出裁决,阿克曼的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脚注,即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第2卷;《变迁》(1998),第467-468页,注③,译自阿克曼,前注⑥,第74-77页。关于首席大法官萨尔蒙·卡瑟弹劾审判安德鲁·约翰逊的行为的脚注,声称没有任何对卡瑟所主张的暗示:“程序领导的有限地位”是将来弹劾审判的先例。阿克曼,同前,第468页,注③。作为一名首席大法官应如何主持对总统的弹劾,卡瑟无论如何都与榜样的地位相差甚远。他自己就有当总统的野心,并且还对动摇不定的参议员流露出约翰逊应该被宣布无罪的信念。伯内迪克特,前注⑤,第136-137页。

<sup>⑧</sup> 汉密尔顿警告说:“这样做必然会使司法部门的权威大为增加,遂至提供进一步的借口去刺激反对司法部门的舆论”,“联邦党人文集第65篇”,载《联邦党人文集》,前注⑤,第439,443页。

果此观点占了优势,它就会解散这个即将到期的弹劾。如果它失败了,主持人就会以 223 对 198 的选票再度当选。这不能看做是对即将到期的弹劾毫不含糊的支持,因为它会在支持人和在以前国会中支持弹劾的、其余那些再度当选的国会议员的脸上留下一记沉重的耳光。无论如何,参议院完全无视阿克曼的提议。

总统的律师争论说,弹劾罪状不合宪法,并且含糊不清,同时参议院审判又出现了一个新程序问题。这看起来或许是一个令人惊奇的观点;回顾第一章,两条罪状之间断言有七个明确方面说明总统在大陪审团前作了伪证(第一条)或是以其他方式妨碍司法(第三条)。然而,第一条中的四条“明确”指控中的三条并不十分明确;总统就关于他与莱温斯基关系的实质,就他在波拉·琼斯案中所作证词的真相,就“他试图以贿赂手腕影响证人证词和阻止发现证据”等问题向大陪审团撒了谎。

通常,要求检察官把一系列详情记录在案就能轻易地解决诉状中缺乏明确指控的问题。但是,假如诉状实在含糊不清——以致于不能依据它确定对被告的指控范围——那么,这一问题就不能用详细清单来解决了。清单必须由检察官列出,而不是提起诉讼的大陪审团列出;假如诉状确实模糊,就不可能判定,检察官正提起的指控是由大陪审团批准的,或者无论大陪审团是否赞同他们自己认为是最适当的。在有关弹劾的含糊罪状的情形下,另一个相似的问题是,弹劾主持人提起的指控也许与众议院批准的不同,于是就避开了众议院,损害了宪法规定的众议院在弹劾程序中担当的角色。这一问题比诉状模糊的情况更为严重。大陪审团通常对检察官提出的诉讼不假思索地盖章批准;因此检察官就没有理由去通过额外附加未呈给大陪审团的指控来挖掘诉状的模糊性。但众议院并非它的司法委员会的橡皮图章。它否决了由司法委员会提出的四条罪状中的两条——而这是由司法委员会普通成员中挑选出来的弹劾主持人执行官起草的。而且,如果在弹劾前众议院应当坚信总统有罪,而不仅仅是他可能有罪,就会有人认为,它应当慎重考虑明确性的问题而不允

许给司法委员会或弹劾执行官交一张空白单据就了事。

还存在其他许多适当的理由,但是都不太适用于克林顿的弹劾。事实上第一条的含义是广泛的,它包含了总统可能对大陪审团说的所有谎言。但是谎言如此之多,试图将其明确化(或收录在每一单独的罪状中)将会阻挠诉讼程序——记得民主党还要加速完成该程序。如果认为一旦谎言已弄清,第一条就不会被忽略,这是不现实的。第三条一点儿也不含糊。

总统的律师认为,支持人再三宣称总统在琼斯案的证词中撒了谎,这已完全超出了第一条的广泛边界,即使众议院已投票否决了提出的指控撒谎的弹劾罪状。此观点错误地看待了投票否决该罪状的理由和总统证词及大陪审团证词之间的关系。该罪状被否决不是因为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总统在证词中未说谎,而是因为他们怀疑这些与小小一个民事案件不太相干的谎言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这些谎言对第一条关于对大陪审团的撒谎指控非常重要,因为总统不断对大陪审团重复其证词证言,而且信誓旦旦地宣称其真实可信。只有在证词证言中包含谎言时,这些谎言才会成为谎言。

## 第四章

# 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

从道德角度对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事件进行明智的评价需要区分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前一用语是指在不考虑其职位或工作的情况下某一社会道德准则施于人们的责任,后者是指道德准则施于那些占据特定职位(并不一定是公共职位)的人的责任。律师有其特殊的道德责任——“法律上的道德”的范畴——这是鉴于他或她的职业而形成的,同时,他们还需承担社会上所有人共同承担的道德责任。对于其他各个职业或行业来说,也都具有这两方面的内容,包括对政治领袖这一职位的道德要求。

关于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的差别,特别是涉及政治领袖的道德问题,在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亨利·西奇威克,<sup>①</sup> 以及更近一时期的 F·G·贝利(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论述中都有所强调。<sup>②</sup> 但他们强调的重点都是这两种道德类型之间的紧张状态、冲突或者交换替代,比如,对一位领导人的与之角色相关的谎言、残暴的行为或

---

① 参见亨利·西奇威克:《实践道德》,第三章(1898)。终极目标的道德(如在《在巅峰的布道》中所述)与职责的道德(一名政治领袖所应具有的道德)之间一个相关的对比,在韦伯的文章《以政治作为职业》中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研究,重印于《马克思·韦伯文选:社会学论文》第 77 卷,第 117-128 页,(H·H·格斯与 C·赖特米尔斯译本,1946)。

② F·G·贝利:《欺骗与操纵:领导的艺术》(1988)。同时参见斯图尔特·汉普希尔、托马斯·纳格尔和伯纳德·威廉姆斯在《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中的文章(1978)。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间的紧张状态在 C·J·A·科迪的作品中被强调为“肮脏的手”,见《当代政治哲学词典》,第 422 页(1993),作为更大的议题的一部分,即道德的双关论(或“肮脏的手”),斯图尔特和其他的哲学家对此都进行了广泛的论述。

其他通常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都会参考其存在的理由而进行辩护。贝利辩称“领导人在各方面都与大学校长十分相似,无法逃避地受到他们的所作所为的污染,并且,由于领导的最本质特性是腐败,它所遵循的道德评价在这一点上与对恶劣气候的评判很相似。”<sup>③</sup>“领导……即是部分腐化堕落与道德败坏。”<sup>④</sup>“没有人能够在不玷污自己双手的情况下在政治上取得成功。”<sup>⑤</sup>这一点也经常用于对律师执业的评价,有许多涉及对克林顿总统调查和弹劾的律师的行为似乎可以作为引证这一点的合理例证。但是贝利有些过于大肆渲染了;一旦接受了我们必须有领导人的观点,那么与行使领导权密不可分“腐化堕落”就不应被视为真正的腐化堕落。<sup>⑥</sup>

我们会看到,这一限定条件结果正与克莱事件相关。但我想强调的是其他关系——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一直没有受到重视。这些属于附加的关系,即由于占据某一公共职位而对某人施加的附加道德责任(并非西奇威克和贝利关注的、或许是对不道德或非道德性的特许);从个人道德向公共道德渗透(何时违反了个人道德会污染到公共道德?);而且这种补偿关系——不是何时公共道德需要违反个人道德(西奇威克和贝利强调的问题),而是何时一种不相关的违反个人道德的行为被出色地履行公共道德赋予他的职责所弥补。最后一个问题表明了亚里士多德学派和康德学派意义上的“品性”的区别,前者强调成就,后者强调道德优秀。这一问题还基于马基亚维利的政治理论指出的罗马教与基督教关于美德的明显差异。<sup>⑦</sup>

为便于确定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之间的差异,需要再次考虑查

③ 贝利,上述注②,第9页。

④ 参见书目同上,第174页。

⑤ 迈克尔·沃尔泽:《政治行为:黑手的问题》,载于《战争与道德责任》,第62、66页(1974)。

⑥ 科迪,同注②,第423-425页。

⑦ 参见哈维·C·曼斯菲尔德:《马基亚维利的美德》(1996)。



尔斯·布莱克关于总统移居沙特阿拉伯以便拥有四个妻子的例子。虽然布莱克没有区分这两种道德,但这里存在着对道德准则的两个方面的违背。第一是一夫多妻,第二是时常离职。第一种是违背个人道德的,至少在最初是这样;绝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一夫多妻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不道德的,或者至少对于任何一个美国人来讲都如此,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第二种是对公共道德的违背;人们期望总统在美国履行他的公务职责,除了偶尔去国外的公务旅行。

但“第一种情况”的条件是重要的。符合美国的道德准则可能是一种与总统职位相关的责任,而且这种道德要求对于个人和公务员的个人生活也都是强制性的。娶多个妻子的总统可能会被认为违背了他的职责,其中,可以争论的是作为道德的典范——而非圣人,他可以因政治领导的粗暴和跌落而不合于圣洁,但应当是芸芸众生的一个好榜样,一个“角色典范”。如果这一点是对的,则其暗含总统个人的不道德行为(此处个人的含义指不牵扯行使政府权力)可能会违背与总统职位相关的责任和他个人的道德责任,虽然这可能取决于该行为是否会为公众知晓。在此我们可以有一个关于“不知道的事情不会伤害你”这一格言的实例。如果从来没有任何人发现总统道德方面的缺点,这些缺点就不会削弱他作为一个角色典范的地位。

## 一、个人道德

在克林顿总统向大陪审团作证后的悔悟阶段,克林顿及其辩护人对克林顿的行为究竟有何“错误”是模糊不清的。<sup>⑥</sup>这种模糊不清是有意的。他害怕承认他作伪证及其他妨害司法的行为。如果承认

---

<sup>⑥</sup> 以下是他的律师于1998年12月8日在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交的184页的情况摘要中所言:“总统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正如总统本人公开、痛苦地说‘不能凭空想像地说我是有罪的。’总统一直坚持认为法律不应允许对他在这一事件中的行为在简单的道德真理方面存在错误有模糊不清的认识;在他与莱温斯基女士的关系方面,他误导了他的妻子、朋友和他们的国家。”

了,不仅会加重弹劾法案的程度(虽然从目前来看这似乎会削弱政治案件的程度),而且还会作为他是否应当在普通法院接受审查的证据,虽然他也许会通过在离任前请求赦免转移这种危险;在最后一章我们看到,虽然不肯定,但有可能总统有自我豁免的权力。他承认的一切包括:一是未特别提及的与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性接触,二是通过在1998年1月21日和1998年8月17日公开地及私下地否认他曾与莱温斯基有过任何性关系,从而误导了他的家庭、朋友、内阁官员及其他下属和美国人民。

奇怪的是,他所承认的这些“错误”可能并不构成违背、至少不是严重违背个人道德或公共道德。虽然某些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宗教分子,认为口交、手淫(特别是相互手淫),无论是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以及使用某一物品作为生殖器的替代品是不道德的,但大多数人并不这样认为。口交,包括爱抚对方的性器官,“几乎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全球性技巧。”<sup>⑨</sup>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似乎都认为口交更接近于爱抚,而不接近于性交,既然如此,我不知道人们基于什么想法认为克莱二人的行为是“错误”的。正如我在第一章所明确表示的,也许有朝一日福利与公共卫生健康管理当局考虑到非计划性怀孕与性病传染的风险,可能会鼓励那些不想要孩子的夫妇以口交代替性交,这并非异想天开。

绝大多数美国人不赞成通奸<sup>⑩</sup>,而且其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一名已婚男性与一名他妻子之外的女性进行口交是通奸的一种形式。但是,如果受到压力,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可能会承认,他们的观点是建立在假定这位妻子不同意或如果她知道了会不同意的基础上的;而且并非所有的妻子都不赞成丈夫通奸。但越过这一可能是神秘的一点,对通奸的反对正由于对它的普遍性的认可而有所减弱。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就趋向于成为规范化。有相

<sup>⑨</sup> 爱德华·O·劳曼恩等:《性行为的社会组织:美国的性实践》,第107页(1994)。

<sup>⑩</sup> 同上,第22页。

当一部分男人都是奸夫<sup>①</sup>，包括受到高度尊敬的总统，如福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在他们当政时期因通奸受到的谴责比今天要强烈的多，所以进一步看，难以认定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之间的关系——从已发生的事情来看，是一种比性器官性交对婚姻危害更小的性方式<sup>②</sup>——对于一名已婚男子性器官性交是十分严重的道德行为。一个复杂的但我并不试图进行衡量的因素是，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之外的其他奸情，包括一些完全的性交行为；他在对波拉·琼斯案件非公开作证时承认与珍妮弗·弗劳尔斯有过性交行为。

许多极端的女权主义者认为，男性上司与女性下属之间的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性骚扰，因为他们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多数美国人在看到莱温斯基的证词后会反对这一观点。我在第一章中曾经提到过这个理由，在此无庸赘述，仅提醒读者注意，指控克林顿在与莱温斯基的关系上存在欺骗、诱奸、哄骗、利用、占一名天真无邪的女孩的便宜、报复、威胁或允诺都是不公正的。的确，这种关系对她来讲已经变成一场灾难。但克林顿不能被指控为故意不警告她存在这种可能性。他可能是疏忽，甚至鲁莽；但如果他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引发的后果略知一二，他绝不会与她有染。或许他应当预见到此事与波拉·琼斯诉讼撞车，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恰恰开始于该诉讼之后。但根据这一点应当指控他疏忽或莽撞，而不是性骚扰。<sup>③</sup> 克林顿是一

① 大约有 20-25% 的已婚男人如此，同上，第 213-216 页。

② 莱温斯基的朋友之一，即莱温斯基向其吐露她与总统的关系秘密的朋友推测认为这是由于克林顿“与希拉里有一个约定……你知道，他希望对妻子比以前更真挚些，而性器官的性交会使他的这一想法很难实现。”见《众议院报告》，第 316 号，第 105 届国会，第 2 会期，第 1 卷，第 1075 页（1998 年 9 月 28 日）。

③ 克林顿自认为是“朋友”的艾伦·德肖维茨认为克林顿决定与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是“鲁莽的”。德肖维茨认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行为比在椭圆形办公室与一名喋喋不休的年轻女子发生性关系更鲁莽。”但是，“当人们在过去成功的次数很多，得到即刻的满足和长期没有出现任何后果时，他们就错误地估计了一些细枝末节，继续着他们认为鱼和熊掌兼得的行为。”艾伦·M·德肖维茨：《性麦卡锡主义：克林顿、斯塔尔及逐渐显露的宪法危机》，第 7-8 页（1998）。“他[克林顿]希望得到可予以否认的性爱。而他得到的却是没有说服力的否认和不令人满意的性爱。”参见同上，第 7 页。

名充满智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且是一名有经验、成功的政治家,但即使睿智和有经验的人仍会做蠢事。在未来的许多年中,人们仍会绞尽脑汁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克林顿会使自己卷入与莱温斯基的纠葛——几乎与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一样的致命的迷恋,而且更缺少借口。

如果克林顿将与其下属发生性关系作为一种惯常作为,当然是应当遭到反对的,正如在美国法律和道德观上非常普遍认同的那样。这种行为将困扰那些未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下属,同时使她们感到焦虑不安;她们可能会害怕那些更殷勤顺从的同事占了职业性的便宜。他的男性下属也会产生这种想法。这会给办公场所平添一种得宠和风流艳事的气氛,损害了职业作风意识。(注意,这个例子跨越了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的界限。上司与下属发生性关系违背了上司的道德责任,但这是与公务性质相独立的一种违背。)有证据表明克林顿确实有这种行为。当然这就是莫尼卡·莱温斯基所认为的情形(她所点出的名字在公开发行的数卷证词中被不当地删去了),就像那些作证的侍卫特工部门官员一样。这是莱温斯基与翠珀交流的录音电话那个奇特的“毕业生”的定义的基础。但这一点并未得到证实,所以我不予理睬。

由于我拒绝在私通是否错误、口交是否错误或与下属发生性关系(除非是习惯性的)是否错误的问题上表态,我避开了克林顿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可能是最有意思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真实”、“客观”以及这些行为的道德帷幕。我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不存在解决道德准则标准的工具——比如美国人是否认为应当摒弃他们对一夫多妻、对损害女性生殖器官、对扼杀婴儿的敌意,是否拒绝人工流产、通奸、医生协助自杀,这些原因我在其他地方也争辩过<sup>①</sup>。即便我对宗教的怀疑有些过分,但如果对克林顿的惩罚是基于其未能与少数美国人认同的更高的道德准则相符,而不是基于他违背了现代美国社

<sup>①</sup> 参见理查德·A·波斯纳:《道德和法律理论中的疑难问题》,第一章(1999)。



会流行的道德准则,这也未免太不合适了,比如以是否符合天主教自然法则所隐含的即使是婚姻关系的口交也应予以谴责这一准则的观点决定予以惩罚。<sup>⑤</sup>

一旦我们将教义准则放在一边,与私通或口交相比,更不能算作“错误”的是克林顿对他的家庭、朋友、熟人、以及广大公众的“误导”。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被误导或者说没有给什么人(他的女儿除外)招致任何持续伤害的结果。很多人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他的抵赖,人们与克林顿越接近、越了解他的历史和癖性,就越不会相信他的抵赖。琳达·翠珀的录音带泄露的内容是具有说服力的;克林顿被指控的行为是符合他的性格特点的;而且,他最初的抵赖,即在1998年1月26日给人印象深刻的电视上的抵赖(“我没有与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⑥之前,是一种托词,是没有说服力的。现在,他的妻子在看到他的抵赖后应当非常了解他了。(如果这样的话,她则成了她丈夫欺骗阴谋的同谋。)<sup>⑦</sup>许多人深信不疑的,或许包括克林顿的律师、内阁成员以及其他克林顿的代理人和支持者在内,就是克林顿的谎言永远也不会被证明是假的;因为这些人不知道那条带有精斑的裙子;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或者他认为她一定把它清洗掉了)。也许国务卿和其他高级官员在暗暗坚信克林顿(这些都是深思熟虑的人)的同时,认为为了国家的声誉和安全而避开谎言。但

⑤ 将该教义适用于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之间的调戏,威廉·贝内特说关键的问题是“总统[与莱温斯基]性方面的表现更像一只山猫,而不像一个成年人。”威廉·贝内特:《残暴的死亡:比尔·克林顿及对美国理想的侵犯》,第25页(1998)。猫也会口交吗?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但我认为贝内特的意思仅仅是说动物没有性礼仪的意识。很巧,贝内特是波拉·琼斯案件中克林顿的律师的哥哥(罗伯特·贝纳特)——令人想起在南北战争中兄弟之间厮杀的情形。

⑥ 《向美国众议院提供的报告的附录》,《众议院报告》,第311号,第105届国会,第2会期,第2卷,第1961页(1998年9月18日)。

⑦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年1月27日的电视采访中,她否认她丈夫“在白宫有私通行为并且以谎言对此进行掩盖”并支持将指控视为“一个极大的右翼阴谋。”但她也说,如果该指控被证明属实的话,那“将会成为十分严重的犯罪。”参见同上,第2卷,第1973、1974页。她是真有此意吗?如果是真的,她会改变想法吗?她没有表白。



他们并没有这样说,而且也很不令人信服。这并非意味着他们应当感到有必要辞职。如果有足够的政府行政部门人员提出辞呈以示抗议,总统是可以被迫下台的,但这是一种违宪的免职方法。这与议会的不信任投票类似。惟一符合宪法规定的、迫使总统下台的方法是弹劾。但克林顿总统的内阁成员可以闭口不言,正如他们当中的一员所为,这样不会危害国家利益。而那些不断重复克林顿关于与莫尼卡·莱温斯基没有不正当关系的抵赖言辞的人只能被看做总统诡计的牺牲品。

他的女儿可能会相信他的抵赖。孩子们都希望往好的方面去想他们的父母。但如果克林顿认为他可以使她信服他的抵赖的真实性,而且认为他永远不会被迫收回这些抵赖,那么他可以不告诉她实情而避免伤害她。如果他知道事实将会被揭穿,那他则实际上在暗地破坏她对他的信任,并在她的眼中把自己勾画成一名谎言家和流氓而伤害她。但正如我所说的,他可能认为他会守住这个秘密,使实情不外泄。到头来,还有一些人相信阿尔杰·希斯不是苏联特工。

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克林顿可能铸成了一个谎言大错,即使成为他谎言对象的人知道他在说谎。但是他没有承认自己说谎,只承认误导。他很明智地承认了他的行为中关于道德的错误恰恰是程度最低的或许根本不能算作错误的那些方面。

但这也许是一种表面上的肤浅的明智。它使克林顿处于两条阵线战争的守势。一条阵线是道德,另一条是法律。克林顿通过承认他在道德上的错误行为,使共和党人将目光集中到法律上的错误行为,即妨碍司法。这样人们对克林顿的行为是错误的这一点形成了共识,成为基准。接下来共和党人再来推敲克林顿法律上的错误,而这一点正是克林顿进行辩护的弱点;在剥去克林顿的律师们的辩解和迷惑后,他们得出了可以进行辩护、但却不光彩的论点,即他的罪过还没有严重到将他从总统的位置上赶下去的程度。

一项克林顿没有表示歉意的对个人道德无可争辩的违背,是将其他人牵扯到他令人置疑的行为当中,使他们承担可能会发生的法

律方面的费用和成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他的最聪明的“牺牲品”就是贝蒂·苛莉,他可能将这个人列为(他肯定制造了这样做的表面现象)在波拉·琼斯案中妨碍司法的同谋,并且可以想像到此人被卷入随后大陪审团进行的调查,弗依·乔丹可能也是同样的牺牲品;还有总统的一名管家,或许他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包括苛莉在内,可能因向大陪审团否认他们知道任何总统与莱温斯基的性调戏而陷入麻烦。但是,或许任何接近总统的人或者至少是总统身边的人都在玩火,而且他们应当知道,因为:

君王之歿  
并非个人之灭亡,  
如同一个巨大的旋涡,  
殃及百姓,并被卷入。  
如同高山之巅的巨轮,  
轮辐悬挂着无数的小物件;  
当此巨轮轰然下滚时,  
她们也将同归于尽。  
国君从不独自叹息;  
当他叹息时,举国一并与其呻吟。<sup>⑮</sup>

但是让级别低的工作人员去预见为总统工作将承担的法律上的风险是不现实的。

将他人牵扯到刑事犯罪或有可能犯罪的活动中的行为,不是总统对个人道德的惟一违背之处。他诽谤莫尼卡·莱温斯基,把她说成是说谎者、是妓女。他放任或者说是主动鼓励了对波拉·琼斯和肯尼思·斯塔尔的诽谤,虽然看来似乎并不能肯定(尽管很有可能)这些诽

---

⑮ 《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三场。

谤是假的,<sup>③</sup> 我们或许应当维持审判。但他对莱温斯基的诽谤是假的。

克林顿通过他的辩护人鼓励作伪证的行为,允许他们在公开场合声称“没有任何人”会因他的这种行为而受到起诉。由于这不是实情,一些人可能发现他们由于受到关于克林顿的公开说辞的影响而入狱。克林顿不会因任何此类无责任感的言论而承担责任,但他应当对他的律师和助手的这类言论负责。他可以通过一句话来反驳。或者他公开声明,不必承认他作了伪证或阻碍司法,只是说明这些都是严重的犯罪,是要受到或正在受到惩罚。直至 1998 年 12 月,对此应当有充分了解的克林顿的一名辩护人公然将对克林顿的指控描述为“非常技术性的指控,普通公民是不会受到惩罚的。”<sup>④</sup>

克林顿的谎言的数量和厚颜无耻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在没有人相信他没有误导的情况下继续说谎,表现出对真理的诚实态度的藐视。这就是为什么谎言家即使在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说谎者之后而且没有人再受到欺骗时仍然受到指责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弥天大谎的技巧令人不悦,即使每个人都看穿了谎言。真实是一种非常重要

---

<sup>③</sup> 现在既然波拉·琼斯案已经结案,我们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是否她指控克林顿乞求她口交是真是假。但结案的情况表明(不可能用更强的字眼)这是真的。在 1998 年 11 月中旬,克林顿被迫离任的危险看来已经过去之后,此案以过多赔偿金额(85 万美元)结案暗示出其中的罪恶。克林顿一定认为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上诉法院会作出与地区法院相反的决定,将此案发回重审,他将会在审判中被击败;否则,出于辩护的原由——除去他名誉上的污点——他或许会为此一搏。

说波拉·琼斯关于克林顿乞求她进行口交的起诉可能是真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明她的整个故事都是真实的。莱特法官认定,琼斯夸大了她在这一事件中所受伤害的程度,以防止法官认为该事件有太多不合逻辑之处无法确认该诉讼是具有说服力的而驳回她的起诉。参见琼斯诉克林顿案,《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增补编,第 990 卷,第 657、675、677 页,21,678 页(阿肯色东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 1998 年判决)。莱特法官正巧是被布什总统任命为联邦法官的共和党人。

<sup>④</sup> 杰弗里·罗森:《以法律的名义,住口》,《纽约时报》,1998 年 12 月 6 日,第 4 版,第 19 页。“非常技术性的指控”随即所指的对象就是由另一名独立检查官提起的对克林顿前内阁成员迈克尔·埃斯皮的指控。但此篇文章明确表示的含义在于迈克尔·埃斯皮为克林顿呼吁使他不要受到弹劾,即对克林顿的指控性质与之类似。

的社会价值,所以我们希望人们尊崇它而不是藐视它。这也许是当克林顿拒绝承认他曾说谎时,那些他曾在被逼近受到弹劾时十分信任的温和的共和党人离他而去的原因之一。他抵赖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使人们看来似乎如同庞蒂斯·派拉特,他把真实当成一种纯粹的辅助价值。这使他不同凡响地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即使对那些从未听说过后现代主义的人来说也如此。<sup>②</sup> 这使人们想起暴君如何通过强迫他们的臣民对无人相信的谎言表示赞同而展示他们的权力,比如,该暴君和蔼可亲、国家是民主国家等。而且还使人想起克林顿善于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的悠久历史——对于征兵、对于吸食大麻、对于担任总统前的奸情。

克林顿希望不付出任何代价通过请求原谅和宽恕的行为使得赎罪宗教仪式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变得十分滑稽,<sup>③</sup> 这样又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虚假忏悔者的印象,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克劳蒂斯<sup>④</sup>。克劳蒂斯对自己的罪行是坦白承认的(谋杀国王并且与国王的遗孀结

---

② 共和党议员鲍伯·英格里斯在1999年12月10日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中,确实将克林顿攻击为与后现代主义者十分接近的“相对主义者”。但英格里斯毁掉了这一切,至少在我看来如此,通过追溯克林顿的相对主义到——奥里弗·温德尔·霍姆斯,此人用议员的话来说“基本上说的是让我们放弃对真理的追寻,让我们在人们中采用相对司法,因为没有可以发现的真理。”我发现将克林顿与霍尔姆斯的神话做比令人不解。

③ 参见《在白宫的审判日:一项发掘道德主题的关键宣言和对宗教的政治利用和滥用》,第11页(加布里埃尔·法克里编,1999);史蒂夫·克罗霍恩:《走入歧途的是克林顿,但公众是神人吗?》,载《芝加哥论坛报》,1998年8月23日,第C1页。琼·贝恩克·埃尔斯坦:《政治与饶恕:克林顿案件》,参见上述《在白宫的审判日》(第11页),将克林顿描述为“别致的忏悔方式……,以一种讨价还价获取公众注意、同情、甚至以牺牲品或使之成为牺牲者的地位交易的方式。”唐·布郎宁提到某些人似乎认为“如果克林顿承认了他没有那些被指控的事情,他将会被证明不存在对他实际指控的证据。”唐·S·布郎宁:《没有抓住克林顿的要点》,参见上述《在白宫的审判日》(第39-40页)。而且阿克希尔·阿玛对总统的评论也是“他滔滔不绝地大谈圣典,而不真正去做。”且阿克希尔·里德·阿玛:“克林顿为什么考虑休长假?”《新共和国》,1999年2月8日,第13-14页。克林顿的本堂牧师在他为宽恕总统所做的长篇辩解词中,淡化了总统行为的重要性,J·菲力蒲·沃格姆恩:《来自风暴的眼中:总统牧师的告白》,第57、132页(1998),而没有提供任何总统严肃忏悔的证据。他的书是一名牧师对他的教区教民中一员的简介,补充了律师对其客户的概括。

④ 《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三场。

婚,他们之间一直有奸情,甚至可以说是乱伦,暧昧关系),“啊,我的罪过极大!冒犯了天庭。”他试图通过祈祷得到饶恕,但也意识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

我的罪行既犯,那我应如何去祈祷才能获得赦免?

“请求赦免我狠毒之杀人罪”吗?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现在仍拥有我杀人之所得:

我的皇冠、我的地位与我的皇后。

假如罪人仍拥有他犯罪所得之赃物,

那他还能被赦免吗?

答案当然应当是“不”。克林顿也想既被赦免又拥有赃物。根据1998年11月的中期大选(许多暂时避开折磨的转机假象之一)的结果使得事情逐渐明朗,克林顿不会被逐下宝座,他便放弃了忏悔的行为,又回到了他原来微笑的自我。他由于DNA测试的结果不利而不是由于经历了良心上的谴责,才被迫承认了他与莫尼卡·莱温斯基的关系,而且他被迫披上忏悔的面纱的原因,是由于8月17日所做的、并无悔过之意的表白而导致的与公共关系的完全失败,而不是由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是说谎家和好色之徒。当突如其来的危机过去之后,装模作样的忏悔也随之而去了。

克林顿总统说服了那些天真的牧师参加他的赎罪仪式,把他们当成了傻瓜。在宣誓后不断重复谎言,他反复向上帝假意起誓——并且坚决地否认了他在说谎。他承认自己的罪过在于从事了仅仅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却无耻地否认了自己的罪过在于从事过已经被证明了的应受谴责的行为,拒绝承认他曾就与莱温斯基的关系向任何人说谎,在悔过之后,立即加倍努力避免由于他的错误行为引起受到不利结果的危害。有报道说,在参议院审查过程中,他——以极



为非基督教的方式——密谋对众议院检察官的报复。<sup>④</sup> 他炫耀他的虔诚,却给宗教带来了恶名。

克林顿对司法的妨碍,同样也是对个人道德的违背。这并不是说每一犯罪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从刑法来推导道德准则会本末倒置。法律将一些严重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虽然不是所有的严重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都被定为犯罪。但是法律还将一些在道德上的中性行为规定为犯罪,其中一些我在第一章中曾提到;一些曾被看做不道德的行为,已经不再被认为不道德了,至少在大多数人来看如此,比如通奸,在一些州仍然被规定为犯罪;<sup>⑤</sup> 而且许多行为,如加工变质食品或毒品,如果是故意这样做的,就是不道德的,而且即使是非故意所为也要受到刑事处罚。但是,故意妨碍司法在道德上不是中性的。

一些特别的法律,或者是这些法律适用于特殊的案件时,在道德基础上经常受到批评。许多人相信,对那些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传唤到众议院非美洲活动委员会作证而拒绝说出他们的朋友中谁是共产党员的人因藐视国会而进行处罚是不道德的。但克林顿总统并没有争辩他为了保护莫尼卡·莱温斯基的名声而说谎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而且他也不能有说服力地争辩在波拉·琼斯诉讼案中的疑点和政治经历能解释他为什么说谎,虽然人们可以认为这能解释他拒绝与她的律师合作。他的确辩称,即使总统也有某种程度的隐私,人们并不应当过问他的性生活,但这也不能为说谎开脱;惟一的开脱方式

---

<sup>④</sup> 理查德·L·伯克和詹姆斯·贝尼特:《顾问称,克林顿发誓开展强烈攻势赢得众议院多数》,《纽约时报》1999年2月11日,第A1页。

<sup>⑤</sup> 参见理查德·A·波斯纳和凯瑟琳·西尔曼:《美国性法律指南》,第7章(1996)。

就是拒绝回答问题。<sup>⑤</sup> 那些拒绝向众议院非美洲活动委员会说出名字的人并没有说谎；他们是在拒绝与他们认为虽然合法但不正当的行为——询问——合作。

既然所有这些关于犯罪行为的“道德抗辩”都不适用于克林顿案件，我们只剩下妨碍司法这个事实来考虑，无论是作伪证、买通他人作伪证、干涉作证都是严重的犯罪。<sup>⑥</sup> 同时，作为一名律师，而且是一名聪明的律师，克林顿不能以不知道（在道德角度可能是很好的理由，但在法律上很少如此）他的行为是妨碍司法作为抗辩理由。

但很多人相信，他妨碍司法的行为如果不能被证明事出有因或得到赦免，至少也由于这一系列情况也应该会得到谅解或宽恕。特别是人们将重点放在克林顿的检察官们对其最初的性方面的越轨行为和假定的恶意和政治动机，以及程序上的不当方面。法律界人士职业性的思维是，相信惩处妨碍司法的法律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支持着我们的司法制度，倾向于认为上述情况最大限度地缓解了克林顿行为的严重性，但是并不能原谅这个行为。然而，普通百姓中的大多数人，无论对错，似乎从更具有细微差异的角度去评价妨碍司法。（但其他人则是无情的、混乱的、无知的或无法无天的——让我们不要错误估计这些细微差别。）他们关心的焦点是看构成妨碍的具体行为和被妨碍了的法律程序的“司法”（以一种世俗的、而非法律的意识），包含了暴力、威胁使用暴力或行贿妨碍司法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而不必考虑它所妨碍的法律程序的性质。但如果像在克林顿案件中，最初就没有制定法律程序，那么芸芸众生在缺乏法律专业人士

---

⑤ “作伪证并不是被允许的对抗政府所提问题的方式。‘我们的法律制度规定对政府询问权提出异议的方法，说谎并不在其中’。”美国诉王（先生），《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 431 卷，第 174、180 页（1977 判决），同时参见西塞拉·伯克：《说谎，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第 176 页（1978）。前面，我提到过在拒绝回答等于承认情况下的例外。但如果克林顿在波拉·琼斯的律师问到他与女人的关系时告诉他们“不关你的事”的话，多数人会在考虑到他的脸面问题接受他的回答。

⑥ 参见，例如，美国诉曼德杰诺，《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 425 卷，第 564、576 页（1976 判决）（“虚假证词是明显的、不能容忍的对司法程序的基本概念的侵犯”）。

那种把遵守法律看成具有卓越价值益处的意识的情况下,则更倾向于饶恕。克林顿违反诉讼程序的是波拉·琼斯案件。我们不能肯定琼斯的指控中有多少是真实的情况;但无论多少,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她起诉的法律基础是不坚实的。而且对于这样一个不可靠的起诉,我们也看到,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之间的暧昧关系是不切题的——大陪审团对克林顿的调查被当成了波拉·琼斯案件证言的附属物。

人们很容易同情那些如果说出真相就会无端地被置于很羞愧的境地、如果不说出真相就会遭到惩罚的境地的人;这就是我们在观察克林顿的情形时虽然并非不可避免的却是可能的观点。人们会争辩说美国总统应当比普通公民有更高的标准,但这一争辩跨越了从个人道德到公共道德的界限。

考虑一下,如果进一步对总统行为的严重性采取忍耐的态度,公众对莫尼卡·莱温斯基给予各方面的豁免的反应,包括保守的共和党人的反应。对莱温斯基作伪证及使他人作伪证的证据比克林顿犯这种罪的确定性更强。作为给予豁免权的结果,莱温斯基将不会因此而受到惩罚。当然,人人皆知为了集中抓住真正首要罪犯,必须放过次要罪犯。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小罪犯并不成为同情的对象;他们仍然是被人憎恨的罪犯。许多人不喜欢莫尼卡·莱温斯基——但不是由于她像克林顿一样是罪犯,而是由于她促使形成历时一年的政治风波并成为其中的角色。或许他们也应当因她的犯罪行为而不喜欢她。但请记住我采用的是这个国家通行的道德准则的标准,而不是道德严肃主义者和许多法官喜欢强加给人们的更高的标准。

即使是法官,对民事诉讼中的伪证问题也存在某种矛盾心理。如果一个法官对另一法官说在他或她刚刚主持的审判中有几名证人明显在说谎,或者说证人似乎已经串通好了证言或者已经受过其律师的“良好训练”,这并不反常。我曾听说过专业证人是“被付钱的说谎者”。这些评价通常并不是以愤慨的口吻作出的,而且很少会导致

向司法部提起调查妨碍司法的可能性。这一反应的部分原因是基于在大多数案件中难以证明作伪证的行为,另一部分原因是法官像其他专家一样在道德方面变得越来越僵化。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存在一种意识,认为法院的制度已经被设计好了,或者至少是被发展得十分强大,不考虑众所周知的无效宣誓、威胁作伪证的诉讼以及其他妨碍司法的行为和这些犯罪频繁发生的结果。如果这些犯罪发生得不那么频繁就会好得多,所幸的是这些犯罪的社会成本较低、不那么令人害怕、与其他重罪相比危险性也较小。

但这种分析也是不全面的,不仅是由于总统在刑事案件调查中自己作伪证,而且在民事案件调查中也是如此。这种分析将法律程序中宣誓下说谎作为一种或然现象来对待,然而事实上这种谎言存在一个辐射的范围。它从公然无耻的谎言一端到虚假的“我不记得了”(如果证人确实记得,就是虚假的)的另一端。谎言越公然无耻,说谎者被控作伪证的风险越大。关于伪证的法律效力在此与关于干涉作证和买通他人作伪证的法律先后适用,所以会不断烦扰证人避开公然说谎而趋于丢脸的伪证范围。后一种谎言通常更容易让人抓到把柄。当一名证人作证他不记得那些显然他是记得的事情时,这种谎言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是无害的;从另一方面说,一种谎言如果以其不可信的方式出现就相当于实言。所以,关于伪证的法律的确在减少诉讼费用和不确定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通过停止作伪证不像通过转变其形式而使人们更容易看透的情形那么多。

总统的大多数谎言属于“我不记得了”的不同形式,但也不是他的所有谎言都如此。他否认他曾色情地接触过莫尼卡·莱温斯基不能因“我不记得了”而得到缓和,这会即刻表明事情的不正确性。<sup>②</sup>这不是那类由于透明度问题而不合逻辑的伪证。

---

<sup>②</sup> 他在大陪审团作证中的一点是,当他被问及莱温斯基作证他曾色情地触摸她是否在说谎时,他的确说这不是他记得的;但在作证的另外一些时刻,他抛掉了这些条件。除非他像唐·胡安一样杂乱无章,否则令人难以置信他会忘记这些细节。

我一直在强调伪证；但对总统的行为我们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估，充分注意到其他妨碍司法的行为，注意到其他公共的或是个人的谎言，注意到诽谤，注意到阻碍，注意到列出参加要求他人妨碍司法，注意到虚假的忏悔。或许最简单的衡量道德的尺度是总统展现了他从根本上缺乏道德勇气，这正是描述领导的道德尺度的克劳塞维茨所称的“勇气精神”，并将其定义为“承担责任的勇气、面临道德危险的勇气”<sup>②</sup>。关键问题是，总统对个人道德的违背是否可以成为弹劾总统和使他离职的公共尺度。

## 二、公共道德

### 执政的道德责任

在考虑与某一特定职位，比如为美国总统，相关联的道德义务时，我们必须区分该职位的执政道德责任和示范性的道德责任。前者是与执行宪法、法律和惯例赋予总统的各种行政管理任务直接相关的道德义务。这些任务包括指挥武装力量、管理对外事务、任命联邦官员、制定行政和立法政策、与国会合作、监督各行政部门，包括执法部门的运作情况。与这些任务相联系的道德义务（广义上的）包括勤奋、谨慎、公正、道德勇气、清廉正直、公平以及遵守基本的美国原则，如合法、和平等。至于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事件及其后果，我找不出任何与总统行政行为有重大关系的交点，直到1998年12月攻打伊拉克。

与神话故事完全不同，总统的任期及职权不是而且也不应当是其任职每一天24小时事无巨细地沉迷于工作。没有迹象表明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的事件减少了他奉献于公务职责的时间，也没有影响他抛开公务，即使在这一事件发生法律和政治后果最初的7个

---

<sup>②</sup>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02页（迈克尔·哈伍德和彼德·帕瑞特编，1976年）。



月也没有影响到他履行公务。<sup>⑧</sup>只有在弹劾隐隐呈现,以及其后投票时,危机才几乎完全消耗了他的时间和精力(虽然他的辩护人否认这一点)。如果说一名总统因受到弹劾和审判如此耗时就应当被判罪并革职,实在是强词夺理。同样不可能的是首席大法官的司法和管理职责如此耗费时间和精力,如果他必须主持长达几周的参议院审查,那么最高法院的运作或者联邦司法制度通常会受到干扰。是的,几个月,但没有理由使对克林顿总统的审查持续几个月。审查持续了六周,如果管理好的话还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内容。

如果不是因为波拉·琼斯案件和独立检察官对该案的妨碍司法的调查——两个诉讼程序对这个国家都可以是不必要的,总统与莱温斯基的性事件就不会有任何灾难性后果、耗时或其他问题。对国家财富来说,重要的是波拉·琼斯不能够表达她意识边缘的性骚扰案件(意识边缘的原因是总统提出的猥亵的要求并没有给她带来持续的伤害,<sup>⑨</sup>即使假设她正是受到了她所指控的猥亵),也不会使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公之于众。为了避免不适当地缩小选择公务员的范围,避免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增加不必要的痛苦和负担,应当允许公务员作为个人保留尽量多的隐私,除非为了使公众能够评估官员履行其职责的能力需要侵犯这种隐私。<sup>⑩</sup>

假如,当我们考虑个人在性方面的出格行为易使一名公务员受到敲诈时,会有潜在的极大的例外。克林顿就是使自己处在了莱温

⑧ 与参议员查尔斯·W·琼斯相比,此人自1885年“两年未参加参议院会议。他一直因与一名富裕女人相爱而苦恼,用他的一切时间在密西根州向她求婚。”J·帕特里克·多贝尔:《评判公务员的个人生活》,载于《管理与社会》,第30期,第115、130页(1998)。

⑨ 她可能因起诉总统而受到了持续伤害。这将与安布罗斯·比尔斯对诉讼的定义一致,即“一架你作为一头猪进去,作为香肠出来的机器。”《魔鬼词典》,载于安布罗斯·比尔斯作品集。第187、293页(1946)。

⑩ 如同在丹尼斯·F·汤普森所著《政治的个人道德准则与公职》,第5章(1987),最高法院在尼克松诉行政事务管理局局长案中对这一观点给予了适当的支持,《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433卷、第425、455-465页(1977年判决),判决认为前总统尼克松对他总统文件和录音带中纯个人的内容不为公众所知有极大的兴趣。关于尼克松案件的更多情况参见下一章最后一节关于责难的讨论(“处罚的均衡性和选择替代”)。

斯基可以对他进行敲诈的境地——而她也确实对他进行了敲诈，威胁他说如果她得不到一份好工作的话，就公开他们之间的关系。幸运的是莱温斯基不是外国间谍<sup>③</sup>或政府合同的垂钓者，或者希望谋求一个她并不胜任的重要的政府工作的人。

引起更多关注的是总统的谎言。也许“每个人都对性说谎”，但一名总统被抓到以极其的真实方式公然说谎就是克林顿在1998年1月26日的惊人之举，通过电视播映摇晃手指否认他曾与莫尼卡·莱温斯基有任何性关系，而且一直重复谎言，直至无可辩驳的物证被披露出来，因此又衍生出大量附属的谎言（比如否认曾经说谎），在公众已经不再相信这些谎言后还长时间地重复，这样的总统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发言可能不再会令人信服。克林顿的任何抵赖现在都倾向于被认为是一种对宗教的怀疑——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否认1998年12月对伊拉克发动轰炸攻势时间的确定是为了尽快转移弹劾的一种策略。<sup>④</sup>

现在，的确美国人不再相信政治家任何说真话的承诺。即使保守的道德主义者威廉姆·贝纳特都会说“大多数总统不会……在宣誓下说谎。”<sup>⑤</sup>他没有说大多数总统不说谎。并没有必要对此表示遗憾。可以争论的是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的率直、坦白，偶尔作为一种漂亮的战略，没有必要成为他述职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中公共道德的正确标准要“低于”个人道德的正确标准——在此领域确实说真

---

③ 当丑闻最初爆发时，阿拉伯世界的几家报纸指责莱温斯基这个犹太人是以色列情报机关的特工，被派来削弱克林顿总统的权威，以使他无法强迫以色列向巴勒斯坦让步。

④ 这场攻击发生在众议院计划对弹劾进行辩论的前一天，结束于众议院投票表决弹劾总统之后的几小时。总统在弹劾程序过程中非常缺乏信誉，以至于当他在参议院宣判无罪后很短时间就被朱妮塔·布罗德里克公开指控在很多年以前曾被她强奸时，他没有公开否认——这可能仅仅会使人们联想到他公开否认与吉尼佛·佛劳尔斯和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暧昧关系——但取而代之的是使记者认为是他的律师在抵赖。在此案中对律师的一句行话——“代言人”——的确十分恰当。

⑤ 贝纳特，见注⑤，第68页。

话的个人美德<sup>⑧</sup>或许是公共瑕疵<sup>⑨</sup>。正是克林顿总统谎言的数量、公开性、透明度、庄重性和天生无根据,包括经过宣誓的(是否在技术上为伪证——有些是,有些则不是)和未经宣誓的,使他不同于其他总统。是否他说谎的对象包括任何事情,如除了他的皮肤之外的琐事——加重了犯罪的程度。对于林肯或罗斯福来说,各自分别在内战和全球战争中说谎、甚至违反法律是一回事,而不那么重要的人物在比较平和、非困难时期为了个人得失说谎则是另一回事。没有人认为林肯或是罗斯福因为违反了法律或道德应当引咎辞职;许多人则认为克林顿应引咎辞职。即使是尼克松,甚至似乎更公平地说,里根在伊朗门事件中,可以争辩对在冷战中的不法行为给予原谅的原因;<sup>⑩</sup>克林顿则不能。

因此,克林顿的辩护人所争辩的是事实,即一名总统非法行使职权对国家的危险性要比他个人生活的不道德大得多,但不是全部的事实。同样真实的是,林肯、罗斯福和其他触犯法律的总统的辩护人都曾争辩过,这种非法行使职权给国家带来的利益大于其代价。这是个人不道德行为所无法达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争论总是令人失望的原因,因为没有人会认为林肯或罗斯福因为实施了触犯法律的行为而会被弹劾,也没有人会认为克林顿不会因为他的触犯法律的行为而受到弹劾。他的行为造成的都是付出了社会资源的成本而没有收益;他们的行为则是付出了社会成本,但社会收益更多。

离题的一点就是,争辩应当允许克林顿隐瞒他与莱温斯基的暧昧关系。我同意他应当如此,而且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就不用(更确切地说他不用试图去)就此事说谎,然后再对是否说谎一事说谎。关

---

<sup>⑧</sup> 本身过高估计,如大卫·纽伯格在《被掩饰的真理:普通生活中的真话与欺骗》(1993)的辩论。

<sup>⑨</sup> 但是,西格威克,见注①,否认这一点。

<sup>⑩</sup> 参见,例如迈克尔·J·马尔宾:《奉行法律与政治检验和平衡:在伊朗门事件中的法律与行政关系》,载于《被束缚的总统职权:法律对行政机构的约束》,第273、274-283页(L·戈登·克罗维茨和杰里米·A·拉布金编,1989)。

键问题在于,在1998年12月以前,就是他就此事说谎后的11个月,他的可信度降到了使他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受到损害的程度。这种可信度的降低不是由于他最初说谎,而是因为他顽固地坚持不出来澄清这些问题。

在此之前,正如我前面指出过的,他还表现出缺乏道德的勇气。克劳塞维茨认为道德勇气是军事领导的基本特质;而且总统是美国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但是一个人的道德特征是否趋向于统一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进而引发了他的行为构成道德上的一致性。<sup>⑨</sup>同一个人可能会在他生活的一个领域表现出道德勇气而在另一领域表现出胆怯,克林顿的个人行为可能不会是他职务行为的一部分,这一事件会促使人们认为,他在与莱温斯基一事上的道德胆怯而使得他在行使公务职权时也是道德弱者。

在公共事务中的克林顿与在个人生活中的克林顿可能的交叉点是他可以利用他的职位获取一些其他诉讼当事人享受不到的让步,比如他被允许在向大陪审团作证时有他的律师在场。最不可能的是莫尼卡·莱温斯基会因为她的前任恋人是总统而从里查森大使那里获得一份工作,或者从雷福龙获得工作机会。弗依·乔丹作证说他非常努力使莱温斯基得到那份工作,因为他试图帮助美国总统。

更有意思的一点是,作为结果而不是动机的是,总统的不法行为构成了一种与联邦政府第三分支的游击战,也就是否认了关于他应当有权得到民事起诉豁免直至他任期终止的争辩的联邦法院系统。最高法院称波拉·琼斯可以继续起诉总统。总统竭尽其所能搞跨诉讼以便使法院的行为归于无效。

### 模范道德义务

在克莱事件与公务行为的交叉点中模糊程度最低的是当莱温斯基正在爱抚他时,他与国会议员的三次公务电话。如果亚里士多德

---

<sup>⑨</sup> 参见波斯纳,前述注释⑭,第53页。



关于沉浸在性爱的欢愉中是不可能想任何事情的说法是正确的话,<sup>⑩</sup>那么克林顿是在允许他与莱温斯基的性事干扰公务。但是这些事件(以及其他类似的可能被认为总统违背了宪法赋予他的“注意法律被忠实地执行”的职责者)<sup>⑪</sup>的真正意义在于别处,即我所称的与总统任期及职位相关的模范道德义务。这些义务分为三类,虽然它们之间联系密切。第一类是关于总统作为角色典范的;第二类是执政的高尚品德;第三类是避免丑闻的重要性。

总统不仅仅是联邦政府的首席执行官,类似于议会制政府的总理;他还是国家的首脑;所以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国家首脑应当为全国人民树立一个极具威力的榜样。有一段时间离婚在美国受到指责,一名离婚男人是不能成为总统的。这并非由于某个人认为离婚会阻止一个人履行总统的行政职权。而是由于一名离了婚的总统会被认为是一个坏榜样。人们可能会说,“如果总统能离婚,我也能离婚。”今天他们可能会说,“如果总统可以成为一系列通奸者,还反复在宣誓下说谎,我也可以这样做。”

是否总统在可能实际影响其他人的行为这一意义(在我看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有关)上属于角色榜样我不知道。有可能认为存在于通常的道德范围之外,如同上帝在荷马神话中被构想为存在于人类社会的道德范围之外。上帝的行为准则不被认为是人类的标准规范,所以,或许总统的行为准则不能被认为是其他美国人的行为规范。荷马神话中的上帝比人类具有更大的威力,但在道德方面更质朴;或许我们应当开始以这种眼光来看我们的政治家。公民们越是瞧不起政治家,就越不会模仿他们的行为。人们会争论说今天的模范道德义务更坚实地与司法机关相联系,而不是与总统职位相联系。我在第三章中讨论弹劾犯罪的法官时曾提及这种可能性。

---

<sup>⑩</sup>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2卷,《道德论》,第1821页(乔纳森·巴恩斯编,1984年)。

<sup>⑪</sup> 《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



有一些总统是角色典范,乔治·华盛顿<sup>②</sup>和亚伯拉罕·林肯就是杰出的榜样。(在这方面,我们的第一位总统和现任总统之间的反差特别明显。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克林顿总统被参议院宣告无罪那一天正巧是林肯的生日。)克林顿作为一名总统在一个比较舒服的时代执政,从来也不像是一名相反的角色典范;他与自己性格特征缺陷有关的成就非常有限。虽然曾经有许多并不出色的总统,但很难想出在树立一个坏的榜样使相当多的人的态度和行为受到实际影响意义上的“坏的”角色典范——否则我们不会变得更糟的。格兰特和哈丁不是好总统,但是有人认为他们的“恶劣”损害了国家的道德大厦吗?我们似乎从未有过具有领导气质的坏总统,比如拿破仑或希特勒型的人物。有些人认为尼克松是个恶魔;他的罪恶是否磨灭了我们其余的人,降低了美国社会的道德格调?我并没有听到这种情况。尽管尼克松有一些不好的品质,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成功还是受到人们的敬仰。

只有憎恶克林顿的人认为他是可恶的,而且他们还没有证明自己有理这样认为。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因为克林顿的不法行为和不道德而崇拜或是嫉妒他,因为这些并没有产出任何成功和胜利,即使拿破仑或希特勒那种短暂的军事胜利也没有。克林顿的行为不端使得他不断陷入麻烦,运气(特别是与他的政敌们较量时)、技巧以及其他一些行为不端每次都使他给自己掘出一条路来,使他成为总统中的哈克·芬或是兔子。但对于他的违法行为、可耻的失败、能足以引起找到精神病学解释的性格缺陷就不尽然了,这些方面从某种程度上对他的成功是起到根本性作用的,如同林肯在内战期间非法中止了人身保护法,成为一种成功的、非常的、在道德和政治上合理的

---

<sup>②</sup> 参见,关于华盛顿的事业生涯和性格特征及其对我们的意义的非常精彩的描述,约瑟夫·爱泼斯坦:《乔治·华盛顿,一名业余活动者的观点》,载于《哈德森周刊》第51期,第21页(1998)。

拯救联盟的努力的重要部分。<sup>③</sup> 克林顿并没有因他的违法行为而受到敬佩。

威廉姆·贝纳特关于“克林顿的行为开始渗入文化”的例子是陈腐的：

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一个关于名为波比斯的汽车交易商的广告使用了像莫尼卡·莱温斯基的说法“喂，你好，我是新来的实习生……如果你希望在本周夜间得到服务，波比斯将一直开放至午夜。”（以“特务机关”特工人员为结束语）<sup>④</sup>

这个广告略显粗俗，但克林顿并没有发表粗俗的言行，而且粗俗的言行并不会构成对美国价值的威胁。贝纳特认为，这个广告不是道德败坏的表现，而仅仅是没有文化、缺乏典雅和教养——在这些领域欧洲胜于美国。但是发生的情况是，贝纳特不是欧洲教养的崇拜者。他说，美国人最出色的是“道德以一种不同于欧洲的方式作为我们政治和态度的中心。”我们的道德特色在于“将欧洲从纳粹威胁和铁幕中解放出来”（第 17 页）。这是不对的。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动机（可以说是主要的）与其说是出于道德的考虑，更不如说是因为国家利益。道德也不是我国的政治和态度的中心。自由和财富才是我们的中心。

这并不是否认克林顿所轻蔑的美国法治价值是美国成功中的重要因素；它们是使美国不同于其他多数国家的自由和财富的根本。因为美国社会是如此庞杂，以至于它对法律的依赖性非常强，以使整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贝纳特有一点是对的，就是“将克林顿先生的个人道德准则、以及对此进行的辩解合法化会使严肃

---

<sup>③</sup> 《宪法》允许在动乱期间中止人身保护令，《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第二项——但是是由国会中止，而不是总统。

<sup>④</sup> 贝纳特，注释③，第 43 页。

的事情变得滑稽的一种嘲弄,而且令人害怕。”(第 131 页)。但除了好莱坞的几个自作聪明的人之外,没有人会做这种事。克林顿的行为几乎遭到了全球性的谴责,即使那些看来并不十分可怕的方面也难幸免。关键问题是,对此进行惩罚的严厉程度如何。贝纳特暗示的是,允许他完成任期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他的行为”以及这样做“会成为他谎言的同谋。”(第 130 页)

威廉姆·贝纳特和罗伯特·博克这样的道德主义保守者认为,美国在道德方面正在衰败。他们指出离婚率、犯罪率、高比例的婚外出生、以及其他的类似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确比四十年前要严重得多。但在这一时期,美国总统在总体上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的人。贝纳特举例说艾森豪威尔、卡特、里根,还可以很容易地举出福特和布什,而且如果算上明显的道德品质,肯尼迪和约翰逊也应包括在内。在受到非难的大本营中,只剩下了尼克松和克林顿。具有良好或者至少看上去良好品质的人被指责在道德日下的年代执政,而克林顿执政时期不仅超乎寻常地繁荣,而且多数领域的社会指数都取得了标志性进步。<sup>⑤</sup> 很难让像贝纳特这样虔诚的人相信,没有强烈的道德严肃性意识的人能管好自己,但显然他们能够管好自己。

诚然,如果将比尔·克林顿与乔治·华盛顿做比较,或将第一百零五届或第一百零六届国会与第一届国会进行比较,你永远不得不带着假笑说:“我们走过了漫长的路,宝贝”。如果这个国家的缔造者渴望某种与共和罗马相匹敌的成功,我们目前的政治阶层就应当与罗马政体的后期阶段相比较。但贝纳特和博克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

---

<sup>⑤</sup> 明了的图解概括。参见卡尔·津斯梅斯特、史蒂芬·穆尔和卡林·鲍曼:《美国正处在转折点吗?》,载于《美国企业》1999 年 1/2 月合刊,第 36 页;同时参见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美国没问题》(《新共和国》),1999 年 1 月 4 日和 11 日,第 19 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黑人未成年生育和非婚生育大幅下降的时期,这一时期大幅下降的还有人工流产率、未成年人性行为、离婚、依靠福利生活的人员比例、黑人贫困问题、犯罪(包括杀人和其他暴力犯罪,以及财产犯罪)、未成年人自杀、辍学、联邦政府开销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以及当然应包括的联邦赤字。

美国这个国家是颓废的,或者进一步说,由于可能会受到腐蚀政治阶层的重要组织的道德和知识的腐败影响而产生严重的危险。

相关的一点,但我认为是有区别的一点,即关于坏的角色典范是美国人对个人不当行为甚至对其职位受到敬慕的总统行为的忍耐程度的有限性。如果总统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普通人认为非常严重的罪行,而不是法官和律师认为的——即使是非常个人化的罪行,人们也难以容忍。他要么会按一般刑事司法程序受到惩罚,然后因完全不胜任而受到弹劾并被革职,要么在一般惩罚之前先受到弹劾并被革职。不能忍耐的行为会使总统完全失败。克林顿总统的行为在多数美国人的眼中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在受爱抚的同时与国会议员电话通话甚至连轻微犯罪都够不上;但却表现出对总统职位的极度不尊敬。据说里根总统在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前总要打上领带,以示对总统职位至圣的尊敬,对我们文明宗教信仰的礼拜。<sup>④</sup> 总统一直被称为“美国文明宗教信仰的高级牧师”。<sup>⑤</sup> 可以不夸张地讲,克林顿总统以他在办公室通道的小丑行为、与莱温斯基的性行为以及为国会议员的电话通话、招募贝蒂作为一种老鸨、看守者和侍卫特工人员的躲避行为、时常的胡闹行为玷污了椭圆形办公室。克林顿对总统职位的不尊敬,特别是将此与他表现出来的、反复嘲弄法律和公然说谎对法律的不尊重结合起来,构成了对美国政府的利用,以及对最基本、深受敬爱的标志的严重冒犯,这可能是总统制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试想一名总统在白宫的前门廊小便或是焚烧美国国旗;这些行为可以被认为是克林顿所为的暗喻。他在对 1998 年 11 月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向他就他所述事实紧追不放的提问做出反应时,各种愤怒融为一体,他又一次重复了谎言。至

---

<sup>④</sup> 这是在克林顿事件中出现的另一具有讽刺意义事件,莫尼卡·莱温斯基选择领带作为合适礼物送给她的恋人们,因为她在大学期间在一家领带商店工作而获得了专业知识。

<sup>⑤</sup> 罗伯特·肖干:《双刃剑:性格品质是如何造就和毁灭总统的,从华盛顿到克林顿》,第 2 页(1999 年)。



此,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会怀疑他说了谎;在不断重复的谎言中,他将自己置于国会和美国人民的嗤鼻之下。

基于克林顿对自己职位和在政府中行为礼仪的不尊敬,可以提出有关弹劾和定罪的最有力的案件。<sup>⑧</sup>但是,无论是斯塔尔还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多数,都没有试图这样做。这也许是马克思·韦伯关于领导气质和理性的概念能帮助我们看到人们对政治领导的期望转变的信号。当人们茫然和恐惧的时候,他们希望相信他们的领袖是具有超人本领的人,这样他们可以安全地信任这些领袖来解决困扰他们的众多问题。<sup>⑨</sup>他们寻找一位具有领导气质的领袖、一位权威人物、一位伟大的父亲、“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领导者、一位将人们对政治前景的希望和恐惧结合在一起的人。”<sup>⑩</sup>(有时一个疯子可能最适合这个描述!)<sup>⑪</sup>当人们繁荣、安全、成熟、自信,正如现在美国人中占前所未有的多数人一样,他们寻求,而不是崇敬领导——不是使领导地位成为事实——而只是令人振奋的政策和理智的管理<sup>⑫</sup>。他们(他们是成熟老练的)知道多数总统都是非常普通的人;知道即使是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人也不像传统上描述的那样出类

---

<sup>⑧</sup> 此时,他的信誉度已经因他反复的谎言而受到了危险地侵蚀,将弹劾建立在如果更早些就有这么明显和充分的理由上显然太迟了。记住,众议院批准的进行弹劾的条款是指控向大陪审团做伪证和其他妨碍司法的行为。众议院没有批准的弹劾条款是关于在波拉·琼斯案证言中作伪证和在回答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向总统提出的 81 个问题向委员会说谎。

<sup>⑨</sup> “在悲伤失望之时,我们向领导权威求助。”罗纳德·A·海费茨:《没有容易答案的领袖问题》,第 69 页(1994);同时参见同上,第 65 页。这种对领导的被动顺从性的态度在卡夫卡的道德小品文中有相似之笔,《拒绝》和《我们法律的问题》,参见弗郎兹·卡夫卡:《完全的故事》,第 263、437 页(内厄姆·N·格拉策编,1971 年)。

<sup>⑩</sup> 詹姆斯·大卫·巴伯:《总统的性格:预测白宫的工作情况》,第 4 页(1972)。

<sup>⑪</sup> 罗伯特·S·鲁宾斯:《关于精神病理学和政治领导的话题介绍》,第 1、18-20 页(1977)。

<sup>⑫</sup> 约翰·R·扎勒:《莫尼卡·莱温斯基对政治学的贡献》,以及《政治科学与政治》1998 年 6 月,第 182、184 页,类似争辩在感觉到莱温斯基的丑闻是由于事实上今天“公众的关注点仍保持在一些由和平、繁荣和现代化组成的基本的标准线上”时,克林顿的声望并未减退。这是扎勒对于智慧和品德的进行区分的想法。



拔萃;知道具有领导气质的领袖经常是危险的;而且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对政府领导水平的多变是非常有弹性的。他们看出克林顿在通常意义上是符合要求的、表达能力强的、具有智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具有灵活性的、而且(如果仅仅是间歇性的)熟练的专业政治家和一个或许是卑鄙之人,但不是危险之徒或极端分子。无论适当与否,尼克松被认为是危险的,而且在他跌落之后,制定了很多旨在限制总统权力的立法,<sup>⑤</sup>虽然这其中的部分原因由于林登·约翰逊对越南战争的高压和隐秘行为。克林顿的失宠更倾向于引起明显允许《独立检察官法》终止的措施,旨在增加总统的权力。许多对克林顿无用的人害怕可能对总统的弹劾和定罪产生动摇效应。他们认为使这只跛脚鸭革职,继续由受到反对派控制的国会的牵制,不值得承受这种干扰。他们认为成本会超过收益。

总统的最后一项模范道德义务是最简单的;即避免会发生影响总统有效性的丑闻。即使许多人不会、也不应当会在意总统是否是角色典范,也不会且不当会在意保持他职位的尊严,即使总统应享有保护个人隐私的有效措施,即使克林顿总统具有非常训练有素的头脑,使他可以避免发现自己与莱温斯基事件的灾难性后果而陷入的困境所产生的迷惑,以及这一切造成的精力分散和耗费,一名总统有责任避免陷入有可能削弱他的有效性的丑闻。无论是否适当,克林顿的行为使该事件有悖于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事件和态度的背景造成了削弱总统职能的爆炸性丑闻的很大风险。在这种冒险中,为了完全是为得到个人的享乐(暧昧事件中偷情的欢娱),总统展现出高度的个人不负责任。这是一种个人的失败。我想强调的是避免丑闻也是一项公共职责——是有效履行总统的其他公共职责的前提条件。克林顿总统花费在值得开销的总统项目和政策上的政治资本不得不转移和分散到挽回他的政治脸面方面。

---

⑤ 詹姆斯·L·森德奎斯特:《国会的败落和再起》,第2部分,(1981)。

### 三、通过成就弥补？

总统的行为违反了公共道德。其严重性还有待讨论。但是即使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还必须考虑它们与总统其他方面的品质或成就相比较，看是否可以得到开脱。这种补救的情况可以以若干种不同方式形成：作为平衡道德弱点和道德力量的需要；作为对人类天生的弱点（“原罪”）的认可；作为一种坦白的道德弱点和人类活动其他方面的力量的实用主义平衡；或者作为对与基督信仰和康德主义相区别的希腊式（包括前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品格概念的接受，不再明确区分道德与其他品质之间的界限。<sup>⑤</sup> 第三与第四种形式是重复的，因为一位总统的道德义务包括诸如精明、深谋远虑和判断力这些与其说是道德品质不如说是一种天赋和才干方面的东西。

对克林顿的总体看法是，在经历了多桀<sup>⑥</sup> 起点之后，他开始在有效履行该职位的行政职责方面变得（至少是到他轰炸伊拉克并受弹劾那周之前）成为一名好的总统，而且能够予以保持。而且这些职责，如我们较早看到的，具有道德的特征。即使是在模范道德品质方面，克林顿也不是一名完全的失败者。许多美国认为他是一个在诸如同情心和忍耐力方面有效的或者说是诚挚的榜样，而且是一名对许多传统美国价值的雄辩感人的或可能是伪善的代言人。除了这些积极的道德品质之外（虽然很多人认为他目前由于被充分印证的道德失败而过于沉重，但仍不应忽视这些积极的道德品质），克林顿还显示了他的智慧、精力充沛、灵活性、想象力、巨大的弹性，以及与外国领导人确立亲善关系的能力。也许美国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取

<sup>⑤</sup> 参见例如，J·帕特里克·多贝尔：《领导者的政治才干和道德品质》，载于《公共管理论坛》第58期，第74页（1998年），列举并讨论了一系列可以合理地向领导者提出的伦理和才干方面的要求。

<sup>⑥</sup> 在《克林顿的总统生涯：首次评估》（科林·坎贝尔和伯特·A·罗克曼版，1996年）中做了充分论证。

得的大多数成就能归功于克林顿的不多。那么如果乔治·布什在1992年再次当选或者鲍伯·多尔在1996年当选,如何得知这个国家今天不会那么稳定和繁荣呢?如果有人回答“非常有可能”,那他一定是疯狂的党派主义者。但任何明显的失败都会归责于克林顿,而不考虑这些失败的因果关系。当我们来评价总统、将军以及其他复杂和具有不确定投机性的领导人时,我们对古希腊关于好运气值得表扬、坏运气值得责怪这样一种态度,不仅仅是留有这种痕迹,而是更有甚之。

但是同时更加难以解决的、已经使人气馁的复杂任务就是对这个总统的评价,我们必须考虑他与莱温斯基事件以及其后的调查中他所展示的糟糕的判断力——如此糟糕以至于动摇人们对他执政能力的信心。他在以下几方面都非常蠢笨:将自己的信任建立在莫尼卡·莱温斯基个人的谨慎和选择之上,他在开始两人的关系时对她一无所知;未能采取更有力的预防措施避免被人发现;未能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事件会引出波拉·琼斯案件;未能在琼斯的律师作证前解决这一案件;未能以少量金钱和较少的政治成本冒险采取对他进行的缺席审判,拒绝回答波拉·琼斯的律师提出的关于莱温斯基的问题;同意他在陪审团面前露面并说谎而不是拒绝回答关于性的问题;<sup>⑤</sup>未能在他向大陪审团作证后向所有人作出适当的令人怜悯的道歉;在向大陪审团作证的当晚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讲话时,没有利用一些时间冷静地仔细地考虑一下他的处境;以及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建议弹劾之后继续重复他不可信的抵赖,这似乎是事先设计好要将希望他承认说谎的温和的共和党人驱开。

他的一些其他的策略可能是明智的(虽然令人讨厌),如在丑闻最初暴露后试图厚颜无耻地摆脱掉,并将肯尼斯·斯塔尔描绘成一个恶魔。迪克·莫里斯当晚主持的关于发生这一丑闻的新闻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如果新闻是真的,希望克林顿离职。

---

<sup>⑤</sup> 这可能是他在整个混乱事件中所犯的惟一的最大错误。

此后,当新闻的惊人价值随着时间推移而慢慢消失,他们改变了想法;但不能因克林顿没有预见到这一点而批评他。我所列举的错误不应当再被解释为聪明的策略,然而这些错误削减了人们对克林顿应付国内危机或者是国际危机能力的信心。可以争辩的是,总统与莱温斯基有关的行为以及其后的调查和弹劾程序中的表现是如此奇怪和令人吃惊,以至于我们无法再相信他可以称职地履行他的公共职责的能力。如此奇怪和令人吃惊的表现可能会使我们更容易相信某些关于他滥用职权的指控,如在1998年12月轰炸伊拉克是意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弹劾程序上引开,还有白宫将敏感军事技术出售给中国以换取对1996年连任大选活动的非法支持的交易。

但我对这种“一概”的论点曾提出过疑问——即一个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一个整体,所以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表现可以可靠地从其个人生活表现中预见到。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或特别对一名总统的所有品质的评价,而不是狭窄地对道德的评价,是公平地考虑“性格品质”的各个方面,而且应当相互补充,这样不好的品质就会被梳理出去从而形成一个概括性的评价,谁会说克林顿总统是如何“坏”的一个人?有一些犯罪和不道德行为是非常过分的,以至于它们不仅会明显地超出此人的优良品质,而且会阻止我们进行必要的道德上的衡量。如果说希特勒“对,他是一个魔鬼,但他至少应当由于修建高速公路、他的修辞学技巧、以及他对动物和他母亲的爱而受到某些赞许”,人们会感到这种评价很糟糕。克林顿的恶劣行为没有上升到美国人拒绝衡量一个人的优良品质与不良品质的水平。或者我应当说还没有上升到这样一个水平。一些笼罩着克林顿的道德品质方面的阴影,一些无关的或仅仅与他和莱温斯基的事件有一点点相关的阴影还有待于驱散。当一切都成为众所周知时,可能会显示出克林顿是对公共道德的违背比至今公共记录所确认的更严重。

如果试图对克林顿总统的品格进行全面的评估,将他简单地看做把这些因素都可怕地混合起来的人的难处在于:他的不知羞耻、他明显地缺乏是非之心、他的自我热衷、他显然相信目标的调整应适应



手段,即使当目标是使他的历史名声增辉的很不错的目标。<sup>⑤</sup> 还有比性淫乱和说谎的恶习更深的品格方面的失败。奥古斯丁主义者相信,由于我们都背负着原罪的负担,没有人可以达到道德的完美。但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承认我们的不完美,真诚地悔悟因我们的不完美而引发的不良行为,并为改善我们今后的行为做出有意义的努力。这种对于道德发展的能力似乎从克林顿总统的性格特征中失去了。这种特征的缺乏在他 1998 年 8 月 17 日在向大陪审团作证之后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很显然他承认与莱温斯基的关系的原因仅仅是由于这一点已经被不可辩驳的物证所证实(他的猜测是正确的);而且他对被抓获的反应是愤怒,而不是羞耻;他还将在物证不会证明与之相反的内容的限度内继续说谎。在其后的数月中,随着谎言的证据不断增加,谎言变得更加厚颜无耻;白宫关于诽谤、宣传和假情报的组织机构表现得非常积极和不讲道理;总统的法律辩护更是复杂、乖戾、微不足道和极端技术性的;他的道歉也是敷衍了事;他的随行人员更是令人厌恶。

品质的微积分可以取决于他如何衡量构成一名政治领导人的品质的各项因素。如果你同意亚里士多德(以及威廉姆·贝纳特)关于政治的重要性或许是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促进道德品质的升华(柏拉图、卡尔文、卢梭和其他许多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有更深刻的叙述),<sup>⑥</sup> 或者同意亚当·斯密关于有效的政治领导取决于在仰慕基础上产生

---

⑤ 威廉姆·贝纳特提供了以下关于克林顿品格的概括性评估:“他有计划地利用女人,然后毁灭她们。他藐视真理和辩论的意义。他极端地降低了我们认为可以允许和原谅的行为的标准。他希望操纵并且破坏基督教的宽恕来达到他的个人目的。他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我放纵的人、他还是自我热衷、永远苦恼、经常成为牺牲品的人、一个比犯罪更具有犯罪性、从不对他发现自己陷入的麻烦负责任。他经常性地让别人为他的恶劣行为付出昂贵的代价。作为一个具有巨大政治潜力和相当的魅力的人,他是有意出现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中的。”威廉姆·J·贝纳特:《我们学到的东西》,载于《华尔街日报》,1999 年 2 月 10 日,第 A22 页。

⑥ 为了对讨论有帮助,参见马丽·P·尼克尔斯:《公民与政治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第 5 章(1992)。



的权威,你就会倾向于更严厉地评判克林顿,采取(意大利政治家)马基亚维利的观点认为政治的目的应当是将一名通过智慧、狡诈和无情能使他的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有效地增加本国利益的人放在一国的首脑的位置——虽然甚至连柏拉图也认为政治领袖有权说谎。

然而,人们怀疑马基亚维利会真的赞赏克林顿,将所有的文化方面的差异放在一边。马基亚维利的观点不是像有些时候人们认为的那样是超道德主义者。这实在是具有特定的公共道德概念的人的观点,是建立在一种对政治的严厉的现实主义评估之上的。这种观点能够帮助我们看出作为一种力量的有机部分的性格缺陷相对于与力量无关的性格缺陷来讲,更容易在道德方面得到证明。当为了国家的利益需要采取强硬的措施时,残酷无情是一名政治领袖取得成就的条件。这样无情就使得强硬成为公共道德强加在他身上的一种责任,如果这样还要“责怪”他具有这样的品格,那就是伪善了。好色和对此说谎并不能以这种方式证明它们本身是有道理的。这些似乎更应当是一个受到挫伤的人格碎片。(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克林顿是自尼克松之后具有最反常人格的人。)克林顿不是在为了国家说谎。更算不上是在说柏拉图的“高贵的谎言”。

我刚才详细说明了这种“分离论点”可以解释我们对因其真挚地热爱动物等而表扬希特勒的不舒服的部分原因。建设封闭式的高速公路、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受到孩子们的喜爱,都不需要发动侵略战争和犯下大屠杀的罪行。类似的是,预算的平衡、改革福利、以及支持死刑也不需要作伪证和调戏妇女。这里我们有一个解释这种不舒服的线索就是道德主义者中的实用主义,这是我下一章进一步解释的问题。有些关于宽恕甚至因为魔鬼的才艺和成就而减轻魔鬼的罪恶的问题没有解决,除非使之成为魔鬼的因素(或许完全与公众的观点无关,或者完全缺乏怜悯)是其成就的基础,这样我们可以说他具有力量的弱点。

与亚里士多德和马基亚维利截然不同的第三种与政治领袖的品

性相关的立场是洛克(英国哲学家)的观点。在主张要严格限制政府角色这方面,无论对基督教还是罗马教,他含蓄地“放弃”了对统治者崇高道德的探索。洛克的观点与《宪法》的起草者的思想最一致,同时这种观点本身也是最容易向大多数的现代美国人推荐的,尽管后者比前者要更坚定。美国人对建国阶段的思想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在乔治·华盛顿这个人身上、在汉密尔顿的总统制观点方面和频繁的对理想、英雄特质甚至是军国主义的呼吁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sup>⑤</sup>——亚里士多德主义与马基亚维利主义构想的融合。<sup>⑥</sup>目前,这种融合已经非常没有生命力了。今天的美国人既不感到有备战要求而需要一位马基亚维利式的总统,也不指望政府将国家从道德堕落中解救出来,甚至不希望政府由那些比他们自身道德水平更高的人组成。<sup>⑦</sup>“关于国家的浪漫浮华”<sup>⑧</sup>使他们冷漠。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同意威廉姆·戈德温“寄希望于人类永远不会通过如此不适当的渠道(政府)吸取如此重要的经验教训(什么是高尚的道德,什么是犯罪。)”<sup>⑨</sup>

他们对总统“品格”崇高的要求无外乎其行政能力和敏锐的识别能力,不会通过他的个人或政治行为阐明社会的法律或道德结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政治不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他们甚至不会在意总统在做什么。只要他不勒索他们。”<sup>⑩</sup>这一切应当归功于这个

<sup>⑤</sup> 参见,例如卡斯·R·桑斯坦:《在共和党人的辱骂之外》,载于《耶鲁法律期刊》第97期,第1539、1564-1565页(1988年)。

<sup>⑥</sup> 首席法官G·A·波科克:《马基亚维利主义的时刻:富鲁廷思潮和大西洋共和党人的传统》(1975)。

<sup>⑦</sup> 这两点是相联系的,“在战争时期共和党人的高尚道德……得到了最强有力的体现;正是战争将市民们团结起来为了公共利益贡献力量;而且即使在和平时期因为个人利益从属于共同利益,也正是战争可能会作为一种榜样。”桑斯坦,注释⑤,第1564页。

<sup>⑧</sup> 科迪,上述注②,第426页。

<sup>⑨</sup> 威廉姆·戈德温:《关于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的咨询》第2卷,第303页(普里斯特利编,第三版,1946)。

<sup>⑩</sup> 《羊年》,《美国企业》1999年,第1/2月合刊,第23、25页(安德鲁·弗格森的话)。

国家的建立者,由于他们受到古典政治道德观念的感染和影响,<sup>⑤</sup>设计了一种能够成功地由一些并未很好地献身于这个政府的政治家来运作政府体制。

说到“美国人民”的追求、需要等等问题,我在此和其他地方必须十分谨慎。公众关于本书讨论的大多数问题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甚至也不会很容易地将这些观点分为二组或三组思潮。不可能简单地将“人民”分成痛恨克林顿并希望他离职的人,喜爱他(或者痛恨他的敌人)的人,以及认识到他性格缺陷、但认为这对他履行公务职责并无重要关联,不至于迫使他离职的人。人民还包括那些对此麻木不仁者、敬而远之者、迷惑不解者、“不协调者”、“目无法纪者”,<sup>⑥</sup>还有很多人说如果他们知道他的真实面目就不会在他第三次竞选总统时再投他的票,但倾向于忍耐他两、三年,不要中途换马。

所有这一切表明,通常概念的品格仍然是一名总统的有价值的财富;实际情况仍然是“人们跟随领导者的原因是信任他们的清廉正直、公正和有能力。”<sup>⑦</sup>在莱温斯基事件发生前的很长时间内,克林顿的性格缺陷(有时被戏称为他“个人的坏女人”)就被认为是他履行总统职能的累赘。<sup>⑧</sup>领导者的品格在美国政府体制下比议会制下是更有价值的财产,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人同时承担了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双重角色,议会制下君主或者总统是国家首脑,由另外一名官员担任的首相是政府首脑。<sup>⑨</sup>国家首脑的作用是“国家的象征”;

<sup>⑤</sup> 参见卡尔·J·理查德:《建国者与古典派:希腊、罗马与美国启蒙》(1994)。关于华盛顿,参见同上,第69-72页。

<sup>⑥</sup> 即使在今天,不法之徒仍然是许多美国人的浪漫写照。

<sup>⑦</sup> 欧文·C·哈格罗夫:《作为领导者的总统:呼吁我们特性中的更可爱的天使》,第35页(1998)。

<sup>⑧</sup> 伯特·A·洛克曼:《领导方式与克林顿的总统任职》,载于《克林顿的总统任职》,注释第⑤,第325、332-336页。

<sup>⑨</sup> 参见大卫·F·普林德尔:《用比较的观点看国家首脑与政府首脑》的启发性讨论,载于《总统研究季刊》,第21期,第55页(1991)。

他“代表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共同事物”；他“是国体的化身。”<sup>①</sup>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政府首脑，最主要的是一个管理者。《宪法》没有赋予总统像首相那么多的典型管理性权力，至少在国内事务方面如此。所以，为了有效发挥作用起见，总统必须能够利用作为国家元首产生的道德资本。他需要有比首相（总理）更优秀的品格（这可能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跟踪克林顿——莱温斯基丑闻的欧洲人不明白这个混乱局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克林顿总统浪费了他的道德资本，但即使处于破败的局面，他拥有的其他方面的财产可能会使他保持平衡，比其他人更能成为一名有效的总统，比如，卡特，他是一个在通常概念上具有极佳品格的总统。<sup>②</sup>

这一讨论有助于威廉姆·贝纳特的观点所阐明的“这事关我们是否将总统作为一名国王来看待，将其置于法律之上。”<sup>③</sup>从某种角度上，这是对克林顿逃脱了将他赶出总统职位的简单的错误解释。克林顿并没有被当作一名国王来对待；而是被当作一名卑劣、不道德的人，他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怪异和可怜的；他对于刑事起诉一直是脆弱的，而且可能最终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就是不得不表示抱歉以逃脱牢狱之灾。他可能在一度或永远破坏了总统职位的神秘魅力中无意识地取得了成功，虽然斯塔尔、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媒体都通过不屈不挠地渲染克林顿的婚外性活动成为总统的这种破坏活动的帮凶。过去的总统都非常下工夫增强总统职位的神秘魅力，以便

<sup>①</sup> 参见同上，第 56 页。

<sup>②</sup> 这个比较对卡特可能不公平，而且夸大了一名总统的成功与他的实际能力之间的关系，如在史蒂芬·斯科罗尼克的《总统制造的政治：从约翰·亚当斯到乔治·布什的领导艺术》（1993）。（关于卡特的具体说明参见同上书目，第 361～406 页）斯科罗尼克的著作是学术性地改变了美国总统任期职责的里程碑。它的格调与巴伯和哈格罗夫的著作解释的关于传统地总统制研究和政治科学形成了鲜明对比，参见注释①和②，加强了对总统领导中除履行行政职责的能力之外的对崇敬或领导气质的特性，低估了仅仅靠运气取得总统成功或失败。

<sup>③</sup> 贝纳特，注释⑤，第 50 页。



增强他们的政治权力,<sup>③</sup> 换句话说,就是更像国王了。克林顿收回了这种投资。这可能不会关系到美国的社会力量、繁荣或道德健康;甚至有益于通过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向获得这些优势的方向迈进。

贝纳特关于将总统看成国王的提法并不是有意的嘲讽。如同马基亚维利一样,贝纳特希望一国行政长官之首应当将自己表现为榜样人物,一个值得尊敬的人,<sup>④</sup> “我们的替身国王,我们过去的象征和伟大”<sup>⑤</sup>。贝纳特渴望这些东西的原因不是由于更好地履行国家首脑的职责会增强总统作为政府首脑的有效性,而是由于总统是国家道德敬仰的人格化身,可以更好地激励民众。作为一名严格的道德主义者,贝纳特从根基上讲是一种对总统制的戏剧性理解<sup>⑥</sup>。

谈到戏剧,那些怀疑我们在关于官员对公众的代表方面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人,只需考虑首席大法官林奎斯特的黑袍上每个衣袖上的四条黄色条纹的文化涵义。在人们的记忆中,美国的法官,包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原来只是身着朴素的黑袍。几年前,大法官对朴素的黑袍厌烦了,加上了黄色的条纹,这是从吉尔伯特和苏里凡的歌剧《奥兰多》中关于首席大法官穿着的服饰得到的灵感。正是身着这种王权象征的华服,林奎斯特主持了美国参议院对克林顿总统的审判。黄色的条纹是具有强烈视觉效果的,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评论,大家注意到了这个服装来源于轻喜剧。最庄严的美国审判由身着滑稽服装的美国最高法官主持。或许(虽然我非常怀

③ 参见,一个非常精彩的讨论,福利斯特·麦克唐纳《美国的总统制:智慧的历史》,第15章(1994)。

④ 参见尼克罗·马基亚维利:《君主论》,第18、21章(1998)。

⑤ 哈罗德·M·巴格:《不可能的总统制》,第13页(1984年)。

⑥ 他的概念很奇怪地受到了《华尔街日报》一个栏目的回应,文章中专栏作家哀悼的口吻称“令人难过的一幕[对克林顿的审判]充满了如此多的软弱无能者和溜须拍马者,不仅仅是约翰·韦恩。这是一篇反英雄的故事。”乔治·梅洛恩:《关于近期华盛顿发生的事件的反思》,《华尔街日报》1999年2月16日第A23页。约翰·韦恩不是英雄,只是一名演员。



疑)首席大法官是在以此表明他对此次审判的认识和想法。<sup>⑦</sup> 但无论他的初衷是什么,他的外表使人很难相信美国人民会继续期望他们的官员比他们自己更加富有尊严、更清高,更能给人以深刻印象。我们当前的象征代表是乔·迪马吉罗。

首席大法官的服饰因法官和律师为保留审判和审判者的神秘魅力的不懈努力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很多法官相信政府的非司法部门——立法和行政官员、管理性机构、甚至军队——应当透明并接受公众监督。很少有人认为这种透明度的要求应当延伸到司法部门。一些法官几乎不相信行政部门(例如总统)能够在尊重他们与政府律师的联络方面主张律师——当事人特权,因为政府律师代表的是政府,而不是个体的官员,他们认为一种类似的特权,就是安排法官的法律秘书担当律师角色,法官担当当事人的角色,应当掩盖司法运作中的秘密。<sup>⑧</sup> 很显然,美国首席法官并不认为司法委员会的权威那么难以相处;并不反对为逐渐消失的司法神秘性付出代价,如果确实存在这种代价的话,取而代之的益处可能是改进选择公务员和对改进公务员执行公务的公共监督。从一种更加商业的、较少考虑尊重僧权的角度理解法官和总统等人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政府,不像贝纳特先生所担忧的那么糟糕。

考虑以下两个更加自相矛盾的说法。第一个自相矛盾的是在《斯塔尔报告》中猥亵的细节和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布的多卷的证据材料。一方面,克林顿总统因玷污了其职位的神圣高贵而受到责骂。另一方面,他的检察官通过公布他的有损尊严的下流行为的细节进一步玷污了总统职位的神圣性。

第二个矛盾之处是克林顿的大多数辩护人认为,不仅他的个人声誉而且他在历史上的地位都因莱温斯基事件及其后果这个插曲而

<sup>⑦</sup> 吉尔伯特和苏里凡的崇拜者们会回忆起《奥兰多》中的大法官与法院的一名守卫相爱——这会另人类比到总统与实习生的性关系。

<sup>⑧</sup> 参见,例如亚历克斯·克金斯基:“不能构成的行为”,《耶鲁法律期刊》,第108期,第835、842-845页(1999)。

遭到致命的打击。其潜台词即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一名好总统,但由于品性方面的失败会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成为一名好的总统的要求,不能留下历史的印记。这或许是实用主义的顶点;我们应当拖延对渎职者的处罚,直至我们从他那里榨得最后一点油水;我们应当等到他离职之后再通过轻视他而处罚他。

## 第五章

---

### 克林顿总统本应受到弹劾吗？ 如果被弹劾，就应被定罪吗？

我对宪法关键术语“重罪和轻罪”的含义，以及克林顿在莱温斯基事件中的行为的道德性与合法性已经作了考察。在此，我准备考虑他是否应当基于那些违法、犯罪或者其他行为而受到弹劾和定罪，这些行为本来可以基于公开记录而得到确定无疑地证实。在本章后文，我考虑了其他可供选择的制裁，比如责难(censure)。

#### 一、答案没有捷径可走

本文标题所涉及的问题也许是无法回答的，有两个理由。第一，宪法标准的不确定性。在包含许多模糊的法律标准的同时，宪法有一个明确的核心。一位总统若是试图屈从于外国势力而背叛其国家，或建立独裁政府，或是放弃职权，或犯下极其恶劣的罪行（即使无一与其职权有关或受到其下属的协助），那么，不必对其动机或其对手行为的动机进行详尽调查，就可弹劾他。同样明确的是，一位总统若是仅仅采取了国会基于党派政治原因反对的行动，他就不应被弹劾。对总统的妨碍司法及相关的错误行为，我们也许从来找不到足够的信息去判断它更接近于以上相反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端。妨碍司法已构成重罪，这一事实关系重大但并非是决定性的。它既非严重到必须使违法者辞职的地步，也不是太过琐碎细小以致于迫使其辞职成为一项明确的、过分的制裁。当牵涉到除妨碍司法以外的克林

顿的其他不法行为时,尤其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对总统职权的藐视、对事实的藐视、对国会的藐视——而所有这些更增添了他作为总统的成功之处,判决就变得更加犹疑不定了。

要使对不可估量之事作出毫无限制的、范围广阔的、不可避免具有不确定性的分析成为可能,没有捷径可走。有人提出了一些建议,卡斯·桑斯坦于1998年11月9日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说,“经宣誓后又作虚假陈述,当——并且仅当——这些虚假陈述牵涉到本身能引起滥用职权的重要问题的行为时,它就成为导致弹劾的适当理由。”<sup>①</sup>换言之,作伪证只会成为加重处罚的因素。总统在牵涉到他的交通事故中作伪证,或是为一位朋友的过失案作伪证,这不会成为他被弹劾的正当理由。因为,总统在这些情形下的伪证行为与他滥用行政职权毫无关系。

以上列举的一连串有关的事例将克林顿和尼克松区分开来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向全体众议院议员提交的、有关尼克松的三条弹劾罪状中的两条主要是从不同的形式指控其妨碍司法,与克林顿极为相似,但在尼克松案件中,他试图掩饰的该行为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而非私人性的。这种区别不能轻易地归结为普遍原理。桑斯坦为总统即便是带有私人目的和运用私人手段犯了谋杀罪的情形提出了一个例外。他没有说明——而加以说明是很荒谬的——该导致弹劾的、私人性质错误行为的例外只局限于谋杀案,其他犯罪不享有此例外。因此,为弹劾提供的明确标准会由于调查而无效。

假如在克林顿任总统前的好几年就因其白水门事件中的刑事犯罪被弹劾,那么,此标准应如何适用就应作为其弹性规定的一个更为明确的指导。他被指控为滥用职权,但该职权却属于阿肯萨斯州。这也应包括在内吗?(我认为不是——无论是否滥用职权,他在任总统前犯下的错将会成为一个极好的、不太可能严重到要视其为重罪

---

<sup>①</sup> 他后来把他的证词扩展成了一本书。见卡斯·桑斯坦:“弹劾总统”,《宾西法尼亚大学法律评论》(1998),第147卷,第279页。

和轻罪之罪行的例子。)就那件事而论,波拉·琼斯控告克林顿有此等滥用职务的行为——他利用州警察(在琼斯案中与克林顿作为共同被告)作为其淫媒。克林顿甚至能由于他利用其秘书——贝蒂·苛莉,一个政府职员——帮他隐瞒与莱温斯基的关系,不让其职员和特工部门知晓,而被指控为滥用总统职权。

我们同样还能批评桑斯坦的提议过度贬低了妨碍司法行为的严重性。假设总统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幼儿调戏者,总统在对其指控为性骚扰的审判中为其作伪证,由此导致他被判无罪,并且还能继续犯诸如此类的更为严重的罪行。或假设总统在驾车回农场的路上由于他一贯的大意将一个孩子轧死。他没有犯罪,但由于其大意和他作伪证否认正在驾车、并收买证人证实其谎言而被起诉。或假设总统有一个私生子,他由孩子养育权的问题而被诉,他替自己辩护、作伪证,而DNA测试证实他在说谎。在所有这些情形下,总统可以持续地、强烈地、合法正当地藐视法律,他使自己凌驾于侵犯他人的法律之上,不必以公平正义或找借口作为掩盖。为适用于这些情形,桑斯坦将所有私人性质的不法行为限定在弹劾权以外,这一分析大大地限制了弹劾权的范围。只有当这些罪行是在总统即将离任之时犯下的(假设总统享有优先的自我赦免权,甚至不必等到那时候),才可想象公众会同意让其继续任职,并以通常方式受罚。

理查德·派克于1998年11月9日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指出,在宪法文字上还存在一个疑点。宪法将“贿赂”和叛国罪都列在重罪和轻罪之列,但我们能轻易地想象总统为纯私人理由贿赂某人;下段中我将举一例说明。认为贿赂除非与行政职权相关、否则总统的贿赂行为不能作为可遭弹劾之罪行的观点,是严重违反宪法用语的,尽管该第四条第二款有关“贿赂”的援引是基于对总统的受贿行为而非施贿行为的考虑。<sup>②</sup> 桑斯坦将“重罪和轻罪”未加说明理解

---

<sup>②</sup> 尚可争议的是,伊朗门事件是一起总统贿赂案——在该案中,伊朗以此释放了在黎巴嫩受伊朗支持的恐怖分子所劫持的人质。



成叛国,利用职权受贿,犯罪或其他严重的滥用总统职权,谋杀以及其他特别严重的、即使以纯私人手腕、以纯私人目的犯下的重罪,但是决不涉及妨碍司法行为,除非它成为以上提及罪行的附属罪行。

你也许会设法为将可遭弹劾之罪行限定在政府行为之内的观点找理由,但会为如下的私人性质的罪恶行为规定例外情形:犯谋杀罪的总统可能会干任何事情。换言之,因为私人行为可以告诉我们总统的尊贵、自控力或其他有关的总统个性,这一私人行为就可被归入到公共领域。在最后一章我指出,这一观点所显现的在私人行为中的道德坚定性比人们所实际期望的还要大;一个人也许私下里是魔鬼,而公众场合却是圣人。但是,假如我的理解出错,这一从私人行为到公众行为的推断就没有理由限定在其私人行为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行这一情形中。因为,我还将在最后一章指出,克林顿在莱温斯基事件中的私人行为令人如此震惊,以至人们对其是否能尽责地履行总统职责提出了怀疑——除非我们愿意(我比桑斯坦更愿意)接受认为克林顿是具有善恶两重人格的观点。

我们应当放弃试图找到一个有关弹劾的简单明了的规则。不幸的是,一旦我们那么做了,将克林顿的案子置于可辩驳的相关考虑中就会使人晕头转向、不知所然。另一方面,他在一年期限内再三地、以不同方式犯下妨碍司法的重罪,他以公开或私下的华丽谎言、恶毒攻击、有计谋的失误、判断上的大错、矫饰的忏悔表演、对传统道德和亲权的泰然面对、以及对神圣国家象征的亵渎来为其粉饰。而所有这些都是违背那些持续的、令人头疼的、有关克林顿政府伦理论调和克林顿本人政治伦理的问题的情形下发生的。

另一方面,克林顿是由于受到相当程度的挑衅才作出举措的——也许挑衅太过分,很少有人在同等情形下不屈服的——他试图将令人尴尬的、私人行为的掩饰从妨碍司法行为中剥离出来。并且,令人吃惊的是,其不合法、不道德的行为看起来也没有对整个国家产生什么不良后果。也许结论下得太早了,我们应当担忧的是,公众对于法律和道德的尊重会受到逐渐的侵蚀。我们对显赫人士未受

惩处的恶行所带来的影响通常也没有办法确定。明显犯了谋杀罪的O·J·辛普森于1995年宣判无罪,然而看起来它并没有影响到国家谋杀率的稳步下降。这也许是因为,他尽管被判无罪,也没有安然无恙地逍遥法外。他受到了大多数尊贵人士的羞辱和排斥(尽管他有一群值得尊敬的密友),被迫支付一笔庞大的损害赔偿额,剥夺了逮捕前拥有的获利丰厚的赚钱机会;而且,在写此文时,他对孩子们的监护权也被取消了。他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人。尽管克林顿最终比辛普森有更多的赎罪机会,那也可能成为他的结局。

## 二、对各种后果的分析

对总统弹劾缺乏明确标准,使人们很自然地关注弹劾和定罪引起的各种后果。我们试图比较两种不同措施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包括诸如公开谴责之类的居中惩处。

人们担忧参议院的审判会导致联邦政府在审判期间的瘫痪。而且,除非因为公众对整个事件感到厌倦,参议院同意让克林顿避重就轻地认罪,审判期间会拖延几个月之久。这些担心对那些熟悉审判程序的人来说显得荒诞可笑。一个对由众议院批准的、两条弹劾罪状中的指控进行的、操作规范的审判不可能耗费几个月,因为不需要证实什么事实。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对争论以外的事项进行证据听讯。由于政府档案中已包含了8000页基本上未经证实的证据,全部审判程序就不会超过一个月。因为已经删除了证据听讯程序,实际审判会在六周之内结束。若是不加删除,只是按规定程序进行,则将花费更少时间。

在弹劾和欧洲大陆法刑事诉讼体系之间可以作一个类比。该体系的审判,从需要证人进行听讯程序的角度来说,先前须经预审法官作全面调查。他将其调查结果制成案卷,呈交给将要进行实际审判的法官或法官小组。有了该案卷,审判小组只在需要补充说明或解决前后矛盾时才传唤证人。斯塔尔对克莱事件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

调查,由此形成组成《斯塔尔报告》本身的极其全面细致的案卷、几千页的证词记录以及其他用作证实的证据。在最初的优柔寡断之后,众议院议员们明智地避免扩大独立检察官收集的证据。当案件移到参议院,参议院在大陆法诉讼中应处于审判法庭的地位。参议院进行任何证据听讯的惟一借口是,补充遗漏部分(如果存在的话)、解决从独立检察官那里、经由众议院得来的案卷中前后矛盾部分(实际很少)。那些未经证实的事实可能已以协议的形式呈交给了参议员。

即便是简易程序,也担忧审判期间会造成政府瘫痪,这种观点也过于夸张了。大多数政府工作低于政治水准,而在目前立法部门中大量任务是对不同利益团体进行罚款、安抚、以及为下次竞选筹备资金。一些参议员关注审判时间是因为他们担心拖延过长,他们不被人们想起。而且,真正令人担忧的应该是另一种瘫痪情形;当政府分为一个政治党派操纵的国会和只剩下两年任期的、另一党派操纵的即将到期的总统时,政府瘫痪可能早已根植其中了。

另一反对审判的蹩脚的理由是,让莱温斯基和琳达·翠珀在参议院的“律师席”上为其性行为作证会玷污参议院。随着众议院在弹劾问题上发生不光彩的争吵后,众议院受到了党派狂徒的猛烈攻击,而参议员们则因未受到攻击而沾沾自喜。伪装很快就揭穿了。而且,我们只要回想一下伯克和托马斯联邦最高法院的确认听讯程序,就会认识到,现代参议院是一个人民党机构,而远非规定参议员普选制的宪法第十七条修正案以前一百多年的宪法制定者所拟议的秘密贵族会议。参议院的所为,正如许多政治机构一样,并不比法律禁止的性行为更具有教化意义。这使人回想起比斯马克的比喻,他将立法比作制腊肠——产品鲜美,而过程气味难闻。

克林顿的辩护人最为关注的是,无论参议院审判持续多长、结果如何,总统——已经由于《独立检察官法》及联邦最高法院对波拉·琼斯案的判决而削弱了权力——假如克林顿被弹劾,其权力将受到进一步的削弱。以定罪和撤职而告终的长时间的审判将极大地削弱总统职权;它将为后来的总统们订立一个预先约束,从而影响其行为。

但是,即使是以无罪判决而告终的极为迅捷的审判,也不可能不受到因弹劾而起的诽谤。

换言之,官员的任期越不确定,其权力就越弱,弹劾的危险就越大。任期的确定是一个理由,而且在第四章注明了美国总统拥有“一国首领”的地位,尽管受到两任制的限制以及他只拥有有限的立法权,他在平均上也比议会民主政体的首相拥有更大的权力;后者只须立法机关大多数成员通过就能在任何时候被撤职,并且,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高效率的一院制。<sup>③</sup>

但是这里潜伏着一个使我们小心谨慎地将此种分析适用于克林顿弹劾案的假设。即,在克林顿被弹劾前,已为弹劾设定了一个固定标准,而弹劾他就会降低此标准。因为只有三位总统受到过弹劾(应包括尼克松),其中两位被参议院宣判无罪,而且“重罪和轻罪”的含义也不够明确,对此标准带来的弹劾影响本身也就不明确了。当安德鲁·约翰逊被判无罪,他们创造了一个人们普遍认为的提高了弹劾标准的先例。就在尼克松落选的前一年,发行了一本有关约翰逊弹劾案的著作,书中嘲讽道,约翰逊被参议院宣判无罪,这使得“对其继任者弹劾和撤职成为不可想象之事。”<sup>④</sup> 假如约翰逊在最初没有被弹劾,这一有利于总统职权的先例就不会产生了。参议院判决克林顿总统无罪同样使得“对其继任者弹劾和撤职成为不可想象之事。”即使国会两院都由反对党控制,它也不可能召集其大多数成员同意定罪。克林顿被判无罪肯定降低了后来者为纯私人不法行为被弹劾

---

③ 见安东尼·金:“权力的基础”,载《总统研究:重大问题,新的方法》(约翰·H·科塞和贝特·A·罗克曼编),第415、423-425页(1993);关于权力任期的保障关系,见安东尼·金:“行政官员”,载《政府的制度与过程》(福瑞德·I·格恩斯坦和勒森·W·波斯比编),第173、195页(1975)。该文本中的合格性——“平均而言”——是重要的。“‘没有加拿大人,’一位公仆和大臣发表意见说:‘希望他们的首相和美国总统一样弱。’”帕特里克·威勒:《同等之中的第一:西方大臣体制中的首相》(1985),第200页。

④ 迈克尔·勒斯·贝尼迪克特:《对安德鲁·约翰逊的弹劾与审判》(1973),第180页。对同样的后果,见希尼·M·麦尔其斯和迈克尔·勒森:《美国总统制:起源与发展,1776-1793》(1994年第2版),第178页。



的可能性。而且,即便由于在审判中“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的理由,参议院的定罪前景不太乐观时,它也会降低下一任众议院弹劾总统的可能性。真实的审判也许就是这样,然而参议院审判似乎并非如此。实际上,判决结果先于参议院审判。

即使每一次总统弹劾必定会削弱总统权力,这种削弱是否是一桩坏事仍旧值得怀疑。代表所有政治观点、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认为,美国政府里的每一桩好事都来自于总统本人,这是因为只有一位总统(命令的统一)、他是由整个国家选举的(民主合法性和责任性),而国会却受到不同利益集团、地方观念、分费政治、为协调多成员两院制大会而花费纯粹的交易成本。<sup>⑤</sup> 即使各议会机构和总统政府一样强大、果断、高效率,也会存在这些情况,或许还是大量的。英国自十八世纪后、德国自二战后成立波恩政府以来,产生了许多拥有实权的首相。<sup>⑥</sup> 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早期美国甚至还兴起了一次昙花一现的运动,其目的是通过消除国会和总统之间的对峙而增强政府实力,修改宪法,推动美国走向议会制政体。<sup>⑦</sup> 这次行动可能在一开始就构想错了。阿瑟·希勒辛格自信地说,成功地建立议会制政

⑤ 例见,格兰特·麦克康奈尔:《私权力与美国民主》(1966),第351~352页;格雷·L·罗斯:《遭受围攻的美国总统》(1997)。一般见,迈克尔·A·费茨:“现代国家中的权力悖论:为什么一位一元、集权的总统不能表现有效和权威的领导”,《宾西法尼亚大学法律评论》(1996),第144卷,第827、829-830页。在分权时期(即,一党控制总统,另一党控制国会),控制总统的政党成员倾向于赞成强大有力的总统,而控制国会的政党成员则认为,一个强大有力的总统是危险的。比较小阿瑟·M·希勒辛格的《至高无上的总统》(1973,以及1989年的版)(在两届共和党总统期间的民主党人的著作)和特瑞·伊斯兰德的《执政者的能量:强有力总统的理由》(1992)(一位共和党总统任职期间共和党人的著作)。关于总统在政治上爱国特性的研究,见理查德·罗斯,“总统测评”,载《总统研究》,前注③,第453、473-475页。

⑥ 例见,迈克尔·弗雷:《英国总统制的崛起》(1993)。

⑦ 例见劳艾德·N·卡特勒:“构建一个政府”,《外交事务》(1980)第59卷,第126、139-143页;希勒辛格,前注⑤,第461-462页。关于议会制对总统制的稳定性与有效性,见阿伦德·里普哈特:《民主制度:二十一个国家中的大多数统治和共识统治的模式》(1984),第68-85页。



体取决于美国目前并不存在的机构,例如强大的政治团体。<sup>⑧</sup>

但是由总统弹劾引发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修改宪法,以议会制代替总统制;而在于是否允许在现存的宪法结构内将各机构的权力平衡进行一次轻微转移。在1970年尼克松落选之后,国会将总统权力特别是外交权分割出来,然而这并没有阻止里根成为一位拥有实权的总统,他在后来的十年中实施了积极的、有效的(即使偶尔是违法的!)外交政策。杰出的政治学家西奥多·罗威在里根执政期写下许多著作,他认为总统职权仍旧是过于强大了。<sup>⑨</sup> 相互矛盾的是,克林顿成为一位成功的总统是由于国会的强大,而国会设法阻止他操纵左翼——这却是他最初的愿望。认为弹劾克林顿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会危及总统职权,这纯属推测。由尼克松事实上的弹劾而导致的权力平衡转移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而且,由于不同于尼克松和他之前的林登·约翰逊参与中南半岛战争<sup>⑩</sup> 的高压方式所带来的剧变,它也许与弹劾调查根本无关。

更有甚者,克林顿的挣扎也许使在尼克松时期就开始的、试图剪断总统翅膀的民主化尝试瓦解了。现在,民主党开始反对会削弱总统权力、作为民主创议的《独立检察官法》,转而支持总统的单方军事行动,他们试图通过战争权力决议以及其他目前忽略的方式来控制总统权。克林顿的弹劾案使得民主党重振旗鼓、为夺回总统权力而战!

尼克松被(实际)定罪,比被判无罪的安德鲁·约翰逊案更能有力地说明弹劾对总统权力的影响。弹劾和审判约翰逊是否会对总统职

---

<sup>⑧</sup> 希勒辛格,前注⑤,第463-470页。同样,“总统主义”在美国的成功依靠的可能是在大多数国家不存在的制度。见朱安·J·林兹:“总统主义的危险”,《民主杂志》(1990),第1卷,第51页。

<sup>⑨</sup> 西奥多·罗威:《私人总统:被授予的权力,没有兑现的允诺》(1985)。

<sup>⑩</sup> 对此要记住它把老挝和柬埔寨围得水泄不通——在法律上最可质疑的战争特征。

权造成任何影响,我们一点也不清楚。<sup>①</sup> 事实是,他没有一位强硬的继承者,直到二十五年后西奥多·罗斯福出现;但在十九世纪,总统只是一个虚位。阿尔伯特·凯瑟尔指出,“从政府机构的角度上说,(安德鲁·约翰逊时期的)总统职权及其历史声望降到了最低点”,也没有立即反弹回来,他将这归咎于约翰逊的“粗心大意和刚愎自用”而不是其弹劾和审判。而且,他将约翰逊继位者的无权归咎于“历史环境”而不是有关约翰逊的特定事项。<sup>②</sup>

人们猜测,对约翰逊的准定罪使其继任者格兰特总统甚至比其自然倾向更屈从于国会。<sup>③</sup> 但是詹姆斯·桑德奎斯特对十九世纪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平衡作了仔细分析,他没有将约翰逊的坏运气和十九世纪总统的无权归结为弹劾,而是一系列许多不同的因素。他还提及了约翰逊之前的许多总统无权,而这明显不是由约翰逊的弹劾引起的。<sup>④</sup> 尽管林肯增加了许多战争时总统拥有的权力,他本人却受到了来自政党体制的相当程度的阻碍,并发现,成功地推行一项战后重建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sup>⑤</sup>

而且,我们不应忽视强硬背后的虚弱,以及虚弱背后的强硬,这使得我们很难说总统职权的轻微转移是否会实际削弱总统的权力。这种转移也许会使总统更难以与国会协调一致——而这是一桩好事——也会使他更难以让国会大多数支持其党派——而这也是一

---

① 不太令人生疑的是,宣判约翰逊无罪给了南方白人臂膀一枪,这对重建是有帮助的。例见,汉斯·L·特里福斯:《安德鲁·约翰逊:传记》(1989),第332-334页。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弹劾约翰逊是北对南;弹劾克林顿(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南对北。看宣判克林顿无罪会导致什么样的政治结果将是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② 阿尔伯特·凯瑟尔:《安德鲁·约翰逊总统》(1979),第230页。

③ 布鲁斯·卡通:《国家援助与美国人的军事传统》(1954),第153页。卡通写道,拨款赞同“传统军事官员把国会视为老板的看法。命令可能出自行政部门,但是,通过拨款议案,创设或废除军事岗位和职责,确认或拒绝高级官员的任命,宣布战争,批准条约以及一般指定军事路线,所有这些都总是要经过议会的”。同前,第152页。

④ 詹姆斯·L·桑德奎斯特:《国会的兴衰》(1981),第2章。

⑤ 斯蒂芬·斯都罗尼克:《总统政纲:从约翰·亚当斯到乔治·布什的领导》(1993),第198-227页。

桩好事;因此,这种转移也许实际上会成为一股凝聚力。此外,总统若攫取权力越多,他就越可能成为众人指责的焦点。<sup>⑥</sup> 而分散权力就能(如马基雅维里向君主推荐的)将人们对此本质上极为龌龊的政府事件的指责转移向他人,由此增加其实权。政治理论家斯蒂芬·霍尔姆斯强调,自由政体国家对其政府权力进行分散和限制,其历史也表明了比独裁政府更强大,这正是由于——并非不是因为——他们拒绝政治权力集中。<sup>⑦</sup> 当然此种分散和限制也许过度了。但我们无法回答的有关问题是,是否基于这些理由,弹劾这一总统有可能损害我们的政治体系。

至此我一直在悄悄假设,总统权力所损失的每一分都由国会平等地获得了;联邦政府权力的总量并未改变。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国会没有执政权,削弱总统权力就有可能削弱整个联邦政府的权力。可能的后果是将权力分散到了各州;另一后果是,将权力从政府转移到私人手里。从整个国家来看,此种结果究竟是好是坏呢?能对此作出肯定回答的人必定是个大胆狂妄之徒。

然而,除了此种冒险的、可能危及总统职权的举措之外,也许还存在其他弹劾克林顿的下策。其弹劾案鼓励了金斯伯格和谢弗特的揭露、调查和起诉(RIP,见第三章)此种不受欢迎的政治斗争形式,并为之作了示范。假如克林顿被参议院定罪和撤职,这将意味着政府改变——即便新当选的总统仍属同一党派,此种变化所引起的权力转移的代价——都将在下届总统选举前的两年之内发生,或者更短(这取决于审判的时间)。

至少在近期内,美国政治会由于诸如此类已成为党派联盟斗争

---

<sup>⑥</sup> 费茨强调了这一点,前注⑤。林登·约翰逊在越南战争中的专断指挥似乎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见罗纳德·A·海费茨:《没有容易答案的领导》(1994),第150—170页。参见理查德·J·爱丽斯:《总统的避雷针:避免谴责的政治学》(1994),第157—158页,比较了约翰逊和艾森豪威尔。

<sup>⑦</sup> 斯蒂芬·霍尔姆斯:《激情与约束:关于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1995),第18—22页。

的弹劾案而备受摧残。与商业或学术上的竞争相比,政治斗争更为残酷和情绪化,因为它具有总量为零的特性(输赢双方界限分明),而且其观众(选举人)常常缺乏认清其真实面目的资料 and 兴趣。民主党孤注一掷想找到一种途径来报复策划克林顿弹劾案的共和党,<sup>⑩</sup>而共和党孤注一掷地想要报复为其贴上“党派狂徒”标签的民主党。这里,布鲁斯·阿克曼关于跛脚鸭弹劾(见第三章)的观点与法律一样不甚合理,又回到了实用政治之上。因为即将到期的众议院中共和党议员比新一届众议院的人数要多,弹劾就不太可能经过新众议院,而由即将届满的众议院投票通过的两条罪状之一就有可能经过它。<sup>⑪</sup>受到任期限制的“跛脚鸭”总统的支持者们认为该程序不公平,其民主优先权受到了轻视。

然而,从1998年12月11日起,当总统恳切要求国会以谴责或以其他方式处罚他时,全国上下获得了一致意见,认为总统应受处罚,以上观点的说服力就因此而减弱了;这场争论是关于应采取何种处罚形式。即使参议院中两党势力均衡,也不可能定罪,我们需要在弹劾及随后的公开谴责与弹劾、宣判无罪、而后进行公开谴责之间作出选择。这些“处罚”方式之间的区别即使不是琐碎的,也比较细微。而且应对审判带来的直接后果加以强调。败方将会因获得“开庭日”而满足,而且通常在此案中他会给胜方脸上狠击一拳。

弹劾的另一可能后果也可能迷惑不清。我们不知道对利用职权进行犯罪的总统弹劾(还包括或不包括强制撤职)是否会为总统重建其令人狂热的、有益的领袖气质,还是会进一步损害此气质。回到第四章提出的问题,我们甚至不知道国家究竟是需要有领袖气质的总统,还是在危难时能挺身而出的总统——当然危难通常是无法预测

<sup>⑩</sup> 记住,追随杰弗逊的共和党人转向政治指控是想向联邦党人报复,因为联邦党人努力借助于侨民和煽动叛乱法来镇压共和党人。

<sup>⑪</sup> 民主党人在新的众议院中占了5个席位。随着5票从共和党人向民主党人的转移,按照弹劾第一款,弹劾克林顿的投票应该是223对211,而按照第三款则是216对217。这是假定投票没有变化的情况,在任何其他变化都消除的情况下,这更为可信。



的。

即使我们能说,让克林顿的妨碍司法行为逃避惩罚会破坏法律构造、损害传统道德观,我们也不清楚,即使他被弹劾,他是否真的能逃避惩罚。他依然会在任期结束之后或是之前就被依据普通刑事程序起诉,但我提请大家注意,总统的自我赦免权会使此起诉成为虚幻。给克林顿撤职当然会是对国家遵循法律规范和高度道德标准的一场戏剧性的证实——但此证实被人们对其反对党技巧和动机的普遍怀疑玷污了。而且许多人认为,在他被弹劾之前,他与莱温斯基的关系就被大肆宣扬,对其起诉或公开谴责已是多余的、“夸张”的,而总统的历史地位也因此失去了光泽。

另一个不能得到肯定回答的相关问题是,是否因总统深得人心就放弃弹劾是非法的,或在决定是否弹劾他时忽视此种受欢迎度就是违背民主的;在作出弹劾决定时需要权衡的是,弹劾克林顿的检察官及其迫害者值得推戴的技巧和动机,或是克林顿已取得的政治成就。

### 三、严格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平民主义

由克林顿案件引发的一个棘手的政治哲学问题,即,在政治上是采用实用主义方法、还是采用如康德及其模仿者、天主教自然法学家一样的、严格主义的、蕴含道德意义的方法。如果我们解决了此问题,我们就能知道克林顿是否应被撤职了。

以实用主义作出决定者希望其决定是建立在对可能后果评估的基础上。在法律案件中,更有理由在作为准司法的弹劾案中,当诸如先例、清晰的法规、宪法原文等有关判决的历史资料也不能提供参考时,采用实用主义就是合法正当的,或至少是常见的一种方式。由于不知道弹劾和撤职所带来的有利后果比不利后果要大,实用主义者就会倾向于反对弹劾。而严格主义者会从道德和法律角度考虑,使调查的焦点转向不利于总统的、总统行为本身的严重性。天主教自



然法学理论家特别有可能对总统行为进行谴责,因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观,不赞成此种不正当的性关系。

由于各种成本——收益的平衡尚未确定,实用主义者认为其方式在整体上比严格主义更适当。此观点遭到了严格主义者的反对,因为,让克林顿继续任职会宽恕其犯罪——只要其罪行不过分危及总统执政效率,甚至会给总统罪行发放“许可证”。或者至少许可受欢迎的总统犯罪,因为总统越是不受欢迎,弹劾带来的损害就越少。人们认为实用主义者希望受欢迎的总统因其受欢迎度而受到免于刑事处罚的“奖赏”。如此,法律正义就屈从于民众正义了。实用主义者对“真相”采取极其不信任的态度。因此,它看上去不能立场坚定地反对作伪证者。由此,他们被指责为缺乏认识论和道德上的指南、以及对法律忠诚、坚定的遵守。<sup>②</sup>

这种对实用主义者立场的刻画是不精确的。认为实用主义者不相信事实、从而就不具备反对伪证的资格的看法只是一个谣传。他们从抽象肯定的角度怀疑事实,是诸如存在上帝(或不存在)、现代物理学能如实反映自然之类的“事实”。他们并不怀疑人类毁灭是否真的发生过、克林顿总统是否弄脏了莱温斯基的裙子、他是否对大陪审团撒了谎。他们一方面怀疑可被证实的普遍有效的道德准则,一方面又并不怀疑:在美国作伪证以及其他妨碍司法行为是为道德所不容的,不能因为受欢迎就判总统们无罪。

因其妨碍司法而对克林顿定罪和弹劾显示了给人印象至深的、康德学派对法律教条机械的遵从,这听起来像是谴责通奸、说谎、违法的恢复传统道德观的感人号召,并坚持政府官员应当在道德和政治领域内成为众人楷模。这些也许就是实用主义者乐于接受的有利后果。但是,尽管弹劾总统的微妙的党派偏见也许因罗伯特·列文斯顿戏剧性的、然而很快被忘却的、因犯有通奸行为而辞去众议院议长

---

<sup>②</sup> 见理查德·A·波斯纳:《超越法律》(1995),第155-156页。

的行为而轻微地缓和了,<sup>①</sup> 它还是减少了弹劾制的意义。无论如何,实用主义者不会相信,当决定是否弹劾总统时,法律和传统道德感只是惟一需要考虑的社会利益。而且,哪儿才能找到那种有人关注感人号召的证明呢?

实用主义者对弹劾最值得怀疑的考虑是,总统受欢迎的程度,以及与之有关但不尽相同的观点——大多民众反感对克林顿进行弹劾。在整个调查、弹劾、审理和判决期间,约有三分之二的民众对他作出了正面评价。很难对这一数字本身作出评估。大多数民意测验中的被测者都被问及总统的个性及其作为总统的职责履行如何。将这两者并列也许会使他们认为,职责履行是与总统个性分开的,而即使如我们在最后一章所见,其个性能作为履行职责的一个尺度。这无关紧要;从特别问及克林顿是否应被弹劾的民意测验中,从 1998 年 11 月国会选举后的最后一次民意测验中,从共和党参议员试图阻碍参议院的审判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大多数美国人不希望他被弹劾;只有 20% 的人不赞成参议院判其无罪。

即便如此,那又如何呢? 仅仅因为民意测验显示大部分人——也许是不熟悉错综复杂的刑事程序的人——认为他应判无罪,就赦免一个谋杀犯或其他罪犯,我们必定会感到大为惊奇。其罪行的潜在的受害人将会成为违法者,即,如果受欢迎度成为免于刑事起诉的借口,那就有人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sup>②</sup> 这也即是从一个不好的角度演示民众正义(见第二章)。而且,我已强调,宪法制定者的意图是弹劾程序应主要是法律程序,它类似于刑事诉讼而非政治诉讼。

假如我们仍旧处于规定众议院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惟一联邦政府机构的 1787 宪法之下,那么,在决定是否弹劾和给总统定罪时应忽略民意的观点是具有说服力的。参议院被委以弹劾的重任部分是

---

<sup>①</sup> 我说“轻微地”是因为他可能会被共和党议员强迫辞职,这些议员相信他成为议长会削弱罢黜克林顿的努力。

<sup>②</sup> 这一点被这一事实弄模糊了:克林顿总统举行的主要受害人波拉·琼斯对克林顿不利的主张,是通过得到丰厚的金钱来解决的。他妨碍司法的行为并未得逞。

基于它不是一个民主机构,因而能够受到委托(不完全的,或并不要求三分之二选票通过才能定罪,但至少要多于众议院)行使审判庭的职责。而今一切都改变了。现在,参议员与众议院成员一样由人民直接选举,人民期望他们能作出应答——不是毫无创意的应答,而是对投票人的愿望作出应答。更重要的是,现在总统实际上也是直接选举的。<sup>②</sup>他是人民的选择,而不是贵族选举团的选择。人民,或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民——许多美国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希望在其任期结束之前有人能对是否弹劾作出决定。他们期望作为他们代表的参众两院议员倾听并关注他们的呼声。尽管与克林顿是否犯了可遭弹劾之罪行的问题相关的法律和证据问题是技术上的、甚至是秘密的,人民也并不觉得无法对其作出估量,因为他们淹没在媒体的各种意见和信息中。来自于法律领域的各显赫人士教人们如何看待提议的弹劾中牵涉的每一问题。他们告诉人们许多事,通过他们对旨在瞄准大众的媒体事件的参与给以暗示,人民有能力在各种针锋相对的专家意见中作出选择。此暗示被众议院弹劾程序的电视播放和参议院的审判进一步增强了。

尽管既非法官又非政治学家的人在决定总统是否犯了可遭弹劾之罪行时过分夸大了他们的能力,他们也不可能在此事上俯首听命于专家阶层的意见,因为这些专家们带有狂热的派别偏见,而且经常是非专业性的。假使负责作出弹劾决策的机构现在成为民众党组织,(在总统弹劾案中的)弹劾目标是一位民众主义者,并且假使该专家阶层是杂乱无序的,那就很难说公众的意见在决定是否弹劾克林顿时未起作用。

请记住,无论在总统任期中或任期结束后,总统仍旧受普通法律程序约束。如果他犯了民事侵害(民事错误),他就会被起诉、要求赔偿。如果他犯罪,就会受到指控(除非他能赦免自己!)。在美国观念

---

<sup>②</sup> 作“实际上”这种限定,是承认候选人可以拥有总统选举团中的大多数投票而不是民众投票的大多数。

上仍旧保存着这样一个基本信条: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总统也不例外,即使无论由参议院审判或由普通法院审判都很难对其弹劾、或更难对其定罪。康德严格主义者可以从以下可能性中找到慰藉:总统可为其犯下的任何罪行在正规法院受到惩治,也可因其历史上犯下的任何不法行为受到处罚,尽管这一可能性是理论上的。

与实用主义在弹劾中的仁慈观点不相符的、有分量的行为是,总统在弹劾争论中厚颜无耻地否认他触犯了法律,甚至否认他曾撒过谎。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见,说无人相信的谎言实际上比具有欺骗性的谎言更坏。希望别人相信他的说谎者并不否认事实真相和虚假情况;实质上,真相是使其谎言有效的支点。而不那么理直气壮的、只想挽回面子或炫耀其权势的说谎者才是真正可怕的;他似乎在向文明社会根本的、必不可少的价值观提出挑战。

我认为,假如我们能在实用主义和严格主义对待弹劾的两种态度之间作出选择,或许我们就能够回答是否克林顿应被弹劾和定罪的问题了。但是在通常的有关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辩论中,辩论者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得出客观结论。有关这点我们能说的只是,严格主义的道德卫士会倾向于认为总统犯了可遭弹劾的罪行,而实用主义者将倾向于——尽管也许是轻微的——另一种说法。

#### 四、相称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其它惩罚

我们仍然需要考虑的是,即使克林顿的不法行为比只是“对其性事撒谎”要严重得多,弹劾也是与其不法行为不相称的反应。惩罚必须与罪行相当。其罪行是严重的,但或许还没有严重到要施以弹劾的地步。尽管刑法中有一些强制性的法定的最低处罚,它也只规定一个大致范围而很少规定一个具体处罚。但是对弹劾和定罪,宪法第四条第二款没有为该情形留下合理怀疑的余地:被弹劾和定罪的官员“应当撤职”。惟一的选择余地与取消其将来执政的资格有关。参议院对此享有自由裁量权。这一点在宪法第三编第一条第七款的



用词中可以看出——“弹劾判决不能超出撤职,取消其执掌、享有美国荣誉、信任和利益的部门的资格的范围”——该条与宪法第四条第二款中有关删除提及取消资格的规定相并列。

“超出”的含义似乎是暗示撤职及取消资格不过是最低惩罚。但是该句将在“超出”条款和“撤职”条款之间产生矛盾。这两条款很容易就能达到统一。“超出”条款限定了最重惩罚,“撤职”条款限定了最轻惩罚。被定罪的官员必须撤职,但是惟一的参议院能强加的加重处罚是禁止其将来的执政权。给一位犯了重罪或轻罪行为的官员定罪却让他继续任职会显得格外荒谬。那等于是向世界宣布美国同意由罪犯执政,或者更坏。那也将会给弹劾程序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如果撤职(无论是否取消其将来的执政资格)就是犯下重罪和轻罪行为的最重处罚,这就意味着——因为软禁十天比踢下总统之位的惩罚要轻——只要让其继续任职,参议院就可判决软禁,或是一个更短的监禁期。也许还能让他免职一年。或者判处他带上手枷、脚枷一天,或一月内插上一个皮诺曹的鼻子、再刻上猩红的“A”字。

选择除撤职以外的其他处罚方式同样会产生降低弹劾标准的后果(尽管我们不能确定这将是一桩坏事)。使惩罚极其严厉也必定不是鼓励诉讼的一种方式。<sup>②</sup>而当罪行定义模糊、无法确定时,它就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方式了。既然在定罪情形下规定的处罚会在某些方面不适宜,那么,因为无法对弹劾总统的各种情形加以列举,它就是一种表述方式——也许在弹劾情形下是惟一的一种表述方式——起诉应限定在最严重的罪行范围内。另一种表述方式是,批准对重罪和轻罪行为进行轻微处罚会降低被要求宣布犯了重罪和轻罪行为的最低限度的严重性。

众议院会合理地倾向于对总统或其他它认为犯了重罪和轻罪行

---

② 这是为什么检察官常常指控被告主要违法中的次要违法的一个理由,例如,他们指控他故意杀人,也起诉他过失杀人。如果只让陪审员在判决被告犯有严重罪行(陪审员都知道这要承担很严厉的惩罚)和宣判他无罪二者之间作出选择,陪审团可能都不会同意定罪。



为的官员进行弹劾,而参议院,如果它发现总统犯罪,它也会合理地倾向于对它认为是犯下重罪和轻罪行为的总统进行审判,以上观点亦适用于此两种情形。它也会通过采用其他的审判和处罚方式降低可遭弹劾之罪行的严重性。

假如迄今为止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宪法没有对弹劾官员批准任何比撤职更轻的惩罚,或除取消他将来执政资格以外也没有规定任何额外处罚。那么对这位犯下严重错误、但是也许没有严重到需要撤职地步的总统,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呢?在弹劾和审判克林顿总统期间,各种不同答案都被讨论过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其进行公开责难,那么就让我们考虑一下它的适当性。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责难还令人犹疑,但反对责难的各种观点同样值得怀疑。例如,这并不意味着国会不能依据宪法的弹劾条款制定一个表达它对某人进行非难的决议;它正是以这种方式对安德鲁·约翰逊进行了“公开责难”。这既是规定,或者整个国会集体行动——责难将在联合决议中得以表述——或者只有参议院作出行动,那就将在参议院定罪之前或它宣判无罪之后,参议院在审判继而定罪之后对总统进行公开责难(或任何被弹劾和定罪的官员)是不适当的;公开责难并不是宪法规定的、对弹劾和定罪的官员的处罚方式。从我们所见的实际理由出发,宪法只对参议院施加给被定罪官员的处罚作出特别规定。

另一个错误的反对意见是,认为责难决议会降低弹劾的标准。责难是弹劾的另一方式,而不是取代对弹劾和定罪的官员撤职的一种温和惩罚。<sup>⑤</sup> 它对于那些反对给克林顿撤职的人、或是意识到参议院不会以必要的超过大多数通过定罪,但却担心让他避重就轻地

---

<sup>⑤</sup> 这是《1980年司法行为和无资格法》规定背后的理论,这一规定授权巡回司法委员会对联邦法官的不良行为作出公开的和私下的谴责和训斥。见《美国法典》第28卷,§§372(6)(B)(v)、(vi);迈克尔·J·格哈特:《联邦弹劾程序:宪法和历史分析》(1996),第100-102页。对此,请记住,和总统一样,联邦法官也只有通过弹劾和定罪才能被迫离任。

认罪会削弱法律和道德的人来说,是一种颇有吸引力的选择。假如国会责难作为一种对联邦官员的处罚模式被普遍接受,克林顿就不太可能被弹劾了。

惟一对国会责难决议存在阻碍和报应的力量是道德力量。但是假定公开责难总统并不常见,这种力量就值得考虑了——假如总统自己的党派中有多数人表决同意进行公开责难,这就陷入了党派之争的圈套。此外,当总统有不法行为时,对他们进行公开责难不可能实质削弱总统职权。公众对各政府部门之间的紧张状态有所了解,因此不太可能作出比该行为本身应有的更重的国会责难决议。

若得到总统首肯,国会还能做更多的事;例如,可判处罚金。这明显就是一个剥夺权利的议案,也即宪法禁止的法定惩罚。但是总统不能对国会的越权提出抗议,因为这得到了他的许可;而且其他人也没有理由对国会的行动提出异议。尽管如此,判处罚金也存在严重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它恰好意味着对一位没有资产却有许多富翁朋友的总统进行罚款;<sup>⑤</sup>这一处罚只是象征性的,而不是真的要掏光他的钱袋,尽管我们将会明白,象征性的处罚不应当被轻视。但是这种违法的惩罚方式就能恰当地表达国家对总统行为道义上的责难吗?

有人评价公开责难既不必要、也不全面。不必要是因为,总统可因其违法行为而在普通法院被起诉,这当然是在他任期届满之后进行的,也可能在任期中,但总统的自我赦免权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不全面是因为,克林顿可能会对其犯下的所有罪行进行招供,<sup>⑥</sup>因此作为一种耻辱仪式的公开责难当然就不足了。但如果大多数民主

---

⑤ 他有一些动产,但是他的净资产却是负的,因为对他的律师费用负有债务。然而,在他离任后,他无疑将很快获得补偿。

⑥ 劳伦斯·H·特瑞伯在“怎样在不惩罚国民的情况下将克林顿送交审判”(《波士顿环球报》,1998年9月16日;第A27版)中说,“总统必须完全承认他的欺骗,并且,在没有必要坦白尚未对他指控的罪行的情况下,抛弃令人厌恶的法律技术上无辜的声明”。但是,这一平衡行动何以可能?“完全”坦白他的欺骗至少涉及到承认伪证罪的所有要素。

党人都投票支持责难,这一耻辱就足够了;克林顿不能以将此由他自己党派支持的责难解释成一记党派的耳光而得以解脱。既然总统不必成为协议的一方当事人,那么,不认罪就进行公开责难还有另一个益处,即它比经总统同意的责难所带来的制裁代价更少。

对公开责难最激烈的反对在于,宪法规定了对非司法程序剥夺权利议案的禁令。即使在其相对人同意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在法院对此提案提出异议,这种不合法的惩处方式是否就能正确表达有权部门对违法行为的责难仍旧值得怀疑。并且,克林顿也不可能同意,如果该责难决议实际上是一个剥夺权利的议案,他会让法院宣布其无效。如果对总统判罚金,它就无疑是一个剥夺权利议案了。带着惩罚的目的去实施一个诸如罚款的特有制裁,将会错误地为责难决议贴上一张剥夺权利提案的标签。<sup>②</sup>但假使删掉罚款又如何呢?一项只剥夺总统名声不剥夺总统其他任何东西的空泛的责难决议是一项剥夺权利议案吗?

这一问题无法解决。国会一向谨慎地运用责难制,而且也缺乏对此种不构成任何威胁的责难决议提出质疑的动因。在法庭上备受攻击的剥夺议案剥夺了人们的财产、薪水、养老金、就业机会以及其他货币性的物质。这些质疑从司法角度考虑,其关注的焦点在于,是否除了国会目的所演示的后果之外,国会行动的目标就是惩罚,而不是该法律对相对人造成的伤害性的后果。尼克松的案子,碰巧是惟一的由弹劾调查引起所谓的剥夺财权利议案的案件,就阐明了这一点。作为总统惯例,尼克松下台之后带走了有关文件(著名的录音带),人们担心他会毁掉其中一些资料,而这将给尚未完成的与水门事件相关的诉讼设置障碍,使有关资料的公开失去历史意义。因此国会通过了一部法律,规定由总务管理局扣留尼克松的文件和录音

---

② 见尼克松诉总务管理局局长,《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433卷,第425、486-484页(1977);劳伦斯·H·特瑞伯:《美国宪法》(1988年第2版),第642-643、646n. 25、650-655页。

带。尼克松抗议说,这部法律是一项剥夺权利的议案,以剥夺其财产的方式对他施以制裁。联邦最高法院认定这不是剥夺权利议案,因为国会并不打算惩罚他,只不过想保存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庭辩论材料。<sup>②</sup>

克林顿的案子就没有相似的理由了;假如惩罚目的就是对国会立法是否成为剥夺权利议案的检验,那么对克林顿总统的责难决议就一定是剥夺财产权议案了,因为它惟一的、不可否认的目的就是惩罚。这将产生一个问题:除了具备惩罚性目的之外,为了上升至剥夺权利议案的高度,一部法律是否必须强加上如刑事处罚之类的东西,或至少要剥夺一点具有实质意义的东西。换言之,是否纯粹的耻辱就足以成为使责难决议变为剥夺权利议案的惩罚了,这还是一个待决的问题。胡果·布莱克大法官认为,黑名单就能成为剥夺权利的提案。他引用麦迪逊 1794 年对国会决议的反对意见,表达了公众对某些组织的责备,因为,此等“责难”会形成剥夺权利议案。<sup>③</sup>对谴责进行投票表决就类似于黑名单;它会为克林顿打上干坏事的人的印记,还会剥夺他诸如大学校长之类的雇用机会。

可以说,决议的措辞是中肯的,如果它仅仅表达了不赞成而不是责备的话,它就不会上升至剥夺权利议案的程度。毫无疑问,决议过于平淡而不能被视为一种惩罚。不赞成和惩罚不是同义词。但同样,不赞成也不是一个极好的可以取代惩罚的手段。

研究刑法的学者们重新恢复了对与责难总统问题有极大关系的

<sup>②</sup> 《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 433 卷,第 478—480 页。

<sup>③</sup> 反法西斯难民联合委员会诉麦格瓦斯,《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 433 卷,第 123、第 144 页, n. 1 (1951 年判决)一致同意的法官意见。又见大卫·P·库瑞尔:《国会中的宪法:联邦主义时期,1789—1801》(1997),第 191 页,似乎同意麦迪逊的观点。



羞辱刑的兴趣。<sup>③</sup> 例如,一位性侵犯者在他前院张贴一张布告,上面写道:“我犯了性骚扰,”或让一位肆意破坏者穿着制服清扫人行道。不会有人怀疑这就是刑罚;如果国会把这些施加给各个罪犯(使羞辱刑成为对某类犯罪批准的、或要求的制裁,这不同于通过一部有望实际操作的一般法律),那就是剥夺权利议案。赞成对克林顿总统进行公开责难的人认为,它就是一个羞辱刑,但如果这么看待的话,却想不出它怎么能与剥夺权利议案的禁令相符。

无论责难违宪或不违宪,有意义或无意义,属于或不属于惩罚,在逐步走向众议院弹劾的历程中,通过对责难的投票表决来解决事情的可能性为民主党提供了一处避风港,却为共和党织就了一个陷阱。如果克林顿总统一时失足而公众开始反对他,民主党就会说他们早就知道他是个坏蛋因而决定责难他,要不是因为公众不想弹劾他、而弹劾又会大大损害政府职能,他们差一点就弹劾了他。假如共和党也赞成责难,他们在这场争论中也许是串通一气的。假如反之他们认为(如他们在弹劾争论中所作的一样)责难是违宪的,是效果不大的温和惩戒,是避重就轻的认罪,或是不能为人们接受地降低弹劾标准——或是弹劾或什么也不是——那么,假如公众反对总统,共和党就会说,“我们早就说过了——他应当被弹劾。”

一旦克林顿被弹劾,对共和党来说,责难也变得更具吸引力了。它提供了一个对可能破坏政府事务的参议院审判进行阻碍的方式,一旦国家在几年后陷入困境,民主党就能指责共和党当初定要坚持审判。而且,以孤立的眼光看,责难只能算作效果不大的温和惩戒,而假使责难的措辞严厉、明白无疑,且要么总统表示同意或国会两院中的大多数民主党人都投票支持,那么,将弹劾和责难联系起来看就

---

<sup>③</sup> 例见,且·卡安:“可供选择的惩罚意味着什么?”,《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1996),第63卷,第591页;卡安:“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种羞辱”,《华尔街杂志》,1997年1月15日,A16版;托尼·M·马萨罗:“羞辱的意义:对法律改革的含义”,《心理学,公共政策与法律》(1997),第3卷,第645页。对不知羞耻的罪犯,这些惩罚被更恰当地表述为“当众受辱之罚”。



不是如此了。但是由于宪法授权给参议院履行对被弹劾官员进行审判的职责,一旦克林顿总统被弹劾且弹劾地点就此转移到参议院,而参议院为确定总统罪行的严重性没有事先进行任何形式的审判就作出责难决议,那些参议员们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责难对于减少刑事起诉总统的压力来说,具有实用价值。一个反对弹劾的观点是,能正确决定行为有罪性的组织应是刑事审判。即使一国最高官员也要遵从普通法律程序的理论成为纠正性司法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理论是法治理念的基础。但一些基本原则最好留有余地而不必太完备了。即使延至 2001 年他下台之后再对其进行实际的刑事起诉,也会让我感到滑稽可笑。我并不认为提议总统有资格享有对其有利的、宽大的诉讼自由裁量权就是主张君主制——事实上是如此宽大以至于会因他在就职前或任期中犯下的、不能被理智地描述为恐怖的罪行遭到起诉而原谅他。难道说责难决议给人贴上罪犯的标签所带来的耻辱还不是对一位高贵人士足够的惩罚吗?起落点越高、失宠就越大。克林顿经证实了的犯罪行为尽管应受责难,但还不令人恐怖。他已受到了羞辱,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受到了玷污,而这一污点也许是不可磨灭的;再加上责难,即使责难不过是还称不上是象征性的实际惩罚的表达方式,那也许就是足够的惩罚,会令除极具报复心的反对派之外的所有人满意了。

刑事起诉的可能性将为 2000 年的总统竞选蒙上一层阴影。参选者们将会被问及他们的立场,假使克林顿没有赦免他自己(或即使已经赦免自己——因为至少对自我赦免权还存在一小点疑虑),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赦免他。总统竞选将会变成对克林顿的复决投票,而民主党参选人会承诺,为给长期拖延的克莱事件划上一个句号,他们将赦免他,共和党参选人则发誓要采纳刑事制裁程序。各种谣言纷起及其产生的后果给美国政治、社会和法律史上添加了一个迷人的篇章。但这已经足够了!

当克林顿的家人 1998 年 12 月 19 日、就在总统弹劾之后出现在

玫瑰花园时,他们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sup>②</sup> 这表明了尽管所有过度党派偏见的指控都是针对共和党的,而且他们在促成弹劾的路上犯下许多可耻的错误,弹劾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有力的、正当的羞辱刑。所有那些保留的是,希望克林顿就其撒谎和违法行为作一个全面、坦白的招供。经过弹劾和招供之后,责难决议、罚款、审判、定罪、刑事起诉——所有这些都是多余的。弹劾加上招供就是既合法又有效的羞辱刑,而责难就是多余的了。但其实不然。

假如惟一的制裁有可能就是进行责难,人们就很难找到审判的意义何在了。此案似乎是,必须进行足够的“审判”,才能不因未听从众议院委派的参议院中起诉克林顿的十三名国会议员而冒犯众议院。对此我不敢苟同。当然,假如克林顿认了罪,就没必要进行审判了;而且我已说过,也没必要作出责难决议了。但因为他没有认罪,就有必要进行审判,对此有两条理由。第一条是,众议院通过的弹劾罪状超出了独立检察官收集的证据所能证实的,至少假如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或明确和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弹劾审判中正确的证据标准。可以说,当惟一给犯罪总统的制裁就是责难时,承担更轻的责任才是恰当的,但是假如仅仅因为它会给整个程序蒙上一层阴影,这一观点就值得怀疑了。我们还不能根据刑事程序的要求肯定地说,总统是否已被证实犯罪。

第二个反对将审判废除或删除的理由与第一条极为相似,甚至与反对给纳粹头目即时处罚的观点有那么一丝关联,而即时处罚正是英国人率先提出以取代司法程序的。即时程序会使事实不能确定、因而有待证实。对纳粹头目的罪行并没有太大怀疑;人们也不怀疑克林顿犯下了我在第一章讨论的罪行。但是当不允许依法律程序进行时,这就公开地引出了历史修正论。拥护克林顿的人就能说,“我们怎么知道莫尼卡·莱温斯基说的是事实?她从来没有被盘诘过。琳达·翠珀也没有。弗依·乔丹和贝蒂·奇莉也未获准向富有同

---

<sup>②</sup> 在克林顿开始讲话时。他一开始讲话,他就又重新获得了他惯有的沉着冷静。

情心的审问官讲述她们的故事,而她们本应当在审判中作证、为自己辩护。波拉·琼斯的律师们没有受到询问,因此大批右翼党同谋分子布下的、阴险狡诈的诡计就没有充分地暴露出来”。而一个完全的审判将使这其中的大部分问题埋藏于地下;进行部分的审判也会使其中几个埋藏(克林顿的律师决定不去盘问莱温斯基)。如果一个完全的审判不必经过责难、认罪就以无罪判决而告终,它就不成其为太大问题;假使在目前条件下总统弹劾程序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政治化,那么无论定罪或无罪,都不会就有关事实和法律偏袒何方的问题为我们提供可信的指导。即使不考虑后果,总统的违法行为也会在整个国家中被公开讨论。因为,这是一个既未认罪也不进行责难的、以无罪宣判告终的、被截掉尾巴的审判;但是考虑到其他的惩罚方式,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能期待的最佳的方式了。

有人提议另一个可“明确”有罪或无罪的选择方式。这是因为参议院的裁决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克林顿是否犯了弹劾罪状中所指控违法行为的结论。第二部分是关于——如果真有违法行为的话——该违法行为是否能上升到重罪和轻罪程度的结论。那些认为责难是符合宪法的民主党人说,因为宪法弹劾条款中没有有关规定,该份两部分的裁决是违宪的。他们前后两种看法不能一致。每一种的动机都是带有政治性的。如果参议院发现克林顿犯有伪证或其他妨碍司法的行为,却因全体民主党都投票支持无罪判决就判其无罪,他们就会对其选民作解释(你怎么能让一个被判决作伪证和妨碍司法的人继续任职呢?),而对民主党派总统罪犯的责备就会成为他们解释的一部分。责难可以让民主党表达他们对总统行为的非难,而不必对他们为何非难他作出特别说明。

由两部分组成的反对裁决的观点是,如果责备如同措辞强烈的责难决议,即使没有施加任何实质性的惩罚——除了责备本身什么也没有——它也是一种“权利剥夺”,而第一部分就成为一个剥夺权利议案。假使不存在审判,而所有参议院所作的不过是宣布总统干了坏事,以上观点就具有说服力了。但是因为结论必须作为审判程

序本身的一个部分,而在审判中参议院履行的是司法职责而不是立法职责,它就不能被仅仅看做一项剥夺权利法案。结论是司法程序中一个通常部分。在没有陪审团的联邦民事审判中,法官被要求在作出判决的途中提出事实调查结论和法律结论。<sup>③</sup> 如果是有陪审团的审判,法官就能要求陪审团回答有关事实的特定问题。<sup>④</sup>而在没有陪审团的联邦刑事审判中,任一方当事人都可要求法官作出事实调查结论。<sup>⑤</sup> 在弹劾审判中采用此种程序将会使其后果成为一个更有利的先例。而对克林顿总统盲目宣判无罪就会使得如下问题没有答案:弹劾罪状中宣称的违法行为是否还没有上升到重罪和轻罪行为的程度,是否那些证据还不能充分肯定地证实那些指控。而分为两部分的裁决排除了这种不确定性。

总统有资格要求第一以及(当然)第二部分中对他不利的结论要由三分之二的参议员通过。因为假使该结论作为一种惩罚来运作,那么,降低三分之二参议员通过的要求就能使参议院仅仅大多数通过而认定犯罪而进行惩罚,从而延期审判而防止他获得无罪宣判。

有了这个适宜的保障措施,两部分的裁决就是符合宪法的,而且,无论判决是有罪抑或无罪,它都具有我曾提及的一个优势——使之成为将来的弹劾争论提供一个更有价值的先例。但这可能是不明智的,而且有理由加以拒绝。参议院即便是正在进行弹劾审判,在实质上也不是一个司法机构。参议员在克林顿审判中的行为可以驱散任何与此相关的疑虑。正如我在第三章指出的,如同普通审判中的陪审团成员,几乎所有参议员都应因带有偏见这一有说服力的理由而在总统审判之前被取消资格,而他们后来却令人怀疑地被取消资格,只不过因为他们所作的公开陈述以及他们在审判中签订的单方合同。除了在弹劾审判中作为陪审员以外,参议员还可作为法官(初审

---

③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 § 52(a)。

④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 § 49。

⑤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 § 23(c)。

和上诉法官融合成一个),从资质和经历看,其中的极少人能胜任。参议院的审判因太讨好民众、反对司法,而不能被认真地作为确定事实程序看待。参议院所作的有关总统是否犯下弹劾罪状中宣称行为的结论也是不可信的,它只是以司法判决的形式伪装起来的责难。



## 第六章

# 文化抗争

作为莱温斯基丑闻及其余殃之后果,克林顿成为了美国政治和文化中一个两极分化的人物。令我深有感触的是,“知识阶层”在弹劾问题上,以及在更加广泛的对整个事件的适当评价上怎么会出现如此强烈的意见分歧——我用“知识阶层”这个词界定受过很高程度教育的人,在我们这个国家主要是指学者和新闻记者,他们以写书或者写文章来讨论有重大社会和政治意义的事件。

把两极分化和意见分歧区分开是很重要的。人们在怎样严厉判处克林顿的行为、斯塔尔和其他支持玩这场游戏的人的行为,以及弹劾是否是合适的响应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不足为怪。让人奇怪的,或者至少是需要解释的倒是意见分歧的情绪性。争论问题的语调,一些知识人的鲁莽,包括一些学者<sup>①</sup>在可能知道事实真相之前感情用事地、武断地偏袒,在知悉情况后他们拒绝面对事实,不承认对手所提出的看法有任何可取之处,他们的夸张、扭曲、过于简单化的倾向,以及由卷入公共讨论的许多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全然不讲道理——所有这些都是问题引致的情绪性的表现。对大部分显然是真实的(也有否认)犯罪和不道德行为的指控以及而后的否认,公众观点存在着如此强烈的两极化,暗示着其与爵弗斯案的类似,尽管在那

---

\* 原文为 The Kulturkampf,本意是指罗马天主教会与德国政府之间从1872年到1887年在控制教育、民事婚姻等问题上的斗争,见《韦伯斯特新世界大学辞典》(1996),第751页。——译者注。

① 在下一章我给出了学者在克林顿-莱温斯基困境中“丧失冷静”的额外例子。

里陈述明显是虚假的——这使得克林顿案与爵弗斯案有所悖逆。

关于克林顿的公众观点的范围相当广泛。一端是克林顿的仇家,和他们紧挨着的则是宗教右派,用人们习惯的叫法,即道德大多数。这一群体不仅包括南部福音派新教会教众——宗教右派的传统核心,而且(略作扩展)也包括像威廉·本尼特和理查德·约翰·纽豪斯这样保守的天主教徒。与之相差不远、有着世俗爱好的是社会保守主义者(如罗伯特·伯克、艾尔文·克里斯托尔、威廉·克里斯托尔以及《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作家),他们现在与宗教右派结成了密切的同盟;就其主要目的来说,宗教右派和世俗的社会保守主义者可以合称为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sup>②</sup> 在该范围的这一部分中我们也能找到国会中的一些共和党领袖,他们一再要求弹劾,这部分是基于政治利益,部分则是出于定罪的目的。在危机之初,许多记者、社论作者以及共同事业型“良性政府”改革的倡导者,并不以拉帮结派著称<sup>③</sup> (不像《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作家,自克林顿就职以后就一直在与其作长期斗争),<sup>④</sup> 他们组成了要求克林顿辞职或者迫使其离任的大合唱。在该范围的另一端有黑人,<sup>⑤</sup> 女权主义者,民主党人,环境主

② 对此群体的一个苛刻但很敏锐的解剖(自然是集中在它的极端成员的最极端的观点上),见安德罗·索理文:“放低嗓门”,《纽约时代杂志》,1998年10月11日,第46页。如果他们有一位哲学权威的话,那就非阿拉斯德尔·麦克印泰尔莫属了,对他的“软性反自由主义”的挖苦描述,见斯蒂芬·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1993),第四章。当然,在麦克印泰尔与杰里·法威尔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我称之为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的群体鱼龙混杂,因而我对它的描述刻画对它的所有成员来说是不精确的。我称“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moralistic conservatives)而不称“道德保守主义者”(moral conservatives),是因为我的兴趣在态度,而不在行为;众所周知,这些常常并不一致。

③ 他们愤愤不平,这不仅因为克林顿撒谎,也因为克林顿在他1996年重新选举运动期间对运动经费的出入有难辞其咎的参与。后来他们没有再要求他辞职或者弹劾。

④ 攻击克林顿的社论和社论版文章现在有四卷(《杂志简报——白水门》),这可以从《华尔街日报》处买到。评定杂志攻击的正确性是不可能的,有些明显是夸大了,有些则太过投机取巧,而另外一些,甚至那些与克林顿-莱温斯基纠葛不相关的,可能会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对克林顿的全部行为的一个尖刻但不是毫无道理的评定,见安·H·克尔特:《重罪和轻罪:对比尔·克林顿的诉讼》(1998)。

⑤ 见杰·罗德林格,“克林顿最后的朋友”,《每周标准》,1998年9月28日,第12页。

义者,以及左派学者(其范围从略微处于克林顿左边的“左派自由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激进派)。我正在用一把宽刷子涂划,这不仅因为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存在着重叠,也因为并不是每一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同意群体的主流或者限定性观点。就我的目的来说,一个粗略的生物学分类就够了。

我想考察为什么这些群体,事实上是这些倾向,分成了队列,就像它们已经分出的那样,因为这将为争论的情绪化的强烈程度提供一条线索。起初,国会中的共和党领袖似乎纯粹只是为了政治好处才对丑闻进行煽风点火的;在好处随着 1998 年 11 月的选举似乎不复存在时,它们后退了。他们因为过高地估计自己而冒了风险,这大概是在错误计算下,而不是在强烈情感的干扰压力下进行的。此外,也可能部分是为了回应克林顿一而再含混其辞地防守,即便存在明显的政治风险,领导层还是坚持弹劾。

在莱温斯基丑闻公诸于众之前的很长时间,克林顿的仇家就已经组成了队列,这正可谓多多益善。仇视克林顿现象也需要解释。在冷静客观的意义上,克林顿的一些仇家可能有点多疑。谣言长久地围绕着克林顿打转,那些精神波动的人们有时就受到了关于高层欺骗的谣言难以抵抗的吸引,并且不加批评地轻信了这些谣言。然而,很多克林顿仇视者不知不觉地就和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对克林顿的强烈(当然不是病态的)厌恶融合在了一起。

为什么保守主义者会如此不喜欢克林顿,这是一个神秘的谜,<sup>⑥</sup>部分的解释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虽然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受到了媒体的极大关注,但美国的大多数保守主义者可能都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道学家。比之于威廉·布克雷和杰里·法威尔,他们更接近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不管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他们支持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他们希望政府致力于对国民的保护和对严重

---

<sup>⑥</sup> 对此疑惑的一个简短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见大卫·马瑞利斯:《克林顿的奥秘:四分半钟的演讲展现了这位总统的全部人生》(1998),第 92 页。

犯罪的压制,并且在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上有所节制;他们对社会的“道德氛围”不是太担心,因而也不太关心同性恋、流产、淫秽物品、以及娱乐性毒品的使用;他们不喜欢社会主义者,也不喜欢清教徒式的集体,他们想要强大的、繁荣的和自由的社会。这些人没有理由强烈厌烦克林顿总统。他们不同意他的所有政策或任命;他们不喜欢他反对学校代用券,不喜欢他奉承工会或者继续支持贴有“肯定性行动”标签的极端倾向;他们也开始担心,他是不是患有严重疯癫。但是,他们喜欢他对自由贸易的强大支持,他的福利改革,他在预算平衡上取得的成功,他对付犯罪的强硬路线,他留用艾伦·格林斯潘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任命罗伯特·鲁宾为财政部部长,他不关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个人财富的急剧增加,他愿意同国会的共和党人妥协,他意图改革授权程序,以及最近他把联邦年度预算盈余主要用于减少国家债务(他的“保证社会保障”计划的精要),而不是用作新的政府计划基金的倾向。他们喜欢他已经把政治范围的中心向右移这一方式。他加强了里根的改革,你不再会听到人们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贪婪的十年”或者诋毁收入不平等。将白宫中的林肯卧室出租给富有的竞选捐款人为改变一切的战争——一项自由主义的计划——开辟了新的战线。近来,克林顿在国防事务上采取了强硬路线。从政策角度看,克林顿同尼克松·洛克菲勒共和党人,甚至同乔治·布什、鲍伯·多尔、杰拉尔德·福特共和党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就像民主党已经消失,共和党已经裂变为以克林顿为首的左翼(尼尔森·洛克菲勒、威廉·威尔德)和以特伦特·罗特和汤姆·德雷为首的右翼(邓·奎尔、杰西·赫尔姆斯)。

自由保守主义者仍然对克林顿有所警惕,因为他们知道他乐意用左派来治理——证据是他的社会健康计划。但是,自从1994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人控制了国会,克林顿就否决了这一选择;优雅地、或者至少是非常爽快地(有人会说是缺乏原则的爽快),他已经向右抢风航行了。自由保守主义者疑心,布什总统的第二届任期或者多尔总统在对他们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上明显右居于克林顿。一些人觉



得,克林顿作为民主党人事实上使他能够比多尔或布什治理得右一点;还有些人觉得,他的包容政治(尽管大部分只是象征性的)在维持社会和平方面有价值——它对长久以来一直没有达到的黑人和其他不满的少数民族的主流化做出了贡献。的确,他一被弹劾,并且随着1999年在参议院正在进行审判的时候发表的国情咨文,总统加速端出了名副其实的高昂政策建议(有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格林机关枪。但是,人们认为,他只不过是在向公众的眼睛里投撒沙子,共和党人的国会决不会通过即将卸任的总统提出的野心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议。

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事实上是与自由的保守主义者相一致的,<sup>⑦</sup> 要不然,共和党肯定会彻底飞离。尤其是,他们都同意个人责任的重要性。他们相信自由市场(尽管他们比自由主义者的热情要低),因为他们认为,人们应当共同对他们自己的经济选择和业绩承担责任。简言之,他们相信,权利总是伴随着责任。这一信仰产生了一个鸿沟,一边是所有的保守主义者,另一边是自由主义者,这些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人们并不对他们的经济成败负完全的责任或者因为他们的反社会行为而受到彻底谴责,顺便提一下,这一信仰并不需要“自由意志”的形而上学底色,<sup>⑧</sup> 它们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冒犯保守主义者的不仅仅是克林顿的不法行为;还包括他拒绝对他们负责——他在允许道歉上固执己见,并且坚持对他的不负责任不付出任何代价地“继续向前”,就像他是一个孩子似的。自由主义者更喜欢把成年人看做孩子,这具有家长制作风的意味,自由

---

⑦ 这在诺曼·珀德霍茨的话语中很明显,见诺曼·珀德霍茨:“克林顿、国家与政治文化:专题论文集”,《评论》,1999年1月,第20、39-41页。珀德霍茨是新保守主义者的领先人物,新保守主义者是一个越来越与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联合在一起的群体,《评论》则是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领先刊物。该论文集以其郑重谨慎而著称,里面收集了珀德霍茨的话,也收集了许多其他的新保守主义者和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的话;有人意识到了1998年11月选举的惩罚性后果。

⑧ 例见,W·V·奎尼:“事物以及它们在理论中的位置”,《理论与事物》(1981),第1、11页;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1990),第171-179页。



主义政策的倾向是家长主义的。

但是,在克林顿问题上,义愤填膺的并不是自由保守主义者。对他的政策的一个更加广泛的同意,缓解了他们因为他的不负责任而对他的敌意。对克林顿表示强烈义愤的是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原因在于他们对克林顿与他们有分歧的那些问题感受最强烈:同性恋、婚前和婚外性生活、女权主义以及流产。<sup>⑨</sup> 这些分歧,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可能与任何民主党总统都有分歧,甚至也不能解释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对克林顿的敌意的强烈程度(因而,就解释过程而言,支持他的强烈程度处于政治范围的另一端)。愤怒的原因不是因为克林顿说了和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什么。在此方面,戴维·贝尔将克林顿与尼克松作了对比:

然而,以这些意识形态移转中的获胜方[在尼克松的场合,是作为大社会维护者的自由主义者,而在克林顿场合,则是作为里根改革的维护者的保守主义者]的眼光看,每一方都成了对没落方最藐视的象征。对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尼克松代表着美国五十年代的黑暗面:偏执多疑、充满怨恨、狭隘、不值得信赖、还有贪婪。他是乔伊·麦卡锡的挚友。而对九十年代的保守主义者来说,克林顿代表着美国六十年代的黑暗面:不负责任、不守道德、不爱国、不值得信赖、以及恣意放荡。他是珍妮·方达的挚友。在每一场合,男子汉不断从挫折困境中恢复的能力只是加剧了仇恨。<sup>⑩</sup>

克林顿属于六十年代的那一代人。他在做学生时曾经吸过大

---

<sup>⑨</sup> 对此分歧可以给出一个名字: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他是道德保守主义者极其厌恶的一个人物。例见,罗伯特·H·伯克:《无精打采地走向罪恶之所:现代自由主义和美国的衰落》(1996),第59-61页。

<sup>⑩</sup> 戴维·A·贝尔:“理查德·米尔豪斯·克林顿”,《新共和国》,1999年1月18日,第18页。另见斯蒂芬·斯都罗尼克:“克林顿总统和‘第三条道路’政治的风险”,《拓展》,1996年春季号,第10页,下文将作更加完全的讨论。

麻；在越南战争期间则逃避兵役；他还是一位通奸者；他是耶鲁法学院的能耐梗；他缺乏做领导者的高贵品质，他甚至在公共场合谈论他的内衣；他是好莱坞明星迷；他“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任命公开的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进入联邦高等职位；他的妻子是一位刚毅自信的职业女强人，这使得他相形见绌。现在他以在白宫办公室的综合场合“离经叛道的”性行为以及一连串用以掩盖的谎言将所有的这一切都结束了。对右派道德说教主义者来说，他是一名狂欢式的闹饮者、无赖、暴乱王子、价值无涉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也是如此娴熟的一名骗取他人钱财的艺人，以致于美国人在心里找不到因为他可恨的行为而恨他的那种感觉。对 1968 年前道德和礼貌意识表现为其持久形式的任何人，以及那些认为国家从那时起已经遭受了一次急剧的道德滑坡的人来说，此人就是一个下流无耻的家伙，而不管他的政策如何。<sup>①</sup>

1996 年，政治科学家斯蒂芬·斯郭罗尼克就曾把克林顿和尼克松、伍德罗·威尔逊一起归结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例子，这是很有先见之明的。<sup>②</sup>“第三条道路的领路人，如克林顿，试图……占领一块新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带主要是由他们的对手划定的”。因为他们“害怕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使用由他们的对手苦心经营出来的许多活动领域，而激起统治联盟内部的不满”，政治竞赛“在总统故意污损已经得到的身份和他的对手努力维持那些由来已久的身份不被损害这二者之间展开”（第 11 页）。因而，与“第三条道路政治”相似，产生了总统的“可靠性和可信性”问题。有时，因为走第三条道路的总统的平衡行动不稳定，也“带来了总统权威的急剧下落”（第 12 页）。斯郭罗尼克以安德鲁·约翰逊、威尔逊和尼克松为例，现在他也可以把克林顿加上。因为这些“可靠性和可信性”问题，因为“第三条道路的规划趋于被人们描述为对真正改革负隅顽抗的花招”，还因为

<sup>①</sup> 例见，伯克，前注⑨，第 341 页。

<sup>②</sup> 斯郭罗尼克，前注⑩。

对手因之寻找“关于一个人怎样利用总统职位去否认他自己的真实情况以及把自己装扮成别的什么的报道”，所以，“对在任者来说，没有什么特性比一种不可以受到弹劾的品性更加有价值了”（第13—14页）——一个克林顿太晚才学到的教训。

自由的保守主义者和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这二者之间最严格的区别在于，无论目前怎样，前者是乐观的，后者是悲观的。自由的保守主义者醉心于共产主义的倒台、自由市场的胜利、繁荣热潮、技术革命以及社会问题的减少。而对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而言，共产主义的倒台是一剂镇静药，因为他使我们丧失了魔鬼似的敌手，从而软化了我们；社会问题的减少只是毫无意义的瞬间即逝的亮点；财富和技术正在削弱我们的道德价值。“我们的整个文化都在经受衰败……当我们靠近其荒凉而脏乱不堪的周边时，智慧之人的悲观主义告诉我们，罪恶之所会是我们的最终归宿”。<sup>③</sup> 既然那会令那些以此方式来看待克林顿被弹劾的人雀跃欢呼，理解左派强烈抵制弹劾也就更加容易了。

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对克林顿的仇怨异乎寻常地映射出许多（尽管可能不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他的喜爱。这是新鲜事情，至少在范围和深刻程度上是如此。在莱温斯基丑闻爆发以前，许多自由主义者要么对克林顿不冷不热，要么在事实上不喜欢他。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些自由的保守主义者更加不喜欢他——他的政治中间派成员、广义上还有自由的政策以及主要的任命。黑人和女权主义者要喜欢他一些，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实施包容政治方面的技巧，

---

<sup>③</sup> 伯克，前注⑨，第342—343页。“荒凉而脏乱不堪的周边”显然是由“现代自由主义的野蛮人”点亮它的“火炬”之后“美国的智识和道德资本”。同前。伯克后来写道，如果克林顿被罢黜，“那将是我们到了拐弯处的一个明显标志，即美国人的道德，包括而又限于我们的政治道德，正在自由下滑”。罗伯特·H·伯克，“清算克林顿主义的代价”，《美国旁观者》，1998年11月，第55页。

这一政治把打动人心的花言巧语和引人注目的任命结合在了一起。<sup>⑭</sup> 那是一种偏爱拥护利益群体中的更加明智、更加能说会道、在政治上更加积极的成员的政治,这并非附带提及,因为他们正是那些与总统交往亲密并受到总统任命的那些人。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喜欢克林顿是因为他的聪明,他在政策问题上的真诚兴趣。其他人——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的镜中影像——喜欢他是因为,他代表着那种原始的超凡脱俗,这是一种在美国大学很时兴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与女人私下的行为比之于老式调情者的要更加不合常规。然而,民主党成员对克林顿显然很冷漠,因为他缺乏对传统自由主义虔诚的尽职尽责,也因为他在与国会的共和党人达成暂时妥协后就明显满足了,而把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以及像工会这样的主要选举团体晾在外面吹冷风。

当独立检察官对克莱事件及其余殃的调查集聚力量,并随着共和党人弹劾的号召出现时,对克林顿支持的少有的同意和激剧也发生了。几乎所有意见不一的自由主义的和左派的观点都团结起来支持他,<sup>⑮</sup> 这常常丢掉了所有的均衡感,并且,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在克林顿寻求生存的斗争中成败攸关之时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古怪结合。对戴维·弗罗姆——一位道德保守主义者——来说,“在莱温斯基丑闻中,生死攸关的是……小山狸的核心信条:性,只要是合意的,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对之进行道义审查”。<sup>⑯</sup> 从通道的另一边,我们听

<sup>⑭</sup> 并且他总是和黑人有一种非常融洽和谐的关系。例见,戴维·马拉尼斯:《班级第一名:比尔·克林顿传》(1995),第293-294页。

<sup>⑮</sup> 有一个少见的例外——来自于在今天被认为是极左派的严厉攻击,这在《华尔街日报》上随处可见——见帕特里克·H·卡德尔和马克·柯普:“自由主义的义愤之死”,《华尔街日报》,1998年12月23日,第A14版。另见瓦尔特·夏丕罗:“盲目的忠诚:为什么自由主义者还要支持克林顿”,《新共和国》,1999年2月1日,第12、13页。他问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热情洋溢地维护克林顿令人讨厌的法条主义中抵押掉了他们自己的统一”,他还说:“在民主党混淆个人效忠与政治原则的过程中,有某种东西摺了披拿巴主义一记耳光……民主党人坚持要崇拜一名地地道道老式的、温和的、是共和党员的总统”。

<sup>⑯</sup> 戴维·弗罗姆,“审判中的一代”,《每周标准》,1998年2月26日,第19、23页。

到了小阿瑟·施尔斯辛格庄重的语调：“独立检察官的所有控诉全部源于总统对其自己性生活的撒谎……对性生活撒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犯罪……君子对性生活总是讳莫如深。只有下流无赖才对其性爱实话实说”。<sup>⑩</sup> 对弗罗姆来说，克林顿是性不道德者；而对施尔斯辛格而言，他是一位绅士。其实，他两者都不是，他是淫荡好色之徒。

弗罗姆和施尔斯辛格都允许以他们在性道德上的不一致来模糊所讨论的行为，模糊几乎是意外发生的性行为。

性事小，撒谎事大。以下他[克林顿]对法治和司法程序的不尊重和损害也是如此，这一程序有赖于它在真实的证人证言上有效运作。一个接着一个的在法庭上撒谎、鼓励他人参与支持他的谎言、宣誓假证以及教唆伪证；妨碍司法；借助于处于其自由裁量权之下的政府官员和雇员——他的私人秘书、白宫新闻发言人以及其他助手人员、内阁和国会成员——都是由纳税人供养的人——去传播和支持他的谎言；他对司法誓言漫不经心的藐视；他不明事理地、史无前例地借助行政特权让下属不要在法庭上提供正式的证据；他利用总统的“天字第一号讲坛”哄骗美国人上当；在为掩盖发生在椭圆形办公室内的尴尬恶作剧而进行的孤注一掷的、不合法的、而最终也是不成功的努力中，为了移转对其不轨行为的注意力而对其控诉者进行焦土式的、不逮捕任何人的攻击。<sup>⑪</sup>

这是争论应该集中讨论的行为。但是，如果反对克林顿的核心不在于他是一个撒谎者甚或一名罪犯（因为右派几乎没有对由伊朗

---

<sup>⑩</sup> 小阿瑟·施尔斯辛格：《弹劾的背景与历史》，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前的陈述，1998年11月9日。

<sup>⑪</sup> 菲利浦·埃尔曼：“为了降低声音的争论——克林顿的‘私人道德错误’和斯塔尔的‘托克马韞（Torquemada，1420—1498，西班牙调查局首席调查员——译者注）调查’”（1998年10月15日，未刊稿），第3页。埃尔曼现在退休了，他以前是司法部助理副部长，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由肯尼迪任命并再次任命），法学教授，华盛顿律师。



门事件的参与者所犯的罪行表示愤慨),<sup>⑩</sup> 而在于他令人讨厌的行为和态度,那么其辩解者避开清教徒在性自由上的攻击的主张就不能作为蛊惑人心的宣传而被驳回。

在 1998 年夏天的《时代文学增刊》中,文学哲学家托马斯·纳格尔宣称:“一场闹剧,正在华盛顿上演”。他点名批评了“道德阴险和情感执拗的斯塔尔”,“耸人视听、恶毒的琳达·翠珀”,以及“盲目崇拜和孩子气十足的莫尼卡·莱温斯基”。<sup>⑪</sup> 这些刻画,在琳达·翠珀案中并没有或者可能没有存留可以提供的证据,<sup>⑫</sup> 出现在一篇从更长的文章中节录的关于隐私的文章的开头,那篇长文在克莱事件曝光前已经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过。<sup>⑬</sup> 在该文中,就像《时代文学增刊》的缩写一样,纳格尔无懈可击地认为,人们有权对他们的性生活保密。但是,通过对比关于克莱事件的调查,纳格尔,像弗罗姆、施尔斯辛格一样,把注意力从酿成调查以及弹劾质询的问题:妨碍司法问题那里移开了。此外,纳格尔忘记了他在更长的文章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隐私是权利的同时也是义务。私下不合常规的行为自由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不要对其不合常规过于招摇;炫耀招摇会使之成为公共问题(第 12—17,26—30 页)。克林顿并不想让他与莱温斯基的事情公之于众。但是,他冒了有可能使之公开的极大风险。这一风险变成了现实,就像纳格尔所预言的,结果产生了纳格尔正确地认为应该是私人行为的公共问题。

---

<sup>⑩</sup> 当人们考虑亨利·海德对欧利文·诺斯妨碍司法的公开辩护(在克林顿弹劾过程中被引用来反对他),布什总统对卡斯珀·威恩伯的赦免,以及共和党人谴责独立检察官劳伦斯·瓦尔希因参与该事件而无视法治,这就被温和地提了出来。见劳伦斯·E·瓦尔希:《独立检察官对伊朗门事件的最后报告》,第一卷:《调查和起诉》(1993 年 8 月 4 日),第 559—566 页。

<sup>⑪</sup> 托马斯·纳格尔:“撕破公共隐私:对华盛顿近期事件的沉思”,《时代文学增刊》,1998 年 8 月 14 日,第 15 页。

<sup>⑫</sup> 尽管当纳格尔把她刻画为“苍白的和吸毒的”时,已经发行的她与莫尼卡·莱温斯基的谈话录音还不足以支持这一刻画。

<sup>⑬</sup> 托马斯·拉格尔:“隐瞒与揭露”,《哲学与公共事件》(1998)第 27 卷,第 3 页。

美国人的性道德是多元的。对通奸、口交、性电话、年轻女子与中年男子之间以及顾主与雇员之间的性关系,同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态度;它们共同存在,这部分源于心照不宣的默契(最后的、最没有保障的):这些都是私人事务。通过迫使这些态度进入口角之争,克林顿酿成了积怨深厚的文化抗争,这是本章的标题。人们可能会要求纳格尔对此有个交代,也会期望他去尝试着在他对克莱事件调查的谴责,与他在更长的那篇文章中的观点:“对雇员或者学生的性强制在法律上应该能够提起诉讼,这是一件好事”(第27页),这二者之间作出协调。波拉·琼斯控诉一名顾主的性强制,而克林顿运用非法伎俩阻挠她证明的努力。纳格尔何以对那些伎俩表示同情的同时又赞成性骚扰诉讼呢?

很著名的是,康德在反对撒谎<sup>②</sup>与赞成遵守法律规范<sup>③</sup>这二者之间划分了非常严格的界限,这些见解仍然保留在现代哲学之中。<sup>④</sup>我倒希望有像纳格尔这样的道德哲学家就撒谎的、经常违法的总统写一写东西,或者直言不讳地批评总统,或者要么一般地、要么具体地在克林顿总统此案中解释为什么撒谎和非法不是严重的道德疏忽。我还希望纳格尔考虑哲学家斯塞拉·玻科如下评论的有效性和中肯性:“极少有孤立的撒谎……撒了一个谎之后,总是需要越来越多的谎话来圆谎;撒谎者总要做更多的修修补补……撒谎者为了支

---

② 例如,“因而,在所有的宣言中,要说实话(诚实)是神圣的、毫无条件的理性命令法则,这没有任何目的便利可言”。伊曼纽尔·康德:“关于出于仁慈考虑而撒谎的假定权利”,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之关于出于仁慈考虑而撒谎的假定权利》,詹姆斯·W·伊林同译,1993年第3版,第63、65页。对被克林顿的辩护者所误解的一个可能的限定条件,请见下一章。

③ “康德的结论是,遵守事实存在的法则的道德要求是‘绝对的’”。杰维米·瓦尔德翁:“康德的法律实证主义”,《哈佛法律评论》(1996),第109卷,第1535、1545页。

④ 关于撒谎,例见,斯塞拉·玻科:《撒谎: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1978)(尽管她没有走康德那么远)。关于遵守法律规范,例见,于尔根·哈贝马斯:《事实和规范之间:法律与民主的话语理论论稿》(1996);俄勒斯特·韦瑞伯:“作为康德主义者的理性理念的法律”,《哥伦比亚法律评论》(1987),第87卷,第472页。

撑他们而投入的全部精力就是诚实的人可以自由处理的精力”。<sup>⑥</sup>

纳格尔和施尔斯辛格都不认为,性隐私具有法院应该给它一种绝对特权的超越性价值。如果真是如此重要,关于性骚扰的侵权规定就必定要予以废止,管制强奸、乱伦、父权、淫秽物品、猥亵儿童、婚内虐待、军事和监狱纪律,以及减少性传染病传播的规定也应予以废除。波拉·琼斯案中的莱特法官允许对克林顿提出关于莫尼卡·莱温斯基的质问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是,她在衡平性隐私主张与性骚扰主张上任务艰巨。所有的坏事都是私下发生的。

对许多人来说,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为克林顿调查所夸大的技术对隐私的侵蚀。没有录音带和 DNA 测试,没有电视和互联网,没有难以清除的电子邮件信息,世人就不会详尽地知道克林顿的性生活细节、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性生活细节、还有她的朋友以及以前的情人的性生活细节。人们对老式的对伤风败俗的强烈反对与新发明的电子技术的结合忧心忡忡。(同时,他们非常害怕互联网能够将危险的隐私画成暴行图表影线)。

如果右派对克林顿的行为、甚至他的性行为的批评已经心满意足了,那么,左派的反应就不会如此强烈。右派是希望把他贴上标签并且把他谴责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许多自由主义学者、城市中不同凡俗之人、以及六十年代那一代人中的怙恶不悛之辈对这种生活方式很熟悉。这使得右派对克林顿的攻击成了对他们的个人攻击、对他们合法性的质疑以及对他们有权把他们自己视为完全的公民和真正的美国人的质疑。以此方式对弹劾克林顿的行动作出反应的并非只有自我认同的左派。那些注视着南部议员谴责克林顿性不道德的黑人,让人想起白人谴责黑人在性生活上缺乏自制力的一段漫长历史。有两名黑人,弗依·乔丹和贝蒂·苛莉,作为斯塔尔调查的隐含目标被惹人注目地提到了。同性恋者很怕在政治讲坛上看到国会议员大声地谈论性的正统观念。作为全副武装的维护克林顿的这些群

<sup>⑥</sup> 玻科,前注<sup>⑤</sup>,第 25 页。

体中的成员,他们通过使他明显地与同性恋者、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好莱坞吉卜塞人、浪子不断联系在一起而确证了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的最大担忧;如此,冲突也就急剧升级了。

拥有一个敌手是令人振奋的。事实上,要是没有敌人激起足够的恐惧来遮掩在次要问题上的分歧,就很难结成联盟。右派过去常常要集结起来反对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已经死了,而克林顿则增补了许多传统的保守主义问题,比如死刑、福利改革、合理生财、预算平衡、授权改革以及现在剑拔弩张的军事姿态,按说这导致了一而再地违反战争权力决议<sup>②</sup>——在总统由共和党人担任时共和党人所喜欢谴责的民主党圣像,民主党人控诉里根和布什总统不断地违反其规定。

鉴于克林顿公然擅用共和党人的政策,留下来充当不可或缺敌人角色的就是克林顿本人了。他在莱温斯基事件中的行为使他成了匿名的、潜伏的、虽不清晰但绝对无误的对美国人价值构成威胁的能说会道的左派化身。被资本主义的胜利和大政府的名声败坏弄得神情沮丧的左派,现在正联合起来反对一个非常邪恶的威胁——巨大的右翼阴谋,这一阴谋在克林顿恢复性压抑、策划将把我们带回到五十年代的社会反革命的途中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事实上,那是某些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愿意带我们去的地方:“很难断定,撇开极端的种族隔离的终结,美国今天的文化和五十年代的文化一样健康”。<sup>③</sup>

我们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女权主义者知道,当人们说受到控诉的性骚扰的受害人,如波拉·琼斯,应该受到补偿时,并不意味着右。而当阿尼塔·希尔控诉克拉伦斯·托马斯性骚扰时,又右在何处呢?右派是女权主义者的敌人,美国人的塔里班。克林顿则是敌

<sup>②</sup> 《美国法典》,第50卷,§1541—1548。一般见约翰·H·艾利:《战争与责任:越南及其余殃的宪法教训》(1994);哈罗德·许宏鞠:《国家安全宪法:伊朗门事件之后的权力共享》(1990)。

<sup>③</sup> 波科,前注⑤,第342页。



人的敌人。除了他的个人行为外(因为和下属的性关系处于女权主义者想禁止的行为之列)他也是女权主义者可以信赖的盟友。和任何政客一样,女权主义者政治活动家们也是屡败屡战。<sup>②</sup>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在克莱事件(克林顿扮演被追逐的、忸怩作态的“女孩”,她拒绝“男孩的”——莱温斯基的——路上一而再地拉客)中,在其他性交往中,在他以前隐含的违法(雪茄烟事件)中,都可以心安理得地进行角色转换。

也存在着“邪恶选择”的问题。女权主义者以及联盟的带头人不可能——现在仍然不会——对克林顿表现出热情。但是,在1998年中期选举进行时,他们面临的却是在克林顿和共和党人压倒性的胜利之间作出选择。如果他们挽救了他,他可能会报答他们,尽管他并不以知恩图报著称。1998年1月,当丑闻第一次爆发,他们本来可以很快让克林顿下台,而提前给副总统戈尔在2000年大选中巩固其地位的机会。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辞职或弹劾明显会给戈尔(因为在公众的脑海里他是克林顿如此亲密的搭档)和民主党人带来极大的风险,以致于惟一合理的选择就是竭尽全力地为克林顿的存活而奋斗。

现实政治自有其风险。女权主义者用以贬低、羞辱克林顿与下属有性牵连,并且在逃避性骚扰诉讼时求诸伪证和其他妨碍司法行为的言辞,将会让那些在未来被控以相似不法行为的政客、以及在并不突出的性骚扰案件中的被告反治女权主义者其身。女权主义者将因为与拉利·弗霖特结盟而受到嘲笑奚落,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偶尔才有的。他们将——他们正在——因为混淆了性别平等和阶级特权

---

② 一些不是政客的女权主义者在承认总统在誓言中撒了谎上直言不讳。例见,简·贝思克·艾尔希坦:“向公众售股”,《新共和国》,1998年3月23日,第12页;林达·希尔伯曼:“给编辑的信”,《纽约时报》,1998年8月24日,第A16版。



而受到谴责。<sup>④</sup> 左派在支持克林顿时似乎是愤世嫉俗的、机会主义的,就此而言,其道德权威将会受损。<sup>⑤</sup> 左派试图为克林顿的辩护提供中立的理由,如“男孩终会是男孩”、隐私的保护比消除车间的性骚扰更加重要,来使愤世嫉俗的控诉发生转向,就此而言,左派可能正在阐明哈贝马斯的格言:“在伪称的道德和伦理理由之后公然掩盖毫无辩护余地的利益,使得自我约束成为必要,这些自我约束……使得他人的利益也卷入其中”,<sup>⑥</sup> 这里,他人指的是男孩。<sup>⑦</sup>

从一开始,为克林顿辩护的主要路线就是,丑闻以及继而发生的由独立检察官进行的调查只关乎性。并非如此,但是,这一点被如下事实弄模糊了:像戴维·弗罗姆这样的保守党人写道,克林顿对性的态度就是问题所在;国会中的共和党领袖被认为是正在威胁弹劾,因为他们认为它会和他们在道德上保守的选举人相处融洽;《斯塔尔报告》着重强调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性接触的细节。事实上,现在把主张安乐死的宗教人士和那些对宗教漠不关心的人区分开的那些问题(而不是安乐死)正是与性有关的问题,特别是与流产、同性恋、未婚性关系、通奸以及淫秽物品的正当性有关的问题。尽管克林顿夸耀吹嘘说笃信宗教,但在美国最热切的宗教人士的脑海中,他的正在广为传播的婚外性闹剧把他和宗教的敌人结成了同盟。这依次使得那些认为与杰里·法威尔或者特伦特·罗特比起来他们自己更像克林顿

---

④ “克林顿极尽非法行为之能事以确保,一种法律适用于像琼斯这样的‘贫贱白种拖车工’,一种法律适用于自负的上等人(以比尔和希拉里的朋友为代表)……当波拉·琼斯以及她的那些保守谨慎的律师厚颜无耻地以为他们也可能使用同样的策略——为了‘值得的’女人而被比尔和希拉里所美化的那些伎俩——已经很明显,以克林顿精英的眼光,这一法律只是为他们——为琼斯的上级——以及为他们的政治客户预定的”。肯尼思·安德逊:“美国人的质询:宗教右派和世俗左派在起诉国家的成长过程中是怎样密谋的”,《时代文学增刊》,1999年1月29日,第12页。

⑤ 就像卡德尔和库普所指出的,“他(克林顿)的总统职位的最后一顿晚餐花空了自由主义者的道德宝库”,前注④。

⑥ 哈贝马斯,前注④,第340页。

⑦ 见彼特·贝拉特:“私人的事情:私人的是怎样成为政治的”,《新共和国》,1999年2月15日,第21、22、23页。

(或者克林顿夫人)的人感到,斯塔尔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对克林顿的追捕具有追捕行巫者(或对政治嫌疑犯的政治迫害)的味道——而对追捕者来说,这则具有十字军远征的情调。

另一件有助于解释在克林顿问题上意见两极化的事情是,人们在同一个时候喜欢或者不喜欢同一个人(或者群体、运动)很难。我的敌人的敌人,因而也是我的朋友的人,没有必要是我的好朋友,就像克林顿在发现他自己与斯大林结盟时所不难看到的那样。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要维持这种矛盾的情感很难,尤其是在像战争,或者与战争相似(对此相似在下一章有更多的讨论)的政治斗争的背景下。既不喜欢克林顿又不喜欢宗教右派很难,因为如果你非常不喜欢后者,你会发现,因为克林顿竭尽全力地阻止他们获胜,你很难不对克林顿心怀感激或者产生疼爱之心。一些人在区分克林顿的行政职位与克林顿被奉为楷模的道德品格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他们确实不想把他视为吉凯尔和海德那个样子;他们希望他完全是这样一种或者完全是那样一种,<sup>④</sup> 而且,既然他们在他是哪种人上不能达成一致,他们就会发现他们自己正处在彼此不能充分了解的战斗营垒中。有人把另外一位复杂的政治人物约翰·F·肯尼迪在死后划分成了两个不一致的象征:

对那些渴望公共行动主义和公共允诺新时代的人来说,英雄的肯尼迪仍然是一个他们已经失去的世界的闪亮的、有感召力的象征。但是,对其他一些对理想主义、使命(首先是积极的政府)不再抱有幻想的人来说,肯尼迪则是一个粗心大意的、行动本位的轻率鲁莽的象

---

<sup>④</sup> 乔治·奥威尔指出过一个相关的艺术问题:“一个人应该能够在他的脑海中同时容纳两个事实:[艺术家]达利是一个好女儿,也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人。其中之一并不会让另外一个失效,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另外一个”。“圣职者的好处:关于艺术家达利的一些注解”,载《乔治·奥威尔论文、报刊文章和信件选集》,第三卷:《一随我意,1943-1945》,第156-161页(索尼尔·奥威尔和兰·安格斯合编,1968)。作此论断时,奥威尔正溯流而上。

征,这一轻率鲁莽把国家带进了一系列的灾乱和挫折,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sup>⑤</sup>

新近的信号与社会规范研究有助于解释国民在克莱事件上两极分化的快速性与急剧性。<sup>⑥</sup> 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抓住该事件来表示他们对通奸、撒谎、违法以及道德疏忽其他形式的摒弃。总统表现的这类行为是道德沦丧的最明显迹象,这些保守人士相信这已经充斥全国,因而通过谴责总统,他们正在发送一种强大有力、极其清晰的信号。任何作如此思考的人都应该表示认同;而任何不如此做的人都会招致在道德上不严谨的嫌疑。无疑,发送信号的人希望,诉诸诸如美国国旗这样的爱国象征,即使那些在他们的内心并不认为通奸、撒谎、违法是邪恶的人,也会表示认同,以免他们作为不诚实的、不道德的、不值得信任的人而被排斥在外。如此的结果就会给人一种全体同意的印象,夸大保守主义运动的政治力量。但是,事实证明,就像呼吁爱国有时也导致极端爱国主义和压制不同意见一样,许多人关心的是,以克林顿所展现的特定的形式谴责道德疏忽,可能导致对更长的道德“改革”列表的采用,这些道德改革几乎不会为那些对宗教右派的道德正统性持异议者留下空间。因之,人们中间的那些担心发生这种可能性的规范创设者,就会发送一种相反的信号,自由主义的和宽容的信号。作如此思考的人成群结队地表示认同,以免他们会被认为是清教徒似的、拘谨的、极端的、以及再一次不值得信任。国家被划分为两个阵营,每一个看上去都要比实际上更加统一,两个看上去都要比实际上分得更开。归谬法(The *reductio ad absurdum*)是艾伦·德秀维茨的观点,“反对弹劾的投票并不是赞成比尔·克林顿的投票。那是反对固执行为的投票、那是反对基础主义的投票、那是

⑤ 艾伦·布伦克雷:《自由主义及其不满》(1998),第221页。

⑥ 例见,狄穆·库兰:“伦理规范及其通过名誉瀑布的转换”,《法律研究杂志》(1998),第27卷,第623页;伊瑞克·A·波斯纳:“政治和法律中的符号、信号和社会规范”,《法律研究杂志》(1998),第27卷,第765页。

反对反环境主义的投票、那是反对正当生活运动的投票”。<sup>②</sup>

竞争的信号诱导人们选择双方——支持并且被计算在内——因为不这么做可能会招致争议双方的放逐。如果你向道德保守主义学习,尤其是,如果你和道德说教保守主义者的骨干有许多个人的或职业的联系,你不会愿意对令人深恶痛绝的克林顿表示任何疑虑,因为你的犹豫不决会被你所珍视的所属群体认为是不值得信任的。如果你是自由主义知识阶层中的一员,你不会愿意对表现出对克林顿处罚过轻的任何疑虑,因为你的犹豫不决会被与你有关的群体中的成员认为是不值得信任的。<sup>③</sup> 例如,他们可能会认为你对同性恋者的权利麻木不仁,他们中的一些觉得,如果克林顿走掉了,下一个被列在右派打击名单上的就会是他们。再想想这,你一起的自由主义者会对你有更少的尊重,如此你的业务和交往机会也可能变坏。在此时尚下,为了维护他们的社会或者职业群体中成员的信任,许多本来可能处于中间会更舒适的人就被拉向了一极或另一极。

此外,一旦你选择了立场,你就容易产生一种对之承担义务的感觉。认知心理学家对此倾向贴上了“认证偏见”的标签,以把关于某争论的事后证据解释为你所支持的是你起先只是暂时选择的立场。<sup>④</sup> 随着支持证据的积累,义务承担就会僵化。逐渐增加的确信使得竞争对手的立场越来越难以作为内心忠诚而被接受。分歧成为了对抗。竞争对手不再彼此聆听。到了这种地步,争论就已经被两极化了,争论者也就成为了党同伐异之人。

② 艾伦·德秀维茨论黎维拉·李维,CNKG 新闻抄本,1998 年 12 月 14 日。

③ 关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学者的成群结队和顺从主义,见理查德·A·波斯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难问题》(1999),第 75-81、90 页。

④ 见马修·拉宾:“心理学与经济学”,《经济学文献杂志》(1998),第 36 卷,第 11、26-28 页,以及该文所引文献。

## 第七章

---

### 留给未来的教训

由克莱事件引发的长年累月的政治法律斗争,为我们洞悉现在以及留给将来的教训提供了潜力巨大的资源。我在前面已经谈了很多,如危机所显现的美国人的政治领导观念和政治斗争形式的变化,国会参众两院对支配弹劾程序的合理、详尽规则的需求等。在本章中,我的注意力将集中放在原本相互联系的两个要点上。一个是对新奇的社会政策问题的处理——实际上是处理新旧事物——的某些专业思考的不充分性;另一个是斗争——首先是战争,在此则是与战争具有相同构造的政治斗争——的不可预见性。

#### 一、法律推理的失败

有三种专业思考或实践已经作为败绩显现了出来。一是目前联邦最高法院在决定那些即使是在政治上极其重大的案件时所使用的那种狭隘的“法条主义”推理。对此,有两个贴切的案例——支持《独立检察官法》的莫里森诉奥尔森案,<sup>①</sup> 允许波拉·琼斯对克林顿的起诉在克林顿在任期间进行下去的克林顿诉琼斯案。<sup>②</sup> 这些案例使得克莱事件迅速扩展为政治斗争。危机所显露的第二类专业思考是由“公共知识分子”——包括那些谈论时事问题的法学院教授和法学院

---

① 《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 487 卷,第 654 页(1988 年判决)。

②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 117 卷,第 1636 页(1997 年判决)。



院长一类人——所有效使用的道德、政治和法律理论。第三类是有别于学术水准的实践中的法律思考。

调查以及随之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存在着各种原因,尤为显著的是性事件本身以及克林顿没有处理好的 1997 年波拉·琼斯案。而另外一个原因无疑是联邦最高法院允许波拉·琼斯案向前发展的判决。克林顿的律师曾经指出,案件所有的程序都应该延缓到克林顿离任之后进行。如果这种主张占了上风,莱温斯基就不会到 2001 年还卷在波拉·琼斯诉讼中,克林顿总统也不会有机会在他任总统期间妨碍司法。

说最高法院支持《独立检察官法》的合宪性判决构成了调查的理由不太确切。在罗伯特·费斯克被任命为独立检察官时,该法已经期满失效。假如该法不曾重新制定,他将仍是独立检察官。如此,问题也就变为,他是否会像斯塔尔一样设法扩大白水门调查以掩盖克林顿在波拉·琼斯案中作伪证以及相关的不轨行为,或者,如果不如此,是否会任命另外一名独立检察官来做这件事情,而这名独立检察官是否也会大体上追随斯塔尔所遵循的做法。因为我在第二章中已经给出的那些原因,不可能防止由一名独立检察官来调查克莱事件。但是假定,《独立检察官法》在 1988 年莫里森案判决之日已经失效,或者至少最高法院确定对总统适用法律的合宪性不是随意的,如此,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就不会委派一名独立检察官去调查克林顿与白水门案的牵连,调查克林顿上任总统之前许多年以前的一起受弹劾的不道德行为。尽管在雷诺任命费斯克时《独立检察官法》已经失效,人们还是期望它会被重新制定,它也很快被重新通过了,而且这种期待对她决定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可能起了关键作用。假如不存在白水门案中的独立检察官,琳达·翠珀鉴于其所面临的违反州法而遭起诉的风险就不太可能透露她的磁带。即使她把它们递交给司法部(或者交给波拉·琼斯的律师们,他们可能会把它们递交给司法部),司法部长也会拒绝委派一名独立检察官调查表面上与总统职权行为关系不太大的事件,或者甚至“关起门”来做调查。如果司法部

做这样一种调查,它就不可能像一名独立检察官那样专心致志和一意孤行,也不会为了可能的弹劾而把调查结果提交给众议院了。

无论有或是没有《独立检察官法》,对被独立检察官搅得一塌糊涂的克莱案的调查都不可避免。即便如此,,而如果没有该法,随后的苦难剧烈程度可能会更小。尽管该法想给独立检察官以比司法部所使用或任命的起诉人更大的可信度,但实际上却给了他们更小的可信度,至少在斯塔尔调查克林顿的案件中是这样。斯塔尔被认为是在政治上与克林顿相敌对的法官代理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萨缪尔·卡斯这样的法官被认为在政治上与克林顿敌对(一如所发生的,这是正确的)是一样的。费斯克就其职位只对克林顿的司法部长负责,并且,尽管是一名共和党人,他并没有像斯塔尔那样与以前的共和党人政府有密切来往,与波拉·琼斯的律师们也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样他就不会为同样的想要“找总统的麻烦”的嫌疑而苦恼了。

一名独立检察官在《独立检察官法》已经不再具有效力的时候受任,这一事实是1978年首次获得通过的该法律存在不当的首要线索。<sup>③</sup> 独立检察官,即司法部因为自身存在着利益冲突而雇佣来调查政府官员的非政府律师,有着很长的历史。<sup>④</sup> 当对行政部门的高层官员提出严重行为不轨的可靠弹劾时,司法部在政治压力下会采取措施以使公众确信对该弹劾将作彻底调查。<sup>⑤</sup> 正是这种压力导致了委派独立检察官,先是阿骑伯尔德·考克斯,接着是列昂·贾沃斯基去调查与水门事件有牵连的尼克松。尼克松倒台了。照此结局,国

---

③ 《1978年政府伦理法》第六编,《美国法典》,第28卷,§§591—599。第六编的目前版本是1994年通过的;对第六编的历史和摘要(包括莫里森案的各种观点),见“独立检察官调查,”《美国刑事法律评论》,第35卷,第875页(1998)。

④ 对该历史的详述,见唐纳德·C·斯马尔茨:“独立检察官:一种内在的观点,”《乔治城法律期刊》,第86卷,第2307、2311—2321页(1998)。

⑤ 尽管如此,重复一种更早的观点,司法部长雷诺所受到的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去调查白水门事件的压力部分源于《独立检察官法》会很快被重新制定的期待。

会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部《独立检察官法》就令人困惑不解。本杰·明金斯伯格和马丁·谢夫特可能是对的,在他们看来,把权力从长久以来都应该是共和党人的总统(尽管该法律被通过时总统是一个民主党人)那里转移给长久以来都应该是民主党人的国会是民主党的一个大的举动。<sup>⑥</sup>

该法规定,在有合理理由相信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可能违犯联邦刑事法律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委派独立检察官;遴选独立检察官的权力从司法部长转到法官;禁止司法部长毫无任何理由地雇佣独立检察官;还有,如我们所知道的,要求独立检察官把弹劾总统的理由的任何实质和可靠的证据告知众议院。这一法律导致了独立检察官任命的大幅度增长,也带来了许多定罪,而这些罪行往往因为小或者难以证明而为受到经费限制的普通检察官所忽略。在任命费斯克调查克林顿与白水门犯罪的牵连之前,尽管对伊朗门事件的独立检察官调查触及到了里根总统,但是还不曾有过为了调查哪位总统而受特定任命的独立检察官。

### 莫里森诉奥尔森案

莫里森案产生于独立检察官亚力克夏·莫里森对里根政府司法部中的一名副部长西奥多·奥尔森所进行的一项调查。由首席大法官林奎斯特所撰写的最高法院法官意见极其枯燥并且充溢着法条主义。在那种使得大多数司法意见又臭又长的开端之后,最高法院问,把独立检察官的任命权交给法官是否违反了行政部门长官的任命权属于总统的宪法规定。<sup>⑦</sup> 该规定允许国会把“下级官员”的任命权授予法院,而不是总统,这样,问题也就变为,独立检察官是否是下级官

---

<sup>⑥</sup> 本杰明·金斯伯格和马丁·谢夫特:“其他途径的政治:选举重要性在美国的衰落”,载《美国展望》,第28—29页(1990)。国会并不会任命或者控制独立检察官,但是它会为独立检察官控诉总统及其被任命者提供更大的信心,这些控诉不会被掩盖在司法部长(他自己或她自己本身即是总统的任命者)的办公室里,而会被调查到底。

<sup>⑦</sup>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二项。

员。最高法院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独立检察官只行使着有限的司法权,能够被司法部长免职。<sup>⑧</sup> 这还因为,既然法官们对起诉了解甚多,法官任命起诉人就没有什么不协调的。最高法院接着考虑,《独立检察官法》是否违反了宪法第三条的司法条款,该条款授予法院以非司法职能,而不是为宪法第二条任命条款所认可的由最高法院支配的任命权本身。最高法院回答“否”,因为法院被授予的与独立检察官相关的其他权力微不足道。

随后,最高法院接着问,《独立检察官法》不允许总统(或者他的司法部长)随心所欲地解雇独立检察官,这是否违反了宪法第二条,该条款授予了总统忠实执行法律的权力。给出的回答又是“否”,因为总统有理由解雇独立检察官,理由包括独立检察官执行《独立检察官法》或者其他法律(他在调查时可能违反这些法律)不谨慎或者不忠诚。最高法院最后问道,通过国会的“权力攫取”,或者通过使法院能够篡夺行政职权,该法是否扰乱了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制衡。对这两个问题,最高法院的回答都是“否”。该法并非国会的权力攫取,因为它授予权力给独立检察官,而非授予国会以调查或执行权。而且,它通过严格限制其分配给法院的职责避免了司法对行政职权的篡夺。

只有斯卡里亚法官持有异议,他认为《独立检察官法》打乱了宪法所创建的联邦政府三部门之间的平衡。<sup>⑨</sup> 斯卡里亚指出,“通过在本案中适用该法,国会有效地强制发起了对总统所任命的高级官员

<sup>⑧</sup> 见埃德蒙德诉美国,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117卷,第1473、1580页(1997)。

<sup>⑨</sup> 也出现过大量对该法的学术批评。例见,朱莉娅·奥莎丽文:“《独立检察官法》:坏法,坏政策,”《美国刑事法律评论》,第33卷,第463页(1998);卡斯·R·桑斯坦:“没有制约也没有平衡:为什么《独立检察官法》应被抛弃?”《美国展望》,1992年5-6月,第20页。对赞成和反对两方面的论据以及大量有用的背景材料,见专题研讨,“《独立检察官法》:从水门到白水门及其以后”,《乔治城法律期刊》,第86卷,第2011页。也有许多对之进行修补的建议,例见,肯·格姆利:“《独立检察官法》的一个原初模型,”《密歇根法律评论》,第97卷,第601页(1998),但似乎并不值得费此周折。



的一项刑事调查,这一调查与总统和立法机关之间痛苦的权力纠葛所导致的行为相关。”<sup>⑩</sup> 他警告说:“仅仅依照该法而简单地启动对首席行政长官的虚弱的刑事调查,而不是接受随着因为一些细枝末节的原因而对总统提起弹劾程序的开始——对处于国会之外的某个总统的政敌来说也何其容易——而产生的政治损害,这对国会来说真是易如反掌。”(第 713 页)。在同一页,他又告诫说,该法可能削弱了总统的公众支持:“在政治上,再没有比能够弹劾对手及其同伙刚愎自用、天真、庸碌,而且,在所有这些可能性中,还是‘骗子’更加有效的了。”对于任命独立检察官的法官陪审团,斯卡里亚问道:“假如他们如人们所知道的法官那样,在政治上盲从,选一个与政府敌对的起诉人,会怎么样呢?”

斯卡里亚引用了罗斯福的司法部长、后来成为最高法院杰出法官的罗伯特·杰克逊反对起诉人恐吓权力的警告。斯卡里亚认为,当起诉人按照总统的意愿行事时,权力是受到控制的——但是,当起诉人独立于总统的控制时,就不是这样了。的确,起诉人基本上只是准独立的,因为如大多数人所强调的那样,总统持有有理由免去独立检察官职务的权力。但是,实际的政治却使该项权力虚无缥缈。总统或司法部长会以护短而遭到弹劾,而且只要回想一下尼克松解雇阿奇伯尔德·考克斯的命令,每个人都会相信此种弹劾。

在莫里森案中,多数意见和异议意见都夹杂着对最高法院以前的判决和历史材料的大量引述,而多数意见和异议意见之间的争议部分则不分胜负。斯卡里亚认为宪法制定者希望有一个统一的行政长官的观点遭到了强烈的质疑。<sup>⑪</sup>

对多数意见,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没有能够和斯卡里亚在异议中所提出的现实政治考虑衔接起来。多数意见所暗示的基本原理可以

<sup>⑩</sup> 《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 487 卷,第 703 页。

<sup>⑪</sup> 见劳伦斯·雷西格和卡斯·R·桑斯坦:“总统和政府”,《哥伦比亚法律评论》,第 94 卷,第 1、15-22 页(1994)。



缩减为这样一句话：只要总统能够有理由免除起诉人的职务，《独立检察官法》就是无害的，因为除非他是恶棍，否则，要是他没有理由免起诉人的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多数意见对《独立检察官法》过去怎样运行（到最高法院判决莫里森案，已有九次依据该法进行的调查）或者它将来如何运行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倒是异议意见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殷切关注。多数意见相当抽象地表述了其分析，分析中允许有理由免除独立检察官职责的正式权力消解了异议意见所列举的实际反对意见，在此不好的意义上，多数意见是“法条主义的”。

斯卡里亚法官是有先见之明的。免除费斯克而任命斯塔尔代替其职务的陪审团无论是否与克林顿政府敌对，有充分的迹象表明其不适当的动机是使克林顿的维护者能够“糟蹋”斯塔尔；当然，斯塔尔对克林顿的调查对政府来说是虚弱的，并且这一调查触发了一场部门之间的丑陋的、痛苦的权力斗争。莫里森案中异议意见的撰写人应该是最高法院的头号形式主义者，这是多么具有反讽意味啊！

事后想想，除了我从异议意见中引用的一句话外，两种观点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二者都没有讨论独立检察官对总统的调查。一方面，多数意见对异议意见叙述相当之长的莫里森对奥尔森调查的事实情况漠不关心，而在另一方面，在比调查一位副检察长更可疑的情况下，援引独立检察官法又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可能认为，多数意见至少应该保留对适用于调查总统的法律的合宪性的质疑，异议意见也应该注意这一点。但二者都没有。或许，作为这些沉默的一个结果，事先即已假定了莫里森案已经解决了独立检察官对克林顿总统调查的合宪性问题。但是并非如此；此外，在斯塔尔调查期间，总统的律师们既不主张对莫里森案应作狭义理解，也不质疑调查的合宪性，对此，我表示惊讶。

也许是因为总统在该案中并非独立检察官调查的目标，莫里森案中的多数法官都没有预见到，假如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去调查总统，政府机构就可能运转失常。一个因为由法官陪审团任命、与选举

的官员有两点不同(总统任命法官,议员投票确认该任命)<sup>⑫</sup>而在政治上不具有合法性的个人,会突然成为美国最有权力的人之一。如斯塔尔所表明的那样,独立检察官的活动毫无政治牵制和经费限制,而且运用着联邦法律授予给起诉人的巨大权力,他有权捆住总统的手脚。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独立检察官简直就像一只闯入政治瓷器店的公牛。捣碎了如此多的陶瓷,这并非他的过错;他和任命他的法官也都不曾声称自己极富政治才干或政治灵敏性。但是,在其转折过程中,随之的任何后果确实是没有料到的。他导致了几个重要共和党人性生活的公开败露、纽特·金里奇从众议院议长职位垮台、其后继者也随之倒台、共和党人 1998 年中期选举希望的破灭、克林顿任期内预算争议的解决、克林顿夫人的政治复原、在许多政策问题上国会行动的推迟、对总统犯罪(如果没有独立检察官的调查他就不会犯此罪)的弹劾、<sup>⑬</sup>乃至《美国医学协会期刊》主编的解雇。<sup>⑭</sup>

赋予某个私人以斯塔尔所使用的那些权力是我们宪政体制中的异常现象,对克莱纠葛的调查也告诫我们,那是一种有害的异常现象。

### 克林顿诉琼斯案

莫里森案的不足之处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描述,即,就像他们致力于一般原则、先例和历史的浮夸言辞一样,法官在莫里森案中没能在对总统适用《独立检察官法》与对行政部门的下级官员适用《独立检察官法》这二者之间作出实际区分。波拉·琼斯案中最高法院一致

---

⑫ 真正有三点差别,因为首席大法官任命陪审团成员,陪审团成员又任命特定的起诉人。人民选举总统,总统任命首席大法官,首席大法官又任命联邦上诉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巡回审判庭特别审判组成员,他们再任命独立检察官。

⑬ 记住,众议院拒绝因为克林顿在波拉·琼斯案的誓词中撒谎而弹劾他。

⑭ 他被解雇是因为他仓促决定刊发了一篇关于美国青年是否认为口交是“性交”的文章。基纳·古拉塔:“美国医学协会在性论文上损失了杂志主编”,《纽约时报》,1999 年 1 月 16 日,第 A1 版。

通过的判决在根本上具有同样的缺陷。这一判决因为法官们没有(该判决是获得了一致通过的)预见到允许该案继续下去会摧垮总统而遭到了诸多嘲讽。法官们缺乏现实主义观点,不能在总统可能遭受到的诉讼类型之间作出区分是该判决最令人不安的特点。

主要意见的第一部分是以这样一种在外行看来都很荒谬的陈述开始的:“原告,威廉·杰弗逊·克林顿,1992年当选为总统,1996年再度当选为总统。”<sup>⑤</sup> 不知道这些事情的任何人都无权了解这一意见。当一名法官一句又一句地在意见中充斥那些只是重复显而易见的而不起任何作用的东西时,危险就来了。在他到达意见撰写的艰难部分,作出对问题的分析之前,他将精疲力竭。在告诉我们克林顿是谁之后,意见简要地摘录了琼斯的申诉辩解,这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最高法院的推理并不以琼斯申诉的性质为主要议题;还是把它看做源于一起交通事故的个人损害申诉为好。<sup>⑥</sup>

在作了进一步的开场白之后,最高法院终于到达了正题,即如克林顿所主张的,是否应该解释宪法以使总统获得对那些由发生在其上任总统之前的事件所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的豁免权。(作为总统,源于其职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诉讼的豁免权得到了承认。)<sup>⑦</sup> 最高法院指出,该豁免权的目的在于使总统在履行其正式职责时无所畏惧,这一目的不适用于基于其成为总统之前所为行为的诉讼,也不适用于基于其任何时候所为的纯粹个人行为的诉讼。

和往常的那些同样没有定论的历史材料发生毫无结果的摩擦之后,最高法院接着考虑这一问题,总统得以“将其全部时间和精力投放到公共职责”上(第1646页)——这一公共利益是否可能为总统所寻求的豁免权提供正当理由。最高法院引用了林登·约翰逊的自助

<sup>⑤</sup>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117卷,第1639页。

<sup>⑥</sup> 如最高法院后来所指出的,肯尼迪总统在这样的事实上被起诉了,但是在出庭作证之前该案已得以和解。

<sup>⑦</sup> 见尼克松诉费兹格瓦德:《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编》,第457卷,第731页(1982年判决)。

声明——他没有像总统一样获得充足的睡眠,并因而接受了这一错误观念,即工作越重要,工作时间就越长,如此也就天真地承认了该论点的前提。但是,最高法院极不连贯地说:

在共和国 200 多年的历史中,只有三位在任总统因为他们的私人行为受到过起诉。如果过去对未来有指示作用,纷沓而至的此类诉讼将会吞没总统则似乎是不可能的。就手边的这件案子而言,如果由地方法院合理控制,对我们来说,占据原告的大量时间似乎就大大地不可能了。(第 1648 页,脚注省略)

最高法院并没有问,在我们所处的诉讼时代,过去是否可能预言未来,也没有评估一桩针对美国总统的性案件是否有可能由一个随意挑选来负责该案件的地方法官“合理控制”,也没有说其判决将通过消除那些案件的一个障碍——即总统在其任职期间免于受诉的可能性,来鼓励此类诉讼。布莱耶法官的赞同意见在第一个要点(把过去作为未来的预兆)上斥责了多数意见,但是却含蓄地承认了多数意见的假定,即对总统提起诉讼惟一重要的后果是占用他的时间。尽管在多数意见的脚注中承认了(但是很快就不再讨论)总统“会因为未决诉讼而心烦意乱、忧虑重重”(第 1650 页注 40)的可能性,<sup>⑩</sup>但两种意见都很看重实际卷入诉讼的时间。(但是,这也不是关键。)如同莫里森案一样,克林顿诉琼斯案中的两种意见也大部分停留在对不起作用的先例的讨论上。

意见中没有任何一项对波拉·琼斯案是关于性的案件这一事实的意义给予任何考虑。这一事实本来应该是最高法院对琼斯案考虑的中心,就像西奥多·奥尔森不是总统这一事实本来应该是最高法院分析莫里森案的中心一样。法官中没有哪位曾预想到把莱温斯基引入琼斯案,但是对他们来说,在总统被指控以拉妇女口交的案件中的

---

<sup>⑩</sup> 在这一点上也取得了一致。同上,第 1657 页。



证词和审判可能会把总统的性生活细节公之于众,则显然是本来应该预见到的。谣传克林顿在其政治生涯中牵涉到性的第一位女人是波拉·琼斯而不是他的妻子,或者甚至谣传波拉·琼斯是在政府中做他手下的第一位这样的女人,这似是而非。甚至连最高法院的法官也听到了这些谣传,而且到1997年再也找不到完全认为这些谣言毫无半点真实可言的聪明人了。对法官们来说,公开暴露总统的性生活细节会削弱总统的权威和效力,这本来应该是再明显不过的。

尽管如此,撰写一个赋予总统在性事上免于起诉的豁免权而又不使原告在性骚扰诉讼中看上去像二等法律公民的法官意见,是需要很高技巧的。而法官们不是缺乏这门技巧<sup>⑨</sup>,就是不懂得这一案件的潜在恶性。克林顿总统的答辩并没有指出他所力争的豁免权可能会随着案件的性质,尤其是它使总统蒙羞以及由此瓦解政府、损害总统的潜在可能性的变化而变化,这是无济于事的。

最最起码的是,最高法院本来可以指导地方法官以一种试图使总统的困窘最小化的方式处理该诉讼。大法官们本来可以告知地方法官,伤害问题是波拉·琼斯诉案中的弱点,并且可以在使总统遭受被罢黜的耻辱之前决定该问题。(又一次,他们没有从总统的律师们那里获得任何帮助,律师们并没有建议这一毫无疑义的逆转。)最终,地方法官正是基于那一理由驳回了波拉·琼斯诉讼;她如此做本来是不必要求总统遭受罢免的。

在我所讨论的两个案件中,更加详细地探究案件的细节——从法官最乐意的抽象规则水准下滑,本来可以防止最高法院犯既对国家又对最高法院的荣誉有害的错误。没有必要决定对总统适用《独立检察官法》是合宪的;没有必要在总统任期届满之前让琼斯案继续下去;如果案件进行下去,除非将之作为最后一招,也没有必要罢免总统。最高法院在这些案件中所缺少的是智识灵敏、实用性和现实

---

<sup>⑨</sup> 最高法院在处理牵涉性事的案件中从来未曾表现出熟练敏捷。见理查德·A·波斯纳:《性与理性》(1992年)。



主义,而这些都是在一个任何重要政治纷争会被日常地递交给法院解决的社会中法官和律师所应当具备的。

本章我取名“留给未来的教训”,只是用智慧之箭对最高法院胡乱射一通,这些智慧在事后无需费太多气力就能觉察到,而这并不能防止将来同样的错误。最高法院不应该因为没有预见到其判决的后果而遭受过于严厉的批评。没有一个大法官具备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职业法官(只有首席大法官先前没有司法经验——但是他作为最高法院的成员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而对法官的训练和经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传授政治实用技能。考虑到职业政客、政治评论家和执业律师在克莱纠葛中所犯的一切大错,我们不应该因为法官缺乏政治洞见而对之求全责备。但是,智慧的起点是,知道你不知道的。法官本来应该知道,在莫里森和琼斯案中,他们不能根据政治洞见(更不用说根据司法判决的传统材料——先前的判决、历史的材料,它们没有一个谈到手边的这个案例)来作他们的决定,因为他们压根就不具备这些东西;而这些案件也不能被推诿。

在法官对其判决后果比通常更加无知的场合,他们怎样判决才更合适呢?尽量少地作判决。在莫里森案中,这意味着,直接把对适用于总统的《独立检察官法》的合宪性判决留到以后,而不是像斯卡利亚所主张的,完全推翻它,抑或如最高法院表面上所做的,完全支持它。斯卡利亚在对该法的争论中占了上风,但是由此(该法律距莫里森案判决只有十年之久)的经历仍然没有能够使无可置疑地反对该法达到保证这样一种自信的信仰程度,即总的看来,它是宪政设计的一项不好的革新。在通过将此革新宣布为违宪的新举措来遏止它时,法官应该踌躇再三。在琼斯案中,明智的方法本该是授予总统在其任职期间免于卷入性案件(或者最最起码,免于因为性案件而被罢免)的豁免权,同时尽可能地使此种豁免权不要扩展到那些不太可能羞辱或者困扰总统的案件类型。

如果宪法或者判例的主文认为主文已经清楚地指出了这类案件

的一个或另外的结果,最高法院就有权根据司法判决的这些惯例材料对其作出判决。但是,既然惯例材料并没有表明对这些案件怎样判决才是正确的,最高法院就应该勇于正视这一事实,即没有什么比注重实效地判决更好。如果大法官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可能在每一案件中如我所建议的去判决,呈递可以称为“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判决——一种基于“不为害”原则的判决。或许,这也是一个好主意,即在最高法院存在下一个空缺时,填充某位担当过高级选任职位或者参与过高级政治事件的人,此人就像我们历史上的许多声名显赫的那些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包括约翰·马歇尔,查尔斯·伊文斯·休斯,威廉·哈伍德·塔夫特,罗伯特·杰克逊,黑格·布莱克以及艾尔·沃伦。当今的最高法院以其高度的职业光芒而著称——但却缺少政治经验。<sup>②</sup>

我无意诋毁规则或者赞美政治裁决。那是不务实的。规则是治理的重要工具,而法律正义则必须与民众正义或政治倾向分开。在先例用尽以及轻易一般化会带来很大不便后果的情况下,戒除一般性并严格遵照案件的特点是合适的,否认这一点就是不务实的。

在弹劾争论中,最高法院在莫里森和琼斯案中的形式主义,与克林顿的攻击者的形式主义是相似的。对他们而言,秘方是,没有人超越于法律之上,没有重罪可以逃脱惩罚,弹劾过当不应该导致对被告惩罚的减轻,而应导致两种惩罚(被告的和起诉人的),权宜之计对决定是否起诉和判总统有罪无足轻重。而最终令克林顿的攻击者感到惊讶的是,公众的大多数并没有采取这样一种严厉、固执的康德主义者的法治视角。人们愿意让总统略微地超越于法律之上,允许重罪在似乎是人性弱点的无害后果时得到原宥,这些弱点原本不应该成为法律程序的主题,弹劾过当能够减轻被告的罪过,以及务实的考虑应该与是否决定强迫总统离任联系在一起。或者,更加精确地讲,考

---

<sup>②</sup> 见罗伯特·G·麦克罗斯基:《美国最高法院》,第219、221页(第二版,桑福德·列维森编,1994年)。

虑到这样一种广为流传的、总统应该因为其行为而遭致某种惩罚的公众意见,美国公众需要在由批评总统的共和党人所倡导的那种法律严格主义与由维护总统的最极端者所倡导的关于正义的急剧变动的“公正”甚或多元概念之间建立平衡,我们可以称此平衡为“实用主义”。

## 二、理论的崩溃

除了传统意义的“法律推理”之外,另外一种思想也作为克莱调查及其余殃的后果而受到了责难。这是方法的大杂烩(简称“理论”,尽管这些方法中的一些是不完全的),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软”主题,如道德和政治哲学、历史和法律的学者将这些方法适用到了公共政策问题上。在别的地方,我已经指出,道德理论(广义上包括在形式和内容上与道德理论相似的政治和法律理论)缺少解决此类问题的资源。<sup>②</sup> 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声称并不仅仅照看学术葡萄园,而是能够建设性地谈论公共问题的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对克林顿危机的回应加深了我的疑虑。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回应既有所保留,又声嘶力竭。尽管克林顿的行为产生了如下一些令人着迷的重要问题:法律与道德的交叉,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的重叠,目前对性道德的理解,撒谎的伦理学,法治本质与务实考虑之间的协调,忏悔的意义,以及隐私的适当范围与限制,公共知识分子对此却很少发表评论,甚至包括那些经常对时事写稿,并因而有利用发表观点的杂志之便利机会的,在有些场合还在无所不在的有线电视上发表讲话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沉默可能是部分由于他们倾向于严格主义的职业价值,与他们的政治信仰——他们大多数是亲克林顿者,特别是反克林顿者——之间的内在斗争。那些充分发表意见的人,像戴维·弗罗姆,托马斯·纳格尔以及小阿瑟·施尔斯辛格,对我而言似乎不管在

<sup>②</sup> 理查德·A·波斯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难问题》(1998),特别是第1—2部分。

什么场合都极少具有价值(见第六章)。让我举更多的例子。

在丑闻爆发后不久写就的一篇文章中,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发表意见说,克林顿总统在否认他与莫尼卡·莱温斯基在性事上有染时可能就已经“事出有因”了。桑德尔为其意见援引了康德的话——以康德作为撒谎者的死敌(见第六章),颇出人意料——“在撒谎和容易导致误解但在正规的意义上是不真实的表述之间存在着严格区别。”<sup>②</sup> 康德拒绝把不撒谎的义务与在所有的场合都讲真话的义务——完全坦白的义务等同起来。他承认,并不会导致误解的某些保留和由保留(法律上称之为“误导性不作为”)所产生的某些骗术在谨慎的意义上是合理的。<sup>③</sup> 但是,就像桑德尔没有提到的一样,康德相信,“我们从来不会坦率地说我们将在无意如此做的时候讲真话。例如,必须以最大可能的严肃性来宣誓,并且遵守誓言”。<sup>④</sup> 克林顿在法庭宣誓时已经否认了他与莱温斯基的关系。

犹如前任法官阿伯纳·迈克瓦称斯塔尔“疯了”,约翰·朱迪斯谴责媒体报道“关于莱温斯基被玷污的连衣裙这一完全未经证实的谣言”一样,<sup>⑤</sup> 知识分子对克莱事件的某些评论在提出证据之前太鲁莽了,声誉卓著的一个例外是简·贝思克·艾尔西坦。<sup>⑥</sup> 但更典型的

② 迈克尔·J·桑德尔:“白谎”,《新共和国》,1998年3月2日,第10页。

③ 罗杰·G·莎利文:《伊曼纽尔·康德的道德理论》(1998),第170-173页。

④ 同上,第173页(原有着重号)。

⑤ 约翰·朱迪斯:“不负责任的精英”,《美国展望》,1998年5-6月,第14,15页。事后看来,朱迪斯的文章明显没有辨别出克莱事件媒体报道中的任何错误。尤为有趣的是,朱迪斯在“性”字之后的带星号的评论(实际上是脚注)中对《时代》杂志所谓“以口交取乐”作了如下批评:“那是口交,是被动的,所以那并不重要。”这在好几个月后证明是异常准确的预言,在克林顿的大陪审团宣誓证词中,克林顿就把他与莱温斯基的行为与性作了区分。

⑥ 例见,简·贝思克·艾尔西坦:“政治与宽宥:克林顿案”,载《白宫的最后审判日:一个考察道德问题和宗教的政治适用和滥用的宣言》,第11页;艾尔西坦:“向公众售股”,《新共和国》,1998年3月23日,第12页;凯伦·R·龙:“伦理学家谴责克林顿的对规则的‘保皇党蔑视’”,《克利夫兰坦率无欺的买卖人》,1998年9月19日,第1F页。龙的文章也提到了艾尔西坦敏锐的妙语:“做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你得到的公众越来越多,而知识分子却越来越少。”



是,由社会学家(也是《新共和国》和除了非学术之外的其他杂志的多产作家)阿伦·沃尔夫所表现的思想品质。他说:

美国人是厚道宽容的,我们喜欢给人第二次机会,克林顿将得到一次,因为他是一个顽皮的孩子,而你不得不原谅顽皮的孩子……没有人真正知道我们宽容的界限。当这一切业已开始,我想我们生活在纳森尼尔·霍桑的马萨诸塞。<sup>②</sup>

尽管相信克林顿是他最坏的诋毁者(甚至精神错乱的一方)所声称的道德沦丧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的罪行却并非是看来极明显的可以原谅的“花花公子”的行为。<sup>③</sup>人们没有必要比《纽约人》——克林顿的一个最忠实的媒体同盟——走得更远,去找寻某个人及其随从、其在广泛活动领域的策略的不光彩的证据。<sup>④</sup>

早在危机之初,在对莫尼卡·莱温斯基的连衣裙进行DNA测试之前,在总统的大陪审团宣誓和1998年8月17日电视讲话之前,朱迪斯和桑德尔正在撰文,而麦克瓦正在谈论报道者。桑德尔将总统的行为描述为“白谎”,朱迪斯对发表不精确报导的批评,以及麦克瓦主张对克林顿的起诉有赖于两个女人之间的饶舌的争论,这些随着斯塔尔的调查的展开而完全变得不堪一击(就像尼克松所说的“不起作用”),覆水难收。

1998年秋天,就在8月17日曝光之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全版公告,署名人有罗纳德·德沃金,小阿瑟·施尔斯辛格,迈克尔·索

---

<sup>②</sup> 引自玛莉·里奥纳德:“在第二次机会,一句道歉就够了”,《波士顿环球报》,1998年8月18日,第A11版。

<sup>③</sup> 沃尔夫可能把“顽皮孩子”的看法全部推给了公众,而自己没有发表必要的评论,尽管那并非是理解他的话语的自然方式。

<sup>④</sup> 见杰弗里·托宾:“克林顿的其他追捕者”,《纽约人》,1998年4月6日,第43页;托宾:“环行货车”,《纽约人》,1998年7月6日,第28页;乔伊·克莱茵,“第一无赖”,《纽约人》,1998年9月7日,第46页。



文(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哥伦比亚法学院前院长),以及主张总统不应该被弹劾的其他一些名流。<sup>⑨</sup> 该公告把对总统的弹劾描述为“宪法上的核武器”(回想起来,这是一种很夸张的描述),这一武器“除非是为了避免宪法遭受严重损害绝对必要,否则不应该被使用。”公告声称,对尼克松的弹劾会通过这一测试,因为尼克松“已经以国家安全为名,这是违宪的,努力掩盖其对政治对手的犯罪行为”。相反,克林顿“为了掩盖私下的经双方同意的性行为撒了谎”。公告没有提到如下情况:克林顿在法庭宣暂时撒了谎,从事过有关妨碍司法的行为,违反了其忠实执行法律的宪法义务,以及一旦尼克松的违法行为被揭露,他的随从被投进监牢,为了避免宪法遭受严重违宪,就不再有必要废黜像克林顿一样还有第二任余下的两年任期的尼克松。尼克松被迫下台,是因为人们对他的行为(他从一开始就不大受大众欢迎,经济也不景气)义愤填膺,而不是因为他为宪政设置了进一步的危险。

公告进一步指出,鉴于恶劣的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总是恶劣的),国家不能冒险来允许“美国总统即将遭受扭曲、伤害和屈辱”。它还建议,克林顿“因为其行为”应该受到国会的责难,并且不无赞许地谈到他“现在已经在好几种场合道了歉”。但是,是为了什么道歉呢?并非是为了妨碍司法。那么,国会责难他是因为什么行为呢?当克林顿倔强地拒不承认任何真正的坏事,而只对“不适当的”性接触和给人们造成了误解(暗指不是足够了解克林顿以致于不相信他会抵赖的那些容易受欺骗的人)表示忏悔时,国会要么做一项调查,要么完全接受《斯塔尔报告》,或者责难克林顿,责难他是因为其行为没有严重到谴责他是合情合理的地步。克林顿所愿意做的勉强道歉,尼克松本来也可以做,那时他随着弹劾调查的进行已经风雨飘摇了一年之久。

公告说,责难将是“一起具有历史意义的惩罚行动”。若果真如

<sup>⑨</sup> “向美国国会和公众的请求”,《纽约时报》,1998年10月7日,第A13版。

此,克林顿就会遭到损害和羞辱,我们的国际形势就会更糟。但是,它不会是一起具有历史意义的惩罚行动。安德罗·杰克逊,这似乎很少被人记起了,就被国会责难过——该责难在几年之后当他的政党重新获得国会控制权时被取消了。公告并未提到这种可能性,即对总统的立法责难会是一项权利剥夺法案,因而是违反宪法的。

几周之后,许多历史学家在《纽约时报》上整版发表了另外一篇公告。<sup>①</sup> 这一公告说,“当前对他(克林顿总统)的控告背离了被创建者视为弹劾理由的那些东西”。没有人努力支持作出的这一结论;也没有人认为“被创建者视为弹劾理由的那些东西”将解决当前的争论。该公告指出,“作为这些努力(弹劾克林顿的努力)的基础的弹劾理论在我们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它没有说那种理论到底是什么。有两种困难。一是该理论指,总统的妨碍司法行为是一种能够被弹劾的罪行,对此,尼克松的弹劾调查可以作为一个先例被援引。那里并不缺乏先例。另外一种可能是,它是作为如下努力之基础的这样一种理论(“政治弹劾”):追随杰弗逊的共和党人努力弹劾像萨缪尔·卡斯这样的联邦法官,以及激进的共和党人努力弹劾安德罗·约翰逊。这是一种不好的理论,但也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那些费工夫考察美国弹劾历史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写过或者示意过我所援引的观点。

签名人之一杰克·拉可夫在此前三周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照题目所暗含的意味即是与公告的核心历史观点相矛盾的。<sup>②</sup> 该文得出结论说,克林顿的诋毁者主张克林顿的行为足以构成一种严重的罪行,以致于对之提起弹劾是合情合理的,这是对还是错,历史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任何人都会奇怪拉可夫到底是怎样调和这两种见解的。

<sup>①</sup> “历史学家保卫宪法”,《纽约时报》,1998年10月30日,第A15版。小阿瑟·施尔斯辛格又处在签名人之列。

<sup>②</sup> 杰克·拉可夫:“具有两种弹劾智识的创建者”,《新闻日报》,1998年10月11日,第B5版。

历史学家的公告起草人之一西恩·威伦茨,于1998年12月8日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在准备好的证词中,他说: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美国的政治形势的命运取决于这一弹劾调查,就像所有的总统弹劾调查那样。它太重要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很清楚,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会给那些形势和法治带来很大的损害——比之于克林顿被起诉的罪行,其损害不知要大多少。<sup>③</sup>

对学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看法。对任何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对任何思考的人来说,“我们美国的政治形势的命运”取决于是否对克林顿总统提起弹劾,这怎么会是清楚明白的呢?一位历史学家可以推测这些事件,但是,他未必以超人的视力有权以威伦茨式自信的口吻讲话。在威伦茨写了这些话之后,克林顿就受到了弹劾,而天并没有因此塌下来。没有人认为天会塌下来。

威伦茨说,安德罗·约翰逊的“弹劾有助于为富裕时代——一个政治邈邈和总统寻常的时代——创造条件”。他没有提供证据或论据来支持他的模糊主张(模糊是因为上下文中的“有助于创造条件”的力量不明确),它也远非不证自明。约翰逊是一个古怪的人——一位甚至不在林肯一方的意外总统,他在内战之后的热烈氛围中以压倒多数的投票遭到了弹劾,而他也被免责。我们回想起来,他的免责使得“一位未来的总统将被弹劾或罢黜几乎是不可想象的”。<sup>④</sup> 如果约翰逊更早几个月遭到弹劾,威伦茨相信尤利西斯·S·格兰特会在1968年被选为总统吗?或者相信格兰特政府腐败会更少?在十九世纪余下的几年里作为总统的约翰逊的继承者的确很软弱,但是,一

---

③ 原文有着重号。

④ 迈克尔·勒斯·贝尼迪克特:《弹劾和审判安德罗·约翰逊》,第180页(1973)。就像他们中的一位所指出的那样,主要出于对定罪会弱化总统——会使我们的政府“墨西哥化”这一担心,七名共和党议员似乎已经被调走了,约翰逊的免责由这七名共和党议员的背叛行为负责。

如我们在第五章所看到,原因是复杂的,而且许多更早的总统也是软弱的。

对那些认为不弹劾克林顿总统会使之逃脱罪责的人,威伦茨答复说,处理犯罪(他忘了加上,除了谋杀,更不用说贿赂、叛国和其他“重罪”了)并非是弹劾的事,而且总统最终可以以普通方式被起诉。威伦茨没有花气力去估价这一起诉的可行性。他是想看到克林顿在2001年被起诉吗?他想克林顿会或者应该被定罪吗?如果不是,如果克林顿像O·J·辛普森一样“逃避劫难”,还能证明法治是有效的吗?威伦茨意识到克林顿会赦免他自己吗?

威伦茨通过大喊大叫结束了他的陈述:如果众议院成员“违背你们应该代表的人民的有意判断”,进行弹劾,那么,“只要还有能够在法治与政治之间作出区分的美国人,你们的荣誉就会因此而遭受污损。”何以证明人民已经作出了“有意的判断”?宪法没有给国会分配判断责任吗?而且,从什么时候起,背弃民意测验成为了政治权宜之计的一个象征?有什么根据认为,政治考虑对因循守旧的民主党人对克林顿及其后果的回应,比对更为多元化的共和党人的回应,起的作用更小?

自从众议院背离威伦茨而对克林顿提起弹劾之后,罗纳德·德沃金插话了。<sup>⑤</sup> 在一篇模仿威伦茨证词腔调和内容的短评中,他说,“我们必须培养一种长久的记忆。”他指的是,我们一定要在2000年记住众议院所做的糟糕透顶的事情,在这一年

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包括在财政上,鼓励和支持因为他们(投票赞成弹劾总统的那些国会成员)的所为而对他们表示谴责的那些对手。(如果狂热者成功地迫使克林顿下台了),他们就已经败坏了宪法,我们必须做好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每一件事,以使他们,而不是使国家蒙羞。

---

⑤ 罗纳德·德沃金,“一场政变”,《纽约书评》,1999年1月14日,第61页。



这些得出了如此自信结论的观点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德沃金相信,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表明,“众议院内的帮派,按照党派路线投票,能够完全毁灭权力分立。”但是,弹劾权,一种能够在事实上被控制众议院的政党所行使的权力,也是由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分立(更精确地说是平衡)的一部分。德沃金也没有指出,帮派,也就是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只要通过决定投票反对弹劾而不管可取之处,就可以使弹劾决定循着政党路线走。德沃金补充说,众议院忽略了“正当程序和公正程序的最基本规定”,但是,他没有,我相信他也不能,解释众议院本来能够规定什么样的,会改变不过度拖延弹劾调查结果(民主党人认为没有必要的东西)的额外程序。德沃金警告说,参议院中的弹劾审判将“使市场产生恐慌”。又错了。就在努力打出审判这张牌的当天(1999年1月6日),股票市场达到了一直以来的高点,并且在整个审判中一直维持在那一水平或接近于那一水平。

德沃金认为,因为弹劾审判“对权力分立来说,是一次地震”,因此它只能留给那些“使总统留任会导致宪法和公共危险”的案件。一贯实施的这一原则本来会让尼克松摆脱困境,因为揭露他的犯罪活动以及起诉他的主要亲信消除了他在其余下的任期里继续从事这些活动的危险。德沃金响应威伦茨,认为处理克林顿的罪行应该放在克林顿离任后由普通法院审理,但是他没有讨论这样一种起诉的可能性,或者赦免权所置的疑云。他同样承认,不能允许一位犯了谋杀罪的总统继续留任,但是他补充说,“认为为了掩盖性尴尬而撒谎,甚至在法庭宣誓后撒谎,与谋杀——它表明了可以相提并论的邪恶与堕落——一样处于同一道德范围内,有此看法的国会议员本身即没有道德能力。”没有人认为总统的罪行和谋杀一样严重。谋杀是弹劾和定罪的充分根据,这一事实并不暗含着,没有更轻的犯罪可以成为弹劾和定罪的充分根据。德沃金想过应该允许一位强奸妇女或者猥亵儿童的总统继续留任吗?如果不,那么,他怎样才能排除不考察和估计克林顿犯罪行为(他没有留下行为的任何迹象)的全部范围的司法障碍?



德沃金称对克林顿的弹劾是“一种政变”，因为对总统的定罪会导致“国家惟一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官员”离任。这是一个说明性的错误，也是弥漫于公众中的弹劾争论一个很好的夸大其辞的说明。副总统也是由全民选举产生的。<sup>⑧</sup>这意味着，离任总统不是由任何政治革命者继承，而是由他自己政党的国家选举成员继承，实际上是他的任命者，在本案中则是他精心挑选的后继者，他的夸耀吹捧的忠实倡导者。如果副总统空缺（如果克林顿下台，众议院共和党议长会成为总统），或者如果副总统属于民主党的一个小派别，或者属于一个不同的政党，这不是不可能的，德沃金的看法可能会更加有力。<sup>⑨</sup>

像德沃金这样的道德和法律理论家，一再主张把这种或者那种道德原则注入我们的公共政策，并且认为我们的法律有太多的实用主义而道德原则太少，但是他们对缺乏道德原则的判决却不置一词，克林顿总统努力从他所停歇过的法律的粘蝇板上逃跑表明了道德原则的缺乏。德沃金的学术著作都是关于原则和正直的，而在他 1999 年 1 月 14 日的《纽约评论》短评中，他想说的一切是，总统“为了掩盖性麻烦而撒谎”是有罪的，但以贿赂的方式唆使伪证以及收买证人、在性困境不再能够隐瞒下去之后仍然继续撒谎，这些他都没有提

---

⑧ 在表述“由全民选举产生”上，有更甚的夸张。克林顿总统的选举并非全体一致通过。在他竞选总统的两次选举中，他以烦恼地参加选举的成年人中 43% 的少数获选。德沃金的政变谈论是学术界缺乏冷静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我在上一章已经谈过了。另见帕特利西亚·科恩：“走向壁垒，25 年后”，《纽约时报》，1998 年 12 月 19 日，第 9 版。

⑨ 安德罗·约翰逊是一位民主党人，1864 年在“联合主义者”选票上与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竞争。德沃金的另外一篇短评在总统豁免之后回到了这一争论。罗纳德·德沃金：“受伤的宪法”，《纽约书评》，1999 年 3 月 18 日。关于事实，他写道，“贿赂”是宪法上提起弹劾的明显理由，“（和克林顿的不良行为不一样），贿赂诱使官员损害公共利益”。同前，第 8-9 页，但是，确切地说，这依赖于贿赂是向官员做的呢还是纯粹是私人行为。他说，克林顿“在离任后仍然可以被定罪和被起诉”，但是，他没有提到自我赦免问题。他在同一页说，“本案中，斯塔尔的行为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可能已经被驳回了”，从第二章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他还说，莱特法官“（在波拉·琼斯案中）已经裁定，（总统的）罢黜是微不足道的”，从第一章我们也知道这又是不对的。同前，第 9 页。

及。

发现众议院民主党人对克林顿的不法行为比专业学者更加坦率是令人惊讶的,但他们的确是如此。他们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所提出的作为弹劾的替代办法的责难方案指出,总统“异乎寻常地没有尽到树立高度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尊重真实的方式行事这一榜样的义务”,“亵渎了美国人民的信任,降低了他们对总统职位的尊敬,给他们一直都信任他的职位抹了黑”,“对其与下属的应受指责的行为作了虚假陈述”,并且“采取措施推迟对事实的披露”,所以这些都比威伦茨或德沃金坦诚直率得多。

当人们想到套话与沉默,想到托马斯·纳格尔的污蔑,想到小阿瑟·施尔斯辛格授予克林顿总统的“绅士”标签,得出如下结论(尽管在此处过于一般化是危险的)就是具有诱惑力的:左派知识阶层缺乏道德内核,而右派知识阶层对道德疏忽的担忧又到了病态夸张的地步。从学术界对克林顿危机的反响,我们有理由认为,学究式的法律、道德和政治理论以及历史研究都是软领域,尽管有他们许多从业者的智慧和坚定意志。硬领域(在我所使用的“硬”和“软”的意义上)是,处理争执方法的一致使得共识能够稳步向前推进,尽管从业者的政治计划各不相同。这一领域的学术性成果既没有趣味,也不重要,但是,它趋于客观,或者至少缺乏依稀可辨的政治曲折变化。相反,软领域可以渗入政治分歧。显然,把威伦茨、德沃金和弗罗姆、威廉·贝尼特划分开的东西,就是充分划分处于对克林顿争论两极的公众的那些东西:不可跨越的价值分歧,这些价值分歧源于禀性、教养和生活经历,而不是源于从共同的前提推出不同的结论。

### 三、法律职业:不逢其时

法学院院长以及法律界的其他首领们应该强调一般意义上的法治的重要性,以及在宣誓作证时和在大陪审团前作证时讲真话的重要性,尤其应指出克林顿是阿肯萨斯州律师协会的成员,他所从事的

行为一般会导致剥夺律师资格。曾经写过一本谴责现代美国法律界道德品格的书<sup>⑧</sup>的耶鲁法学院安东尼·科隆曼院长,原本可能会指摘他任性的毕业生。对克林顿严厉的批评话语原本也应该从德沃金教授那里得到,他既是律师,也是哲学家,并以倡导法学应该重新被认为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而著名。<sup>⑨</sup>所有这些期望都落空了。

法律学术界对克林顿行为的伦理范围的沉默,<sup>⑩</sup>在1998年11月6日当几百个法学院教授——全部法律学术共同体的基本部分——签署了一封主张国会不应该弹劾总统的信时,成了震耳欲聋的爆炸。信中所倡导的“重罪”观念与卡斯·桑斯坦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所作的陈述是相似的,威伦茨、德沃金和其他一些人重复了这一主张,我在第五章对此表达过我的保留意见;我们可以称之为“公共行为+谋杀”,因为谋杀是他们给出的惟一有必要提起弹劾的私人行为。

对11月6日的信,我想强调两个其他的方面。第一是它对总统的行为闪烁其词。它说,“如果总统对他的性行为在宣誓时作了伪证,该伪证严格而言并没有涉及总统权力的行使。如果他隐藏了证据,罪行也不涉及其行政权力的行使。”这诸多的“如果”在原文是用斜体字刊发的,斜体传达了对控告总统的正确性的真正怀疑。但是,直到1998年11月6日,没有总统行为要素的各种“如果”。他有罪的证据是无法遏止的,他的律师对此甚至也很少争辩。但是,该信没有对克林顿行为提出批评,不过是说“我们中的一些人相信总统做了

⑧ 安东尼·科隆曼:《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1993)。

⑨ 例见,罗纳德·德沃金:《法律的帝国》(1986);德沃金,“赞美理论”,《亚利桑那州法律评论》,第29卷,第353页(1997)。

⑩ 幸好不是全部。对法学教授直言不讳的陈述,例见斯蒂·董勒斯:“伪证先例”,《纽约时报》,1998年12月28日,第A27版;董勒斯:“‘准确的谎言’:矛盾修饰法的法律世界”,《洛杉矶时报》,1998年8月30日,第M1版;戴维·达尔:“克林顿鼓励众议院凭良心投票”,《圣匹兹堡时报》,1998年10月8日,第1A版(援引了罗文斯·特里比对克林顿在其离任后进行刑事起诉的号召)。另见菲力浦·埃尔曼:“盲目教授的耻辱”,《法律时报》,1998年11月16日,第21版。

不光彩的事,另外一些则相信独立检察官做了不光彩的事。本信则与所有这些意见毫不相关。”我不明白法律学术共同体对总统行为的忸怩作态。所有的署名人,不是部分,难道就不能就总统——一名做了由律师们所摒弃的行为的律师——做了不名誉的事而达成共识?

我想指出的11月6日那封信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的署名人的纯粹数量。他们中的许多,可能是大多数,并非宪法方面的专家;人们也想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克林顿行为的事实(单《斯塔尔报告》就达200页长)或弹劾法律,在事实上研究到了何种程度。不怀好意的批评者可能会把知识分子在请愿、公开信和整版公告的签名,描述为喜欢看见它的名字出版的动物的群体(“有独立思维的兽群”)活动形式。

无疑,在此专业化时代,11月6日那封信的许多签名人,对宣誓伪证的法律以及它对诉讼程序的重要性知之甚少,他们也不想花时间去了解更多。那么,人们就会希望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的教授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写一封他们自己的信,去强调总统罪行的严重性,以纠正11月6日那封信给人造成的错误印象,但是没有教授们这么做。人们也可能会企盼在近几年对各类争议问题,如流产,发表过公开立场的美国律师协会,对总统公然藐视国家刑法的行为对法治的影响表明公开立场。但还是沉默。

律师协会的沉默,可以被认为是对总统(记住,他本身也是律师)及其律师所使用的策略的谅解,以及认同外行的直觉——律师主要做的是在法律与正义之间挑拨离间——这些策略的谅解。律师们对控诉总统宣誓伪证的辩护,因为不值一争的、过于琐碎的含糊其辞、对明显事实的无耻的否认、断章取义和脱离上下文的引证以及对法律的错误描述,而被搁浅了。许多非专业人士从这些景观获得了如下印象:宣誓伪证是一种不重要的技术性违法行为,一名惯于撒谎的人超越了他的能力范围,以及聪明的律师能够通过诡辩术击败任何对宣誓伪证的指控(也许应该是任何时候的任何指控)。



法学教授们基本上没有为消除这一印象做些什么。<sup>①</sup> 恰恰相反,他们加强了它。证据并不只有 11 月 6 日的那封信。宾西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的里奥·凯茨写道:“我觉得借助于法律漏洞是很难犯罪的,总统、波拉·琼斯的律师和独立检察官都很难。但是,要是那样的话,我也具有与他们相同的基本性格弱点:我也是一名律师。”<sup>②</sup>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戴维·斯特劳斯并不认为“莱温斯基事件”是“真正的丑闻”;相对于“像水门这样真正的丑闻”,它只是假想的“丑闻”。<sup>③</sup> 总统的行为可以成为,也可以不成为让他离任的理由,但这当然是很丢脸的事。乔弗雷·斯通,芝加哥大学教务长,该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曾在克林顿诉琼斯案中与斯特劳斯共同担任总统的辩护人,认为肯尼思·斯塔尔和国会共和党人的行为是“整个事件中最不道德的行为”,“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中最‘无耻的’……方面”——“比总统可能已经做的事情不知要坏多少倍”。<sup>④</sup> (可能已经做吗?)斯通指责威廉·贝尼特勾结斯塔尔和国会共和党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同路人”(在斯通一页纸的文章中三次把这一麦卡锡术语套在了总统的对手头上),努力想操纵“得到”总统职位的权力杠杆,这是一种卑鄙和不负责任的努力,它完全由“道德狂热、个人的报复心理和党派政治”激发产生,也表明着“共和党右派的道德盲目”。比之于桑斯坦和威伦茨,斯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提到,弹劾被限定在“官员权力的严重滥用”上是很可以理解的。

哈佛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表扬克林顿采取了一种“率直而

---

① 虽然不是一点也不。例见,斯蒂文·董勒斯:“克林顿的选择:讲真话或者赌一把”,《洛杉矶时报》,1998 年 8 月 2 日,第 M1 版。

② 里奥·凯茨:“一切欺骗都是不相上下的”,《纽约时报》,1998 年 8 月 19 日,第 A31 版。凯茨教授的话让人想起阿莫罗斯·拜尔斯对律师的定义:“惯于规避法律的人。”《达维尔词典》,见《阿莫罗斯·拜尔斯著作选》(1946),第 187、289 页。

③ 戴维·A·斯特劳斯:“克林顿风暴之后”,《纽约时报》,1998 年 8 月 6 日,第 A23 版。

④ 乔弗雷·斯通:“道德狂热是一种更坏的罪行”,《芝加哥论坛》,1999 年 2 月 20 日,第 22 页。



文雅的”防卫：“他愿意供认性，并主张那是私人问题，是不可以被弹劾的。而且，他把任何想妨碍司法或教唆宣誓伪证这样可以弹劾的犯罪已经（正在？）交由独立检察官去证明。还有，既然从来都不会有妨碍或教唆的污迹或磁带，总统将会获胜。”<sup>⑤</sup> 言外之意，没有无法推翻的物证或者录下来的供词，这些犯罪是不能被证实的。这是错误的；但是，即使那是正确的，在有罪与没有被证明有罪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人们可能都很希望刑法教授把它们指出来。“文雅”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概念，它与能够使有罪的被告逃脱惩罚的伎俩是联系在一起的。

德肖维茨于1998年12月1日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批评了委员会中的共和党成员，因为他们忽略了一种宣誓伪证种类，也就是由警官在刑事起诉中所作的伪证，这一种类在他看来比总统的更加严重。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sup>⑥</sup> 但是，它的严重性几乎没有减轻总统的罪过。德肖维茨还说，既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种族灭绝（例如，在卢旺达，柬埔寨以及直到最近的波斯尼亚），我们就不应该起诉普通谋杀。此外，总统还是一大帮联邦警力的最终老板，这些警力包括联邦调查局，侍卫特工处，美国司法警察署，烟、酒、枪支管制局，国内税收署的刑事犯罪，美国海关署、边境巡逻队，缉毒署以及各种武装力量的宪兵。警察头子的伪证至少是和巡逻警察伪证一样严重的犯罪。

在德肖维茨的《性的麦卡锡主义》<sup>⑦</sup> 一书中，他批评了克林顿，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努力掩盖他与莱温斯基的事情中所犯的愚蠢错误，也隐约因为没有聘任德肖维茨作法律顾问。德肖维茨

<sup>⑤</sup> 艾伦·德肖维茨：“关键在证词，而不在演讲”，《波士顿先驱报》，1998年8月20日，第37版（加了着重号）。

<sup>⑥</sup> 例见，葛布里尔·J·陈和C·威尔斯：“作为偏见和撒谎动机之证据的沉默的‘蓝色之墙’：警官伪证新方法”，《匹兹堡大学法律评论》，第59卷，第233页（1998）。

<sup>⑦</sup> 艾伦·德肖维茨：《性的麦卡锡主义：克林顿，斯塔尔以及出现的宪法危机》（1998）。

在批评克林顿的律师所使用的那些伎俩时,非常挑剔,尤其是对罗伯特·贝尼特在波拉·琼斯讼案中沒有建议(德肖维茨说贝尼特在电话里对他承认了这一点)<sup>④</sup> 总统不到庭。尽管德肖维茨因为克林顿对一般意义的犯罪持强硬态度,对其犯罪同伙缺乏同情心(事实的确如此)批评了他,但却没有因为克林顿从事了犯罪活动或者损害了法治而对他提出批评。

执业律师在克林顿的整个苦难经历中出尽了风头,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在参议院的审讯中。大多数众议院负责人和总统的律师都曾有过出庭律师的经历。他们的表现夸大了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之间的不对称。在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中,检察官应该相信他们起诉的人是有罪的;他们不应该只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能够说服陪审团定罪而提起诉讼。原因在于,检察官的“委托人”——国家——从对无辜的人定罪那里获得的东西很少,或者根本就得不到什么,得到的有可能比没有还少;给无辜者定罪可能会减弱刑法的威慑效果,因为效果并不依靠如果被告有罪而受罚的可能性,而是依赖于这种可能性与如果他是无辜的而受罚这二者之间的差异。<sup>⑤</sup> 相反,辩护律师的当事人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被宣判无罪。因而,克林顿的律师们在审判中对作各种陈述毫无顾忌,显而易见的是,作为聪明人,他们不可能相信总统在大陪审团前的宣誓作证是实话。他的两个主要律师,戴维·肯德尔和查尔斯·拉弗,都强调总统沒有对大陪审团撒谎。

④ 同上,第19页。

⑤ 这在对有罪或者无辜随意地施以惩罚的情况下最明显。让我们用  $EC$  代表预期惩罚成本——一种威慑量度。那么,  $EC = pS$ , 这里  $p$  是逮捕和定罪的可能性,  $S$  是刑罚。对实际犯罪的预期惩罚成本是被控诉者有罪的预期惩罚成本与他是无辜的预期惩罚成本之差。即,  $EC = EC_g - EC_i$ 。相应地,  $EC = P_g S - P_i S$ , 这里  $P_g$  是被控诉者有罪而遭惩罚的可能性,  $P_i$  是他是无辜的而遭惩罚的可能性(在任一案件中假定判决是同样的)。这可以被简化为  $EC = (P_g - P_i)S$ , 显然,如果惩罚的可能性与有罪同值(即  $P_g - P_i$ ), 犯罪的预期惩罚成本就将是零。但是,如果对有罪或者无辜并不随意地施以惩罚,分析就要更加复杂,预期也就更不确定。旨在防止无辜者被定罪的宽松的程序保障可能会增加对有罪者定罪的可能性,直到足以抵消阻止增加对无辜者定罪的可能性的负面影响。

惟一的不同在于,肯德尔对他所说的没有给人留下相信的印象。拉弗,一位更好的演员,给了人们一种具有说服力的伪装,他相信他说的一切。律师们使得参议院会议厅成了总统谎言的回音厅。

尽管斗争双方不时地表现出很高的专业水平技能,调查、弹劾以及对克林顿总统的审判却都没有体现法律职业的最佳时机。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及其成员、以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所表现出的老练、雅致和公共关系,这些错误对判决总统无罪可能是决定性的,而总统律师们在技术上的杂技表演伤害了他的名誉,并且也可能成为了赞成弹劾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向其攻击者的眼里投沙子,以及为其支持者提供“赛跑空间”(就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是有好处的。

#### 四、大众传媒

对手们在一点上具有共识,即谴责媒体在它们关于克-莱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没有尊重个人隐私和性的庄重得体。人们又怀旧地记起了过去的那些好日子,那时有一个保持缄默的密约,以避免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肯尼迪的通奸行为向公众曝光。但是,就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关系而言,打破沉默准则的并不是媒体,甚至不是像《苦工报告》这样毫不过滤的互联网媒体。事实是,由审判团的一名陪审员授权独立检察官调查该事件,这是通过琳达·翠珀逐渐引起人们注意的,而不是通过媒体。的确,大众传媒到处嗅来嗅去;《新闻周刊》的文章对凯瑟琳·威莉引用了翠珀的话,这是迫使翠珀录制她与莫尼卡·莱温斯基的电话谈话的因素之一;而斯塔尔在克莱事件在新闻界曝光之前想捆住克林顿的希望也加快了他调查的进程。但是,调查一旦开始——媒体至多影响了开始时间的选择——再对公众隐瞒就不可能了,考虑到调查对国家的可能后果,这原本是不合适的。

媒体过去对总统的通奸行为保持沉默的原因并不在于那时候的新闻记者更道德;如此想就会屈从于黄金时代的荒谬见解了。其部分原因在于,国民更加拘谨。阅读报纸的人对关于总统性活动的文

章可能会触目惊心。一些读者可能不会相信那些文章；另一些人则可能会认为如此作践总统是不忠诚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或者大逆不道的。媒体的危险是可以感觉到的；即便今天的报纸和电台也得对它们的报道语言作删剪。但是，由于人们对性问题的公开讨论变得越来越心安理得，对公众人物性生活的讨论禁区也就越来越少了。躲在媒体对事件及其后果的新闻报道背后的不是传播、观众或者广告税的增长，而是对变化中的道德的自然适应。因为克林顿总统的危机而谴责媒体的人们，就像那些谴责肯尼思·斯塔尔以及克林顿夫人信心十足地指责具有“大右派的阴谋”的那些人。他们正在抱怨信息的传递者。

第二，也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的新闻记者和那时的政治科学家（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政治科学家）一样，接受了我第四章讨论的总统的神秘性理论：即总统的有效性依赖于公众的信仰——他是高于生活的——这一看法。现在，许多新闻记者不再相信这种理论，因而当他们暴露总统的性格弱点时他们不认为他们正在伤害国家。

第三，今天的媒体存在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出版商从来都不想把自已列在总统的、或者其他强有力官员的敌人名单上，尤其是对那些拥有他们自己的电台或者电视台的出版商，这是很有价值的政府特权。像其他的阴谋一样，不得不卷入阴谋的人们和公司的数量越多，保持缄默的密约的预期效果就越脆弱。随着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兴起，新闻和信息供应商比以前要多得多。但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媒体来说，像《苦工报告》这样的互联网新闻台，像《沙龙》这样的互联网杂志以及 24 小时连续播放的有线新闻网，已经不可能再掩盖它们不想播报的新闻了。

对新闻媒体来说，克林顿-莱温斯基的长篇故事是一个暴富之源，因为组织新闻节目的成本对观众的数量而言基本上是恒定的，而关于此长篇故事的节目吸引着大量观众。这使得媒体并不对国民着迷于长达三个月的政治和法律连续剧负责。媒体不能让人们对特定

的故事感兴趣。存在着太多的与其他故事的竞争。人们对他们能够理解的(不像白水门事件)、关于性的总统丑闻着迷,这一点都不奇怪。

媒体在它们对苦难经历的新闻报道上所犯的惟一大错就是,把莱温斯基描述成一名 21 岁的住院实习医生,这给人造成了克林顿利用一个小姑娘的印象。莱温斯基在事件发生时 22 岁,只是一名义上的实习医生,因为莱温斯基是作为一名常规的雇员被雇佣的,尽管她并没有完成所交给的文书工作。她是一名头脑清楚、有性经验的年轻女子,而不是一名易受攻击的孩子。

媒体对克林顿磨难的新闻报道,尽管被谴责为耸动视听,但事实上也加强了新闻业的职业主义印象。大多数新闻记者,不管是印刷业的还是大众传媒的,也包括社论作者,都是自由主义民主党人。他们对丑闻及其后果的报道毫不留情,甚至在他们与公共观点明显不合拍之后也是如此。他们比一些学者有更弱的政治性,他们的影响也比一些害怕“自由主义媒体”的保守主义批评家的要小。

## 五、另一种名义的战争

克林顿-莱温斯基的长篇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更成系统地思考冲突动力学。冲突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普遍特征,这已经由各种各样的学科(博弈理论、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当然还有历史学)在不同的背景下进行了研究。背景之一是战争。<sup>⑨</sup> 从来都不曾出现过单一的冲突“理论”,冲突这一现象也许太混杂了,以致于不能容许理论的统一。但是,由对克莱的公开披露所触发的冲突具有系统特征,这可以从其与冲突之王——战争——的类比来理解。克劳

---

<sup>⑨</sup> 例见,托马斯·C·谢林:《冲突策略》(1960)。谢林强调了对争执双方避免或者限制战争的协商;我想强调的则是战争行为。



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延续”<sup>⑤</sup>——加强了这一类比的适当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甚至也可能与它具有相同构造。对战争以及与战争相似的冲突的系统特征的一种更好的理解,可能有助于参与克林顿危机的人避免他们所犯的一些错误。

在冲突利益意义上的冲突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潜在的冲突爆发为实际的斗争却是少见的。大多数劳动争议是在没有罢工的情况下得到解决的,大多数的诉讼也是在不审判的情况下得到和解的,大多数的国际争端也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解决的。斗争这一术语倾向于给双方带来沉重代价,因而在大多数时候,它为谈判解决所避免,谈判解决大致也能够让每一方得到与通过斗争来得到的差不多的东西。因此,在可能的后果、或者每一竞争方对特定的后果所下的赌注不确定时,战争最有可能爆发,这种不确定导致了一方或双方的错误估算。

战争趋于产生惨重的代价,甚至也与胜利的赌注有关,它们的发生并且它们经常最终也是完全单方面的。要是考虑到代价、以及它们发生时常常是单方面的之后,它们还是发生了,就表明可能存在着对军事后果的极端不确定性。<sup>⑥</sup>对此,略加思索就会知道为什么。首先,战争是战略性的。这就像下棋一样,“下”的效果取决于对手的应对;既然对手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每一招都会迅速招致第二轮不同的回击,很不确定,那么斗争的过程和后果就不可能事先预料。其次,在战争中,保密有极大的好处,对此,旨在为和平解决提供便利的化解制度——是与诉讼的审前调查和劳动关系的集体谈判一致的制度——很不完善;主要的一种是间谍活动。更为重要的是,战争既是间断的,在技术上又是逐步推进的。从而,从上一轮的战争后果很难

<sup>⑤</sup>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69、87、605页(迈克尔·霍华德和彼得·帕瑞特编,1976)。

<sup>⑥</sup> 克劳塞维茨又强调了一个观点。如,同上,第85-86,101(“战争是不确定的王国”),102页。如果知道战争会沿着某一路线进行,那么任何受理性控制的民族都是不会发动战争的。所以,如果有良好的信息,是不会发生单方面的战争的。

预见到下一次战争的后果。换言之,战争缺乏良好的先例。<sup>③</sup>而且,所有的斗争都是情感性的,战争尤其如此,因为其暴力引起恐惧和仇恨。战争的情感性使得人们或者甚至战争民族的领导者很难直接思考,从而为预知对手的行为设置了进一步的障碍。(从人类的行为是理性的这种假定模式进行预测更加容易。)例如,常常不可能知道攻击是会导致防守方的逃窜呢,还是导致防守方加倍猛烈的还击。因为情感与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战争具有不同寻常地频频出现愚蠢错误的特点——也有更深层的原因,即保密和诡计具有斗争和运筹的特点,这使策划估计复杂化了。在战争中,没有任何与证据规则或伪证制裁相对应的东西,这些有助于减少审判中保密和诡计的作用。所有这些考虑都支持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很简单,但是,最简单的事情都是很不容易的”。<sup>④</sup>

在国内斗争的场合,比如由揭露克莱事件所引发的斗争,角逐者都在极端不确定和激烈情感的条件下争斗,斗争跟战争可能很像,也可能通过军事理论和历史来解释。那些都是这一特别斗争的条件。不确定性首先源于克林顿的抵赖以及对斯塔尔调查的实际或潜在目标的否认,也源于斯塔尔不愿意放手。但是,这也和公众对一些情况怎样反应的不确定性混杂在一起,并最终为其所超越,这些情况包括:总统的性丑闻,总统妨碍司法,独立检察官及其参谋人员的起诉策略,时间选在与丑闻及其后果交汇的中期选举,以及媒体对总统行为的强烈谴责和硬性要求他下台。这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新鲜事情,因而其过程和结果不到很晚是不会预料到的,亦即直到主角(总统,他的维护者,他的攻击者)采取他们的行动之后。

斗争由情感所分裂,也为不确定性所分裂。一如我们在第六章所看到的,一些竞争者所下的赌注似乎惊人地高;看上去,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危如累卵。斗争的规则是不明确的。值得庆幸的是,规则

---

③ 参见,同上,第112页。

④ 同上,第119页。

并不像在战争中那么不明确；没有暴力，而只有少量的暴力威胁（除非克林顿的仇视者和《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作者能够得到信任）。<sup>⑤</sup>但是，谎言和诽谤、背叛以及“泄密”（间谍的一种）都被大多数斗争的参与者视为是可以接受的策略。这些策略和不确定性掺和在一起，也为冲突的情绪化所加强。

克林顿的“战争”行为显现出其他一些与战争相似的特征。其一是进度。打仗一般是战争的间歇特征，而不是它的连续特征。军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东转西闯、熟悉地理、静观其变；战斗会时不时地打破沉寂，但（在许多战争中）并不经常。<sup>⑥</sup>克林顿求生的斗争同样如此。第一“仗”持续了不下一周，从1998年1月21日故事的爆发到发表国情咨文。接着是很长的一段准备时期，它最终以斯塔尔激动人心的打击——检验连衣裙——而告终，这预示着一场猛烈的战斗。然而，随着9月21日对总统在大陪审团前的宣誓作证的广播，又消退了。随后发生的是克林顿在中期选举中戏剧性的“不流血的”胜利和对敌将纽特·金里奇的“残杀”。但是，令每一个人都很惊讶的是，战斗在几天内又重新开始了。汤姆·德雷举起了倒下的旗帜，直至坚持到12月19日众议院共和党人的胜利，但是，接下来却又是另一次间歇和和平的侦察，他们想当头拦阻参议院的最后的战斗。和谈失败了，1999年1月，参议院参加了最后战斗。

以上段落所叙述的故事引来了战争的另外一个类比。拿破仑应该讲过，比一名不好的将军更坏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有两名良将。他的意思是，在进行战争时，由于战争的条件，尤其是情感性和极端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分裂倾向，命令的统一是极端重要的。这

---

⑤ 演员艾勒克·伯德温在全国广播公司的《晚夜》节目中制造了最怪异的恐吓，他在其他国家说：“让我们一起到华盛顿，用石头把亨利·海德砸死！我们会把他砸死，并且到他们的家中，杀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引自美莲达·亨勒伯格：“亨利·海德反对克林顿的决心是怎样形成的”，《纽约时报》，1999年1月10日，第A1、A14版。海德并不开心。同上，第A14版。

⑥ 例见，罗伊·缪尔：《拿破仑时代的战争策略与经验》，1998年，第7页。

一因素有利于总统。他在他那一边处于毫无疑义的统帅地位,尽管就像在大多数战争中那样,他的军队有他们自己的日程表;他的大多数国会步卒和官员对他们自己存活的关心要超过对战争胜利的关心。他的对手缺少一位单一的指挥官。金里奇努力想充当这一角色,但只是间歇性的,并伴随着明显的有限胜利。他不能挽回他的第一次失败,他也没有真正的后继者;在他垮台后,指挥权就胡乱地掌握在了由德雷、海德和罗特松散集结起来的三人统治集团手中。对共和党人来说,不幸的是,美国缺乏忠实的反对党领袖这一传统,<sup>⑤</sup>这一领袖本来可以在他们与总统的斗争中统帅共和党人,特别是有可能确切地表述一致的策略、主题和观点。

另一个与战争类似的特征是,对正在被争论的“战争”问题,非战斗人员和普通士兵往往漠不关心。在真正的典型战争中,许多非战斗人员只想逃离烽火前线(许多战斗人员也想),而大多数普通战斗士兵都不是逃兵,他们战斗是为了生存、战利品或者他们的战友,而不是为了他们领袖的目标。对克林顿斗争的公开讨论常常心照不宣地假定了,两亿八千万美国人已经扛起了武器,形象而言,正在要么为克林顿所提出的目标,要么为反克林顿者所提出的目标而战。而事实上,大多数人并没有积极参与这种兴趣索然的战斗。他们并不明白所有这些闹腾都是为了什么,对更加紧急情况的地方的或个人的关注也干扰了他们,或者,他们对此压根就不予理睬,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完全不可理解或者跟他们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在那些积极参与者中,有很多人是基于纯粹的帮派精神而战斗——他们战斗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克林顿继续干下去或者垮台对民族是要紧的,而是因为他们在这场战斗的一方或者另一方有职业奖金、个人友情或者情感交往联系。

斗争中一个很特别的克劳塞维茨主义特征是,双方的大错数量

---

<sup>⑤</sup> 金里奇在1994年国会选举运动期间扮演了这一角色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在他随后企图控制弹劾危机的努力中,他悲惨地失败了。



非比寻常。它们源于,克林顿在莱温斯基卷进来之前没有把琼斯案件解决好或者没有做应该做的事、他的律师中伤琳达·翠珀、克林顿轻信莱温斯基对他们的事件会小心翼翼,以及琼斯的律师对克林顿的不恰当提问,这些酿成了他努力靠能说会道来避开他们的圈套而不作能够被证实的伪证这一大错。接着还发生了一些大错:莱温斯基让一名对刑事实践缺乏经验的律师代替了她起初的律师(弗依·乔丹所请的律师)、<sup>⑤</sup> 克林顿在公共和私下场合对事件的抵赖太过明显、他对大陪审团撒谎的决定、<sup>⑥</sup> 在他仍然对那种经历感到痛心的时候向国民演讲、以及斯塔尔在他的报告中包含了太多生动的性细节。

这些大错最终导致了一些结果,这似乎在于——对共和党人是灾难性的,它似乎也在于(但这仅仅是另一错误的开端)——共和党人对1998年中期选举结果的错误估计、<sup>⑦</sup>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没有能够在定好精确的调查时间表前通过一项决议(是一致同意的或者基本如此)进行弹劾调查、<sup>⑧</sup> 该委员会没有迎合众议院民主党人的程序建议(然而目的是有害的)、该委员会决定向公众公布克林顿总统的大陪审团誓词的录音、以及委员会中的某些共和党成员错误预

---

<sup>⑤</sup> 确切地说,这是她父亲的错误,而不是她的。该律师在营私舞弊讼案中做过她父亲(一名医生)的诉讼代理人。

<sup>⑥</sup> 克林顿的律师们犯过他们自己的错误;但是这一错误似乎是他犯的。“克林顿先生的律师们……曾告诫过总统,对他来说对联邦大陪审团撒谎无异于自杀……在他在法庭作证之前的周末,总统的律师们决定,他应该作一种开明的陈述,承认与莱温斯基不正当的关系,而后对性接触的性质不回答任何特定的提问。但是,在大陪审团质证的四小时里,总统背离了原计划而坚持咬定莱温斯基对他做了性行为而他从来没有碰过她,这使他的律师们感到惊讶。”“共和党的决心怎样影响克林顿输掉了选票”,《纽约时报》1998年12月21日,第A1、A24版。显然,他的证词激发了独立检察官办公室为了可能的弹劾把克林顿提交给众议院。同前,第A24版。当然,这是一篇新闻报道,可能不太准确。

<sup>⑦</sup> “民主党人在劫难逃……11月3日的投票过后,民主党人可能降到了约40名参议员,200名以下的众议院议员。”威廉·库瑞斯托:“民主党人的命运”,《每周标准》,1998年10月19日,第10页。

<sup>⑧</sup> 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从此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并且没有再犯。



计磁带会表明总统发了脾气。但是,众议院民主党人也因过高地估计他们的实力而冒了风险。他们的帮派激怒了共和党人,也可能遏止了通过责难和解弹劾调查以达到不弹劾的任何机会。<sup>②</sup>在参议院,大错主要在众议院主持人一边。他们人多口杂,也太相像了,<sup>③</sup>都错误地强调了弹劾的妨碍司法条款,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以及对莫尼卡·莱温斯基做了不合适的讯问。

总统对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的 81 个问题的回答具有诡辩、不坦率的特点,在有些地方还具有虚假的特点,他甚至在面对公众不断要求他承认伪证或者至少在宣誓时撒了谎(或者最最起码,撒谎了)时仍然拒绝,对这些尽管存在着很多批评,但是我不认为这些对真实的逃避、对常识和坦率的有意冒犯可以被确定无疑地断定为大错。在人们不再相信他,尤其是在弹劾争论的前夕,他还是否认。我并不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他的一大错误。它不仅确证了他撒谎成性的印象;也给了温和的共和党人一记耳光,这些共和党人想以宽大行为交换完全的承认。他本来就应该闭上嘴巴。

但是在弹劾倒计时期间,其他过度批评行为和疏忽就像它们是令人讨厌的那样,也是注定了的。随着危机月复一月地继续下去,对克林顿来说,要全盘招供,承认他一而再地撒过谎,主动请求刑事起诉以及恳请国会宽恕,就越来越成为了不切实际的选择。他坚持谎称他不曾撒谎的时间越长,这就越清楚:如果他不再说谎,那不会是由于良心的变化,而是由于策略的改变;如果良心可以激发他说真话,那很早就应该这么做了。到 1998 年 12 月,如果有任何人要求克林顿总统放弃谎言,他只能用马克贝斯的话回答:“我在血海汪洋中/都行了这么远,陷了这么深,难道我应该就此罢手,/迁徙跨越是令人

② 对支持这一假说的一些证据,见亨勒伯格,前注⑤。

③ 就表面而言,他们都是保守的、白色的、基督徒的、“正直的”、体力上“能干的”男性。白宫选派了更加多样的五人组,包括一名有生理缺陷的白种男性和两名妇女,其中一名是黑人,另外一名是犹太人(从她的名字看)。如果共和党人原来不曾选派更加多样的队伍,而是只派一到两名起诉人,他们至少可能利用多样性的缺乏而赢一把。

厌烦的,走回头路又何尝不是如此”。<sup>④</sup>

就他的律师把否认不能否认的事实与起诉程序的技术障碍(比如,这一妨碍,即弹劾条款具有不合宪的模糊性)相结合的策略而言,这些策略强化了而不是消除了他们的当事人犯有控诉状上所说的罪行这一印象。它们甚至也可能酿成了弹劾。但是,它们服务于两个目标。他们避免让克林顿先生在离任后更容易受到刑事起诉的伤害;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一起诉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他们给了民主党人同样的逃跑空间,民主党参议员企图支持对总统未详细指明的不法行为的责难,而不赞成裁定他犯了特定的罪行。对任何选民所提出的一名犯罪的总统怎么可以被允许继续留任的疑问,国会的民主党成员可以回答,克林顿的律师们对总统是否犯了罪也已经产生了真诚的、如果可能也是技术性的质疑。为安德鲁·约翰逊辩护的律师在弹劾诉讼中也着重借助了技术性法律观点,<sup>⑤</sup> 这能够使得七名共和党人认为他们的投票是基于法律考虑作出的,<sup>⑥</sup> 这七名共和党投票反对定罪,因此也反对他们自己的党。能够躲在法律之后总是舒适的。但是,总统的律师们对法律细节和焦土策略可能做得太过了。这类策略有时可以获胜,但是它们却是孤注一掷的一种象征。

我们必须谨慎地权衡依过去的情形分析未来和对未来作预测,或者事后想想和事前看看这二者之间的差别;还需要在以下两者之间作出评估:一是在当时从理智上看似乎是最好的,但最终证明是不好的策略(或者在当时似乎是不好的,但最终证明是好的,对由总统的律师引起的无关宏旨的辩护的最终裁决可能是如此);二是事先就应该看出有可能存在缺陷的策略。事后觉醒的智慧和事前预见的智慧之间分歧的最好例子可能是克林顿从一开始就公开明确否认与莱温斯基有任何性关系。回顾过去,他立即全盘招供似乎是最明智的。

<sup>④</sup> 马克贝斯,act. III, sc. II. 137-139。

<sup>⑤</sup> 见迈克尔·勒斯·贝纳迪克特:《对安德鲁·约翰逊的弹劾与审判》(1973),第146-167页。

<sup>⑥</sup> 同上,第174-178页。

但是,除了迪克·莫里斯拉选票的建议——人们并不愿意接受总统的行为是穷凶极恶的,回过头去可以想到连衣裙,但事前却不能预知。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想相信克林顿,或者至少不想承认他们的怀疑,要是没有DNA检查结果,他就有可能对该丑闻只是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就像他8月出现在大陪审团之前不久一直所做的那样(在赞成抵赖是一种策略时,我并没有暗含道德认同)。

在克林顿努力挽回他的总统职位和一场真正的战争(因为大错对犯错误的人来说太鼓舞人心了)之间作比较时,我的下一个观点是,一个人在极端不确定的情况下会企盼什么。一个例子是琼斯的律师对克林顿的不明智的提问。要是他们问了他可能不能回避的问题(很容易这么做),他本来可以当场就决定不回答这些问题。这可能会导致缺席判决,尽管它不会截断独立检察官的调查。翠珀所提供的暗含着总统贿赂证人、在作证之前教唆假证的磁带发动了这一调查,但是,它也有可能使得调查的最丰厚果实荡然无存。

第二个例子是,莱温斯基改聘的刑事律师缺乏经验、不称职,他拖延了她与独立检察官的合作,从而耽误了克林顿否认的时间,也导致了由调查所产生的调查记录的大范围扩展,这一记录对克林顿极为不利。第三个例子是克林顿决定在大陪审团前作证,并允许他的证词被录下来,结果他在千千万万听众面前作了伪证。但是,广播也可能是斗争的转折点——克林顿的斯大林格勒——因为在它对克林顿的名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时,它转向了公众对弹劾的反对。这部分因为克林顿的魅力和胆量,以及他的不知名的调查人给电视观众造成的凶神恶煞的和令人不快的印象,也部分因为共和党人对磁带的预先描述不精确,这使得他们看上去似乎是盲从的和不可靠的。

转折点(对克林顿的大陪审团证词的广播)以及明显的却是虚幻的致命一击(中期选举)这二者说明,在斗争中,即使目标在本质上是无关的,也存在着不能达到一个宣布的目标的危险。无论是在大陪审团前接受提问时丧失了冷静,还是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得到了额外的议席,这对克林顿的弹劾本来都不应该是重要的。这些事

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该斗争将如何结束太不确定了,以致于公众希望对手对自己的计划提供一些标示着转折点的信号。显然,共和党人认为克林顿在电视上发脾气是重要的,他们在国会中占绝大多数同样也是重要的。否则他们是不会预知这些事情的。<sup>⑥</sup>在没有什么继续下去时,这至少是一种自然的推论。1968年新年的攻击基本上是依次失败的自杀式攻击。但是,它最终却被证明是越南战争的转折点,因为美国已经否认了这样一种攻击的可能性。公众并不知道越共败得有多惨;所知道的一切只是,我们的政府已经摧毁了敌人的力量。

战争的情感性制造着错误的开端,也产生着危险的过于自信。滑铁卢战役之前法国进攻英国左翼的失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英国骑兵的反攻热情是如此之高,以致于他们的攻击把他们带到了法国大炮的近距离射程内,在那里他们一败涂地。在克林顿危机期间,共和党人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起初他们认为后退并且让民主党决定克林顿的命运是最好的;如果他幸存下去,他就成了一位软弱、不光彩的总统,共和党人在1998年的中期选举中在议席上就会处于有利位置,并且在2000年赢回总统。但是,当克林顿在斯塔尔的重击下被弄得晕头转向时,共和党人就开始考虑,他们可以踢开克林顿,在1998年11月赢一大把,选派戈尔扮演克林顿孪生兄弟的角色,并且也可能以独立检察官对滥用竞选筹措款的调查来摧毁他。所以,他们狠命用劲,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平衡,并且引起了一种强烈反应——导致了金里奇的下台。事后想来,他们看上去像哑巴,但是,应当允许情绪化和不确定性混合在一起,这种情绪化带来了削弱审判的急剧的情绪震荡。假如金里奇具有克林顿乐观的性情,并且把下台拖延几天,他也许就继续活下去了。

与战争的情绪化相关的另外一点是,战争各方都倾向于无视他

---

<sup>⑥</sup> 可以想象,共和党人当时正在努力影响公众的反应——希望如果他们告诉公众将会看到克林顿发脾气,公众就会看到。



们起初的战争目标,而随着战争的进行采用更具野心的、常常更加具有报复性的目标,因而,他们会有更大的牺牲。换言之(这是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另外一点),战争趋于逐渐升级。在《伊利亚特》中,夺回海伦的战争就是一场摧毁特洛伊的战争。在美国内战中,解放奴隶是北方的一个战争目标。对德国及其同盟的防御战成了一场“为了民主维护世界的安全”以及重划欧洲中心版图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北朝鲜的共产主义政权成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战争目标,尽管它很快就被抛弃了。同样,从共和党人的观点看,以小规模冲突开始的战斗最终成了不惜一切政治代价罢黜总统的全力以赴的战斗,这一战斗旨在弱化克林顿总统,但是并不罢黜他,以此在2000年的选举中给副总统戈尔以现任者的优势。部分原因只在于他倔强的辩解激怒了他的攻击者并且导致了他们的加倍努力。<sup>⑧</sup>“战争”给他们带来了个人的和政治的损毁,他们也因为报复而绝望、而不惜一切代价。

我的最后三个观点彼此相互联系,也与前述关于达到一个宣布的目标很重要(而本质上并不重要)的观点相联系的。它们是与过早地宣布胜利、<sup>⑨</sup> 因接受失败而失败、<sup>⑩</sup> 以及依靠终结游戏策略的胜利缠绕在一起的现象。因为战争的不确定性和情感性,以及因之发生的对它持续过长或者没完没了的担忧,角逐者发现对胜利的有效条件事先作出界定是有诱惑力的,这样可以创造一个可以得到的目

<sup>⑧</sup> 再次见亨勒伯格的文章,前注⑤。

<sup>⑨</sup> 一个例子是,在波拉·琼斯案件中,当联邦地区法院在1998年4月驳回该案,竟然出人意料地受到了克林顿的律师的一阵喝彩。例见,约翰·阿洛伊西斯·法威尔:“尽管处境尴尬,贝纳特仍然毫无伤痕”,《波士顿环球时报》,1998年4月2日,第A28版。(也有拒绝者——他们是有先见之明的,见劳艾德·葛鲁夫和戴维·塞加尔:“总统的律师:贝纳特用他胜利的大腿跨栏”,《华盛顿邮报》,1998年4月3日,第A34版。)六个月后——利用这一时间是一种传统智慧,案件本来可以或者本来应该以不超过两万五千美元的可能代价、以及在有可能避免完全调查莱温斯基的情况下,在更早的年份被和解或者被缺席判决——总统以85万美元和解该案。

<sup>⑩</sup> 克劳塞维茨,前注⑤,第90页。



标、一个明白易懂的焦点、以及一个确定的斗争终结点。但是,这往往只是一种敌人可以自由拒绝接受的惯例。这在 1812 年被“理解”为,如果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战争就会结束;俄国人就会承认失败。但是,他们没有,拿破仑的军队在几个月内被摧毁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假定,也可能是正确的,德国如果控制了法国,就会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在 1940 年当德国征服了法国时,人们普遍相信它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英国将求和。但是,英国拒绝承认失败,并且最终击败了德国。甚至法国原本也不必承认失败;尽管法国本土被占领了,但是它的全体国民还可以与它的殖民帝国战斗。

在由公众对克莱事件的关心所触发的争斗过程中,克林顿似乎有两次差点被迫离任。第一次是在丑闻向公众披露后的头几天。第二次是在总统向大陪审团作证和 1998 年 8 月 17 日的演讲,与 9 月 21 日他的大陪审团宣誓作证的电视播放这二者之间的那一段时期。在此两个时期,他的脸面丧失殆尽,以致于让他继续位居总统之职不可思议。一个意志更加薄弱的人,或者一个更加卑微的人,可能早就半途而废了。但是,就像所发生的那样,如果他拒绝承认失败,他的对手事实上是没有能力让他失败的。那些自信他会失败、以及他会不得不承认和屈服的人,没有能够仔细研究那些为终结游戏所必需的步骤。民主党、内阁以及白宫工作人员大批大批地离总统而去没准起了作用,但是,那何以可能?他所在的党、他的内阁、以及他的职员与总统突然、完全断绝关系,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它也可能毁掉民主党。但是,倘若这些(比起对总统的弹劾和定罪来,更加接近于真正的致命一击)不发生,让克林顿离任就只有靠弹劾和定罪了。由必要的 2/3 投票来定罪一向都是虚妄之举;没有人能够统一 67 张可能的投票,因为只有 55 名共和党参议员,而且并不是他们全部——还有数量极少的民主党参议员——都可能投票定罪。<sup>①</sup>惟一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是,公众对总统的深恶痛绝情绪空前高涨,从而

---

① 最终,并没有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定总统有罪。

改变参议院的想法。9月21日早晨,等待总统在大陪审团作证的证词录音在广播上播放时,似乎仍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到当天晚上,该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这就像中途岛战役一样。在日本航空母舰的士兵不损一兵一器地将美国战斗机一批批击落之后的几秒钟,日本看上去似乎已经赢得了战争。接着俯冲轰炸机队来到了,击沉了日本的航空母舰队,日本的希望终结了。

继续比较下去,广播并不是战争的终点。克林顿总统对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所提问题的逃避和虚假回答,对他的命运引发了一个向下的螺旋,这随12月11日他在玫瑰花园的四分钟(这是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建议提起弹劾的四项中的第一项进行投票之前的发言时间)演讲而跌落到了最低点。总统就像一只遭到了鞭打的狗一样,发言仍然只是为他的难以琢磨的不特定的错误言行,作另一种推托的、不足以令人相信的道歉,而后就默默地回到了椭圆形的办公室,而忽视了像猎狗一样的新闻记者要求他承认撒谎和伪证的叫嚣声。一周过后,众议院的议员席上开始出现弹劾争论,随后几天,他受到了弹劾。

日本的战争与共和党人对克林顿的战争之间的比拟是不准确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地位与克林顿总统1998年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美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而克林顿在1998年是一位即将卸任的总统(跛脚鸭)。他的地位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英国的胜利是本质上的、英雄式的、光荣的、但是也是得不偿失的,这加速了这个民族的衰落。克林顿与撤职的斗争表明了他的坚韧、达观和良好的语言技能;但是,他也受到了严重伤害,一只跛脚鸭被进一步伤害成了无助的瘸子。我所谈的伤害并不是指对克林顿荣誉的伤害,其严重性必须要考虑到将来的审判,而是指对他作为总统的有效性的伤害。由于他不能再次逃跑,也由于国会两院反对党的牵制,他已经处在了弱势,由于调查和弹劾,他的权威遭受了如此重大的额外损失,以致于他可能在任何水准上,而不是在语词上,都难以完全有效

了。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党是搬起石头砸了他们自己的脚。这指的是1998年11月中期的国会选举。由全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弹劾总统,这已经被列入日程安排。民主党比预期做得要好;总统已经“赢得了”全民投票;人们都确信总统不会弹劾。但是,共和党人,就像拿破仑俘虏了莫斯科之后的俄国人一样,拒绝承认失败。面对媒体专家脸上的愕然神情,他们决定把弹劾调查继续下去。像俄国人一样,他们尝到了消耗战的甜头。弹劾总统的稳健击鼓声带来了损害,总统的律师们日渐走样的、不惜一切代价投机取巧的法律诡辩术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击鼓声。他们不能回击对伪证的指控。公众对弹劾调查的厌倦脱胎换骨地成为公众对总统命运的冷漠。他的道德权威逐渐消逝了。他受到了弹劾,一个月不到,他就在参议院受到了审判。

## 第八章

---

### 并非结论

这个国家整个 1998 年和 1999 年的前六个星期的公共生活为克林顿总统留任总统职位的抗争所占据。这场抗争不仅充满桃色和富有戏剧性,而且更是深深地吸引着人们,尽管它是高度戏剧性的——在强度和深度上都是一场瓦格纳式的戏剧:以克林顿为主角和以数以百计的配角支持的优秀演员们披露了大量生动的资料(磁带、衣服和共和党议员的性生活)、肯尼思·斯塔尔的华丽剧本<sup>①</sup>、电视解释的希腊合唱、加上不幸的台步、党派性的人来人往、告密、悬念、命运的逆转和(克林顿仇恨者们提供的)暴力暗示,好像是由阿普戴克或奇弗尔所描述的五月——十二月浪漫史、一场不断升级的阴谋、一部描述主角道德和心理成长的小说,<sup>②</sup> 甚至还有讽喻的解释和喜剧的格调。这是一部终极的华盛顿小说,其高超、无法攀及的流派表现和其对事实确实胜于虚构的证明,表明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将其娱乐价值先置于一边,这一经历使我们受益了还是受损了呢? 作出判断还为时过早;如果我们要说因此受损,尤其不是时候。

我们确实在某些方面从中受益。我们知道了《独立检察官法》的

---

<sup>①</sup> 有人将《斯塔尔报告》视为(几乎视为)“一部经典传统的小说”或“道德化叙述”。参见亚当·戈普耐克:《美国研究》,载《纽约人》,第 39 页(1998 年 9 月 28 日)。

<sup>②</sup> 在我的脑海中,莫尼卡·莱温斯基从 1995 年 9 月的一个轻率的性感比萨饼女服务员转变成为其证词在 1999 年 2 月 6 日向参议院和全世界播放的一个坦然自若、言辞清楚的女子。

危害和总统弹劾的缺陷。与其他近期的非小说娱乐事件(例如戴安娜王妃事件、约翰·格林再度进入外层太空)不同,克林顿总统的痛苦经历促使人们严肃地思考许多重要的问题——法律、道德、宪政框架、公众舆论和政治行为等问题。由此,使人们的思想更加市民化,虽然无人知晓这一市民社会教训会被人们记取多久。这还使公众可以更坦率地讨论性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好现象。认为父母已经放松了对其子女的道德发展控制的观点未被证实,也难以想象。年幼的儿童不了解克林顿和莱温斯基做了什么,少年们了解,但却没被告知。口交是否会因为公众对总统的这种尝试的无穷讨论而变得更为普及,作出这种评论也还为时过早,但即使如此也非世界末日;虽然对某些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这种行为是一种罪恶,但它至少能安全地避孕并很少导致疾病。在这些方面,性电话更好一些,虽然我可以想象,如果威廉姆·贝纳特读到通过声音的行为的内容时会惊讶得从椅子上跌落。如果因为克林顿总统犯有伪证、妨碍司法等违法行为仍幸留原位而鼓励了某些人,那么对他们而言,这些犯罪行为不具有可比性和可预知性,他们已经知道从事这样的行为可能遇到的麻烦。被暴露隐私不仅限于克林顿和莫尼卡·莱温斯基,而且有克林顿—莱温斯基一剧的配角,包括共和党众议院议员,并且通过披露相当比例的政治家在他们的密室内有几具骨架而使作为选举策略的丑闻传播中性化,从而使人们能重新针对实质性问题进行选举竞争。<sup>③</sup>

这一戏剧还表明了美国政府的恢复力。因为,尽管这些问题,政府照常运作,并度过了十三个月所谓的危机,分心无疑是存在的。但是,联邦政府(这并非是指整个美国政府)严重地偏离了国际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积极参与,或者国内的危机如社会保障和健康保险等问题没有得到关注。有些政府应解决或至少应朝得到解决的方向取得进展的问题,联邦政府无法在 1998 年解决;有些问题不再成为问题;

---

<sup>③</sup> 约翰·哈伍德和简尼·康明斯:《策略性退让:克林顿年度的可能性原因:丑闻话题》,载《华尔街日报》,第 A1 版,1998 年 12 月 11 日。



有些问题以通常的方法得到了解决。在总统即将离任的非全盛年月,他面对的是两院均由其反对派控制的国会,而且和平和繁荣使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得以暂时的消退,伴随着丑闻和丑闻传播已使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美国人民倾向于不支持积极政府,所有这些将拖延其他问题的解决。克林顿,一个积极政府的支持者,以其滑稽可笑的行为损害了公众对积极政府的信任。我们从中认识到,与托尔斯泰笔下的拿破仑一样,美国总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块飘荡在洋面的软木塞而不是控制潮位的月亮。<sup>④</sup>我们还认识到了虚弱的力量。在克林顿为政治生存而抗争之际,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也保持低调,因为知道克林顿总统急于表明其实力和转移视线(与狗打趣)。我毫无疑问地认为,当莫里森案件和琼斯案件发生共同影响而使联邦最高法院将总统和全国置于开始于1998年1月28日开始的苦难时,他们正在玩火;但是各种侥幸的撮合使这个国家免于遭受最坏的后果。我们的制度具有恢复力,这意味着它们能经受挫折,但瑕疵依然存在。克林顿总统职位的危机,与几个年代之前的越南战争一样,暴露了美国制度各个分支的无数缺陷——媒体的博学人士(尽管不是在执行任务的记者)、政治顾问和预言家、公共知识分子、<sup>⑤</sup>华盛顿的律师界、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国会议员们、白宫的追星少女和献媚者们,以及总统本人。但是这一事件发生在历史危机之间的太平盛世,我们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取教训。

我们已经从中意识到,那些要我们接受他们领导的人,尽管他们有权力、有知识、能说会道、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富有成就,但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与我们中的其他人一样是愚蠢、下流、胆小和草率。这是

---

<sup>④</sup> 参见,斯蒂文·斯都罗尼克:《总统们造就的政治:从约翰·亚当斯到乔治·布什的领导能力》(1993)。

<sup>⑤</sup> 特别是那些被斯坦利·费希称之为“‘出租工作日’的知识分子或‘珍宝’知识分子——他们被邀请参与是因为他们被人们认为是特定问题的权威(相当于一个专家证人)或因为他们该问题持有的立场可以与另一个被公认的教授所持的立场戏剧性地对抗。”参见斯坦利·费希:《职业矫正:学术研究和政治变迁》,第118-119页(1995)。

说,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具有所有普通人的缺陷,他们只是幸运或具有专业或专门的知识而被推入一个具有权力或影响力的职位。他们粉墨登场、趾高气扬,直到有一天,某些不可预期的事件的发生撕下了他们的面具,粉碎了他们精心构建、似乎冷静的公共自我,展示在人们面前的他们是完全的普通和不完美。

我们已经从中了解,专业主义,无论法律、学术或者政治,不再是有能力解决突发挑战的保证,而且恰恰相反。专业主义的趋势导致了极度的狭隘。职业人士掌握了现成的技能以处理同类问题。当有些问题的出现超出他们处理问题的习惯时——如克林顿-莱温斯基案件中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现象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他们的专业技能、训练和经验的限制就暴露无遗。

我们还从中已经领悟到,法律太多并非好事。我们不需要在总统任期内起诉他,我们不需要一部《独立检察官法》。

总统职位的神秘性成了《斯塔尔报告》和总统在全球观众面前接受大陪审团公开询问的原因。我们知道,在理论上,与所有人一样,总统有身体和包括身体功能的私生活、有私生活窘迫、低级趣味(一个收集青蛙的总统)和不完美的性格,会作出异常错误的判断,这是一回事;在确定和抽象通常被隐藏的细节时和在本案中知道声名狼藉的现任总统(而非已经失去光泽的历史人物)的私生活,这是另一回事,所以当琼·笛蒂翁尖刻地将总统说成表现了“粗野的青少年所习惯的掠夺性性行为”和标志了“深度的自怜、迅速的责备、眼界的狭隘,如同在野生动物记录片中,但事情并不依其意愿发展”<sup>⑥</sup>时,无人指责她的评论的公正性。她将野生动物作比较是适当的,因为野生动物没有私生活。

总统职位的神秘性受到了损害,也许是摧毁;但是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神秘性并未因此而得到补偿性的增进——事实上也受到了损害。法院的职责将因莫里森诉奥尔森案和克林顿诉琼斯案的惨败、

<sup>⑥</sup> 琼·笛蒂翁:“克林顿收缩筋”,载《纽约时报书评》,1998年10月22日,第16页。

因首席大法官林奎斯特黑袍的饰纹而被记取；我们已经从中明白，参议院，与众议院一样，成了一个过于政治化的机构，以至承担了《美国宪法》所赋予它的弹劾总统的司法功能。

在这场惨败中，法院的作用将被很快遗忘；没有一个了解国会的人会将其视为一个司法机构。被我称之为终极的华盛顿小说所具有的最持久的影响可能是，人们不会再将总统视为一个超常的人；同样的理由，一部更伟大的小说，《往事的记忆》，由于其确定细节的痕迹而使人们很难将那些政治贵族看做超常之人。对那些认为权威需要依靠神秘维持的人而言，总统神秘色彩的破灭是一场灾难，对此克林顿付出了代价。他们也许是对的，有效的政治领导需要依靠神秘性。但我认为他们错了！美国人的政治成熟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他们毫不奇怪地认为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知识领袖是他们的同类人，绝不是什么模范。一个国家绝对不需要依靠一个人的超常性。

## 译 后 记

对本书的翻译,既非出于我对克林顿事件的兴趣——尽管在克林顿事件的整个时期我正以访问律师的身份在美国工作,并且与作者讨论过他正在撰写中的本书的有关内容,也非出于我对法律政治的兴趣;接受翻译本书的请求,主要是出于我对理查德·A·波斯纳先生的崇敬,他以其独特的知识良心和独立的学术立场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他现居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巡区首席法官的高位:当法学研究陷于可危的方法论匮乏的境地时,他与其他先驱者们使北美(乃至全球)的法律经济学成为一种运动,但在经济学在法学中的运用走向庸俗化的时候,他又开始矫正其滥用——他自始至终认为法律经济学只是一种方法;当整个世界——尤其是律师职业界——走向日益短视的功利化并附和和各种势力的意见、许多律师(甚至是法官、法学教授)放弃法律原则立场(并非法条主义)而对克林顿事件作出得意的评判时,他——作为联邦法官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不宜发表任何意见——却在独立地思考,以致在参议院审判结束后的短短第4天就完成了本书,向社会提供一种法律职业人员的见解(我曾经与一位已经退休的美国政界人士谈及波斯纳法官的本书,他说:这是同类书中最优秀的一本书,但从政治角度和个人职位发展考虑,作为一个联邦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也许不应该写这样的书。);当信息产业的发展使美国的反垄断法面临挑战、微软案件控辩双方在美国联邦法院争战时,他被任命为调解人,以提供法律建议和从中斡旋,并开始

考虑新经济中的美国反垄断法律问题(其著名的《反垄断法》——1976年《反垄断法——一种经济学视角》的第二版将于今年面世)

.....

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已经过去快两年了。作为一个总统,美国留给克林顿的时间不长了,可他的伪证行为和整个事件作为历史留给美国(不仅仅是美国,而是整个人类)的遗产将使后人永久受用,尽管人们(可能包括他自己)可能已经开始遗忘(甚至有人认为,与其让布什或戈尔当选总统,还不如让克林顿连任,如果法律允许的话;连同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愿望,因为他觉得做总统很好玩,可见美国宪法对任期限制的意义和法治的意义),或可能只是两党之间或某些个人之间因此结怨而持续争斗。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对其中问题的理性思考。当我在开始翻译本书、与美国朋友谈及此计划时,有人建议我不要将此翻译成中文,因为他认为这是美国政治制度和学术环境的负面现象,可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和追求。然而,我恰恰认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会有一种完美的制度,克林顿事件及其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能给国际社会提供思考:

**公共知识分子的权利、社会角色及其群体命运** 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以向社会提供知识为职业、并独立于政府机构和营利机构的群体。对于这个群体,严格地说,这是一种职业,社会应赋予其不为利益和政治影响所迫而追求真理的权利,以体现其独立性。尽管其与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具有外延上的交叉,但不同的是,这种学术自由除了其法律权利以外,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其难以逃避的职业道德义务,即秉持知识良心在各种社会争议场合提供中立的专业意见(典型的如美国国会听证会中的中立专家证人——这些证人当然不全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提供公共舆论。在这个群体中,人们应该有一项默示的基本职业道德契约条款——即,你的观点应该不为你个人的政治追求和经济利益所左右。否则,你可以选择从事这种追求的职业——律师、政府官员、商人,因为公共知识分子



这种职业已经为你提供了应有的收益——经济收入、社会尊重以及要求你为此承担相应的成本,包括遵守职业道德。不遵守这一道德规则的个人行为可能使这一群体严重贬值,对这一道德规则的执行不力或者集体性地背离将导致这一群体的崩溃。当然,这一机制的产生,需要有规则的自由竞争市场、提供优良服务的制造商和供应商、有需求并有足够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合理的管制者,其中缺一不可。然而,作为这一群体本身应审视的是,如何提供一种优质的服务——具有中立性、知识性、思想性和权威性观点。我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也不甚明了历史的中国和当今的中国是否存在或有多少公共知识分子,也许我对公共知识分子提出了过于苛刻的道德要求,尽管这不是针对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要求。理性地思考这一问题,就像人们开始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丑闻习以为常一样,公共知识分子也有其作为理性人应有的各种需求。但是,职业的选择本身毕竟体现了其需求的选择。无论如何,在希望彻底破灭之前,人们总是抱有幻想,幻想在这个趋势逐利的时代有一块净地。任何人在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之前,应该具有基本的心理准备和铭记这一群体的职业道德要求,即在远离纷争和喧哗的同时摒弃“杂念”。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现实生活将远比想象的要艰难,克林顿事件所反映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现象(我在此并不是说,反对弹劾克林顿总统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没有遵守其职业道德,我相信波斯纳法官也不这么认为),对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机制尚未建立或尚不健全的国度而言,其意味是更加源远流长。

**程序法律的意义** 在一个法律极为详尽甚至到了烦琐的国家、在一个极为重视程序甚至在某些制度中程序重于实体(如正当程序规则、证据无合理怀疑规则)的国家,出现弹劾制度的程序法缺陷,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就传统性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而言,这一事件现象具有正负两面的影响。其正面影响为,引以为戒;其负面影响为,引以为藉。我由衷地希望,所发生的不是后者。

就法律的实体和程序规则而言,这好比是轨道交通中的铁轨与车辆的关系,离开任何一项,整个系统就没有意义。如果一定要判断何者更重要,就得分析由于车辆运行延迟所造成的轨道闲置、系统无法运营的成本与轨道建筑延迟所造成的车辆闲置、系统无法运营或两者中任何一者的质量问题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成本。理论上而言,法律应是一个实体与程序并举的规则体系,两者不可偏倚。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人们的行为习惯和历史教训,尤其在一个不重视程序规则的社会,对程序法律的任何程度的强调,都不会过度。

**现代社会的道德要求** 人们也许一直在反复思考现代“堕落”社会的道德问题,婚外性行为、性交易、吸食毒品、机构腐败、尔虞我诈、种族仇视等。然而,对历史的回顾告诉我们,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古代社会、近代社会道德问题的变异。它们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这些道德问题,是人类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因价值判断的变化而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现代社会的信息交流,使这些问题广为传播,使那些原来为“上流社会”和“地下社会”的人们所“垄断”的不道德行为为“平民阶层”所知晓,开始感到惊讶、难以置信,随后开始习以为常、麻木不仁,因为他们无所作为,甚至介入其中,从而降低了人们的道德要求。然而,一个社会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道德的维护,要么将不道德行为道德化(公众化),要么使不道德行为承担成本,否则不道德行为的泛滥将引起严重的行为规则价格歧视、造成社会不公、导致信任危机、引发社会重组。道德问题不仅仅是道德问题,克林顿事件还提出了道德的法律问题,即政府应对何种不道德行为进行管制(即使不道德行为非法化)和如何管制。我的答案是:首先,政府只应将资源用于对产生外部成本的不道德行为的管制;其次,政府只应将资源用于其收益超过其成本的对不道德行为的管制;最后,政府的管制措施应足以在正常分析中阻止类似不道德行为(不法行为)的发生。依据这些标准,也许我们至少有了一个方向。

**处理社会冲突的策略** 一个成熟的社会(小到社区,大到国际社

会),其成员(包括个人、机构和国家政府)必须具有足够的智慧,通过谈判、裁决和妥协而解决各种社会冲突,以尽力避免危机的发生、避免诉诸解决危机的武力手段。不论在波斯纳法官先生认为克林顿事件的处理有多少策略上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硬币的两面。从美国社会本身,它应从中汲取改善其制度的教训;但作为一个外人,我们除了应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外,还应注意到这些事件发生过程中,整个社会的总体有序性和面对游戏规则所体现的个人意志、组织意志的灵活性。

当我在完成本书翻译后撰写本文的过程中,这里又发生了一场牵动全球人心的法律之战(并且再次明显地体现了严重的党派倾向)——2000年总统选举佛罗里达州选票重计案,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当事人、律师、法官和其他职业人员——都在接受法律和道德的考验,民众意愿、选举制度、正当程序、分权制衡、司法独立、联邦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以其独特的方式需要这个民主国家去直面。当然,所有的问题将留给人们去思考、留给未来去完善。

作为一种惯例——因为我一直认为没有其他人的帮助任何人将一事无成,但更是一种由衷的表述:我要感谢所有家人和亲友对我生活和事业的帮助和支持,是他们使我拥有对生活的激情、对事业的执著、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人类的关注,使我对法律职业的持久兴趣和在异常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之余翻译本书成为可能;感谢参与本书翻译的各位同仁,他们卓越的翻译水平使本书显得更有意义;感谢法律出版社的各位同仁,他们独具慧眼,安排了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并且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使这本在本主题中最具分析和理论深度的书呈现在广大中国读者的面前。

蒋兆康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于康尼狄克州纽黑文

